

白雲論壇

第三卷

张本义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主 编 张本义

副主编 辛 欣 范旭仑 王雨霖

目 录

上 辑

张本义 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李 季 中国文明的起源

乌丙安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与影响

张从军 汉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谢景芳 谈清史和清史研究

王充闾 话说张学良

王 毅 名作的感染力

梅显懋 中国小说与史传的不解之缘

梁归智 《红楼梦》探佚

马明捷 谈谈中国戏曲

宋 民 书法创作及其特点

杨 新 漫谈今日书画市场与收藏

木田知生 日本中国学漫谈：以京都为主

宋协毅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桃太郎故事为例

下 辑

张本义 书法的危机与书家的责任

李勤璞 农事与艺文：秋胡戏妻作品中的桑树

王雨霖 《从朔编》考朔

房学惠 罗振玉、罗继祖点评《桐阴论画》

孙绍华 唐与渤海关系的珍贵文献

辛 欣 甲午战争前中日留学教育及比较

冷绣锦 黄海海战“松岛”舰被击真相

孙海鹏 青泥诗文补

孙绍华 石涛新论

萧文立 罗雪堂兴农思想句玄

陈艳军 顾颉刚与图书馆

闻 鲤 《罗雪堂合集》出版

戴立强 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上 辑

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张本义

记得，五年前白云书院开课时候，我们请来了著名学者于植元先生。他在给我们开第一次讲座时曾谦虚地说：“好角都在后边，京戏开演时，前面总有垫场子的，这个垫戏的，可以使迟到听众等到大名角出场。”今天“白云书院国学义塾”志愿者培训班上第一课，我却当真的属于随着开场锣鼓上场的第一个人。抛砖引玉，以后陆续再请大方之家到这里做高层次的讲座吧。这不是谦恭之词，确是肺腑之言。

今天，我结合我们白云书院，讲一讲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我想根据我个人对书院精神的学习谈点体会。首先，介绍一下我国书院的大致历史、白云书院的缘起；其次结合朱子的白鹿洞《揭示》，探讨一下“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第一，说说我国书院的大致发展情况

《辞海》将书院定义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校类型，始创于唐代”。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重视诗赋文学的进士科考试地位上升，出现了隐居于山林寺院读书的风尚，于是兴起了私家办书院之风。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唐代民间办的张九宗书院（在今四川遂宁）、邺侯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等，都是私学性质。有资料表明，私家书院早于官办的书院，而且这些私家书院已具备了教书、念书、藏书、著书、刻书等后来书院的基本功能。所以，唐代中后期是我国书院的发端时期。

宋代初年，因为国力有限，朝廷尚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兴办教育，特别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文化典籍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因此私人办的书院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宋人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

张本义，大连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特别是宋真宗赵恒对私人办的书院采取了扶持和鼓励的政策，曾先后为岳麓、嵩阳书院赐书、赐额。宋廷南渡之后，大批读书人流落江南，这样就使南方的书院兴盛了起来。一些名儒如晦庵朱熹先生、南轩张栻先生、东莱吕祖谦先生、象山陆九渊先生等等，为创办和主持书院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朱熹先生在知南康军（在今江西）之后，重建白鹿洞书院，购置学田、招收生徒、延请名师、制订学规，并邀请陆九渊先生前来讲学。其后，各地争相仿效白鹿洞做法，纷建书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办学宗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经费来源、组织机构、山长遴选等制度，从而使我国的书院进入了发展时期。

元代的国祚虽然不及百年，但却较为重视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金州博物馆工作时，在金州城南门外修路工地，发现了一通元代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的金州儒学残碑。这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教育第一碑”。地处辽东半岛的金州，当时属于边陲之地，尚建有儒学，说明元代后期教育发展的程度。元代中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在建立地方州县儒学的同时，下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行径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贍学者，并立为书院。”各地书院也纷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元的统治者，由于加强了思想控制，使书院里的学术自由和创新氛围大大削弱，其办学规模和水平都远逊于宋代。此为我国书院的恢复时期。

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两个系统。一是官学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学（太学）、地方的府、州、县学等。比方说，明代县试中，考取了生员（即秀才）资格才能参加院考，生员在院考中取得了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乡试及格（中式）称举人，举人参加会试，中式者称贡士，贡士参加殿试之后成进士。各级官员大部分就从这些举人、进士等中间选拔，读书的士子们要做官，也大都沿着这条干禄之阶往上爬。另一个系统就是私学，主要指民办的书院。

明代，以提倡官学为主，但是士子们更是喜欢相对自由的书院。到了明代中期，王湛心学大盛。王是指王守仁（阳明）先生，湛是指湛若水（甘泉）先生。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到各地讲学，不仅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使书院成为学术思潮的摇篮和学术创新的基地。到了明代的后期，书院内的思想非常活跃，因此，朝廷开始加以压制，首辅张居正就曾奏请废书院。而遭受最大劫难的书院，则要属无锡东林书院了。当时是魏忠贤的阉党专权，政治非常黑暗。天启五年（一六二五），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当时东林士子受迫害者达三百多人，这是明代迫害知识分子最为惨烈的事件之一。尽管

如此，纵观有明一代，由于学术思想的活跃，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书院得到了更大的普及和发展，此为我国书院的鼎盛时期。

清代，书院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尤其在乾嘉时期，各地书院的数量和规模也都达到了全盛。但清代对思想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这时的书院，已经和官办的儒学所差无几了，有的甚至和官学一样，很少组织会讲，只是负责月考、季考等事。特别是失去了宋明以来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创新精神，学术空气也相当沉闷。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利舰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国艰日亟。人们纷纷把批判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作为传播传统国学的书院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甚至认为国家贫弱的原因就是因为书院等教育制度落后所致，一时间“争毁书院”之风四起。到一九一〇年清廷实行“新政”之后，历时千年的书院被废止。此为我国书院的官化期和末落期。

有资料表明，我们大连地区有可能在明代已出现了书院。清代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在金州文庙内创建了南金书院。“南金”为南方出产的一种高品质的铜，古时所谓的金，多指铜。《诗经·鲁颂》有“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的句子，说的是淮夷将大龟板、长象牙、整块大玉和上等金子作为礼品献给鲁僖公。后常以“南金”比喻人才。由于清代金州城至今甘井子一带属金州厅内的“南金社”管辖，故书院也以“南金”名之。后来，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在今瓦房店市的复州城内又建立了横山书院。横山是瓦房店市内的一座名山，横山书院的遗址现仍大部分保留下来了。这两个书院在清代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大连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把南金书院改为“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主要以办学教育为主。当时的贡生王永江先生就作过监院，他也是著名学者、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和书法家，后来当了奉天省长。当然，这时期的南金书院也是徒有其名了。

有一句话，叫“痛定思痛”。在沙泥俱下，鱼龙混杂之时，很难看清事物的真面目，也难以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现在看，清末的“新政”就是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到清朝后期几十年间就忽然垮掉了？除了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深刻危机之外，士子们也助了革命党人一臂之力的。为什么这样说？因“新政”废了科举、废了官学、又废了书院，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没有出路了，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时候，怎么能指望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热爱和献身呢？所以清朝很快就垮掉了。然而，仅仅在书院废了二十年之后，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就曾感慨地说：“书院之废，实在吾中国之大不幸事。”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中国书院的传统实在不应丢掉。

第二，讲讲我们白云书院的缘起

我们大连图书馆为什么要兴办书院呢？大家知道，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从十九世纪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上个世纪初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推行西式教育，推动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为不公平的待遇，一时间甚至视传统文化为仇敌，必欲破除而后快。从而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大家都看到，今天崇洋之风愈演愈烈。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不够，仅以现实生活为例。今天的年轻人，吃的是麦当劳，听的是西方的音乐，跳的是西方的舞蹈，看的是西方大片，学的是西方语言，穿的是西方服装，过的是西方的节日，住的是西式洋楼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一些人俨然将自己视作了西方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不屑一顾，从而丢掉了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传统价值观，乃至文化认同发生了转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丧失殆尽。这是一件西方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情况，也是我们值得深刻思考、深刻重视和深刻忧虑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文教化。《周易》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我认为，所谓文化，“文”是指人文精神，只是个手段，而“化”是变化，是改变，才是目的。直到近代，“教化”不仅是我国各级地方官吏任职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且是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作为学习和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书院历来重视对民俗民风教化功能的发挥。如书院讲会时，受众一般比较宽泛，有的几乎直接对社会的所有成员开放。吕祖谦先生曾说过：“士大夫善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知去做，如何会得好？”（吕乔年辑《丽泽论说集录》卷十）在今江苏的虞山书院就曾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在今安徽的明万历年间的赤麓书院《会约》中说：“独计地方风俗，寔失其初，及今不返，后何底止？今将一应遵事宜，胪列如左，期与诸友共以此意劝勉各家。挽浇靡而归之淳质，此会不为无益。成已成物，原非虚语，维风范俗，吾儒实学。”该《会约》中所到的事条，如“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劝业”、“止讼”、“禁赌”、“备赈”、“防盗”、“黜邪”等，皆关系到民风之教化。

“国际图联”指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教育功能。我国文化部也已将社会教育纳入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范畴。应该说，社会教育中，“教化”风俗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利用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式，对广大市民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教育和化成。这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兴办书院的一个原因。

书院是一个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标志之一。“理一分殊”，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书院的举办也各不相同。因此，书院也都彰显了一个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地方文化。一些历史悠久和文化昌明的地区，如今天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河北、山东等都是由于历史上书院众多，才使民风文雅，人才辈出的。有人，甚至有的大连文化人说，我们大连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对这话，我一直持批评意见。如果是一个对大连历史无知或者外地人说这种话，尚情有可原。但若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歌哭于斯的大连人，特别是大连的文化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就叫文化。可考古证明，大连地区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有了人类的活动呀！能说我们没文化么？我曾参加过田野考古，亲手在金州城内原始地层中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小珠山文化时期的陶罐，而后商周遗址遍布大连。市内烈士山上就有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积石墓。汉代曾在此建过沓氏县，日本人当年在建设大连城市时，在现今的劳动公园内，也曾发现过汉代的遗迹。因此，说大连地区没有文化是无知或错误的。

从汉代一直到明清以来，大连地区的历史发展也赓绵有绪，从未间断。如营城子汉墓、大李家汉城、董家沟汉城、张店汉城、陈屯汉城等都可以证明，汉代这里人烟麇集。有人说，晋至唐代总章年前这里曾被高句丽占据过二百多年，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直到现在，在大连地区还没见到过一件准确的、典型的高句丽时期的出土器物。还有人说金州大黑山城是《唐书》上所说的高句丽时期的卑沙城，我曾也持有这个观点。史书上说卑沙城“四面悬绝，唯西门可上”，但我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大黑山城西边有两个门，从而对其是否是卑沙城发生了怀疑。相反，我们曾经在大黑山城附近发现过两处战国刀币窖藏。我们还在金州北屏山发现了北齐天保二年的纪年菩萨像。这个造像非常精美，与中原同期石刻造像相比，毫不逊色。辽金元明清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可以说遍布大连地区。到近代，很多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先生、罗振玉先生和康有为先生等都在此居住和讲学，他们都是一流的国学大师。民国初年的一批反袁志士，很多是大学问家、大诗人，都在此居住过，因此，当时大连的文化影响力在全国也是很大的。

只是日本占领时期实行奴化教育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受了严重的阻碍。解放至今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大连地区的传统文化应该说比较薄弱了，这样说，才是符合实际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大连人，特别是大连的文化人，决不应妄自菲薄，应该为脚下这块土地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做事才是，因为无论从哪儿讲，这是我们的根啊。这是我们之所

以兴办白云书院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教育方面。现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完全是照搬西方的模式。结果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发生了严重龃龉或悖离。种种弊端在新式教育实行不久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竺可桢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浙江大学宜山开学式上就曾指出：“现在的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

今天，在教育全面西化的潮流中，我们将传统教育的对人的本体教育忽略了，只注重了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役于价值理性之上。用传统教育思想的语言说，即是只重外在事功，轻内在的安身立命。

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仍以应试教育为主，某种程度上可与科举年代的应试相比。尽管我们一直在提倡进行素质教育，但学生们为了应试，累死累活，死啃书本，根本无暇顾及其它。仅以书法教学为例，虽然教学大纲有规定，但因与考试无关，大多数学校根本不进行写字课基础教学。现在我们的孩子，很多已写不好汉字，甚至不会写，也不屑写汉字，别忘了汉字是我们的母文，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全部信息，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粹之一啊！古人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法是一个人的脸面，也是谋事的资本，它可以磨练人的情性，人的抽象能力，人对美的感知力，所以传统教育中对汉字都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来对待的。有资料说，现在日本，师范学院的学生能否毕业，要看板书。板书写不好，就没资格当教师，因为教师的字写好与否对学生影响极大。可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老师，有几个能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呢？我们的教育只看升学率，只看分数，其结果和科举时代官学的应试教育几乎毫无二致，窒息了思想和创造力，白白浪费了青少年许许多多的大好光阴。

而与此相反，我国传统书院中宽松的讲学环境、自学精神和灵活的办学方法，确实值得我们现在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教育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不行。有感于此，我们也想通过摸索一条现代书院教育新路子，就像当年书院和官学互补一样，我们现今的书院也能和现行的教育制度互为补充，以求为改变现今僵化的教育思想和体制贡献我们的心智。

我们兴办书院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办书院的条件。书院，顾名思义，与书分不开。书院从一开始就是藏书、刻书、校书、教书的地方。而如今的大连图书馆藏书多达二百七十万册，仅古旧籍就有六十多万册，我们有一批历史文献研究学者，而且还有一大批像在座诸位这样的志愿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迅速回归，也为我们创办书院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大连历史上有南金、横山书院的学统，百年之前，亦曾群星灿烂、光被桑梓，很多学子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支文

脉我们不能让它断了，尽管这一文脉几十年来已命悬一线，但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也仅是一瞬。以上，都是我们创办白云书院的基础。

白云书院从二〇〇一年创办以来，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又开办了“国学义塾”。六年来，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一步步走了过来。至今已有上千名学生在我们书院肄业，几万名市民聆听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已经编辑出版了《白云论坛》两卷，还编印了《四书读本》，在学术研究上还将陆续出一批成果。当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传统文化教育决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大连也可能培养出一大批我们自己的国学人才，甚至于栋梁之材。那时，人们会记住我们的，会记住白云书院的。

为了改善我们的教学环境和水平，我们去年又筹集资金对白云书院七百平方米的院舍，依照明清书院的风格进行装修和改造。总体来看，可以说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要按照传统书院风格进行装修呢？这是因为书院建筑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之一。《论语·泰伯》章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说，要坚定相信道并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全它。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动乱地区。天下太平则出仕，不太平就隐居。由于从孔子时代起，隐逸就成为文人士子的一种时尚的文化行为，就连孔子在曲阜讲学的地方，后来也被广种杏树，称之为“杏坛”，再后来发展成隐逸于山林传道的文化风范。西晋名士张华《招隐诗》中有“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的句子。后来的私学大师们，多依照这个传统，将书院建到山林幽谷之中，依赖于优美静谧的环境以陶冶师生性灵，潜心传道授业和著述，实现其不能“立功立德，也须立言”的理想。书院建筑摒弃繁复、夸张和奢华，多取平淡、简朴、方正、雅致的风格。由于这种风格与儒家的中庸平和的理念相附和，所以，千百年来已成为书院建筑的一种标准和定式。而反过来，这种高尚雅致的建筑本身，又进一步陶冶了士子们高尚雅致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建筑的魅力所在。

我们此次对白云书院进行装修，不仅装修风格追求古朴，而且连所有的家具也都采用了明式书房家具的做法，加之，参加学习的学生清一色的蓝布国服，与窗外的竹影与青山交相辉映，着力营造了一种传统文化氛围。其目的，还是借以“化成”学子们的精神和气质，造就倾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才。

有人问白云书院名称的由来。“白云”一词由我们书院地处白云山麓而得名，“白云”本身就很有诗意。我给书院拟了一幅嵌名联：“白云无语；书院有声。”表达了对白云书院的热爱和祝愿。

至于我们的书院里为什么要立孔子铜像和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等先生的刻石呢？我国书院都设有祭祀孔子等圣贤的场所，这也是传统书院的一种教育手段。因为我们白云书院场地有限，所以只在大厅供奉孔子铜像、在走廊两厢树立儒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碑石线刻造像，以纪念先圣先贤，激励后学后进，这也是对书院功能的一种完善吧！

第三，我们探讨一下“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什么是中国书院精神，是近些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有的说，书院精神就是一种“独立个性和姿态”精神，有的说是学术上“创新精神”，有的说是“自由的学术精神”，有的说是“兼容并蓄”的精神等等。当然立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概括的结论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上述的概括，都无法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概括中国书院的精神实质。

我认为，中国书院的核心精神，就是“学为己”或称“为己之学”的精神。

“学为己”的思想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宪问》章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说，古代学者的学习目的，在于整治和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性，达到圣人、君子的境界，而今日学者的学习目的，则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取悦于人，以达到功利的目的。按照孔子一贯的崇古思想来看，“学为己”是应该推崇和提倡的，而“学为人”是应该反对和鄙弃的。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希望行道于天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必须循序渐进，由基础做起。《礼记·大学》中开列了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为由学习知识和道德，再到政治的培养和造就的过程。也就是说，成就政治理想必须通过穷追事物的原理（格物）、获得知识（致知）、诚实意念（诚意）、端正思想（正心）、修养己身（修身）才能实现。也只有做好了如上的五条，才可能实现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八个条目中的前五条讲的都是“修身”的内容和步骤。而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也在于“修身”。“修身”是能否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不能“修身”，遑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中还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一词，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学为己”。“修”与“学”、“身”与“己”互训，都是一个意思。《经典释文》训“学”为“治也，习也”，《礼记·礼运》里有“讲信修睦”的话。《广韵》训“己”为“身”。而《释文》所训学为“治”和“习”，包含了学习和整治的过程。由此可见“修身”一词，也就是通过学习以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行来整治自己。

在孔子的思想中，“学为己”要达到怎样的修身境界呢？《论语·述而》章中说：“圣人，

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这里面，孔子提出的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就是人们通过“修身”而达到的四个不同层次：其最高者，称为“圣人”，其次是“君子”，再其次是“善人”，最后是“有恒者”。

按照孔子的说法，“圣人”只有极少数如尧、舜、周公等才是，而“君子”，则是指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就曾谦虚地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见成为君子也是孔子自身的理想。一部《论语》中，有八十七章论君子，仅“君子”一词就出现过一百零七次。而且以“君子”开端：即《学而》中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君子”结尾，即《尧曰》中的最后一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所以，尽管“圣人”是儒家人格的最理想境界，但由于达到者少之又少，不如“君子”这种虽未尽完美的境界，经过为己之学“修身”，士子都可以达到。因此“君子”对读书人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格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一部《论语》即是君子之论，而儒家思想也可称为君子思想？

至于“善人”，心地善良，但学问和道德都还没到相当高度，故比君子低一个层次。“有恒者”，仅是向善而有操守，坚持走自己路的有恒心者。在孔子看来，不管是“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都须经过“修身”即“为己之学”这个过程才能达到。“学为己”的关键，是要追求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内省达到自我内在价值。

“学为己”的思想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自我灵魂的一种终极关怀。对此，我想多说两句。

历史上士子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毕竟少数，故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特别是在天下无道时，士子为了独善其身，甚至采取隐逸的办法，安贫乐道，以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正像《礼记·学记》所说的，“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如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总之，通过学习，完全可以在寻求自我价值中实现自我精神满足。

比如，如何使身避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孟子曾教我们一种通过自反内省以在遇到横逆之时的一种精神慰藉方法。《孟子·离娄下》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的这句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若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上来说，也是“学为己”的一个好注脚。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说“学为己”是中国书院的核心精神。

我国书院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孔子的杏坛，由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官学废弛，私学兴起，以致学术勃兴，余风延及汉晋，促进了唐宋私学走向正规，并催生了书院。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末，这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就处在我国传统学术的中心地位。而书院自唐宋兴起之后，即成为学习、研究、弘扬和光大儒家思想的大本营。前面我们讲过，儒家主张“学为己”，注重人文关怀。一部《论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用“学为己”三个字即可概括，因为讲的都是君子“修身”做人的根本道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嘛！尤其奠定了书院学术思想基础的宋代儒学大师们，由于反对士子专以科举为务，损害了修养自身希贤希圣的内在追求，所以竭力提倡“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遂成气势，波至明清。如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内，就是内省，修身。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所谓“圣人”就是有最高的内在成就之人，而“为己之学”正是“圣人之学”。陆九渊说：“古之学者为己，所以昭明昭德，己之德已昭，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陆九渊集·语录下》）朱熹告诫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上有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它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宋子语类·学上·力行》）这里说的意思，如果不为己学，只是为了科举应试的话，必然学的是一些没有实际用处的虚学问。在宋儒看来，“学为己”才是真读书。而后，宋明理学大师们在书院中也都是讲修身为己之学。明代李梦阳在《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五中说，“夫道可修乎？修其人之身，即修道也。”“肇自文公（即朱熹），大兴洞学，条例古训，佑启后人。于是白鹿洞有规焉，实夫天下通规也。然今之学者，穷年而守一说，皓首而不能行，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其为斯道之蠹，大矣！”

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书院都有院规（或称揭示、洞规、学规、章程等），而其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要属被李梦阳称为“天下通规”的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了。它摘取了儒家圣贤有关修身、做人、治学的主要论述，是我国书院较早的，也较为全面的学规。从而成为我国近千年来书院教育的总纲。尔后几乎所有的书院在制订章程时，都设有“修身”和“治学”这两个中心。不管各书院的《学规》是繁是简，大都仿照白鹿洞朱熹手订的《学规》，而将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放在首要地位。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第一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五常”，也叫“五伦”。即父子间要有亲情，君臣间要有忠义，夫妇间要有区别，年长年幼的要有尊卑次序，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这是要人学习处好五种关键的人际关

系。第二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庸》里的话。朱子批注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这也《大学》里是所谓“格物”“致知”之要。第三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言忠信，行笃敬”出自《孟子·卫灵公》，“惩忿窒欲”，出自《易·损卦》，意思是君子要制止忿怒，阻塞嗜欲。“迁善改过”出自王弼《周易注》，朱子批注说，这是“修身之要”。第四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谊”通“义”，以义为主，以道为正。君子要讲究“义”和“道”。朱子批注说，这是“处事之要”。第五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即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句话，现在已被联合国定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准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凡事多做自我批评，多做反省，事情有自己达不成目标的，不要去怪别人。朱子批注“此为接物之要”。

以上全部五条，就是朱熹手订《揭示》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得到，引经据典所讲的都是如何“修身”，如何做人，从而成为我国书院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完全体现了“学为己”的精神。

至此，我国书院精神应该比较明确了，这就是“学为己”的人文主义精神。

顺便说一下，我们也根据传统的书院精神，结合现今的实际，制订了《白云书院学规》。其内容为：

- 一、延续国学薪火，弘扬传统文化。
- 二、入院均须尊师，向学更要重道。
- 三、学为己身立本，砥砺志气品节。
- 四、研读圣贤经典，为学经世致用。
- 五、举止整齐严肃，立身明礼敬人。
- 六、读书务必四到，疑误即时明析。

其中仍是着力于修身。前后二条我要略加解说一下。

关于“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固有的”，就是代代相传的，原有的。这与近代传进来的“西学”相对，又称“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上自儒家经典，下至中医、天文、地理、音乐、美术、书法、工程、技术等等。“薪火”，是指代代相传的学术。庄子说，“指穷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柴烧光了，火种却保留下来了，后来就用薪尽火传，比喻道术学业师弟相传的学统。国学的很重要的传授方法是口耳相授，如所谓“家学”，就是家族中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所形成的独特学问。如同匠人带徒弟，国学的学习

研究也特别重视师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前面我已说过。面对今天全盘西化之风，国学的继承和弘扬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一历史的责任。

关于“四到”。这是讲读书方法。过去古人读书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口到。后来胡适又加上手到。这是传统教学上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应丢掉。蔡元培先生在《二戴书院学约》中规定“学自即定，乃次学课，写读书笔记是也。日记读其书几叶，有新知有物义，皆记也。积一月，随课卷而缴焉”。“手到”，即是勤于动笔，有疑惑或心得应及时记下，以供及时解析和查阅、温习、研究之用。清光绪年间湖南龙潭书院《学约》也说：“古人读书皆有抄本，以流览之书随看随忘，非经手抄则漫无省忆。今拟定为句读、抄录二门。句读之功，不可旷日，抄录则随其心得，无庸按日定课。”

因为时间关系，关于发扬书院精神的现实意义待日后再探讨吧。

谢谢大家。

中国文明的起源

李 季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近年来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普通人中间都是很热点的问题，那就是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如果从历史科学、考古科学角度讲，文明史应该是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公认的历史，是在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这一年代有各种史书可以互相论证。因为从共和元年到西周初年，时间不算太长，所以史学家们认为西周的历史不会存在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周之前的夏商的历史是不是可靠的？能不能被证明？这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会儿我还要详细地说。提这个引子，就是想说明单凭文献记载，还不能从学术上、理论上非常扎实地推导出我们习惯讲的五千年文明的这一结论。

关于文明，基本概念是指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相对于过去野蛮社会来讲的。就是说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金属工具青铜器的使用，文字的使用和普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城市的产生，国家的诞生等等，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把它叫做进入了文明社会。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还有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有人说在爱琴海也有古代文明，另外，在美洲大陆还有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这些文明都是人类不断前进的辉煌阶段，其中公认的比较原生的文明是古埃及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和美洲的文明，它们的文明性是最强的，是最有独立性的。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道路，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别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说埃及早期天文学的成就，利用天文学观察尼罗河水泛滥的预测的准确性等等。我们中国文明起源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特色，有一个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那就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从诞

李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二〇〇五年七月三十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生到发展，即使中途有外族的入侵，但是作为文明、文化的本体始终一脉相承。比如说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一直到楷书，从文字本身这个系统来说，能够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脉相承到今天，这是绝无仅有的。咱们张本义馆长是书法家，他了解得比我清楚多了。大概在计算机普及之后，欧美一些人士曾断定汉字死定了，因为用二十六个字母的键盘输入所有的汉字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的汉字输入法已经有上百种了，且在当今世界上汉字仍然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字之一，这证明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世界上很多文明确实辉煌过，但客观地说应该叫一度辉煌。也有再度辉煌的，但是主人都已经更换了，比方说我们到印度去，希望主人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些早期佛教的经典、胜迹，但是主人更愿意给我们介绍印度教，认为印度教才是他们的骄傲。再比如我们只能说是古埃及人创造了金字塔的辉煌，因为古埃及人和后来的埃及人在人种的延续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有在中国，文明是一直传续下来的。

那么中国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是不是也吸收了其他文明优秀的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具体地说在哪一个阶段，吸收了哪些因素，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讲座就能讲清楚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成规模地和其他文明的交流，是在汉唐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丝绸之路，真正开启了和西方文明沟通的道路。过去我们认为丝绸之路一直通到罗马，但实际上它并非是一条很长的商路，而是一段一段的，比如货物先运输到波斯，然后再从波斯流通到罗马。所以我们不能说在西安出现了罗马金币，就认定当时中国的商队一定出现在罗马大街上，即使甘英到达了大秦（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不能说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已经有了贸易通道，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形成这种规模性的贸易。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形成阶段基本上处于独立发育和发展的过程，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地形特征造成的，比如说它和印度文明隔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西方文明隔着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地带，在没有驯养的马匹可以长途运输的情况下，真正形成贸易规模的沟通是达不到的。所以中国文明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下诞生的。

那么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祖先呢？

中国像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些口耳相传的记载，基本成形的说法是在很早的万邦万民时代，有一些小国家，在炎黄时发生很多战争，逐渐走向统一。期间经历过一段比较民主的禅让制，后来禹传启，出现家天下。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不同时代史书记载不同，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都是传说。到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认为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下来。那时候司马迁能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看

不到的原始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再加入一些他自己的主观判断，我们大家认为他说的还是比较可信的，有道理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很多西方的关于史学的理论，比方如何认定史料、认定史实等，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在十八、十九世纪得到了发展，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刺激，他们觉得对中国古代历史中朦胧的这一块儿，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看看我们老祖宗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对古代历史重新进行反思，这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场“古史辨”运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九二三年在《古史辨》上发表文章，提出这些历史是不是层层加码了、被放大了、历史被改造了。当时大多数史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中国当时处于转型时期，一些观点比较偏颇，有些大学者甚至对古史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汉以前无信史。经过激烈争论，后来大家都能心平气和来看待这些历史，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提出把古代文献分级处理，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场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人们极为迫切想知道中华民族真正历史的愿望，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确认自己的历史。从文献中寻找古人走过的真实历史是很难的，因为古书能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古书的语言和今天相比又有很大的变化，而我国文字又有多解性。那么是否有可行的办法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呢？于是就有学者试着从考古资料入手，寻找古人走过的真实历史。

上个世纪在古代历史方面有四大发现：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清朝内府档案。这四项在古书上都没有记载，而这四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人们见到的文字最多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石头上刻的篆书，对于更早的文字，大家没有概念。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认为这是一种很早的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这些文字，寻找其出现的源头，有这些文字的地方，应该是古代的首都，那么如果找到了这个地方，对古代的历史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最后终于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古代遗址，后来证明这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所以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是确认了商朝的历史。

殷墟的发掘不是最早利用考古资料探索文明起源的，中国最早从地下考古资料来探索古代文明是从河南的仰韶村发现的一些彩陶开始的。这些彩陶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出来的，凭其朴素的判断，认定这些彩陶的年代，应是比商周王朝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是中国原生的文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后来证明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安特生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还把西方的考古技术正式带到了中国。河南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的一个起点，这个功绩，中国考古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深入，中国学者自己也成长起来，包括一部分留学西方的学

者的归来，他们开始了自己组织的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发现的就是在河南殷墟的发掘。

抗战爆发之前，在河南殷墟连续发掘了十年，这是中国考古学家正规地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一个古代的首都进行科学探索，发现了当时商王的王陵、大批的青铜器、成坑的甲骨，最终证实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就在这里。这时寻找甲骨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了，因为还发现了宫殿、宗庙、青铜器等具备文明社会的一些条件，所以连最苛刻的否认中国文明很早就诞生的西方学者，对于到殷商时期中国已进入文明社会没有任何异议。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了，这是大家研究的一个起点。

随着对甲骨文的研究，大家越来越佩服司马迁老先生。在《史记》中有一个“商王世系”，就是历代商王的年表，这个是无法造假的，都很准确、具体。甲骨文的研究和《史记》的商王年表基本上是吻合的。这就是说，地下出土的材料，证明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看到了一些很可靠的资料，所以他能够把商代的历史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

通过殷墟的发掘，我们不仅了解到商代已经创造了非常伟大的辉煌的艺术，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青铜文化能发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在世界其他各大文化中都是没有的，青铜器铸造的技术和艺术，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是一个丰碑。它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商代的历史是信史，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司马迁对商代历史的研究是看了可靠的资料，是可信的，那么夏王朝的存在，不应该是凭空捏造的。因此夏是不是存在，就成了当时中国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

《史记》上记载商汤灭亡了夏。那么汤王在哪儿灭的夏？这个地点很重要，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支很发达的文化，如果它的年代又早于商，那它很可能就是夏。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祖先是来自东边来的，所以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到更东边，就去了山东进行发掘。一九二八年在山东省龙山附近发现一个史前文化遗迹——龙山文化，它以黑陶、灰陶为主，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所以大家认定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化，它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不久，中国学者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一九三一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河南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殷商文化的三叠层，正是由于这三个文化叠压的位置关系，明确了这三个文化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解决了困扰考古学界的大问题，这个结论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年代学的一个框架。但这只是三种文化的先后顺序，它们之间并不是紧连的，其陶器形制的差异非常大，中间肯定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能找到一种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殷商文化，能填补这个空白的，按照年代学上推断，它就应该是夏文化这个阶段。找到它，就有可能找到了夏文化的线索。讲是这样讲，但是发现是很困难的，考

古学上讲究可遇不可求，所以寻找夏文化就成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点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心愿或者心病。

考古界老前辈徐旭生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到今天仍然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很好的书。他通过对中国古代传说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中国古代的部族大体上是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华夏集团，大概以华山为中心，就是现在黄河中游这一地区；第二个集团是东夷集团；第三个集团是苗蛮集团（长江流域）。从文献上看，夏王朝的诞生应该与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关系最密切，统治区域应在现在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所谓豫西晋南地区。这样在时空两方面就给出了框定，就是说在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在商以前这个时间段里，如果能在豫西晋南地区找到一种文化，就很可能是夏文化。一九五九年徐先生带着考古队在河南偃师市翟镇乡二里头村（位于现在郑州和洛阳之间）发现了很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称二里头文化。经过后来人的发掘，尤其是到了七十、八十年代，发现了宫殿遗址、古代墓葬，出土了青铜器、玉石器等，其中青铜器既有点儿和早期的殷商青铜器相像，又比它原始，按年代应该排到它前面。现在通过 C14 测定，证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基本上处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考古学者基本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这里的夏文化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就是建立了夏王朝的这一支夏族的文化。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已具备了文明阶段的一些因素，这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上是具有突破性的。海外一些学者确实还不承认夏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原因是夏文化还缺少能够完全盖棺论定的证据——文字，缺少像甲骨文能够证明商代历史的这样一种铁证。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一些陶纹，就是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有的非常复杂，有些形状和后来的甲骨文非常相像，几近于一致，但是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学者之间有很多不同意见。可以比较明确的讲，不管发现多少字符，都没有形成句子，还不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完整的事件，所以只能说它是文字的端倪或者起源。

随着对夏文化探索取得的重大进步，中国文明起源的链条逐渐清晰了。考古学家又相继找到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中间环节和早于仰韶文化的更古老的考古学文化，这样中原地区在公元前六七千年，甚至更早一点，一直到商代，从考古学文化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重大的缺环了，基本上都连续下来了，这对于逐渐找到中华文明的根源，就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地方的文明都可以和黄河文明相媲美。比如说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环太湖一带地区）中，其玉器制造水平绝对高于中原

地区，同时说明这一地区经济也较发达；八十年代后期在汉水流域发现石家河文化，其城市规模很大，社会组织严密并出现了社会分工，后来在安徽凌家滩等地也有新的发现。再往长江上游走，在四川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其实三星堆文化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发现了，但当时未发现城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现了一大批青铜器，造型非常奇特，有的长达四米，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到西周时期。最近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发现了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青铜礼器、金器，甚至还有一大批象牙。总之这些文化遗址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都不低。此外，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辽宁西部位于喀左、建平县交界的地方，发现了一片红山文化的墓地，它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处于仰韶文化后期），也发现了一些制作非常精美的玉器，有石头做的击石木，用泥雕的神像等，作为一个政权祭祀的三个要素坛、庙、冢也都具备了。它的发现使世界考古界对中国的文明刮目相看。

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而从考古这个文化角度看，真正统一是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各个文化区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汉水流域、成都平原、黄河河套地区、山东泰山地区、中原华山地区、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以及辽河流域，它们的文化都能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甚至六七千年，各个区域都有本土的生长根基，也就是说每个文化圈自己的传承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星星之火，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文明火花的出现，它们既互相交流、融合，也发生冲突、战争，争夺生存空间，争夺的实质也是文明的交流和汇合。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华夏文明。这是大多数学者所得出的多元一体或多元一位理论。

概括地讲，中华文明的形成，从阶段说，是从小的古国到方国到秦汉帝国，才使文明变成真正成熟的文明；但是从起源地来说，是从不同地方分别起源，最后融汇在一起的。在不同阶段，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在有些地域，某个阶段，有的文明也是一度辉煌。举个例子，比如环太湖区域的良渚文化，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特别辉煌，在工艺制造上，遥遥领先，但后来到了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夏王朝建立的时候，它突然衰落下去，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依然没有答案，成为一个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探索。辽河区域的红山文化也曾一度辉煌。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使多元的文化能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为什么都能公认中原文化呢？这是学者们正在探讨、研究的。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原有一个交流、交往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吸纳周围的文化因素，比如殷墟文化中就有北方的青铜器，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很可能是殷墟文化玉器的前身。

青铜器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一个因素，其精美程度极具震撼力，不管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是在台北故宫，都是极具震撼的。但是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没有得

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在甘肃、青海发现了密集的青铜镜子、青铜刀等小件青铜器，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从西方传入的。理论上不能排除它和西方和西亚有交往，但是它本身在中国得到发展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自己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的考古还没有发现最早青铜器的起源，也就是最早青铜器是在什么地方加工的。过去西方学者提出置疑，商周文化这么辉煌的青铜器，甚至教科书都在讲，浇铸一个司母戊大方鼎需要八百公斤铜水，这得需要多少铜矿来熔炼？那铜矿在哪儿？河南没发现啊，安阳也没有啊，是不是从外国进来的？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采铜不在这里采，古代铜矿带在湖北大冶（今天依然是铜矿区），这就大体解决了铜矿来源问题。此外，还找到了采铜工具和铜锭，有了铜锭，就可以进行运输了，也就是说先在大冶把铜初级加工成铜锭，然后把铜锭运到安阳、洛阳等地，在这里把铜锭铸成青铜器。这样就很清楚了，我国青铜文明是从周代开始自己起源的，但是青铜器再早，就只有一些痕迹，比如在山东、西北都有零星的小铜片的发现。

再一个文明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出现。大家公认有了城市，才应该有文明，但城市和城不是一个概念，是不是围起一个城圈就是城市了。比如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都非常发达，但没发现有城，而有些有城的地方，里边没有什么像样的遗址，可能就是一些防卫性的地方。一般来说，有了城，就说明社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社会组织很稳定。在中国筑城的历史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三千年到三千五百年。

从考古学角度来证明古代文明，所应该具备的因素主要有青铜器、文字、城等，这些因素在中国不同的地区都能追溯得比较早，所以有学者兴奋地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不是还能再往前提，提到公元前四千年，也就是我们已有六千年文明史了，于是展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年代的大讨论。我认为应把文明因素的出现和文明的起源区分开来，把文明起源的过程和文明的最终形成区分开来。有一种说法我认为比较有道理，就是应该把文明的形成看作是一段路途而不是一个门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文明的形成是我们今天人给的一个定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非要划定哪一年进入的文明，这应该不是很科学的。比方说，对于成年的时间，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有的十六岁，有的十八岁，有的二十岁。实际上人肯定有一个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过程，但是把它准确地划到哪一年，其实是有一个幅度的，无论定在十六岁，还是定在十八岁，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道理来。所以我觉得探索文明的起源，划这种绝对的杠，意义不是特别大，更多有益的是来探寻它的规律，探寻它的特点，探索文明起源的道路对后来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像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总之，比较稳妥的说法，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以夏王朝建立为标志。这一方面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也认为社会制度在当时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这样说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加有说服力。当然，学术是在争论中不断前进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认识，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有更多的说法和更激烈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这种争论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阔的角度上来进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前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在今天的条件下（用航空摇杆探寻遗址，用C14来测定年代），大体上建立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框架，所以我们给后人也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希望更多有志于这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年轻人，能够对一个文明古国起源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贡献。我就先讲这些。

问：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证明了商殷史的存在，而顾颉刚先生则提出了中国古史里的“伪造说”。从考古学角度，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答：不管王国维先生也好，还是顾颉刚先生也好，我们今天不能说他们谁驳倒了谁，或者说他们的哪些学说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我只能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流的学术观点，并不排除有些认识还是有反复的。关于中国古史，任何一个观点、手段，包括考古，都不是最后终极观点和手段，都不能达到一锤定音的地步，所以包括对甲骨文的考释，对历史文献的考释，存疑是非常正常的，这种争论会长期进行的。

问：大连是滨海城市，按照古文化的划分，应该是东夷这一系。我想请李先生简单介绍一下，东夷文化在遗址中有什么样的延续性？占有什么地位？

答：现在考古学越分越细。非常坦率地说，我对大连文化确实缺少深入的了解，我只能笼统地说大连的古代文化应该属于环渤海古代文化区，所以作为广义的东夷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化，从考古学上认识，它是有自己独立起源的。另外，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上相对是比较单纯的。由于大连的古代文化有这么两个特点，所以大家对它的研究是比较下功夫的。但是，这一地区的文化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贡献，我想还得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工作，才能够讲得比较清楚吧。

问：据说中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有相似的地方，请李先生解释一下。

答：关于中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之间的联系，其实在前面已讲过了，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么长距离的、远程的、大规模的文化传播，现在没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

问：考古学的时间框架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那么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是否可以和以上三个时间框相吻合？

答：因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来对应是非

常困难的，但是我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旧石器时代排除，因为按古书记载，至少到黄帝时，应该进入了农业社会，如果说一定要和考古学对应的话，它应该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另外要细一点划分的话，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就是有了一定的青铜器，但是还没占主体。我们一般认为传说中的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应该是铜石并用时代。

问：您刚才讲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化的，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逐渐走向统一。请问在考古方面是否有遗迹可以证明这一过程？

答：考古上的遗迹主要是从形制上来分，比如我们日常用的做饭的工具，房屋的形制、兵器等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形制，那么在各个文明没有达到统一的时候，确实有很大差异。比如发现的秦代楚墓，楚文化特点非常鲜明，虽然处在秦王朝统治下，但是它强烈地表现为是楚人的墓，看不出有什么秦的特点。到了汉武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墓地遗址，虽然有南方的特点——漆器比较多，但是它的形制、格局是按照等级规制来进行的，体现了大一统的特点。

问：中国文明起源的规律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有什么启示？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谈一个。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这一特点看，有兼容并蓄的传统。今天，在政治上我们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在文化上，应该保存地方传统的特点。比如我们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它的宗旨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其他地方还办有不同的书院，虽然我没有调查过，但是我想肯定有弘扬地方文化传统的书院。地方文化传统不但包括古代的文化，也包括今天的创新。总之，这种多元的，交相辉映的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从古代到现代到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汉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张从军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墓葬装饰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在石材上雕刻的画。因为其雕刻方法有一种是线刻，像是用铁笔在石头上的刻画，所以被命名为画像石。但陕北地区出土的一些画像石也有在雕刻基础上的绘画，如雕刻出人物形象的大轮廓后，眉眼细部及其服装颜色则以绘画的形式表现。这种亦刻亦绘的艺术形式就是“画像石”。实际上，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从平面线刻到浮雕、透雕应有尽有，已经远远超出了画的范畴。因此，画像石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其内涵就是两汉时代刻画在墓室或陵园建筑上的石刻图像。

作为墓葬装饰，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墓室、墓地祠堂和墓阙建筑上，是完全为墓葬服务的装饰艺术。因此，画像石题材在主要围绕丧葬目的的同时，还有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环境、状态、面貌、形象的记录以及对与于黄泉地下、神仙天国等等不可知世界的理想描述。这些来自汉代民间的图像使我们在与历史久违了两千多年之后，得以目睹当时的社会生活真相，认识和了解通过文献、文字所不可知晓的汉代社会形象，了解汉代人们以画像石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示的汉代习俗和理想追求。

汉画像石概况

汉画像石主要分布于四个地区：黄河下游的山东苏北区、河南南阳区、陕北和山西西部的榆林绥德区、四川一带。

从画像石发掘和出土情况看，黄河下游地区画像石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大约从西汉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南阳地区则以西汉晚期和东汉中期为多，墓葬形式多为砖石混合墓，画像多布置在墓门和横梁以及立柱上。绥德和榆林地区多为东汉中晚期墓葬，画像主要装饰在墓门部位。四川汉画像石则以石棺和崖墓为特色。

山东、苏北地区发现的石椁画像墓不仅时代早，延续性强，而且藏量特别大，一座墓地

张从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

动辄数十、上百甚至有成千座石椁，以每座石椁四块画像计算，其数量就十分客观。大型画像石墓如安丘董家庄、沂南北寨、临沂吴白庄等不但闻名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武氏祠、孝堂山等小祠堂画像更是闻名遐迩，其画像拓片甚至被当作重要文物予以流传收藏。

西汉时代，山东、苏北地区的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和墓地祠堂上，到东汉时期，则刻画在石质或砖石混合的墓葬、石祠堂、石阙等墓地建筑部件上。其雕刻技法各式各样，有属

于绘画范畴的平面线刻，糙面减地，凸面线刻，也有属于雕塑范畴的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等。总之，举凡两汉时代所能见到的绘画和雕刻技术，在山东画像石的领地里都能够寻觅到踪迹渊源。可以说，如果要研究两汉时代的平面和立体艺术，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资料库。

和雕刻艺术相媲美的是那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一部大千世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现实，乃至神仙鬼怪、奇禽异兽以及中外交流、当代时事几乎无一遗漏的汇粹到了画像石里。如同东汉时期文人王延寿所论：“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文选·鲁灵光殿赋》）。

作为墓葬建筑的装饰，画像石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关于死后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想死，但又无法和生命自然规律抗争，于是便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寄希望于荒诞不经的神仙社会。大量成仙、求仙图像显示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执着、留恋和对来生的美好向往。为了达到超度天国的目的，人们竭尽全力的企求保持住现有的身躯，希望以现在的样子和状态进入神仙的领地，过上心仪已久的舒心生活，于是，保护身体不腐不坏，防止一切对身躯有可能造成侵害的因素，构成了画像石内容的重要主题。

从护卫辟邪到升仙脱俗再到教育警戒，这是画像石内容发展的“三部曲”。辟邪是为了保护好躯体，以便顺利升仙，教育警戒虽然与延续其子孙家业有关，但最根本的也还是为了延续墓主接受祭祀的权力，使其世代代享受着人间的香火，享受着历史的礼拜。

画像石艺术形式为什么在两汉时期倍受青睐和欢迎？

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春秋战国的封建化改革到两汉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人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认识，精神生活也因此而五彩缤纷。众多人们在尽情享受安定富庶生活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未来的发展，关注人死后的去向。有钱便有闲，便有空去寻觅去琢磨一些新奇观念和文化，于是，神仙方士应运而生，普天下的“奇技淫巧”风从云集，在黄河下游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十分优裕的场所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画像石作为一门新的装饰艺术，很快便在这里流行开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比较起来，世界上最早在石头上刻画的是古埃及，然后是希腊半岛以及两河流域。古埃及将画像刻画在墓室的做法和汉墓画像石的做法有许多地方几乎完全一样，比如，画面的分层分格，人物加榜题，主要人物形象高大，而侍者或宾客相对渺小等等。这些相似之处，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联想，把汉画像石与古埃及的墓室画像联系起来。另外，画像中所见一些半人半兽的形象，与希腊和两河流域的图像如出一辙。这种种因素和着丝绸之路乃至更早一些的草原之

路的交流，为寻找画像石的源头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话题。

黄河下游一带，一直是一个十分富庶开放的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为什么首先在燕、齐地区出现了大量神仙方士，诞生了那么多奇谈怪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来自草原之路的文化交流有关。在神仙方士思想基础上诞生的道教何以最先在中国的北方（燕赵地区）和东方（齐鲁地区）发生，其思想渊源也应该与这两大地区活跃、开放的思想文化有关。

总而言之，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艺术形式，在中西交通日益频繁和密切的西汉时期诞生，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合品。不同的是，这种艺术形式在被吸收到中国传统艺术的行列里后，便很快被同化和改造，并按照各个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需要而改变着面貌，成为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也是为什么一提起汉画像石艺术总是被誉之为“博大精深”的缘故吧。因为画像石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的精髓。

二、石椁画像

椁是古代墓葬中的外棺，套在棺材外围的一个空棺，其目的是保护棺材不受外部挤压，以确保棺内的尸体不受伤害。棺椁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一种埋葬方式。石椁则是木椁的替代，所以以石代木，其原因在于石材比木材坚硬结实，不怕侵蚀，不易腐烂，可以永垂不朽。石椁最早出现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但带有画像的石椁最早问世可能是在西汉的武帝或者昭帝、宣帝时期。最早使用石椁的地区在山东南部的济宁、枣庄和临沂和苏北地区，社会上大量使用石椁埋葬的时期是西汉晚期及王莽时代，到东汉早期或者还有继续。目前所见出土的画像石椁，时代最早的可能是山东临沭的曹庄石椁，画像内容最丰富的是邹城市卧虎山石椁和兖州市农技校石椁，资料最完整的是济宁市师专郑氏家族墓地石椁，出土数量最大的是枣庄市。

石椁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体石椁，一种是双体石椁。单体石椁四面用四块石板围裹而成，底下铺着石板，顶上盖着石板。但由于切割石板的困难，大多数石椁墓葬的地板和顶板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多块或者干脆以夯土取代底版。双体石椁则是在单体的基础上，将头、足部挡板加长，使之成为近乎方形的石椁，再在中间加一块隔板，将一座石椁分隔为两个空间，或者夫妇合葬，或者将多出来的空间当作侧室，随葬物品。为使石椁整体坚固，无论是单体石椁还是双体石椁，在石板与石板的结合处，都处理成卯榫的形式。

因为石椁是模仿木椁的形式，所以，在画像安排方面也和木椁接近，比如在石椁外表刻画画像以模仿漆画木椁，但在石椁内部刻画图像则是石椁独到的艺术构思。一般情况，时代比较早的石椁都在外表刻画画像，时代稍晚一些的在内面刻画，也有两面都刻画的。从出土石椁的具体情况看，内外两面的画像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

石椁的板材厚度一般都在十至二十厘米之间，因此，在石椁上的雕刻只能是属于浅雕一类的线刻或减地线刻等方法，不能做深层次的雕刻或透雕。

在画像内容方面，石椁外表的画像一般是具有辟邪成分的题材，内面画像则在辟邪的同时，还照顾到了墓主的生活起居等需要。从最早的石椁到晚期石椁，其题材内容有着比较大的变化。早期主要是来自木椁的几何形纹饰，后来增加了明显辟邪意味的墓树和财富象征并隐含着贿赂地下神明的璧纹、墓阙式的门、灵魂出窍的鸟及其玉璧、柏树和鸟、建筑、人物、动物等组合，再后来流行建筑以及守护的武士门吏等人造的保卫力量，之后是神仙类的人物，古圣先贤以及地下生活理想的社会图象等等。

石椁画像中的璧、穿璧或植璧图像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刻画在石椁之上的目的是讨好或威慑地下的君主以及不法妖邪，让他们清楚，入葬到地下的人物有来头，有势力，不可慢待，也不可随意冒犯。树和树纹象征的是柏树，柏树是打鬼的神树，如《风俗通义》所说：“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这里的“罔象”就是“魍魉”，是地下的妖邪。除掉这种妖邪的法宝就是柏树。如《博物志》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魍魉立毙。汉人为什么怕魍魉，是因为这种妖邪喜欢吃死人脑，在石椁画像中画上柏树的样子，魍魉自不敢轻易冒犯，死人也可以安寝。所以，两汉时期除了将柏树的形象装饰在墓室四壁外，还在墓地种植柏树，以保证死人的安全。

在升仙题材方面，主要有引导拜见西王母、获取仙药、和仙人博弈、乘坐龙车等交通工具脱离凡尘。最早出现的西王母具有半人半兽的性质，其图像表现或者将西王母安置在荒野之中，或者让其部署带有野性的特征，如人身兽首、人身鸟首和人身蛇尾等怪异形体，这样处理的原因既来自于《山海经》对西王母野性的解释，也来自于西汉晚期对西王母职能的认识。《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荒西经》说西王母“戴胜，虎齿，豹尾，穴处”，既野性又野处，同时还兼具统管天下厉鬼的职责，因此，到西汉晚期河北一带发生民惊事件时，是西王母信仰最终安定了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了民乱。西王母在西汉晚期出现在正史中的形象就是辟邪，出现在石椁画像之中，也同样具有辟邪的成分。随着人们信仰的扩展，西王母后来又慢慢演化成长生不老的神仙主宰。祈求西王母保佑的图像一是由神怪引导着拜见西王母，二是鼓舞祭祀西王

母。至于其他长生不老的方式也很有趣：一是常规式的乘坐快捷交通工具奔向仙界，二是通过和仙人下棋而忘却或使时间停止，三是通过饮食仙药成仙，如西汉铜镜铭文所云，“渴饮玉泉饥食枣”，就可“寿如金石为国保”。

在西汉晚期人们看来，辟邪和神仙两大主题殊途同归，辟邪是为了保证死者安全，埋到地下完好无损，升仙则是死后最高奋斗目标。汉代人们为什么把保存尸体的提升为头等大事，千方百计地希望保住尸体不腐不坏，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希望起死回生。因为自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美好认识，那就是人死只是灵魂体魄的短暂分离，灵魂在出游一段时间后，还会回来与身体结合，一旦灵魂附体，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样一来，死了的人即使不能够上天做神仙，也可以再回归到现实世界生活。所以，辟邪是再生的基础，也是升仙的前提。由此就可以理解，石椁画像中采用大量辟邪题材的原因所在，理解汉代人们如此热衷以画像形式装点墓葬棺椁的真实意图。

人事内容的画像主要表现了墓主的退休生活，并把死当作退休，画像表现的形式就是墓主端坐在一座房子里，接受着人们的朝拜，房子外头伫立着一匹马。墓主在地下世界享乐的表现则是歌舞、狩猎等图像。

历史题材题材在石椁画像中比较少见，主要内容是“泗水捞鼎”。“泗水捞鼎”的本意是讽刺秦始皇当政的不合天意，引申意义则有可能是告诫后人，特别是对自家家业有非分之想的人物：不得觊觎他人财产。该得的就得，不该得的，强求不得。

从石椁画像可见，西汉晚期的人们最关心的是死后尸体能否保存完好，只要保证尸体不腐不坏，就为起死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就具备了升仙的条件。另外，人死后埋到地下，还有一个和阴间社会沟通融合的问题，那就是要讨好地下世界的主宰，祈求其多加关照，因此，辟邪是这一时期画像中最主要的题材，其次才升仙和享乐理想的追求。

三、石墓画像

所谓石墓主要是为区别于石椁墓而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不单指完全由石材筑造的墓葬，其中既有全石墓，也有砖石混合墓，其主要特征是墓葬已经由单纯的石椁进而发展为多室墓葬，空间和范围较之石椁墓葬大大扩张，丧葬习俗和观念也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墓画像就是这些墓葬之中带有画像的石刻。

画像石墓形式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如河南南阳地区冯君孺人墓就是王莽天凤五年的画

像石墓，但大量画像石墓流行于东汉以后。这些墓葬在形制方面，开始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住宅形式，其内部结构安排了客厅、寝室、厨房、仓库甚至庭院。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前后室或前、中、后室，并由此而发展扩充为附属左右耳室以及多个侧室等形式。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其基本形制都是由墓门、主室和附属侧室等组成，带有画像的石块或石板一般都安置在比较显眼的墓门、前、中室四壁或者过梁、横额以及立柱上。

目前所见东汉早期的墓葬多为前后室形制，前室横置后室竖置，其基本形态如同“T”字形，像西汉时代出殡用的“幡”（如马王堆帛画形态）一样。前室宽敞，后室狭窄，前室陈放随葬物品以及祭祀用品，后室存放棺槨。中期以后，墓内的室逐渐增多起来，其结构也日渐复杂化，在单后室的基础上，有了双后室甚至三后室等多后室的样式，西汉晚期出现在南阳一带回廊式墓葬也在全国各地流行。到了东汉晚期，墓葬的规模越来越大，墓室面积多在一百平方米以上，如临沂市吴白庄汉墓，面积就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安丘董家庄汉墓，则是一百一十平方米。这些大型墓葬，为了扩大内部空间容量，还在墓室中增加了立柱、过梁以及半月形屋脊等，使地下的墓室俨然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屋宇，画像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其内容也日益复杂丰富起来。

根据不同墓葬画像布局 and 安排，不同题材的画像分别被安置在墓葬的不同部位。如神怪、战争等辟邪威慑内容多布置在墓门、立柱、天井和后室等场所，具有人间气息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等一般都安排在前、中室四壁或过梁上。从画像布局位置可以看出，墓门等出入口或容易被侵入的部位安排的题材主要是辟邪的内容，前室象征的是庭院，画像内容则与室外有关，中室象征客厅，画像则以室内观赏为主，后室是寝室，画像自然要围绕安息设置。另外，墓室是墓主的阴宅，所以，在画像布局方面也处处以墓主为核心，按照墓主生活的要求和习惯安排。如墓主应该身居主位、正位、上手、面南的位置，画像就以此为中心分别设置。

在雕刻技巧方面，早期的石墓画像大多比较粗糙，在细节方面不很注意，晚期则比较讲究，各种技术手段都有运用，这里既有常见的糙面线刻，减地线刻以及浅浮雕、高浮雕、透雕，也有像祠堂画像那样的磨光线刻，还有减地凸面彩绘着色等等形式。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画像石制作的技术日益娴熟，即使在一些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墓依然和发达地区一样，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别。这些迹象也表明，到了东汉时期，以画像石形式装饰墓葬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在题材内容方面，和石椁画像取材不同的是，墓室画像在辟邪、升仙和地下生活的基础上，加大了生活方面的内容，如出行的出马越来越多，歌舞宴饮的场面越来越大，来访的宾客也是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墓主在地下生活的越来越安逸舒服，墓室成了地下的厅堂庄

园，黄泉世界成了墓主乐不思蜀的天堂。

东汉时期，是历史上比较重视儒家思想教育的时期，可以说真正落实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是东汉时期。西汉以来的“孝道”思想在东汉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与选拔人才、升官发财直接挂钩，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厚葬风气的弥漫，这一方面导致了墓葬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画像内容向着儒家的规范要求靠近。以往墓葬中很少出现的教化内容也被引进到墓葬之中，以往比较简单的地下生活更加复杂和丰富，象征的抽象的内容被进一步具体和细化，死者在地下的生活被安排的应有尽有，舒适无比，墓室甚至比地上的房屋还排场体面，墓室画像也更加丰富多彩。以沂南汉墓画像内容为例，这里不但有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有气势恢宏的胡汉战争，而且还有礼仪规范的吊唁活动，有场面壮大的歌舞庆典、庖厨宴饮和收获储藏。在生活细节方面，还细腻地刻画了武库马厩，起居内室等等。升仙题材丰富的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除了玉兔捣药等常见形式外，还增加了争夺仙药、夸耀仙药以及获取仙药和升仙的种种方式。其中以服食仙药长生和乘坐快捷交通工具抵达仙界的方式最多，这说明，东汉晚期的人们比较普遍的相信通过服食药物可以长生的同时，乘坐快捷交通工具也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那就是到达了神仙的世界，也可以和神仙一样与天地同寿。这种通过速度改变空间的认识，反映两千年前人们难能可贵的时空观。

石墓画像显示的东汉社会意识，一是炫耀，炫耀门第，炫耀人气，炫耀门生故吏的众多，炫耀车马地位，炫耀日常生活，炫耀丧葬排场，炫耀家庭和庄园的富庶及其保卫力量的雄厚。二是追求，追求得道成仙，追求超升仙界，追求西王母东王公的庇护，追求来世理想的幸福生活。三是担忧，担忧地下墓室不安全，担忧阴宅遭侵扰，担忧身后的财产家业被他人掠夺，担忧子孙后裔不成才。

四、祠堂画像

祠堂是祭祀祖宗先人的地方。在古代，祭祀一般都是在居家的附近建立一所房屋式建筑，定期举行一些祭祀活动，以缅怀逝去的父母祖宗，笼络亲情。将祠堂建在住地或其附近，恐怕主要是为了出入方便的原因。到了汉代，在继续保持这种方式的同时，又有了去墓地祭祀洒扫的习俗。这可能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老敬老的思想有关。因为要在墓地祭祀，所以，连带而来的是需要有一座和祠堂一样的建筑，以陈设祭品。因此，墓地的祠堂就其目的而言，只是陈放祭品的地方，就其规模而言，远远要小于住地的祠堂，故墓地祠堂实际上是一些专

用小祠堂。小祠堂里摆设祭品主要是给墓主享用的，所以，在汉代，墓地祠堂就已经被称做“食堂”、“斋祠”和“享堂”了。

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面以上的小祠堂是山东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最负盛名的是嘉祥县武氏石祠，发现数量最多的是邹城和滕州市和微山县的小祠堂。

从规模形制上看，小祠堂的形制一般有四种。一是三块石板围筑而成并带盖如倒“凹”字型的祠堂；二是起脊如房屋的祠堂；三是双开间、前面由一根立柱托顶着门脸横梁的祠堂；四是在双开间后壁正中又单独向外开出一个壁龛的祠堂。

从时代上看，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祠堂是出土于汶上县的路公食堂，时代是王莽天凤三年，最晚有明确纪年的是武氏祠堂中的前石室（武荣祠）。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小祠堂部件分析，山东和苏北一带是画像祠堂最集中的地区，其小祠堂的建造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东汉初年的明帝、章帝、和帝时期，一个是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早期的祠堂建筑结构比较简单，多“凹”字型小祠堂，画像内容比较单纯，画风比较严谨细密，如同壁画，晚期建筑空间则比较大，画像内容也比较复杂，雕刻技法也比较成熟。

由于小祠堂的功能是摆设祭品，所以在画像内容的布局方面，一般有很明确的方向感。正面（祠堂后壁）是祠堂主人所在的位置，因此，这里的画像多安排有墓主形象及其生活片段式的内容，左侧（西壁）象征西方，则安排一些神仙题材如西王母等内容，右侧（东壁）则对应于西方，安排东王公等神仙以及生活画面。另外，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画像也被安排在便于观览的主要部位。

因为小祠堂位于墓前地面以上，其画像主要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所以，其雕刻技巧要比墓室里的画像更细致、更生动一些。从现存小祠堂画像看，大约在西汉晚期，其雕刻技法和石椁画像的大体相同，石面虽然经过一定的修正，仍不免有粗糙之感，到东汉前期，石面被进一步打平磨光，雕刻的线条也越来越纤细，各种图像的细节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这种技巧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甚至影响到南北朝。另外，也许因为财力所限，西汉以来的比较粗糙一些的雕刻风格依然被保留下来，并在一些地区长期流行。

但是，令祠堂主人和其后裔们始料不及的是，在东汉晚期的一些墓葬里，常常有小祠堂的部件被改砌到新的墓室里的现象发生。这种将他人祠堂拆毁而筑造自己墓室的做法，在山东南部如济宁、枣庄等地区较为普遍。虽然，完整的祠堂被毁坏了，但由于这些部件又被埋入地下，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小祠堂画像的作用。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在地上小祠堂已成凤毛麟角的时候，一批批墓葬里却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祠堂部件，这就为进一步了解两汉

时期的墓地祠堂画像增添了新的资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拆毁他人祠堂改造为自己墓室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保护了地面祠堂免遭历史毁灭的一个“善举”。

祠堂画像因为其建筑的功能主要是祭祀和供他人观赏，所以画像内容重点表现的是祭拜、升仙和教化。祭拜是提醒后人要尊重死者，景仰先人。升仙则重在说明死者去向不是单纯的安息，而是转换了生活环境，是超升到了天堂，死者的墓地实际上就是仙界，祠堂是神仙世界的建筑。教化是祠堂画像最主要的内容，这里既有告诫妻妾子孙的内容，更多的则是警戒仆从故吏要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尽忠尽孝，不负旧主，不忘前恩。画像石中常见的忠臣义士、节妇烈女等成分，大多表现在祠堂画像之中。

五、石阙画像

阙是中国古代地上建筑的一个部分，一般安置在城门外两侧，其原始含义与“缺”近似，是缺口的意思。其形制犹如两座门垛，中间敞开，不设大门。在城门外一定位置设置城阙，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城门到了。

因为是城门的衍生物，所以阙也可以像城楼一样，能住人，可登攀，站在阙上远眺近观，故阙又有了一个别名“观”，即观望的场所。由于阙在城门附近，是出入必经之处，所以，这里也是张贴告示，颁布法令通知等周知大家的所在。到了汉代，阙又成了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的标志性建筑，其装饰的意味日益浓厚。

墓阙是城阙的派生物。自从人们将墓地当作了冥界的城池后，墓阙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墓地大门的标志，成为进入墓地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所见最早的墓阙可能也出自西汉晚期，现存墓阙则多为东汉时期的。并以山东和四川保存的最多。山东现存墓阙有五、六处，较之四川的汉阙，虽然在数量上排名第二，但在画像内容等方面则比四川的略胜一筹。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汉阙是建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的莒南县孙氏阙。最晚的应该是嘉祥武氏墓阙，时代是桓帝建和元年。

就墓阙形制而言，早期的墓阙似乎只是单体石阙，阙顶作成屋檐状，表示这是一座建筑。阙身则有两种样式，一是上窄下宽如同墓碑的样式，一是四方形立柱的样式。这种如同墓碑或望柱式的墓阙形式，表明墓阙虽然模仿自城阙，但实际的用途主要还在于标示，像界桩一样，标示着墓地所占据的范围四至和墓地家族的属性，是张家还是李姓。后来的墓阙则完全模仿城阙，在望柱式的单体阙身外增加了一座附属体，使其成为“子母式”，原来的阙身成

了母阙，新增加的则成了子阙，在形制上，墓阙高大，居于主要位置，子阙矮小，处于从属的位置。如此以来，墓阙由单体的四面体而成为门墙式的两面体，其形制就此完善定型。

在山东现存画像石阙之中，莒南县孙氏石阙的画像最简单，平邑的皇圣卿两阙内容最丰富，武氏墓阙最完整，莒县东莞墓阙雕刻最精致，四川石阙则多为浮雕形式。如果以孙氏阙和平邑阙为山东地区早期阙，武氏阙为晚期阙的话，则早期墓阙画像在炫耀显摆之外，还带有一些神神道道的成分，如西方神仙世界的内容等等，晚期墓阙则又增加了一些教化的内容。大概在晚期阶段，入侵墓地的领域，破坏他人墓葬的不良事情时有发生，故而墓主及其后裔们在设计建造墓阙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增添这一类的内容，以防自家墓地不受侵害。因为墓阙的主要功能是墓地的标示，所以，在墓阙上刻画的画像内容则不外乎墓地属性、辟邪震慑、炫耀显摆以及教育警示等。同时，墓阙和祠堂一样，都是墓地地上建筑，所以，在画像布置方面，也和祠堂有诸多相似之处，选取了“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礼仪教化内容雕刻在墓阙之上。

从石椁画像到石阙画像，两汉时期的民间工匠们为我们创造和保留了十分珍贵和难得的图像资料，使我们通过这些画像对两汉及其以前的社会有了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认识，得以了解两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揣摩和理解画像石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理想、情操，丰富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戴。

谈清史和清史研究

谢景芳

一、一般人对清史的认识状况

对中国古代历史，大家较熟悉的是清代这一段。主要的原因是：第一，这一段历史离我们今天较近，清朝到现在灭亡还不到一百年，许多人物和史事还在我们的耳边传播；第二，我们的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一般都要上溯到鸦片战争，在中小学的历史课教学中，也主要是讲述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第三，清代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制度、风俗、民族、边疆、外交等多与现实有重要的联系，对清代历史的关注也就多于其他各朝代；第四，近年来以清代历史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形成了一个潮流，清代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成了社会文化消费的重要题材，对清代历史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清代消亡时间不长，许多史实和人物的研究正在进行中，这就提高了社会对清史研究的关注程度。所有上述原因都使清代历史在社会上具有广大的爱好者，这对推动清代历史的研究和普及清代历史知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事情要一分为二地看。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应该进行，但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这些年来，在进行和执行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情感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对许多历史人物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甚至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够作客观的评价。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人与事进行简单划分；为夸张自己的成就，就任意贬低前人的奋斗和努力；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凡是封建时代的，就只有批判的价值而无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对清代历史的宣传，似乎只有丧权辱国、卖国求荣；所有男人头上梳辫子的形象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和屈辱；清朝的前期就是大杀汉族人，后期就是割地赔款；满族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没干什么好事。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清朝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些基本史实的无知，也涉及到历

谢景芳，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史观问题。

就一般文化消费来看，问题也相当严重。人们相信书本、相信电视，把演义、戏说、传奇故事当成是真事儿，把编剧和导演的理解和看法当成是定论、定评，以致于形成定式：雍正帝阴狠狡诈；乾隆帝风流倜傥；孝庄皇后雄才大略；慈禧太后委琐昏庸。当然，还有很多历史事件也都与事件的真实性相去甚远，有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清代史研究的进展，过去对清代历史认识上的一些错误已经被纠正，一些史实逐渐澄清。可是人们对研究动态了解不够，造成对清代史事或沿袭旧说，或将错就错，或干脆就不加研究地把野史传闻当成事实加以认可。所有这些都应及时加以纠正，只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知古鉴今，既不厚诬古人，也不貽误今人，真正发挥历史学的文化建设功能。

二、清代历史进程的线索和规律

清朝的发祥地在辽宁。这无论是从清王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活动的地域来看，还是从他所创立的后金政权地点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辽宁是女真（满洲族）人活动并创造辉煌历史的基地和后台。

在东北地区，早在有史记载之前，在现今的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两侧就生活居住着西部的东胡人和东部的通古斯人。满族的先世就是通古斯人的一支，在先秦时期称为肃慎，两汉时期称勿吉，魏晋时期称挹娄，隋唐时期称靺鞨，当时其中一支粟末靺鞨，在唐朝的册封下，在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渤海镇建立了地方政权——渤海国，共传王位十五世，二百二十九年（六九八至九二六），被当时兴起在辽西一带的契丹人灭掉。在辽朝统治的两百多年中（九一六至一一二五），改称为女真人的满族先世，不甘心契丹贵族的压迫，起而反抗，于一一二五年灭辽，在哈尔滨一带建立起“大金”政权，灭亡北宋，与南宋王朝南北对峙，直到一二三四年，被蒙古灭亡。在元朝和明朝统治时期，女真族一直在东北活动。明朝万历初年，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地女真，积攒实力，开始反抗明朝对女真人的压迫。一六一六年在辽宁新宾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始终处于主动，一六二二年占领了除辽河以西地区以外的全部东北地区，并建都沈阳。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兴城），随后去世，由其子皇太极继位。他西击蒙古，东征朝鲜，南袭明朝，一六三六年改国号为“大

清”，自称皇帝，改族称为“满洲”，开始了与明朝一决雌雄的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一六四四年春天，李自成兵进北京，明朝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皇太极病逝沈阳，其六岁之子福临即位，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率八旗兵南下，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攻入北京。十月福临在北京重新登极，满族人开始了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

从一六四四年起到一九一一年清朝倒台，清朝一共传位九代十帝，二百六十八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为主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历时代变迁最激烈、世界地位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朝代。

从一六四四年到一八四〇年近两百年的时间，清王朝经历了战争、恢复、发展、繁荣、鼎盛和中衰的过程。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前二十二年经历了战争和动荡：抗清斗争、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最后控制了全国。这是清朝建立和政权稳定的时期。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和平建设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康雍乾盛世的起点。从此开始，中经雍正十三年到乾隆六十年，历时一百一十多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前二十年，清朝进入中衰时期，各种矛盾：阶级的和民族的；国内的和国外的；边疆的和内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有些开始尖锐和激化。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山东王伦起义最早发生，然后是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随后是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当时还发生了天理教在河南和北京的暴动，起义者甚至打进了皇宫。其他局部的起义和造反几乎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是：国家财政问题严重，官贪民贫，吏治腐败，人口和土地比例严重失衡，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周边加大了侵略扩张的强度和速度……。清朝，当然也是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

一八四〇年，来自于海上的威胁终于成为现实。清王朝反击英吉利侵略的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中清朝不得不接受割地、通商、赔款的现实，这不仅是清朝两百年来所未有，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经。从此，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最发达的、占据国际优势地位的中国已经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清朝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史、伤心史。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府已经不能正常地行使主权，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连续签订。人民不是死于贫困，死于灾荒，就是死于战乱。为了活命自存，为了保家卫国，人民造反、起义，要求变法，奋起革命，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一九一一年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时代成为历史。

三、清代历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清朝的历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灾难史，是一部不堪回首的清政府的卖国投降史。似乎那个男人头上留辫子的朝代一无是处，只有可供人们嘲笑消遣的笑料。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回溯的意义的话，只是可供找一找中国现代如此落后的原因，并从中接受“落后就必然挨打”的教训。这种对清代历史的认知是相当片面的。多年以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一般的教育宣传中，给人们灌输的就是这种可笑的历史观。似乎在那近三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人什么都没干，干了也没什么意义；满族人毁掉了中国世界大国、强国的辉煌历史，毁掉了中国值得自豪的历史文化，并且也使中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贫穷和落后状态。这些认识一直阻碍着我们对清代历史的理解。其实，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也同样是一个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朝代。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清朝前期的良好治理和统治，中国在西方殖民活动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就完全可能沦为殖民地，而不是什么赔款割地。如果没有清朝前期的社会整合与良好的而有效的边疆控制，我国当今的疆域和领土能是一个什么状况，就很难预测。

那么，如何才算是科学地认知和正确地理解清代历史，了解清代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价值？

我们必须把清代的历史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放在中国多民族的发展格局里、放在世界时代变迁的整体变化中，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否则，一切的片面肢解和情感用事都永远无法真正了解清朝。

第一，清朝的统一和高质量的社会管理，使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达到高峰，出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社会最后一次也是水平最高、历时最长的社会繁荣时期——康乾盛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期望的是社会太平、安居乐业、家给人足，尽管那不是什么高水平的生活标准，但在那个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时代，也并不是容易实现的愿望。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遇到什么战乱和灾荒，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实在是难能的。中国历史上，值得人们夸耀和向往的盛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再就是清朝的康乾盛世了。我们发现，在这几个少有的盛世中，清朝的盛世不仅是清王朝治理能力的证明，也是中国人对社会管理、资源开发和利用能力的证明，更是对数千年传统管理模式、发展潜力发挥净尽的证明。

在中国古代所谓正统王朝的三百五十多个皇帝中，清朝的最高管理者大多是称职的，而

康熙、雍正、乾隆更是出类拔萃。这三人共执政一百三十八年，乾隆和康熙是中国历史执政时间创纪录的人。康熙二十二年以后，中国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繁荣的盛世，清朝也因此巩固了统治。几个皇帝都能不辞辛苦，勤奋为政，一扫前朝弊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边疆巩固、民族和睦、国力强盛，康熙帝赢得了“圣祖仁皇帝”的尊称。在此期间，清朝的土地开垦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近九百万顷。土地种植的质量、作物品种、产量都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因此，清朝也养活了历史上数倍于前朝的人口（乾隆末年人口总数达到三亿），平均寿命也大幅提高，国库存银经常保持在六千万两上下，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不能相比的。全国国土总面积约在两千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且边疆稳固。以社会稳定程度来看：康熙三十七年，全国死刑三十五人；四十五年二十五人；五十一年三十二人；五十四年十五人。那时中国人口总数已达一亿数千万，每年死刑二十至三十人，甚至还商量过是否可以停刑！康熙帝、乾隆帝都因为忧愁国家大事（边疆的稳定、人口的无限度增加、吏治的腐败、黄河泛滥、粮食的产量等），有过夜不能寐的经历，雍正帝批阅奏章甚至秉烛达旦。这几位皇帝都是文治武功的高手，才华过人的精英。

第二，清朝的边疆管理和民族整合政策是中国在内乱外患中，仍然能够保持大一统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中国人从古到今就一直生息繁衍在东亚大陆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并创造了独特的优秀文化。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一直是国人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从秦朝统一开始，虽历经波折，到元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基本已经确定。尽管明朝对边疆的管理不能尽如人意，民族关系也一直处理不好，但是到清朝，中国对边疆的管理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康熙帝成功地击败了沙皇俄国在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活动，成功地抑制了荷兰、英国等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图谋。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关系中以法律条约形式与俄罗斯固定了中俄东段和北段边界。对边疆的叛乱活动，用兵一个多世纪（亲征、屯田、驻军）。实施行之有效的“一国多制”的统治政策：在西藏采取驻藏大臣制和金瓶掣签制；在新疆采取将军制与伯克制度；在云南、贵州采取流官和改土归流制度；在内外蒙古采取黄教及盟旗制度；在东北采取三大将军制度等，以多种制度因地制宜实施了有效的统治。边疆长期稳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康熙五十八年以近代手段勘定全国疆域并在法国巴黎以铜板印刷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确的《皇朝疆域全图》，是中国对边疆管理的最重要成果。这一切建设，使得古老的中国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和近代全球扩张侵略的大趋势下，免遭了灭国的殖民地命运（全世界只有日本、尼泊尔、伊朗、阿富汗和中国），尽管晚清王朝的统治走向腐败，割地赔款，中国受尽屈辱，但是那些边疆治理的许多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边疆管理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清代无疑是以满族贵族为统治核心的政权，当然彻底放弃了大汉族主义。清朝皇帝为了稳固对汉人的统治，大力清理“华夷之辨”思想，缓解民族歧视，加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理解、利用。对少数民族采取了联合、笼络与武力威慑相结合的统治政策，也借鉴以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教训。这些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淡化了民族之间的猜忌和隔阂，减少了摩擦，增加了了解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整体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是近代中国在屡遭战乱、破坏、分割、侵略而终不至于分裂的基石。

第三，清朝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建设的集大成时期，这是研究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原生态文明一直发展到现代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诸多文明中相当典型的一种（有中国特色）。历代王朝一脉相承，在几千年中因革损益，将中华文化发展到所能达到的顶点。所有的一切，到清朝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专制制度为例：清朝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最具权威的皇帝，而且无论从个人的素质还是制度的保障，都真正是“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中国历史上高层政治中的分权现象：宦官干政、外戚篡权、朋党攻击、诸王反叛、勋臣乱政、皇位争夺、宫闱丑闻、武将割据……几乎一扫而光。清朝的许多制度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惩贪治贿、治吏养廉的管理方法；官员的考核（四格八法）、回避、致仕制度；对整个官僚系统的监察与弹劾制度等。有些经济制度在今天也有进步意义：黄河的治理；南粮北调；运河的管理和使用；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管理；农牧副渔的协调发展等。当然，传统政治制度中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认识传统和国情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四，清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和总结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保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像清朝那样重视在经验层面上把握历史文化。从康熙帝开始，编纂了数十部堪称是创纪录的大书，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四库全书》等等。在乾隆和嘉庆间形成的乾嘉学派，更是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极至，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清王朝对文化实施专制政策，严格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甚至大兴文字狱，也造成了文化的重大损失。这是专制主义的通病，不独清朝为然。

第五，清朝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入世界潮流的关键时期，清朝没有完成由传统社会向工商业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那么清朝或者说中国当时到底有没有社会转型的可能？世界转型期发生在明朝中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直到乾隆时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证明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就比西方差。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谴责皇帝们的保守和无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认识能力、具体国情等,我们不能苛求康熙、乾隆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有时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做。

总之,中国文化要想融入世界,必须在中国自有文化内加入外来因素,给我们一个刺激、冲击,然后在融入多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识,见贤思齐,走向自强之路。

下面我再简单说一下大型《清史》的编纂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有个传统,前一个王朝灭亡了,后一个王朝要为其撰修历史,这是从唐朝就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二十四史》就是这样修出来的。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组织赵尔巽等学者修史,这就是后来的《清史稿》。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地方编得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没有参考清朝的档案,故不能算是权威的。建国后,曾经先后四次提出要编纂清史,第一次是一九五〇年,董必武最早提出为清朝修史,由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工程;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找到任北京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让他组织编纂清史,可是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也未能进行;第三次是一九六五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组织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下来;第四次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向国务院建议启动清史工程,作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二〇〇二年八月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二〇〇三年二月全国九十五名清史史学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十三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商定了清史编纂的体例。会议初步确定在纪传体通史体例基础上进行革新,增加大事记和图,即由通史、传、图、表、大事纪年和志六个部分组成。后来清史编纂委员会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集思广益,在全国征集编纂意见,准备用十年时间,即二〇一二年完成三千万字、一百卷本的《清史》。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清朝灭亡将近一百年了,清史研究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它为清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我相信在《清史》编纂过程中,很多清史问题能得到澄清,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是对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达到的。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现在我希望答复大家一些问题,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问: 如何评价左宗棠、曾国藩?

答: 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人物进行评价是有困难的。我认为首先对他们要充分肯定,这些人认同外国文化,不仅倡导向西方学习,而且身体力行,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批近代工厂,加强了国防力量。当年的左宗棠抬着棺材上前线,坚决与俄罗斯人决一死战,这是相当有勇

气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是很难确定的。总之，在情感上我很同情他们。

问：满族人代替了李自成来统治中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答：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悲剧。如果仅仅因为不甘心于满族人的统治，就认为是历史悲剧的话，从民族情感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是外族。我认为无论哪一个民族统治中国，只要能把中国这一段艰难时期平安度过，并且能积累一定的经验和实力，都是可以肯定的。

问：顺治皇帝是出家了还是死了？

答：清朝的疑案很多，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多尔袞死了以后，他开始亲政，当时只有十三岁。亲政后，他非常重视学习汉文化，很快就达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要求。顺治十四年，他看中了他的弟媳妇董鄂氏，并迎娶进宫。董鄂氏入宫后，与顺治的感情与日俱增，一年后为顺治生了一个儿子，顺治当即封为荣亲王，这是极为罕见的。可是不到两年荣亲王就死了，董鄂氏极度悲伤，在顺治十七年突然去世。顺治皇帝痛不欲生，从此批阅文件不用红笔，改用兰笔，并开始信奉佛教，可见他们感情之深。在沉重打击下，顺治十八年初，顺治皇帝偶感风寒，出天花，一病不起。但也有史学家认为，顺治帝根本没出天花，而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出家了。这就成了今天的一大疑案。

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谢谢。

话说张学良

王充闾

作为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张学良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可以说,在这位世纪老人身上,存在着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受时间限制,我拣选六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里说一说。它们是:一、张学良的功业;二、蒋介石为什么不放他;三、一九九〇年“开口”之后,他在四千八百多页口述历史中,都说了些什么;四、他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五、他的情感世界;六、他为什么没能回老家。

—

周恩来生前说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依据什么作出这么高的评价?首先就说说张学良的功业。

张学良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六岁就中止了,要再扣除童年和就学阶段,不过十数十年时间。他十九岁考入东北讲武堂,出来之后就任团长,又晋升旅长,由于率军赴吉林、黑龙江剿匪,战功显著,当年晋升陆军中将;二十四岁任东三省空军司令;二十七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升任上将军团长;二十八岁,皇姑屯事件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王”。

他执政伊始,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要稳定内部,要处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要应对日本侵略阴谋。当务之急,是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

王充闾,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

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对他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就刮目相看了。

原以为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楞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台湾参谒延平郡王（郑成功）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这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而更大功勋的建树，是七年之后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谱写了历史新篇章。国外有的历史学家说他“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是言之有据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在十二月四日亲至西安，逼迫张、杨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十二月七日下午，张与蒋在其驻所临潼华清池，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说：“现在全国老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现在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果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个，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把桌子一拍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事变当时，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他以惊人的勇气与魄力，勇敢担当下来，不愧为一个铁骨铮铮的东北硬汉子。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并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参与调停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亲日派的何应钦甚至主张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杨和中共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相继委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张、杨与周恩来共同参加，最后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

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放还蒋介石。张学良还亲自送蒋回宁。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当时的考虑是，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承认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一方面，它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正如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说的：“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作出这种“以身饲虎”的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以至后日，每当提起，国人在无限景仰之余，都为他的惨痛遭遇，深深痛惜。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几起爆炸式新闻：十二·十二，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十二·二十五，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十三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它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论断。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愿的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此次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达到预期效果，最关键的人物是张学良和周恩来；而杨虎城、宋氏兄妹，还有端纳，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出发点并不相同，但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合力。

像张学良这样，由于一个顶头上司的专制，竟然被监禁了五十四年，翻检世界历史亦不多见。在中国倒是无独有偶，这个人便是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对于这个名字，人们也许略感生疏，但若提起他写的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临江仙》词，由于被人编入早已成书的《三国演义》的卷首，那就家喻户晓了。杨升庵与张学良，同样出身宦宦之家，都是少年得志，终身坎坷，大起大落，而且都是在三十六岁遭遇不测之灾。杨升庵的父亲是当朝宰相，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而后入仕翰林。由于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为皇帝，在朝廷引起纷争，杨升庵联结朝臣两次上疏“议大礼”，又大哭大闹，弄得沸反盈天，触犯了嘉靖皇帝，结果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嘉靖帝发誓，只要他在位，就绝不放回杨升庵；而他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一说七十一岁，一说八十岁），也未能回朝任职。他的命运比张学良还要惨。当然，他的获罪因由本无足道，是无法同张学良相比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为什么蒋介石就是不放张学良？

一九三七年一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国政协会上，委员呼吁还给张学良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同年十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赶快放出张、杨。蒋冷冷地说，找李宗仁去。李宗仁还真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落实。顾了解蒋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派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蒋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亲下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长期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一九五六年，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老蒋，已经到了释放之期。蒋介石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也有传说，蒋还赠一双拖鞋、一只手杖，意思是，一拖到底，直到老死。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直到临死那天，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不要放虎归山。”他把张学良当作猛虎看待了。有一次，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让你？”张说：“张岳公（张群）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分析，蒋对张是“一怕二恨”。怕，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抗日战争时期，蒋一怕张学良恢复自由后，说出“不抵抗日寇”的实情和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弄了个《西安半月记》，蓄意掩饰，歪曲事实，一旦真相大白，有损他的人格形象，也会把他所作的承诺暴露无遗，很不好办。二怕已经被拆散的二十万东北军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难以控制的军事集团。三怕张学良与共产党再搞什么“三位一体”，使共产党的势力更加强大。解放战争时期，他怕张学良放出来会被共产党利用，影响他的统一大业。退据台湾之后，蒋的威信已经降到极点，怕张学良被反蒋势力拉过去，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恨，一恨张学良劫持领袖，使他丢尽脸面。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蒋介石说：“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至死不悔罪认错。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不让他痛快一世。”蒋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厉害。你张学良让我委屈半个月，我就还你一千倍半个月。他是非常毒辣的，有人分析，为了切断张学良日后出国的后路，甚至让他与长期定居海外的于凤至断绝关系，真可谓谋深虑远。如果蒋介石还在世，张学良将永无遇赦、出国之期。

三

由于各方面施加压力，一九九〇年之后，台湾当局总算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他可以不经批准接待亲友探访和记者访谈。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开口”之后都说了些什么。据公布的四千八百多页口述历史和其他大量资料看，不外乎以下诸方面：大量的关于个人家世，一生经历，以及个性、情怀、爱好、追求等；其次，是对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的评价，对日本人的看法；第三，两岸关系、西安事变、回乡探亲等政治敏感问题。

他常常谈到周总理。一生中他所尊重的人很少，却对周恩来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话不

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再就是宋美龄，他谈得也不少。一九二五年，张在上海认识了宋美龄。一九二八年，蒋宋结婚第二年，在北京饭店与张学良聚餐，见宋美龄和张学良谈得很亲热，蒋介石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张学良说：“我们几年前就是好朋友了。”很有一种得意之感。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说：“我认为她是我的知己，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他说，蒋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宋美龄对张学良感到很愧疚，西安事变后，不只一次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联系到张学良坚持要到二〇〇二年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并说他不伤害某个人。这个人是谁？不妨用排除法：西安事变当事人中，蒋介石、宋子文早死了，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只剩下他和宋美龄还在世。据他预测，到二〇〇二年他就不在了，宋美龄大约也活不过二〇〇二年。所以，我们猜测“某个人”是指宋美龄。如果按过去大家所知道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到“伤害她”。由此推测，协议中尚有未公开的内容。大约有两点：一是当时蒋承诺，回南京后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战副总司令；另外，就是改组南京军政班底，比如，撤换亲日派何应钦等。这些，是由宋氏兄妹当场担保之后，才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决定的。而回到南京，蒋介石就翻脸不认人，一巴掌把张学良打入十八层地狱。宋美龄自然深感愧疚。张学良却还讲究道义，体谅她的难处，始终不愿伤害她。即此，也能看出张学良的宽以待人。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当然没有好感，但也不愿说得太多，太苛：“我的判断，他对我讨厌极了。所以后来不能让我自由。他心里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我只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力不放的人。”“蒋介石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样大的魄力。……从中国历史上看，皇帝大多数是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蒋这个人就窄小。你看他用人，对他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他还说：“蒋介石有大略，没有雄才；我父亲有雄才没有大略。”

张学良对溥仪，也很不以为然。他劝溥仪要把皇帝老爷那一套去掉，努力去做一个平民。“见我面，他老是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就说：‘你那个样，还打听那玩艺干什么？你要好好做一个平民，可以到南开大学读书，或者去国外留学。’他听不进去。”

张学良多次说过：“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他还说：“国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骂我是封疆大吏，没

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这个人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干，我当时会跟日本人拼命的。”

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很不愿意接谈，但逼得紧了，有时也说一些。记者问得最多的，是在几十年后他对西安事变怎么看。他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是如此。”“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惨酷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在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把身旁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先后送进了坟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不断地参加追悼会，这里面有许多当年在他统领下的在台东北军将领。

长寿，当然是好事，是一种机缘，但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历史上，就有许多人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大汉奸汪精卫的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时侥幸而死，后来也就不致戴着“大汉奸”的帽子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曾倾倒过许多人呀！

为了说清楚这种“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道理，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采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滩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他的“好戏”，看他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

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说说张学良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

小时候，张学良的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这孩子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还考虑到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所谓“将门虎子”；又兼俗谚有“三岁看大，七岁至老”的说法，为牛为虎，从小就能看出。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在张学良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他特别看重人格，操守。任侠好义，敢做敢当，轻死生，重然诺，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大辱甚于死。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这种椎心刺骨的心境，少帅在日记中也作过披露：

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了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国、家之仇！曹植诗云：“闲居非吾意，甘心赴国忧”，信然。

对于内战，他却是厌恶之极。且听下面的口述：

以前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我父亲后来不打了，也是因为我。我跟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问她：没子弟、没儿女吗？她说，都给抓去当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啊？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儿打自个儿，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后天又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辈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我父亲看我激动，教我不要打，休息几天，我痛哭反对啊！

一个心肠滚烫的热血男儿，一副爱国忧民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长期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那些年轻人请他讲讲陈年旧事。他问大家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话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二十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他说，由于在大车上落草，所以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东北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三十一岁离开东北，三十三岁离开北平，三十五岁离开武汉，三十六岁离开西安，三十七岁离开南京，四十六岁离开大陆，九十三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题字，他写了一副直抵

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可是，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剂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坦荡，粗犷，人情味浓。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幼稚与天真。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一九三三年三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可是，过去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总是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

人之腹”。西安事变后遭到监禁，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和英雄主义的个性，恰好是构成这场悲剧的基因。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本身就是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而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角色。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醉后清风，醒时明月，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所谓“神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庞然大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变轻变小；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断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

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九五七年，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老蒋想要安排他离自己近一些，以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

我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可见，养花蒔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

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或为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或为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五

张学良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这是与其他许多大人物不同之点，也是他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得以优游度过，并获得健康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这里重点说说他的两个妻子和一个女朋友。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六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不能教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还即兴吟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自刎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最为圆满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缓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刺伤，能够抚平疼痛的疮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一九一六年，十六岁的张学良与十八岁的于凤至结婚。这是一起包办的婚事。于凤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与张作霖有很深的交情。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作霖十分欣赏她，因而，由吴俊升作媒，两家很快就议定了这门亲事。张学良不敢违抗，只能听命。大帅让他到郑家屯去探亲，由吴俊升陪伴着，可是，走在半路上，张学良突然变卦，没有去成，这使于家感到很没有脸面。于凤至认为是对她的污辱，非常气愤，提出要解除婚约。吴俊升没法向大帅交代，便刻意导演了一场“画店相亲”的喜剧。原来，

于凤至对古画十分痴迷，听说沈阳画店新进一批珍贵的古画，就在吴俊升陪同下，前来观赏。老板很年轻，英姿勃勃，仪态不凡，郑重其事地从画库里取出一批画，于凤至看得很仔细，指定其中一张，问要多少钱，老板伸出三个指头。三十？不；三百？不；原来要三千块银元。于凤至嫣然一笑，说：“这是赝品”。老板笑问：怎见得？于凤至便凿凿有据地一一指点出来，使在场的人非常佩服。吴悄悄地问：“老板，怎样？”老板连连点头。这时才揭开谜底，原来老板竟是张学良。当场他们正式见了面。为了报前日的“一箭之仇”，于坚持要张到郑家屯去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张学良很尊重她，一直称为“大姐”。一九三四年，他被迫下野，赴欧洲考察，就是于凤至陪同的。当时由于身体不好，孩子又在英国读书，于凤至留下，没有回来。两年后，听到少帅被监禁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给宋美龄写信——她们是干姊妹——托她代为转圜。同时，束装就道，匆匆赶回上海，最后在溪口见到了张学良。这对张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她一直陪到安徽、湖南、贵州，前后三年多时间。她原本过惯了都市生活，一路上，流离颠沛，饱受煎熬，造成严重失眠，结果乳腺癌发作，只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赴美就医。原定治好以后就回来，不料竟成永别。

于凤至在海外，天天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早日跳出苦海；经常远隔重洋，捎书寄物。到了一九六四年，她遭遇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张学良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宋美龄告诉他，还不具备条件，因为他有结发妻现在在美国，而这里又与赵四长期同居，作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必须在于、赵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向来都是痛苦的。张学良艰难把笔，向远隔重洋的“大姐”倾诉苦衷。于接到信后，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通情达理，包括当年接受赵四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但她还是清醒地考虑到，赵四是难得的优秀女子，在没有名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几十年，她做了一般女人绝难做到的事，所以，对她由衷地感激、敬佩。有她来陪伴张将军的后半生，自己也就放心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至于个人的苦楚，算不了什么。于是，给张回信，同意解除婚约。此后，她在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几年，直到一九九〇年一月三十日在洛杉矶去世。而张学良一年后才被准赴美探亲，他们终于失去了重见机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是自由恋爱。一九二八年秋，赵一获十六岁离家私奔，只身来到沈阳。其父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认为她有辱家门，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她断绝关系。为了跨进张家大门，她一生再也不能返回赵家，牺牲了父女之情、母女之爱。史学家唐德刚有诗赞曰：“北上三军齐解甲，南来四妹最堪尊。誓随公瑾同生死，蜚短流长岂足论！”过去三四年间，她一直是以私人秘书和小妹的暧昧身份侍奉少帅，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才算熬出了头，

六十四岁的张学良和五十一岁的赵一荻白首成婚，书写成一部旷古绝今的人间艳史。赵四与张学良厮守终生，相依为命。可以说，她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用她那柔弱的身躯为他遮风蔽雨，用她那稚嫩的双肩为他分担心灵的重负。张学良是挺过来了，赵一荻的生命却日渐枯萎，熬尽了青春年华，熬白了满头秀发，最后，经受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于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去世。

下面，说说张学良的女朋友。对此，他从不讳言，但究竟是谁，没有说明。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他与赵四离台赴美探亲。在旧金山、洛杉矶只住了几天，就由孙子、孙媳陪同去了纽约。记者问他“有何贵干？”他爽快地回答：去会女朋友。记者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到纽约之后，下榻在贝祖贻的夫人蒋士云的豪华公寓里，达三个月之久。这才算真相大白。

他们相识于一九二七年的北平。当时，蒋士云随父亲从法国归来，她容貌出众，精通外语。三年后，他们又在上海重见，两人频频出入舞场，共同赴宴，总是用英语互相交流。蒋对张十分景慕，张回沈后，不断接到蒋的来信，还有玉照。一九三一年二月，他们在北京会面，其时赵四小姐已在身旁。蒋这时才发现，自己晚了一步，只好带着满腔遗憾，挥泪作别。七月，她到意大利去看望父亲，九月，结识了贝祖贻这个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当时任国家中央银行总裁，夫人去世不久。第二年贝、蒋就结婚了。张学良还专程送去了贺礼。一九八二年贝祖贻去世后，她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西安事变发生，蒋士云正在上海。听说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起来，便与于凤至一道，参与营救工作。经戴笠批准，还赶往溪口探望过张学良。后来，张被押解到台湾，她又曾秘密地从美国赶去探望。这次，张学良到了纽约，一切活动，包括会见记者，参加当地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还有同吕正操将军会面，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接触，都是经蒋士云一手安排的。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们有时间就倾心长谈。张学良说，这是从一九三七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蒋士云也对记者说：“我认为，张将军是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由于经常陪张到教堂去作礼拜，原本不信教的她，后来竟也信奉了基督教，把这作为对张学良的永生怀念与追思。

六

关于张学良究竟为什么晚年没有返回祖国大陆，最后客死在异国的檀香山，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共中央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当时，中央作了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一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同志，亲自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对张学良归来的一切事务性安排。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中了吕正操。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袍泽，又是西安事变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即颂春祺

邓颖超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九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贝祖貽夫人的住所，首次会见了老上司张学良，进行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避开所有外人，进行一次单独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张学良看后，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吕又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张学良颇受感动，说：“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六月四日，张学良在纽约的祝寿活动结束后，又主动提出会晤吕正操，地点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的官邸里。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尽管他坦言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仍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回信，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

缘，定当踏上故土。”而后不久，即与夫人经夏威夷飞回台湾。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纷。是不是由于张氏夫妇当时身体欠佳呢？不是。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还有人猜测，赵一荻阻拦少帅回归故乡。赵四确曾公开表示过不希望张学良回去，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从赵四的一些家书中可以看出，她对祖国和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她之所以不愿意张学良回来，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他一接触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情绪久久安定不下来，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

应该说，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起，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即便他身在铁窗，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当张学良一九九〇年恢复自由后，他面对海外媒体，曾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敬慕之情。邓颖超病故，他曾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志哀悼。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

据深深了解内情的张捷迁说：“张将军非常想念家乡，愿意在适当时候回去看看。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影响，现阶段还不想回去。他总觉得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愿意继续等下去；待政治气候晴朗下来，海峡两岸谈判有了完满的结果后，在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再考虑回大陆。”张捷迁还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张将军于一九九〇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那次是因为他有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很想前去参加，但因受到当局的阻拦，以致没能成行。”他们怕张学良一旦到了罗湖桥边，就会迈过那条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大陆。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晚年未能回归故乡，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特别是表面上以张学良基督教友自居而实则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从中制造了重重障碍。据台湾报纸披露：“贝夫人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说这是大好机会。少帅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意难为李登辉。贝夫人劝他，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想回到台湾请示李登辉，待批准后再回大陆。贝夫人说：‘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请示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

上李登辉的当，是因为张学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轻信。从前轻信蒋介石

石，最后又轻信了李登辉。结果，抱憾终身，始终未能圆此还乡之梦。若是说最终的遗憾，这该是最大的一项。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他并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他返回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足足等了两年半时间，一次次地试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绝，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掉头不顾，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控制。只是，风烛残年，身体日渐衰颓，终于有心无力，完全丧失了回归的条件。

说到这儿，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张学良逝世后，报刊上登载的一篇短文：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

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老家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功业、爱情、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张学良听了大声吼叫起来，“可是，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功业、爱情、寿命集中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可比。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

《红楼梦》探佚

梁归智

我今天来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讲《红楼梦》探佚，很高兴。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是清朝乾隆、道光以后社会上“热读”《红楼梦》而流传的口头禅。“诗”指《诗经》，“书”指“书经”，也就是《尚书》，这两部书属于“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而四书五经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把《红楼梦》抬高到和四书五经一样的地位，说明当时《红楼梦》影响力巨大。

没想到过了二百五十多年，这部小说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欣赏、研究这部小说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出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红楼梦》有探佚这部分内容。

什么是《红楼梦》探佚？“佚”就是丢失，探佚就是探讨《红楼梦》原稿佚失部分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原著只留下前八十回，成了“断臂维纳斯”。但八十回以后的原稿并不是压根没存在过，而是“佚”了，丢失了。佚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今天不讲这个。暂且接受脂批的说法，即“被借阅者迷失”。探佚就是要探讨这个“被迷失的世界”，把它的大体轮廓勾勒出来，看看曹雪芹原来的整体构思是什么样子，小说原著的整体风貌是什么模样。很自然，也就会比较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内容与现存的后四十回续书有什么区别。再进而比较这“两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哲学、审美和文化的内涵和特点，看二者有什么区别。

原稿既然已经“佚”了，我们根据什么来“探”它呢？是不是胡乱猜谜呢？探佚怎样来保证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呢？探佚最主要的根据，还是来自于《红楼梦》的文本本身。因为曹雪芹写小说时采用了一种奇特的方法，就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前八十回的确留下

梁归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范旭仑整理。

了许许多多的“谏语”“影射”等伏笔，根据这些伏笔的确能探索出后文情节发展的基本轮廓。第二，就是通过对前八十回的分析，对作者的思想倾向、艺术手法、审美风格、结构法则、悲剧观念等作深入的研究，看看那文章的必然走向，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什么。第三，脂砚斋等曹雪芹的亲友写下的批语中有一部分涉及八十回后佚稿的内容，甚至有具体的文句，比如说原著写黛玉死后潇湘馆的情况是“落叶萧萧，寒烟漠漠”，是和前八十回的描写“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前后对仗的。第四，《红楼梦》有很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所以小说的“生活原型”也就是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探讨原著的某些情节可能怎么写。比如曹家有两个女儿是王妃，其中一个平郡王纳尔苏的妃，另一个也嫁了某王子，《红楼梦》中贾元春和贾探春分别是皇贵妃和海外王妃，当然小说是作了艺术加工的。第五，是清朝至近代的不少野史笔记记载了一种“旧时真本”《红楼梦》，说到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情节情况。虽然至今没有一个本子被发现，但历史记载言之凿凿，如流入日本的儿玉达童本就说探春是“杏元和番”，用陈杏元比喻贾探春。以上就是探佚的五大根据，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也就是对《红楼梦》文本的深度阅读。探佚学涉及版本、家世等“红外学”，但从本质上说，它是地地道道的“红内学”。当然，这五种根据或者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结合的。

下面重点讲一讲“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奇特创作方法。

这是一句“脂批”——脂砚斋的批语。脂砚斋是笔名，是和曹雪芹关系亲密的一个亲友，曹雪芹创作小说的时候，同时就有一伙“圈内人”在他的小说抄本上写“批评”——批语和评语，其中脂砚斋写得最多最有代表性，后来研究红学的人就把所有这些“圈内人”写的批评叫“脂批”，或者“脂评”。

这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脂砚斋等人不只写了一次，而是写过好多次，有时候表达方式略有变化——写成“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伏后文”……等等。一言以蔽之，这是曹雪芹写小说时采用的一个基本的、全局性的艺术手法。

那么这句“写作手法概括”，究竟是什么意思？“草蛇灰线”是两个比喻。“草蛇”是说一条蛇从草丛中蹿过去，不会留下脚印——画蛇还不能添足么，但蛇有体重，还是会留下一些不明显但仍然存在的痕迹，比如某些草棵可能会歪倒一点。“灰线”是说拿一条缝衣服的线，在过去烧煤烧柴后的炉灰里拖一下，由于线特别轻，留下的痕迹也是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就是比喻在小说写作中到处留下对后文情节发展的暗示、伏笔，所以说“伏脉千里”、“在千里之外”。

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写作方法！神奇在这种手法不是偶一为之，而是几乎在每章、每节、

每句中都存在。如果我们能看懂这些“草蛇灰线”，是不是会增加我们阅读的兴趣呢？因为人人都有一种“预知”、“猜谜”的癖好。反过来，如果你对 these 满布文本字里行间的“草蛇灰线”一无所知，麻木不仁，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你能说你已经读懂了这部神奇的小说吗？

下面我就告诉大家这些“草蛇灰线”的奥秘，引领大家一步步进入这个艺术的迷宫。“草蛇灰线”一共有五种表现形式：一、谐音法；二、讖语法；三、影射法；四、引文法；五、化用典故法。

我们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单音节象形文字，一个读音可以有多个字形，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英文叫 text）中，含义参差的同音字并不会引起理解的障碍。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文化中的“谐音文化”就特别发达。比如过年前我到南宁、桂林旅游，看到礼品店里卖的礼品玩意有作成棺材模样的，我有点奇怪，售货的小姐告诉我：“棺材”谐音“官财”，表示让你又升官又发财。又比如我们过年在门上贴大大的一个“福”字，要把它倒着贴，谐音“福到”。如此等等。

因此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就特别多一层讲究，有了些忌讳，要让同音字引发美好的联想，避免坏的联想。其实所谓语言文明里也包含这一层意思。要多讲吉利话、“好”话。把“不好”的话也往好的方面理解，其中谐音就是一个重要手段。

古代的等级制度特别森严，有所谓“避讳”，就是对尊长的名字要避免使用，而用读音或意思比较接近的字来代替。《红楼梦》里就有一个例子：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第二回她的家教贾雨村说：“怪道这女学生读凡书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时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

曹雪芹不愧是一个大天才，他就把这种谐音的民俗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成为“草蛇灰线”的一种重要类型。这主要体现在小说中人的姓名上面。比如小说第一回登场亮相的“甄士隐”、“贾雨村”，就是谐音“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或曰“假语村言”，研究者认为是抄手听音之误），暗示小说中写的贾府故事是以曹雪芹家的“真事”为素材的。所以小说中又常提到一个江南的甄家，有一个和贾宝玉长相、性格都一样的甄宝玉。

贾家的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脂批明确告诉我们“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息”，从命名上就规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结局。第一回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就是后来的香菱，这“英莲”和“香菱”都是谐音“应怜”。这个乡村财主的女儿，五岁就被拐子拐卖，后来又成了呆霸王薛蟠的小妾，最后被薛蟠的大老婆夏金桂折磨而死，她的命运也真“应怜”了。相反，那个甄家的丫鬟娇杏，则谐音“侥幸”，因为她偶然回头看了落魄书生贾雨村一

眼，雨村误以为她有意于自己，作了府太爷后就讨她作了妾，正巧大老婆不久又死了，这个乡村丫头就成了堂堂的“地市级首长夫人”了。所以小说中有两句诗调侃说：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为什么说“一着错”呢？因为按封建礼教，女子走路应该低眉顺眼，回头乱看男人，是不守规矩，犯了错误。曹雪芹这么写，很有点调侃意味，要是死守规矩，不就要失去很多机会吗？

第二种“草蛇灰线”是谶语法。人类对语言的迷信古今中外都一样，因为语言的确是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哲学经典格言了。人总想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又觉得语言这玩艺有点神秘感，这就发展了“谶语”文化。在《红楼梦》里，曹雪芹点化这一传统，创造了一种谶语法，暗示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后续演变轨迹。具体地说，谶语法可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是诗谶。我们看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让他看太虚幻境薄命司里的“册子”，上面不就是一幅画配一首诗吗？贾探春要远嫁海外，就画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上一个女子掩面啼哭，岸上两个人放风筝，配的诗则是“清明啼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贾惜春将来要当尼姑，就画一个女子在寺庙中念经，配诗则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些诗词曲赋等作品，作家为小说中人物“量体裁衣”，捉刀代笔，却让写作风格符合每人的个性，同时还都或多或少地暗示着人物命运和小说情节后文的进展。比如黛玉前面写有《葬花词》，到第七十六回又吟出“冷月葬花魂”的名句，就是前呼后应，暗示黛玉的夭亡。

作诗以外，小说中还经常作灯谜，猜谜语，有的谜语也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这些谜语，无论是否以诗的形式出现，也都具有谶语性质，这是谜谶。典型的如第二十二回就是“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这一回贵妃娘娘贾元春先送回家一个带有诗谜的灯笼，贾宝玉和姐妹们，甚至贾母和贾政，也都作了灯谜，可是却都是不祥之兆，连贾政都有了预感而觉得悲哀。比如元妃娘娘作的灯谜谜底是爆竹，就是我们后来过年过节放的鞭炮，惊天动地，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所谓“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就是贾元春后来在宫廷斗争中遭遇不幸结局的暗示，类似于唐朝的杨贵妃被缢死马嵬驿。

结合时代文化背景，曹雪芹锦心独运，大展奇才，把某些戏曲的名称和内容，与小说情节的演变结合起来，于是有了“戏谶”这又一种“草蛇灰线”。第十八回元春省亲，其中一个重要庆祝节目是演戏，贵妃点了四出折子戏，脂批就针对性地指出：第一出《豪宴》——《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第四出《离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并总结性地

说：“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就是用戏曲的内容关合小说未来的重要情节进展。当时的读者对这些戏曲的首尾关目都烂熟于心，一读到这些画龙点睛之语就会恍然大悟，拍案叫绝。

还有一种谏语法是语谏。就是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某些对话也具有“谏语”性质。注意我这里加了两个“某些”作限制词，因为它不像诗谏、谜谏和戏谏的无一不是谏语，而是“某些”。举一个最显豁的例子。第七回刘姥姥走后，周瑞家的找王夫人汇报情况，被薛姨妈抓差，送十二支宫花给贾家三春、凤姐和黛玉。送到贾惜春时，惜春正和小尼姑智能儿一起玩，就开玩笑说：“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把这花儿可戴在那里呢？”这是小说中第一次描写惜春说话，却直接影射到她最后的结局：出家当尼姑。总之，谏语法包括：诗谏、谜谏、戏谏、语谏。

影射法是“草蛇灰线”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具体如何影射呢？在曹雪芹那一管生花妙笔下，也是婀娜多姿，玲珑八面。清代评点家们说过，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这就是看出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有明显的互相影射。的确，每个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感受到，晴雯和林黛玉的个性比较接近，袭人的思想作风则和薛宝钗有类似之处。显然，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暗合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那句老话。这种写法也就是后来红学家们所说的一个人物是另一个人物的“影子”。

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写晴雯遭到王善保家的诬告，在重病中被正统而偏执的王夫人所驱逐而悲惨地死去，她是“抱屈”的，蒙受了不白之冤。那一回书写得撕心裂肺，尤其是宝玉和晴雯死别的一幕，更是秋风秋雨愁杀人。但精彩不止于此，懂了“草蛇灰线”，就明白晴雯之死是“一击两鸣”，是影射着更为惊心动魄的林黛玉之死的。你看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贾宝玉写了一篇怀念晴雯的祭文，刚刚“读毕，遂焚帛奠茗”，忽然听人说“且请留步”，“那小鬟回头一看，却是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来显魂了！’”结果却是林黛玉。黛玉和宝玉讨论祭文的词句润色修改，改来改去，宝玉终于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无形中说到黛玉头上了，以致于“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人物之间互相影射的艺术手法，此一情节就是一个现成例子吧。

影射法的另一方式，就是象征性的以物品影射人了。还记得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十二支宫花给三春、黛玉和凤姐的故事吧？那一回开头有一首回前诗说：“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原来“秦”谐音“情”，而十二花就象征十二钗。在小说中，正、副、又副三等“册子”中的一些重要的女儿，曹雪芹每位赋予一种特

色花卉作为“吉祥物”（其实应该叫“薄命物”），第六十三回就揭示了一些：黛玉和晴雯是芙蓉花，宝钗是牡丹花，探春是杏花，李纨是老梅，麝月是荼蘼花，袭人是桃花，史湘云是海棠花。每一种花都有它的讲究。

影射法——人与人互相如“形影”；人与物彼此可“照射”。小说就这样有了“镜子”效应，前章后节一脉贯通也。“风月宝镜”的含义，这也是其中一项吧。

“草蛇灰线”的第四种形式是引文法。“引文法”——前面一段文章遥遥“引伏”后面一段文章，也就是后面一段文章已经预先在前面那段文章中所“隐伏”。也就是脂批所谓犹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

口说无凭，举例为证。小说第二十一回回目的是“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花袭人假装生气要离开宝玉，用感情作要挟，要求宝玉改变不合世俗的思想行为；另一个故事是贾琏和多姑娘偷情，平儿发现了多姑娘的头发却在凤姐面前替贾琏掩饰。有趣的是，在小说正文之前，有一段脂批。这段脂批是怎么说的？请看：“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回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这段脂批告诉我们，原著佚稿后三十回中，有一个回目叫“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而这一回的故事是和第二十一回的故事前后对应的。第二十一回中花袭人和平儿是女主角，后面相应的一回则薛宝钗和王熙凤是女主角，这就是“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因为将来宝钗嫁给宝玉，是袭人的女主人，凤姐当然早已是平儿的女主人了。

这种“引文法”，除了完整回目的故事前后“引伏”之外，还有某个情节的前引后应。比如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和王熙凤的女儿巧姐，两个小孩互相交换柚子和佛手，脂批针对这一情节批曰：“伏线千里。”“柚子即今香圆之属，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这是告诉我们，板儿和巧姐交换水果的这一情节，是“伏脉千里”到后面贾家败落后，刘姥姥救出落难的巧姐，巧姐嫁给了板儿的故事。

“草蛇灰线”的第五种表现形式是化用典故法。这些典故是有生命的，长生不老的，我们张口说话，提笔撰文，它们都会像精灵一样时时现身。比如我介绍“草蛇灰线”，就顺口

说出“画蛇添足”。《红楼梦》里的人物张口说话，也常常是妙语连珠，俗语，成语，典故，层出不穷。贾宝玉要去学堂读书，林黛玉就调侃他要“蟾宫折桂”了；黛玉葬花，是“飞燕泣残红”；宝钗扑蝶，是“杨妃戏彩蝶”。这一笔丰富的遗产，旷世奇才曹雪芹又巧妙利用。除了行文时典故如花、成语如叶之外，一个更让人惊奇的创造是他把典故化用作情节发展的“草蛇灰线”。还是以例子来举一反三。

第三十七回大观园的才女们成立文学社团——海棠诗社，大家说我们都是诗人了，不能再姐妹兄弟的乱称呼了，应该每个人起一个雅号。第一才女林黛玉雅号是什么？那是“蕉下客”，贾探春送给她的：“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

这里探春用的是“湘妃”典故。娥皇、女英是什么人？有什么故事？她们是姐妹俩，是我们的老祖宗上古圣王尧的女儿，第二代圣王舜的妻子。她们曾帮助舜度过种种难关，辅佐他登上王位。后来舜到南方巡视，病死异乡，这两个忠实的妻子前去奔丧，一路哭泣，眼泪滴到竹子上，就有了斑竹。最后姐妹俩痛不欲生，跳进湘江里自杀了，死后成了湘水的女神，就是湘妃。这个典故用在林黛玉身上，真是妙趣横生妙在其中。因为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她投胎作人本来就是向神瑛侍者——贾宝玉“眼泪还债”的。所以她爱哭，要作“潇湘妃子”。

但还有更妙处不传的妙言要道呢，你瞧“湘妃”是两位，除了娥皇，还有女英。那么谁是女英呢？我向你附耳低言：是史湘云！史湘云？你一定要吃一惊，然后说：“拿证据来！”那容易啊，证据就是她姓名中那个“湘”字。君不见第五回湘云的“册子”上判词有云“湘江水逝楚云飞”，其《乐中悲》曲子又说“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吗？还有，第七十六回中描写黛玉和湘云在大观园联句咏月，还特意描写两人是坐在“湘妃竹墩”上呢。

总之，“草蛇灰线”的奇特方法使《红楼梦》的探佚成为可能，当然还要与其他几种探佚方法互相结合起来作总体分析。有了探佚，就使小说的阅读格外具有了趣味性，挑战性，因为它要求每一个读这部小说的人都要动脑筋，要和曹雪芹共同创作《红楼梦》。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永恒的魅力，成了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前面讲了探佚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按照那些探佚的方法，具体实践一下，讲两个探佚的个案。

首先，我们看看宝黛钗爱情婚姻故事在曹雪芹原著佚稿中是什么样子。这当然涉及和后四十回续书写法的比较。具体来说，后四十回续书宝黛钗的婚恋故事在贾家抄家之前就已经

完成，又和贾家内部家族争夺财产的内斗完全脱节，贾母、凤姐和邢、王二夫人一致决定了给宝玉选宝钗而不选黛玉，也就是说宝玉的婚姻与家族的争斗、兴衰那一条主要线索基本上没关系，是不相干的两张皮。而在原著中，宝玉的婚配却是和家族的内斗以及贾家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的荣衰变迁复杂地交织纠缠在一起的。这就涉及对小说主题、主线和结构的整体认知和分析。原著是以家族盛衰为最主要的线索的，原著一共一百零八回，前五十四回写兴盛，后五十四回写衰败，是风月宝镜的正照和反照。所以到第五十六回就有甄家人进京到贾府，贾宝玉梦见甄宝玉，醒来麝月议论睡觉不能对着镜子的情节，就是象征现在开始反照风月宝镜了，假的结束了，真的开始了，荣华富贵是假，破败毁灭是真。宝、黛、钗的婚恋悲剧是这个家族大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受这个大悲剧制约的，从故事情节的构成到其中包含的思想内容都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后四十回的“调包计”，则是个比较单纯的包办婚姻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又重蹈了小说第一回曹雪芹抨击的“佳人才子小说”的覆辙，即所谓“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的千部共出一套。

荣国府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财产的继承权和管理权的争夺。而处在矛盾中心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管理财产的王熙凤，一个是将继承财产的贾宝玉。这两个人才是全书并驾齐驱的两大主角。林黛玉其实是第三号。前八十回经常把宝玉和凤姐并列着写，如两个人一起见秦钟，就是隐喻他们二人将见证贾府的一切盛衰变故，要“证情”——秦钟谐音“情种”，是个象征人物，这个情不仅仅指爱情，而是家族兴亡的一切悲欢离合之情。荣国府的基本矛盾构成是以受贾母宠爱的二房嫡子派为一方，这是主流派；以二房中的庶子派赵姨娘和贾环以及大房贾赦、邢夫人为另一方，这是非主流派。非主流派嫉妒主流派，要争夺财产，目标就是对准两个人，凤姐和宝玉。前面的赵姨娘魔法，后面的王善保家的发动抄检大观园，都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这在小说进入后半部，也就是从第五十五回开始，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激烈。无论是小戏子和赵姨娘的冲突，玫瑰露和茯苓霜的盗窃案，厨房风波，背后的矛盾都是这两派在争权夺利。基本趋势是两种非主流力量逐渐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主流派。如贾赦借说笑话讽刺贾母偏心，又称赞贾环，说他可以继承荣国公的爵位。所以，宝玉的婚配问题是与这一基本矛盾紧密相联系的。宝玉成家意味着财产权利的再分配，宝玉要正式顶门风了，宝二奶奶要管家了。所以宝玉结婚意味着他要正式成为贾家的财产继承人，要引发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各方面的势力都要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来表态，那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是后四十回所写那么简单。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一看贾母。从前八十回的“伏线”看，贾母不会择钗弃黛，黛玉是她的亲外孙女，是她最疼爱的小女儿留下的惟一骨肉，宝钗的关系要远

得多。当然作者也写过贾母喜欢“会做人”的宝钗，那是作者用笔玲珑八面，我们不要受后四十回影响而误读。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后，贾母流泪，薛姨妈说要向贾母给宝玉和黛玉提亲，已经暗示了贾母的倾向性。另外贾母对王夫人说只有晴雯可以给宝玉作妾，晴为黛影。贾琏的小厮说宝玉必然配黛玉，将来贾母一开言，再无不准。许多伏笔非常清楚。但贾母希望王夫人主动提出来，因为古代讲究父母之命。

可是王夫人偏偏不主动说，因为她不喜欢黛玉，而喜欢宝钗。这在前八十回中的“伏线”非常多。如对金钏儿，对晴雯，都是影射黛玉的。金钏儿死后王夫人对宝钗说没有新衣服作装裹，只有准备黛玉过生日的两套，而黛玉“是个有心的，又三灾八难的”，怕黛玉多心。客气说法中流露的是对黛玉的不满。宝钗立刻拿出了自己的两套衣服，王夫人于钗黛的亲疏好恶十分明显。王夫人骂晴雯是“病西施”，而这正是黛玉的绰号。无论从亲戚关系的远近，家庭的背景，身体情况，特别是思想作风，王夫人喜钗厌黛都是顺理成章的。

凤姐呢？她在后四十回被写成“调包计”的主谋，是非常不合情理的。首先，凤姐的靠山是贾母，一切都迎合老太太的意思。既然老太太属意黛玉，凤姐一定会站在老太太的立场上。所以前八十回有凤姐开玩笑说黛玉应该嫁给宝玉。还有小厮兴儿对尤二姐和尤三姐说贾母一定会让宝黛相配。兴儿当然是听贾琏和凤姐的口风。更重要的，是凤姐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她会拥黛反钗。为什么呢？因为凤姐是大房的儿媳妇，却借到二房管家，成了二房嫡子派的代表人物。她压迫赵姨娘，不为公婆贾赦和邢夫人所喜，这都很明显。那么对未来的宝二奶奶人选，凤姐就要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了。如果是黛玉，由于黛玉身体不太好，又主要是沉浸于诗人式的精神生活中，她当了宝二奶奶，凤姐继续在荣府管家的机会还很大。如果换了宝钗，凤姐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凤姐的根本特点是贪财又爱揽权，所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她一定会拥黛而不拥钗成为宝二奶奶。

荣府的两种非主流力量，赵姨娘、贾环和贾赦、邢夫人，他们主要是从争夺财产的角度考虑。对宝玉娶黛还是娶钗都无所谓。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挑二房嫡子派的错，把他们占据的主流派地位颠覆，自己取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赵姨娘看到没有了黛玉的话宝玉就会受到致命打击，所以她就造谣诽谤说宝与黛有“不才之事”，企图把宝玉搞臭甚至搞死，因为一旦黛玉受诬陷而死，宝玉也会活不成。总之她的目的就是除掉宝玉让贾环继承财产，而她能抓住的把柄就是宝和黛的关系。邢夫人等大房势力因为嫉妒二房，也会与赵姨娘一鼻孔出气。

所以，探佚的结果是：八十回后宝玉择偶，以及黛玉和宝钗的命运等都是和家族内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包办婚姻故事。大概的情节轮廓是：八十回后贾家日益内外交

困，经济入不敷出，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也走下坡，前八十回描写凤姐、贾琏找鸳鸯借当，太监会敲诈，凤姐梦见另一个娘娘夺锦缎，王夫人说七事八事都不遂心，等等，都是伏线。而家族内斗愈演愈烈，这从第五十五回就开始铺垫，从最下层的老婆子小戏子，一直到最高层的贾母和贾赦。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非常明显，抄检大观园就是大房向二房的一次挑衅和决斗。所以八十回以后，这种内斗更加尖锐复杂。贾母突然病危甚至病故，没有了贾母这块“镇石”，斗争就变得公开化。赵姨娘诬蔑宝、黛，邢夫人附和，王夫人把宝玉搬出大观园，宝玉与黛玉隔离，后来随着其他事故，宝玉更离开贾府，黛玉在对宝玉的担心和思念中眼泪还债而死。王夫人借助元春的力量给宝玉定亲宝钗，这样王夫人既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也是一种在家族内斗中的反击举动，反击赵姨娘和邢夫人等对二房嫡子派的攻击。当然这里面也就有了关于黛玉结局的探佚。

黛玉是受到诬陷诽谤而死的。因为晴雯是黛玉的“影子”，晴雯就是“寿夭多因诽谤生”，而贾宝玉怀念晴雯念谶文时，又是黛玉出来和宝玉谈论谶文的文句修改，最后宝玉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而黛玉“心中有无限狐疑”。

诽谤她的人是赵姨娘、贾环一党，前面已经说过，他们要争夺财产继承权，要搞臭贾宝玉，就造谣说黛玉和宝玉有“不才之事”，嫉妒二房的大房贾赦、邢夫人等也随声附和。宝玉曾错把袭人当黛玉而“诉肺腑”，袭人担心得流泪；抄检大观园时在紫鹃房里抄出宝玉旧物，王善保家的就“得了意”等，都是暗示。

当然黛玉和宝玉受攻击诽谤，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贾母病危甚或病死了，宝玉、黛玉和凤姐都失去了靠山和保护，正像紫鹃替黛玉担心过的：“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黛玉是“眼泪还债”而死的。后来贾家内外交困，贾宝玉搬出大观园，和黛玉隔离了，再往后甚至离开了贾府，黛玉为了宝玉的安全，日夜思念，眼泪洗面，终于泪尽而亡。她是带着对宝玉的爱与痛而死的，没有后四十回中的“焚稿断痴情”，没有误解，没有怨恨，而是自我牺牲式的为爱而死，正像宝玉曾歌咏过的林四娘捐躯为恒王一样。因为黛玉前身绛珠仙草欠了宝玉前身神瑛侍者的人情债。她是“还债”，不是“讨债”。脂批说黛玉死时“证前缘”，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就涉及佚稿和后四十回宝黛爱情悲剧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眼泪还债”是以“爱”为终极价值的，而后四十回的钗黛争婚、黛死钗嫁是以“恨”为终极价值的。

黛玉可能在死前听到王夫人为宝玉订婚宝钗的消息，这增加了她的心理痛苦。但也有可能像电视剧所改编，是黛玉临死前私下嘱咐宝钗，要她在自己死后照顾安慰宝玉，因为黛玉

知道在当时宝玉受到攻击污蔑的情况下，只有宝钗最能给宝玉带来实际的好处。黛玉对宝玉充满了关心，一切为宝玉着想，是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知己”这一精神亮点的体现。

黛玉死的时间一说在春末，即《枉凝眉》中所谓“想眼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春流到冬尽，春流到夏”以及《葬花吟》中“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另一说她死在中秋月夜，根据是她曾在中秋月夜吟出“冷月葬花魂”的谶语式诗句。大的时间背景则是贾家被抄家之前，因为黛玉死后宝玉和宝钗成婚是贾元春赐婚的，元妃尚在，贾府当然还没有彻底败落。

黛玉最后怎么死的，一说是病死。一说是自知不起后投到大观园里的水池中自杀。后者的根据有：她是“潇湘妃子”，而“湘妃”就是投水而死，《葬花吟》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五美吟·西施》中“一代倾城逐浪花”，黛玉听小戏子演唱《牡丹亭》而联想起“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花落水流红”等等。个别人据第五回黛玉的判词“玉带林中挂”说黛玉上吊自杀，大多数人认为是想入非非。

再看看贾探春的结局探佚。

前面说过，八十回以后众女儿的命运结局是和贾家的家族总体命运以及贾家的内斗这两方面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宝、黛、钗的故事更多地体现了内斗，那么贾探春的故事则更多地和外部形势的演变有关。贾元春和贾探春排在钗、黛之后，是两个王妃。元春是国内的皇贵妃，探春是海外的王妃。她们两人的结局更多地体现家族命运的变化。为什么说探春是海外王妃呢？因为有许多“草蛇灰线”的伏笔。

第五回贾探春的“册子”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支大船，船上有一女子，掩面涕泣之状”，再加上画后题诗和后面的《分骨肉》曲子，都暗示探春要远嫁海外。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探春作的谜语其谜底是风筝，谜面是：“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联系她的“册子”上的谶语诗中有“清明啼送江边望”，探春将来远嫁的日子是清明节，大的时间背景是贾家被抄家之前。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各女儿抽了象征自己命运的花名签，小说描写探春抽签后，“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这是明显的谶语，探春“也是王妃”。所以，探春在原著佚稿中的结局是像汉朝的王昭君一样出国远嫁，不过她不是嫁到北方，而是去南方的一个海岛小国中当王妃。这在第七十回放风筝的一大段描写中有明确的象征。那一回探春放了一个“软翅子大凤凰”风筝，和天上另一个凤凰风筝以及第三个门扇大的带响鞭的玲珑喜字风筝搅在一起，

三个风筝断线后飘摇而去。凤凰是帝王家象征，这正像花名签中的“日边”、“瑶池”等词语一样，都是将作王妃的影射。

第六十三回中，贾宝玉给芳官改名“雄奴”、“耶律雄奴”，说到“历朝中跳梁猖獗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这其实是正话反说的“讖语”，暗示佚稿中会有不再“拱手俯头”的外国势力与“天朝”发生冲突，而最后朝廷和亲，让贾探春当了王昭君的角色。薛宝琴说过一个真真国的女儿，所以也有研究者说探春可能就是嫁到了真真国。当然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八十回后佚稿中写政治甚至写战争，都是一种侧面描写的背景，不会有正面的铺张，更不会有武打场面，因为小说的原则是“大旨谈情”，要保持“不干涉时事”的风貌，重点笔墨是落在由某些重大事变引发的众女儿的悲剧命运的描写。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的“怀古诗”第七是《青冢怀古》咏叹王昭君，第六十四回林黛玉作《五美吟》，其第三首也是咏叹王昭君，这两首诗都是探春命运的象征。

由于前八十回描写探春刚强果断，代理家政，打了王善保家的一巴掌，所以研究者认为佚稿中探春的远嫁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就像王昭君也是主动要求嫁到外国去一样。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中，大家的观念是认为离开祖国家园是最大的悲剧，所谓“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所以探春的结局仍然是“薄命”，这和今天大家有了“地球村”概念，都向往欧风美雨想出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故而不能用今天的思想套古人，说探春出了国又当了王妃是太幸运了，不“薄命”了。

还有两种和探春远嫁海外作王妃有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说探春没有嫁到海外，而是嫁给了前八十回中提到过的南安郡王。因为有一次南安郡王的母亲南安太妃来贾府，特别欣赏探春、黛玉、宝钗和宝琴几个女孩子，认为这是南安太妃将从这几个女儿中挑选儿媳的暗示。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探春是嫁给了第七十一回给贾母送寿礼的粤海将军邬家。这当然是见仁见智了，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认同，就要每一位读者也来参与探佚，你看看每一种说法的根据，哪一种更有说服力，更能自圆其说。

这就是说，探佚研究使《红楼梦》的阅读成了一个永远需要读者参与的“召唤结构”、“未知结构”、“空筐结构”、“鸿蒙结构”，使小说审美永远存在艺术空白，从而使《红楼梦》产生永远不会衰竭的艺术魅力。断臂维纳斯比一个不断臂的维纳斯更具有艺术的永恒魅力，所以我主张探佚，而反对各种新的续书。续书那是另一个问题，涉及时代感受、艺术修养、语言功力等多方面因素。应该承认，曹雪芹是不可重复的。可以说，续书一定失败，但探佚永远有魅力，探佚不是续书，探佚只研究大体轮廓，不谈细节，细节交给每一个认同探佚的

读者自己在想象中去完成。探佚只是召唤每个读者每一次面对小说时要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小说的体验中去,要求读者调动自己的全部文化修养和艺术想象去与曹雪芹共同创造和完成那佚失的部分,让这一个审美过程在每一位读者那里千万亿次地进行,每一次都是富有个性的,因为每一个读者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因此这种独特的审美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永远有新鲜感,永远有挑战性,永远有诱惑性。从传播学的角度说,原稿的残佚引发市场效应,可以在接触环节上吸引注意;对原著佚稿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文本的认同差异可以引发争论,也就是在保持环节上保持注意;而探佚所具有的巨大思想和艺术之潜在内涵,则在价值提升环节上提升注意。没有市场效应不能吸引社会注意,缺少价值关怀则不能深刻。《红楼梦》探佚使二者都具备了。这就是探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探佚的意义所在。它使《红楼梦》成了一个永远的魅惑。

我曾经说过一句很让人不高兴的话,我说从思想精神气质的角度,老一代学者只有两个半人读懂了《红楼梦》,理解了曹雪芹,两个是胡风和周汝昌,半个是鲁迅。鲁迅是因为时代的历史局限,那时红学的发展还刚开始,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都不具备。鲁迅和胡风都不是红学家,但他们是思想家和诗人,鲁迅的《野草》最能体现这种气质,《野草》学是鲁迅学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一点就是最本质最要害的。所以大家不要迷信红学专家,他们可能由于某种便利多掌握了一些资料,做出了一些考证成绩,但对小说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的进入和理解可能反而不如某些普通读者,因为他们不具备诗和哲学的素质。我因此提出了“人间红学”的概念,民间有高人,真正的曹雪芹的知音在民间,我见得太多了。可能今天在座的就有高人。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中国小说与史传的不解之缘

梅显懋

小说与史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史传贵实录，而小说却不能没有艺术虚构，小说中有史笔的痕迹，史传中也有小说的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小说与史传的界限并不清楚。古代的小说集像宋代的《太平广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小说与笔记、实录兼而有之。评论家往往称小说为稗史，或者叫野史。小说家自己有时也称自己在写史。因此评论家就往往用史传的标准来要求小说的写作。例如《三国演义》是非常优秀的历史题材的小说，但清代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却指责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观者往往为其所惑。”直至今日，人们对历史文学（历史小说、历史剧）仍然注重其是否合乎史实。电视剧《康熙王朝》、《末代皇妃》播出后，都因为剧中的一些史实细节与历史不符而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甚至要对簿公堂。谁是谁非，我觉得还真不能简单下结论。用史实的标准来要求文学创作肯定是不合适的，但这里面有文化传统背景以及人们的欣赏习惯的问题。小说与史的关系的确很复杂，所以，我用了“不解之缘”这样一个词句来表述。今天就想借此机会，对小说与史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尝试作点探讨，与大家作个交流。希望能得到在座各位的批评指正。

一、小说与史传同源异流

首先从源头上说，二者都脱胎于同一母体，这就是上古神话。神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古时期的史。它的创造，并非是为了渲染故事来使人愉悦，而是有实用价值的，人们要把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如天灾、人祸、战争，也包括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足迹的记录，如发明火的燧人氏、发明八卦的伏羲、发明医药的神农、发明种植的后稷等等。

梅显懋，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范旭仑整理。

没有文字，靠口耳相传，而一旦有了文字，自然要用文字来记事，这自然就是“史”的开端

了。

那么谁是最早记史的人呢？按鲁迅的说法应当是上古时期的巫。巫是上古时期部落中的高级文化人，他们不仅仅记神事，现实生活中值得记录的都要记。一旦用文字来记事，神话的发展就很有有限了，加上儒家学者不语怪、力、乱、神，提倡实录，慢慢地史传记载才消褪了巫术的色彩。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专职的史官。

不过要说明：从巫到史，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史官，都同时兼有巫的职能，至少在周代还是巫、史连称，所以中国古代的史传在很长时期内有浓厚的巫文化的烙印。先秦史传如《左传》、《国语》中总要夹杂着许多神鬼巫术占梦之类的记载。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像《左传》的作者竟会在书中喋喋不休的讲述这些无聊的事，其实正是由于巫、史有这样一种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说正是神话孕育了史学。同时，神话也是小说的源头。

尽管神话的本质是记事，但其中就蕴含着上古时期人民丰富的想象、美好的愿望和特定的审美情趣，并且运用了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这就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艺术经验和创作方式，毕竟这种解释有着难以拒绝的魔力，人们从中不仅得到了思想上的启迪，也得到了审美愉悦感的满足，而这是从老老实实叙事的史传上所得不到的。所以，尽管进入了文明时代，神话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在民间始终没有中断它的创作脚步，在一些文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依然会沿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他们所关心的故事。

民间的创作，因为无文字记载，所以失传的很多，但从文人的作品中仍可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有很多不能看作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是取材于民间。《汉书·艺文志》记小说家，“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即琐碎细小之意。所谓“稗官”，大概是无足轻重的小官吏，他们可能有搜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民间故事传说的职责，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借鉴。

魏晋时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一类志怪小说中所记载的故事，如李寄斩蛇、干将莫邪、宋定伯捉鬼等，原本也应当是民间的集体口头创作。干宝不过是从民间搜集到故事而后做了一些加工润色，并不是故事的创作者。干宝自己说故事来源有二：一、承于前载；二、采访近世之事。这说明“神话”到了文明时期仍然还在民间一定范围内流传。后来，逐渐演变成成为不仅讲神事，对于一些奇人奇事也加以传诵。正因为有民间创作这条潜流的存在，至宋元时期还形成了民间的一种艺术“说话”，通俗点说，就是讲故事，类似于今天的说评书。而说话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说话原为即兴的，后来有了底本——话本，书商将话本修润售卖，就是话本小说。一些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

是文人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加工修润而成的。从这个角度说，神话也是小说创作的源头。只不过在封建社会中它只是在民间比较兴盛，可称为俗文化。

二、小说与史传的不同际遇及其原因

虽然小说与史传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但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哥俩待遇截然不同。史学成了社会的宠儿，而小说则备受冷落和歧视。

梁启超说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在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史传就体裁而言，有编年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典制体，四体各成体系，自上古直至清末，各有一整套完备的记载。此外还有实录、家谱、杂记、地方志，再加上注释、解说、考证的书籍，真正可以说得上是浩如烟海。唐初便确立了史馆（专门修史的机构），网罗大批人才来修史，给予高官厚禄，此后，官修史传，历代沿袭不改，历代文人也多把撰史视为神圣职责，能进史馆修史是很荣耀的事。而小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被压抑被歧视的地位，小说家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被人瞧不起，一般都是落魄文人，没有功名的人，才去写小说，而且弄不好还会因此惹祸。所以，现在研究古代小说的人最头疼的就是作家的生平事迹资料太少，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大文豪留下的研究资料极少，至于《金瓶梅》的作者题为兰陵笑笑生，其真名为谁，至少有十几个候选人。

为什么小说与史传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命运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我认为其重要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务实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的形成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有关，务农的人们最讲究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人靠土地生存，土地也能把人牢牢地拴住。因此，中国古代的人们往往着眼于现实的人事，而不太愿意做脱离现实的想象。此外也与儒家学说有关，孔子注重探讨人伦道德，热衷于如何提高人性修养，以期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虽然敬神，但不提倡用太多的精力去钻研神鬼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儒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孔子也被尊为“圣人”，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务实观念愈加巩固。正是这种务实斥虚的文化大背景，使得大多数文人表现出一种对于“实录”的史传的高度重视，而不能容忍在写作上的虚构违实，小说则恰恰不能没有艺术虚构。

其次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介入。重视史学的观念应当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传统之

一，然而史的编写在封建社会中渐次被封建统治者所垄断，给予史官很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待遇，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鲁迅先生曾气愤地说：正史多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倒不如去看野史杂说，“野史杂说……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野史杂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因为小说家大多是仕途不得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社会弊端，而且正因为小说不受官府控制，可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暴露了一些社会真相，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查禁甚至销毁的厄运，像《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都曾被列为禁书。近人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将中国小说创作的动机归为三类：“一曰愤政治之压抑；二曰病社会之混浊；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而有这样思想倾向的作品，封建统治者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三、小说中史笔的烙印

正因为小说与史传同源于神话，所以中国史传中往往会有一些带有小说意味的叙述描写，甚至于有虚构的东西。如《左传》成公四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一段史事，晋灵公派鉏麇刺杀赵盾，当鉏麇看到赵盾天尚未亮就“盛服将朝，坐而假寐”的情景时，感叹地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于是“触槐而死”。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段内心独白大概是出于史官的猜想之辞。至《战国策》则更具有小说意味，明显的如苏秦，将其与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比较，可知《战国策》中的苏秦与历史上真实的苏秦相去甚远，苏秦根本就不是像《战国策》上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小人，若说此形象高度概括了战国时期“士”的形象和他们的处境，倒是十分恰当。而且《战国策》通过苏秦这个形象的描绘，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实在是与后世小说十分接近了。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史传的修撰，贬低甚至查禁小说创作，因此，中国的小说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打着写史的旗号来写小说，声言自己既无资格参与写正史，只好收集一点正史未记载的事件，为正史提供补充，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小说创作上具有明显的依傍于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深深的史笔的烙印。具体说来有如下一些表现：

一、从小说命名来看：以“传”、“记”、“史”、“外史”“录”为名的随处可见。如《柳毅传》、《任氏传》、《枕中记》、《三遂平妖传》、《水浒传》、《杨太真外传》、《西游记》、《禅真逸史》、《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

记》、《石头记》、《宦海升沉录》等不胜枚举。

二、以实录为标榜，小说本来是虚构的，但是小说家总要让读者相信他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小说往往在开头交待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家世生平，结尾交待故事的来源、人物的结局。例如：《任氏传》以狐狸精幻化的女子为主角，本为虚构无疑，作者却要声明“唐天宝九年夏六月”，自己曾与小说中男主角郑六同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又如李公佐著《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南柯一梦”，偏要在篇末郑重声明：“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从吴到洛地，中途停泊淮浦”，遇淳于棼，听其讲此事，且亲览槐树下的蚂蚁洞，经反复考察，得出结论，此事属实。连《红楼梦》也要在开篇声明自己所写的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真好像是在实录自己一生中的所见所闻。当然明清时代的小说家观念上也有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写史，表面上摆出实录的架势，实际上是虚晃一枪，其真实的时代背景恰恰被作者所隐藏起来了。如《金瓶梅》指明是写宋徽宗政和年间事，而其反映的却是明中叶的社会现实；《儒林外史》在书中一再点明所写为明初的事情，实际上书中所写的人与事都是以作者所处的清代康、乾人事为模特而创作的。曹雪芹一面说自己所写皆为实录，“不敢稍加穿凿”，一面又说此书乃是“空空道人”、“渺渺大士”抄录于“大荒山，无稽崖”的一块为女娲补天所弃之石头之上，实际上等于是在向读者暗示书中所写非是确指某时、某地、某人，不可拘泥。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障眼法，但不能不承认他是受写史的影响。

三、模仿史传传记的笔法，详叙人物的家世生平。史传中记叙人物必在开篇交待人物家族简史。如飞将军李广一定说其祖先乃秦国猛将李信，“秦时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水浒传》以传命名，其中的重要人物如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杨志等人更是不惜笔墨详叙其出身家世、履历、遭际等。神魔小说原本应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中国的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中，凡人物一出场，往往自报家门，陈述身世履历，这正是小说创作深受史传笔法影响的结果。另外，中国不同时期的小说中刻划的英雄人物也都有家传，如《征东》写薛仁贵，《征西》则写其子薛丁山，《薛刚反唐》则写丁山之子。《说唐》写罗成，《扫北》则写其子罗通，《粉妆楼》写罗通后代罗灿等。还有杨家将，从杨业写到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金豹。还有《三国》中有关羽，到了《水浒》则有关胜，不仅声明关胜为关羽后裔，而且其造型简直就是关羽的翻版。

四、中国小说的言简意赅、婉曲深微的笔法也是从史传借鉴来的。《春秋》寓褒贬于行文之中。虽是实录，但通过选择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作者对所记之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以极简略的文字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同样是记叙战争，用征、伐、袭、侵，所寓含的作者的

褒贬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后世文人学者以“春秋笔法”称之，并奉为史传行文的准则。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叙事和人物形象的描写中寓含了对善恶忠奸的褒贬，其语言风格犹以语简意深，委婉含蓄著称，形成了中国史传特有的行文风格，被称为“太史公笔法”。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天下已定却要陈豨联合谋反，事泄，被吕后斩之于长乐宫。司马迁评韩信“假令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不亦宜乎！”但看其全篇内容，结合结尾的评价，实际上是在暗示韩信对汉家有大功，但憾韩信其人不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受刘邦的妒忌，是至死之因。司马迁之所以用了这种表述方式，一方面是受了“春秋笔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缘自中国封建社会言论的不自由。就司马迁而言，以汉家史官写到汉家史事，不能不有诸多忌讳，但史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一定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用这种婉曲深微、意在言外的笔法，应该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小说在封建社会中本是不得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小说家多出身卑微，或科第功名上不得志，才转而从事小说创作的，一般都有一腔义愤在胸，而若将其发泄出来，又须防专制迫害之惨祸，故在无形中接受史家暗寓褒贬的笔法，也是很自然的事。

《金瓶梅》表面上写的是宋代的一个暴发的无赖小人西门庆的荒淫罪恶的一生及其家庭内部的争斗，实际上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充分暴露明中叶社会政治昏暗，社会风气腐朽糜乱的现实。西门庆的形象也可以说有明中叶某些皇帝的影子，其家庭内部的争斗，可以看作是明代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的折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认为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蒲松龄的《聊斋》也是借写花妖狐鬼来抒写一腔“孤愤”，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正所谓“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戚蓼生论《红楼梦》“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曹雪芹是在我国古代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的修养，在浓厚的重史的文化氛围中，结合他自己特殊的身世和所处境遇，将以《春秋》、《史记》为代表的言简意赅、寓褒贬于行文之中的写作方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抒自己半生以来的所思所想所感，又能够避开文字狱的惨祸，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不正是自己点出了书中有弦外之音，有意在此叮嘱读者注意吗？学者们早已指出书中借甄士隐、贾雨村二个人物的名字，隐含着“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意思，俞平伯还指出第十二回跛足道人给了贾瑞一面镜子，嘱其“千万不要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紧要紧”，这是作者有意点破读者迷津，让读者注意此书所蕴藏着的深意。

这种笔法在神魔小说当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文人要表达自己的

一腔孤愤，往往要借助于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自己。例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或者作者本出自游戏之笔墨，但书中却蕴含了对明中叶社会的黑暗腐朽、人情世态的冷嘲热讽。如书中写比丘国、车迟国的国王皆宠信妖道，言听计从，荒失国政。比丘国的国王先是缠绵于狐狸精幻化的美后，形神皆疲，次后又听信妖道之言要取一千一百个小儿心肝做药引医病，待到妖道已现原形，那国王却依然是执迷不悟，哭得天昏地暗。谁能说这样的昏乱、无道、庸懦的国王形象没有明世宗的影子呢。这些地方，细加体会，不难看出作者对封建时期最高权威的蔑视和嘲讽。胡适说“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的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的黑暗”，这一问的确切中要害。

五、小说的夹叙夹评的模式，也是受了史传的影响。“史以道义”是我国的史学传统，也就是说，写史传重要的是要让读者知道什么是应该作的事，什么是不应该作的事。相传由孔子修润过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传《春秋》，有意识地在行文中“寓褒贬，别善恶”，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褒贬评价，意欲使那些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后来史学家不仅继承这个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左传》用“君子曰”、《史记》用“太史公曰”、《汉书》用“赞曰”、《三国志》用“评曰”为标志，以下的文字大多是作者借以直接发表议论的，以表明自己对善恶忠奸的褒贬态度。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家们对于著史有着崇高的历史责任感。由于“史”在中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这一传统自然地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无论是讲史平话还是志怪传奇，不论是文人的创作，还是民间艺人的“说话”，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这一原则。特别是文人的创作，更是把为政治服务，劝善惩恶，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而且常模仿史传中的篇末评议的模式，如唐皇甫枚《三水小牍》篇末往往用“三水人评曰”为标志发表自己的见解。《聊斋》用“异史氏曰”为标志来发表议论。此外还有不少小说在书名中就明确地点明惩劝教化的写作宗旨。如冯梦龙的小说集“三言”分别为《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书名就明确了编著小说集的目的就是要“警世”、“喻世”、“醒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开导大众。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醉醒石》、《照世杯》、《警寤钟》等等，都明显地在书名上即明确表明作者醒世、警世的创作宗旨。这些都是小说家接受史家笔法影响的结果。

四、史学影响小说创作利弊谈

史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既有其积极有益的一面，也有其明显的弊端。其积极有益的影响

主要在于：

一、中国古代小说注重小说创作素材的真实性。追求写实的风格，更易于引起读者对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注，直至今日人们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关注程度仍然要高于小说作品，一段时间内“纪实文学”异军突起，受到普遍的欢迎，不能不说是与传统的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有关。在今天人们欣赏历史文学，对其中严重违反史实情节，反响就特别强烈。我认为必须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中国人特定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观念，戏说历史在国内很难得到认可。

二、中国小说创作重视小说所应当起到的社会教育意义，将扬善惩恶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继承这一创作传统，无疑是有意义的。鲁迅说自己做小说，总不免有些主见的，他认为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坚决反对把写小说当做“消闲”，说自己写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道出了真正优秀小说家所应该具有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既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之一，也应当成为今后小说创作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三、中国小说所具有的这种言简意赅，婉曲深微、意在言外的文风，能给读者以咀嚼回味的余地，有益于启发读者自己去思索，开拓了读者的思维空间，从而更易于使读者获得一种“再创造”的特有的美感。

其弊端在于：

一、由于受到史的观念的约束，小说创作总是左顾右盼，长期依附于史，不能放开手脚走自己的创作道路，致使中国小说萌芽甚早却发展极为缓慢。以史家的标准进行的小说评论，在无形中束缚了小说家创作的手脚，常因追求史笔的标准而使一些小说内容枯燥平板，缺乏艺术性。《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了，而在封建社会中往往要被史学家以有不符史实者责之。但《三国演义》的创作成功，恰恰不是因为他老实地依傍于史，而是由于创作者走了一条艰辛的创作道路，以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为蓝本，以史实为补充。而以后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却没有一部能够与《三国演义》差可比肩的。这其中的原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继者没能领悟到《三国演义》创作成功的真谛，反而进一步向“史”靠拢，以史传为蓝本，老老实实做了一点史传通俗化的加工，如蔡元放以冯梦龙《新列国志》为底本创作的《东周列国志》，史事倒是真了，但缺少艺术价值。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包括历史剧，要求其不能违反基本史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过分地以史实的标准来要求文学创作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小说家对于史传与小说的界限的模糊认识，往往会片面强调小说的惩劝教化的社会

功能，而忽视了小说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感染读者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小说形象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特别是那些三、四流的作品，连篇累牍地进行说教，更是令人生厌，其效果与作者的愿望适得其反。至于那些借惩戒之招牌，推销淫秽齷齪之实作品，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三、由于中国小说言简意赅、婉曲深微的语言风格是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产物，造成了中国小说往往有晦涩难懂、语意含混之弊。像《红楼梦》好则好矣，没有学者的考证研究，也很难为大众所接受。鲁迅曾感慨《儒林外史》“伟大也需有人懂”，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信口开河讲了这么多，其中的一些观点包括所举例证都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诚恳地请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名作的感染力

王 毅

了解一点儿大连历史的人都知道，大连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尤其在金州地区，有很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大连的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文化建设工作，比如我们大连图书馆举办的传统文化讲座，请大学老师来，大家交流一下，日积月累，相信传统文化在我们大连能得到很好的传承。

我今天讲“名作的感染力”，主要以古典诗歌为例证。那么，什么叫名作？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第一，名作不是一种个人偏爱的产物。我们每个人在文学欣赏和艺术欣赏上，完全有自己偏爱的权力。比如，二人传、芭蕾舞，我就喜欢。西方有句话，叫“趣味无争辩”，每个人都有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对某一类风格、某一类内容、某一类体裁的爱好，别人无权指责。喜欢就是喜欢，没办法，也用不着说服我，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偏爱。偏爱有它天然的合理性，这个我们不用讨论它，但是名作不等于这个概念。所谓名作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得到读者普遍的认可，普遍的尊重，普遍的喜悦，必须是这样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刚才说的那句西方谚语“趣味无争辩”，用在名作上就不合适。第二，名作不等于畅销书。我们到新华书店买书，会发现有些书卖的特别火，还有签名售书啊，一下子来势很猛，也就是所谓的畅销书。它突如其来，大家争相传阅，形成一种欣赏上的短时间内的聚焦现象。但是有时来的快，走的也快，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大家都忘了。还有一种，叫做常销书，你在书架那儿会发现并没有很多人争买它，但是书店永远有它的位置，永远有人在买，每天卖三两本，几年过去了，这种作品仍然有它的读者，这叫常销书。畅销书和常销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楼梦》的研究史料出来以后，在读者中间影响很大，有点类似于畅销书，但它更是常销书，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仍能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感染。所以，畅销书、常销书不一定能划等号。常销书可能是畅销书，也可能不是畅销书，但是却能常销下去。书出版时默默无闻，但慢慢的大家就认识到它的价值。

王毅，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讲演。刘丹整理，王雨霖校订。

作为一般读者，一方面，我们要有开阔的视野，如果你仅限于个人喜欢的，只偏爱某一类文学作品，就像人吃饭偏食一样，久而久之，多少都会有一些营养不良。所以，我们视野要开阔，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很多，竞争很厉害，文学

创作的质量啊，肯定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趋势，值得看、值得欣赏的作品，我们不要轻易把它抛弃。当然，这里有两个标准：个性的标准和公共性的标准。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你周围的人也喜欢，你会有一种深得我心之感，这就是公共性标准和个性标准吻合了。但有时候，公共性标准和个性标准不一定吻合，两者之间可能会有冲突的，这就涉及到审美问题。好，那么，名作究竟是什么？我想把它讲具体一点，我提出来三个要素。我感觉凡是名作，基本上应与这三个要素相吻合。

第一，作家的创作能够激发感受的自体。大家注意，我这个说法和一般文学欣赏或文艺理论的讲法不太一致，一般讲作品质量，经常用深刻的哲理、思想、时代性等等词语，我不想用这些词，为什么呢？所谓的哲理，尽管非常有分量，非常能够说明人世间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任何哲理、思想都是外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马克思、鲁迅、曹雪芹的思想都很好，古往今来，这些大作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说法，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来讲，有时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不是由你自己内心引发出来的。外在的东西再高明，也不能替代你本人的体悟。所以对文艺创作来讲，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把作品里面要揭示的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一种感受的自体。我为何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呢？我看到过一个材料，有记者问上海一个女作家，二〇〇四年想干点什么？她大致谈了这么一番话：我以后的写作，主要是我的感受的自体要起作用。所谓自体，不是那种浮泛的、粗浅的感受，而是经过千锤百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对社会、对人性的一种感受。那么作家本人的内心深处的、长时间积淀的一种感受，能不能表达出来，这点很重要。比如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个人都有母亲，即使不太孝顺的人，读到此诗后，他内心深处人性被蒙蔽的一面也会觉醒。这首质朴的诗能千古流传，就是作者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感受，也激活了读者的感受。我特别强调感受这个东西，人要相信自己的感性，这种感性不是那种很随意的、没有分量的感受，而是一种反复咀嚼、反复领会之后的，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语言表达的一种内心体验。

第二，名作能够揭示出人性的深层。人性这个词，我们用的很多了，人性是很复杂的，我们强调的是人性的深层。所谓人性的深层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讲它的深度；一个是讲它的超越性。名作揭示出来的人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青年，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大学教授还是一般的市民，都能使我们有感于心。比如朱自清的《背影》，它之所以让我们久久难忘，就是因为它揭示了深层的人性。事实上朱自清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像《背影》中那么融洽。正因为现实中和父亲关系不那么好，所以父亲在买桔子送他时，那背影的

动作，一辈子忘不了。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朱自清本人的一种期待，一种心理的补偿，所以才写得深刻，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名作还能超越时空的因素，发挥普通的人性。比如你随口说出来的唐诗宋词，因为它们能够和人的善良、正直、宽厚、友爱的因子相吻合，所以能超越时空地流传下来。深度、超越性与艺术感染力总是成正比的。

第三，名作形式的普遍积淀。积淀这个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艺术形式。我们常说赏心悦目，实际上应颠倒过来讲，先悦目而后赏心。有时是悦视觉，有时是悦嗅觉，有时是悦触觉。首先外观、形式能够引发我们的好感，能够叫我们喜欢，这是悦目，而后才能赏心。形式的一个普遍积淀问题，讲起来很复杂。拿古典诗词来讲，里面的典故，里面的意象就不乏赏心悦目。比如，明月的意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家要是对中国古诗词喜欢，读过一些作品的话，就会发现，从《诗经》开始，明亮的一轮月亮，永远写不厌。再比如杨柳的意象，“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意象的问题，典故的问题，声韵的问题，对仗的问题，语言本身的问题，风格的问题，凡是名作，在他的艺术形式的各个要素方面，必须都要达到一种百炼成钢的程度。读过《背景》你会发现它形式上极其质朴，夸张的地方，华丽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就是像聊天一样，把故事叙述下来，但是它仍然具有我说的形式的普遍积淀，仍然让我们觉得有悦目而赏心的地方。我不是说华丽的不好，华丽的也有好的作品。不管是华丽也罢，质朴也罢，必须在文艺作品表达方式上、显现的状态上，叫我们能够喜爱，能够接受。

下面我们举例来看看名作的感染力。

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作品？根本上讲，文学作品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中其他方面提供不了的营养。人类有共同的情感：爱母亲、爱孩子、怀念亲人等等，文学家把他们自己的这些情感，用好的语言形式、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让我们共享。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讲的大刺客荆轲，这两年火得不得了，电影、电视、文艺创作很多。《史记》不是诗，但是《易水歌》给我们留下两句诗，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深秋时节，就在今天的河北易县，荆轲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秋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秋天的河水也已经冰凉了。而后哀叹生命，“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这一去啊，就回不来了。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叫林庚，他曾经分析过这两句诗。他说，荆轲以这两句诗永垂千古，是因为诗里面表现出来的悲壮情感让我们心悦诚服。而且在这种情感后面，蕴藏着一种更为永久、更为普遍的情感。我觉得他这话很好，很有理论性。我们不一定要有荆轲这样的经历，我们甚至不一定要认同荆轲的这种政治上的选择，但是荆

轲的这么一种胸襟，这么一种由内而发的人性的光芒，就能够超越时空，使我们一代一代读者都能够产生共鸣。

由荆轲的这两句联想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非常大气，真有一种君临天下、壮怀激烈的感受。由此我们还可联想到孔老夫子《论语》里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宿夜”。这句讲的是：孔老夫子领着他的学生，走到了黄河的边上。黄河不像现在，当时环境还没有恶化，我们现在动不动黄河断流，两千多年前，黄河水量是非常充沛的，非常壮观的。所以老夫子走到黄河坝上，突然从河水不分昼夜奔流不息中，感悟到了非常深刻的东西。北朝民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同样写出了人的心胸、气度。我认为荆轲、刘邦、孔子以及无名氏的《敕勒歌》，都是在天地之间，在一个境界上品味人生，突然发现感受的本体，一种人性的深层，然后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

还可举例，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大家想一想，语言很精练，苍劲奔放，极富感染力，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成为历来传诵的名篇。再如毛泽东的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些诗词都有大气魄、大眼界、大感悟。这些都是名作。

名作能给我们情感的熏陶和冲击。刚才说的荆轲刺杀秦王的故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它是不对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应该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荆轲刺杀秦王，完全是逆潮流而动。但我们不管那些，我们注重的是人性，人的情感。谈到真挚的情感，我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这里积淀了作者多少厚重的人生体验，多少发自内心的情感，“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坟墓真的是那么矮吗？海峡真的是那么浅吗？母亲去世了，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最痛心的事情，虽然诗人的语言极其平淡，甚至用一些小學生都会用的形容词，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出诗人内心深处，那种哀伤和沧桑之感。再如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强烈要求抗金，给皇帝不断的上折子提建议，但是皇帝就是不用他，所以作者在这首词的最后两句，表达了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哀愁情感，“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从这种非常平淡的，非常简单的表达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厚度和真挚程度。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文学作品，有时候会借用大自然作为一个

框架，作为一个参照物来增加它的感染力。刚才走进报告厅时，我看有些老同志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我跟他们说，是不是上午到滨海路去玩，去晒太阳了，下午到这个地方来听讲座，来休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住在大连这个环境里，大自然恩赐我们这一方海，海天之交，有时候对我们人的心情、对我们人生的体味、对我们生活的质量有一种澄清的作用。本来我们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茶，想一想头都大了，面对人生中好多好多压力，觉得过日子真难呀，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或许吃点安眠药管用，但还有别的手段，就是读一读好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回到荆轲的这两句诗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一句写的就是景色，你可以想象：秋原辽阔，寒水宁静，你站在深秋的原野上，一眼看去，一览无余，你会感觉自己的胸怀变得宽阔了，你会领悟人世间的那种你争我夺是不值得我们费神的，一些自己原来觉得挺大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大了。所以啊，大自然的永恒无穷，就像陈子昂写的“天地悠悠”，有一种感染力，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感动。大自然的这么一种框架的作用、参照物的作用，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澄清和过滤。那么大自然的过滤、澄清在什么情况下对我们的感染力最强呢？一般来说，是一种淡色调，是一种冷色调。“风萧萧兮易水寒”就是一种淡色调，冷色调。反过来讲，春天到处都是花，都是绿叶，夏天枝叶繁茂，行不行，也可以，但是把这种暖色调，热烈的情调和这种比较寒、比较素的情调相比较，我感觉还是人家荆轲作的好，还是人家刘邦说的好，就是这种秋冬之季，它比起春夏之季来，更能够使我们体会到天地的悠长、人生的渺小，从而更重视、更珍惜我们生活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名作都能达到这个目的。

《和子由澠池怀旧》描写的是苏轼和他的弟弟子由骑着毛驴去赶考，路过河南洛阳附近的澠池，住在一座寺庙里，并在墙上留了一首诗，几年之后，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于是写下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想一想，这首诗写的很有味道，它是典型的宋诗，它和唐代诗歌不一样，宋代诗歌喜欢讲哲理，讲的非常深刻，这种道理是诗人自己的亲身感觉，是由诗人自己的这种感受的本体升华而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稍给大家解释一下，它里面没有太难懂的地方。“人生到处知何似”中的“到处”是指一个人一生走过的地方。人一辈子，要走很多的地方。用什么来比方呢？“应似飞鸿踏雪泥”，飞鸿就是大雁。大雁通常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有的时候它飞累了，或是由于某种需要，它会在地上落一下，落在哪儿？苏轼作一个比方，冬天的雪化了，地上是泥泞的，所以大雁落下来，爪子会在这个泥泞的地面上留下烙印，他说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古人的流动性并不比我们今天少，特别是读书人，去赶考啊，去做官啊，去游山玩水啊，去拜访朋友啊，

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一辈子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从哲理上来探讨人这一辈子来去匆匆，把人生旅途比喻为“应似飞鸿踏雪泥”。“雪泥鸿爪”成为我们今天的成语了。“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是和他弟弟一起回顾往事。几年以前，我们去赶考，路过澠池这个地方，老和尚让我们留了一晚上，还让我们在墙上写了一首诗，现在老和尚去哪儿了？“老僧已死成新塔”，大家都知道得道高僧，甚至是一般的和尚，他死了之后，有些比较讲究的寺庙里头，埋他的坟墓上面是要修塔的，他们的尸骨就在这个塔底，有点像我们的纪念碑一样。古人房子没有我们的房子结实，泥巴墙上面刷点石灰水，几年过去，墙早就败落了，我们兄弟当年在上面提的诗都见不着了，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沧桑感。“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想当年跟他弟弟由一起赶考，骑着驴子，一路走来，人困驴也困，多少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觉得这首诗，作为事实的中心点没有层层点，只是“老僧”、“坏壁”、“蹇驴”，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会经过好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很具体地记住它，但是却能记住从中得到的感悟。比如说我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大连图书馆与各位有过一次交流，若干年以后，各位的相貌，我肯定记不起来了，但是一些重要的细节我能记住，我会记住和在场的各位的这种沟通交流。在苏轼的这首诗里，他绝不会絮絮叨叨讲这个事情的经过，他要的就是物质之上的精神领悟，事情本身只是他人人生体验升华的一种真理，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哲人胸怀，也就是名作的感染力所在。

好，我就讲到这儿吧！

问：您是一位文学院的院长，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我感觉现在的文学作品反映不出这个时代的伟大，尤其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特别反感，因为它不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现代文学为什么反映不出来这个时代的伟大？

答：这个同志提的问题很大，也经过了思考，我不一定能够答好。这么讲吧，我的一个同事在《人民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今天的时代，一个准备经典的时代》。我们已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点不假。这个伟大，不一定是说它的正面价值，它指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巨大变化，是这个意思吧。我们今天的时代在变化的强度、力度以及影响的深远程度上，恐怕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几个时代之一。这种变化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当代人评价不了。这里面有很多痛苦，有就业的压力，有就学的压力，有医疗保障的压力等等，这些压力使得我们当代人很痛苦。如果把这个伟大理解为是一种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巨大的变化的话，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为什么身处伟大的时代，不一定能写出大作品来呢？这恐怕就涉及到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普通现象，就是一个作家，身处在这个情景、

环境之中，他能不能有这么一种跳出时代背景的能力，能不能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即使能够跳出来，是否能识得“庐山真面目”，这个很难讲。当局者处在这个环境之中，有很多具体的利害关系，有很多现实的诱惑，使得他不一定能够成为大家。但是也不要悲观，我们辽师大去年开了一个所谓的“哈佛国际小说笔会”，请来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一个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很感兴趣，由于没有时间，他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推荐几部作品。这个资深编辑怎么回答的呢？当然这也是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只能看几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资格成为名作，并能够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册里面的话，第一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另外一部是阿来的《尘埃落定》，还有王蒙的一些作品也很好。普遍现象是你所说的，但也不完全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准备经典的时代，或者叫准经典时代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经典作品，而且陆陆续续还会有有的。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与影响

乌丙安

—

大家知道，人类文明是从人类的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中精英的东西才是文明，是优秀的文化在推动人类进步才是文明，这就是我们国家所讲到的先进文化；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先进文化决不是平平常常地诞生的，自古以来文化就是鱼龙混杂的，“文明”总是和它的孪生兄弟“野蛮”伴生在一起诞生的。聪明的人类居然发明了战争。当我们歌颂居里夫人时，你哪里知道她发明的是杀人的武器。连居里夫人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样残酷的后果。高文明、高科技、高进步往往伴生的是破坏自然生态的野蛮，我们也不能想象把炸弹绑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痛苦，但就有人这么做，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促使他为此而赴汤蹈火，去炸敌对国家的人群。现代文明同时也伴生着现代野蛮。现代战争的野蛮已经使我们很恐怖了，而恐怖战争就更加危害人类。所以当我们探讨文化的时候，应着眼于它的多角度和多侧面。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跟过去有些教授讲的可能有些不一样。我所讲的东四恰恰是另外一面，这个另外一面并不是负面的一面，而是过去人们不大关注的文化层面。这就是我说的民俗文化，或者说是人类文化的根基，是人类最根本的基础文化，日本把它叫做“基盘文化”。我们中国过去往往从文化分层的角度又把它叫做“底层文化”，也就是俗文化，大众文化，它主要是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数以亿计的人就世代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我们讲的就是这种文化，我们大家也都是从这种文化根基中诞生出来的。

人类文化到底怎么来的？这是个重要问题。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正在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各种派别在近现代

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产生了不少，我国的马列主义学说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

了重大发展。但从哲学层面上来讲，近现代欧洲有一个很有影响的马列主义学派使马列主义哲学特别关注人类日常生活的文化根基，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它不只是在政治经济圈里转，而是更深刻地探索民间日常生活，看看人类对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解读的，所以他们就从哲学的高度解剖了人类文化到底是怎样结构而成的。

国际上文化人类学界给人类的文化下的定义不下七百多种，比较有影响的从大师级学者嘴里说出来的大约就有一百四十多种。各说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简单地说起来就是人类文化主要由“自在的”对象化的三个彼此不能分离的部分组成。那就是：一是使用工具生产的习惯方式和手段；二是社会生活习惯的传承；三是语言习惯交流的活动。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人们一代传一代约定的习惯体系，也就是人类文化。这个哲学上的定义所说的“自在的”，就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意思。这个定义其实正是民俗学给民俗文化下的定义。它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基础部分，中国民俗文化也不例外，它是我国文化的主要根基。

这第一个使用工具生产的习惯方式和手段，在作为农业文明古国的中国，主要表现在几千年的农耕传统习惯方式上。比如说中国汉族的“二十四节气”农事活动习惯，就是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农耕文化周期的代表。北方的“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等等就是千百年来农民遵守的农耕作业习惯。直到现在，老农根本就不看阳历日历，脑子里记着一本活生生的古老的阴历或叫做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按照这个来种庄稼。种庄稼的二十四节气在欧洲是绝对行不通的，只适合中国这块土地的生态。比如二十四节气里的“秋处露秋寒霜降”，秋分过后，寒露和霜降快来了，几亿农民就要安排这一阶段的农事活动了。这里就有各地不同的很多习惯，把它排到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天中，让每一天的农事活动习俗，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用号召，无需动员，自然而然、自在地发展。五千多年的农业大国其实就是这样运转的。同时，还有各民族渔猎生产或畜牧生产的种种风俗习惯在自然地发展。这就是哲学上讲的“自在的”关于生产的民俗文化。

第二个是社会生活习惯的传承。人类的生产习俗，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这些就是诸位最熟悉的民众的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

第三个是语言的习惯。人类最突出的一种工具就是语言。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其他动物不会有它们自己的文化语言。现在研究灵长目动物的人类学家几乎都在研究猩猩，特别是黑猩猩和大猩猩。这些猩猩和猿人、和后来的智人有些相似，它们有语言符号。但是，它们的信号是怎么发出和交流的？直到今天，研究成果认为它们不可能有文化，只有一种信号。只

有简单的符号，表示惊恐，表示高兴，但是猩猩至今还不会表示否定。我们能说不，说 no，但猩猩不会，猩猩不会使用否定的信号。

动物行为学家用现代科技研究给我们民俗文化带来了很多的好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明，在人类社会有很多是习俗的成分，是民俗文化的元素，实际上却在有些灵长动物中也有。比如非洲平原的狗头狒狒，它们的群体性和人类社会差不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所以一个狒狒家族在非洲平原上最多能有九十多只在一起生活。它们有领袖，也有妻妾。原始社会人类选择妻妾和争领袖时所使用的办法，跟狒狒没有什么区别。当一个首领开始衰弱的时候，另一个雄性的强者就起来，跟它挑战，就像我们古代的英雄，一个英雄出来，大家看着他很英武，他在打猎时战胜了猛兽，在面对别的异族部落侵略时战胜了敌人，于是就要用比武的办法让前一个首领下来，人们就要拥戴新的强者做首领。狗头狒狒也是这样，大家都在观战，战胜的那个为王，失败的那个退让下来。这时，这个队群的狒狒就拥戴这一个强者。在炎热的烈日下强者坐在最佳的阴凉处，大家像参拜一样，都冲它喊叫，像是在呼“万岁”，然后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按照长幼一个一个从它面前经过，它要表示亲昵，它特别宠爱哪一个雌性，它就留在自己身边，这很像是在选纳后妃。然后带领它的队群，在它所占据的地方走一圈，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撒尿，如果另一个狒狒队群走到这，闻到这些尿味，就不敢侵犯，如果侵犯，就会有一场恶战，这就是边境纠纷。我们现在人类不也是这样吗？这个地方没有水，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但这是我们的领土，别国休想侵犯。我们有记号，这叫边界。要商谈的话，是另外一回事，这叫文明。动物行为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有领袖欲，有领土欲，其实有些动物也有，人类别把自己看得太高明。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高明的地方似乎不在于生产，因为所有的动物种群都会打猎觅食，猎豹打猎就很有一套。中国北方的狼在群体行猎的时候，怎样包抄，怎样捕获猎物，都有严格的纪律。许多动物种群里的鸟兽能使用现成的工具获取食物。当科技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时，人类越来越知道自己其实是平庸的动物。人类没有鸟类那样的飞翔能力，人类没有许多哺乳动物那样的奔跑速度，人类的视力远不如鹰，听力远不如马、鹿，嗅觉远不如猫、狗灵敏，人类在许多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特长。很多哺乳动物的幼仔很快就结束了依赖期，相反地人类婴幼儿依赖期最长，需要多少年才能把一个小女孩养育到长大成人。所有灵长目动物，包括小猩猩的依赖期都比人类短很多。依赖期长实际上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尽管生物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直立的动物已经很了不起，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脊椎动物中，最脆弱的还是人，因为现在已经测定了只有人类的脊椎支撑力脆弱，人人都有腰酸腿疼和腰肌劳损。事实证明人类在生理机体方面是有缺欠的。

那么，人类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类曾经经历了一场有机体的“特化”。为什么进化论在重要的方面被推翻了，是因为进化是极其缓慢的，特化却是一种特殊的突变。人类这个有机体，生理上出现过一次特化，那就是人类大脑的特化，今天的人类都知道怎么去外太空了，却惟独对于人类自己的大脑为什么有如此高超的智能，依然所知甚少。但至少知道了人类的大脑已经特化了，正是这一个重要因素，使人类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人脑特别是中枢神经特化以后，出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基因，那就是符号思维，大脑能够进行符号思维，能把这些思维用语言代码表达出来。人们抬头看到了蓝蓝的空间，就叫它为天；低头看到了脚下踩着的这一大片空间，就把它叫做地；见到了高高的地，就叫做山；山下流淌着的叫水，叫河，叫川，叫江；看见了花草，就给它们取了各种各样花草的名字。这种符号在人类大脑里出现了，所以人类开始有了记忆，而且还能够重复表达这些记忆，人类用各种语言记下了所认识的大地宇宙，万事万物，并把自己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用口头语言记下来，彼此进行交流，世代传承下来，于是出现了文化，创造出原始文化。在原始文化中首先出现了原始的生产生活习俗。

人作为一种动物，生产生活是最基本的东西，就从这里出现了文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中，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这里的两种生产被一些人理解错了，以为两种生产就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研究的两种生产不是这样，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一种是维持自身生存的生产，主要是食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产，也就是生儿育女、传种接代的生产。

人类要生活生存，必须根据需求，生产吃的东西。你是种庄稼的，我是放牧的，他是打猎的，各种生产手段都是为了先把人养活了。这种生产习惯叫做“产食文化”。所以我们的农业部门、粮食部门、食品工业部门就都很重要。农业社会在吃上显然是先进的，远比游牧社会、采集打猎的部落社会要高明，所以农业国家产生了最早的产食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的农业文明国家。这种农业文明首先解决的是吃。所以在世界上，中国人在吃上是领先的。“食在中国”这是真的。全世界凡有人烟处，都有中国餐馆。吃的文化，吃的习俗，中国人积累了很多很多饮食的知识和技艺。我们不妨一个一个地列举烹调的方法。先说用水煮，用火烤，许多国家都有。但是一说到蒸食的方法，就有很多国家的人不会用这种熟食法。比如蒸馒头、蒸年糕、蒸鸡鸭鱼肉。还有，包括煎、溜、炒、爆、糟、腌、酱、焗、氽、涮、烩、焖、发酵等各种各样的烹饪法，应有尽有。于是，从生产到生活，民俗文化自然而然就诞生了。

生产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产。中国人之多，不是因为世界上先有中国人，后来别的族群

才一点点地诞生的，而是中国人生殖繁衍的多。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就记住一点，要想干活吗？这么多的地种不了，生的孩子多了以后就有更多人来种庄稼了。农业劳动就是这么笨重，多生一个儿子，就多了一个劳动力。戏曲舞台上就是佘太君生有很多儿子，七狼八虎出幽州，最后男人都战死了，只好十二寡妇征西。这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的特点。老太君的龙头拐杖梆梆地一拄，请皇帝看看老杨家是怎样出来这么多的忠臣孝子。

在全世界，中国人是最早意识到生育是最重要的，却忽略了哪张嘴都是要吃的，结果又回到起点，还要再回去生产。我们发明了山上的梯田，所有能种的田地我们都种上了，还是吃不饱。再加上水灾、旱灾，中国人还是一个饥饿的、多灾多难的民族，所以人们有了对龙王神的信仰，有了对旱魃的敬畏。

在农业生产与生活的长期习惯中，产生了种种战胜灾害的愿望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把这些都用口头语言代代相传下来。这样就有了古代那么多的神话、传说、故事，后来又创造了很多的娱神娱人的歌舞、音乐、戏曲。比如“后羿射日”神话，许多少数民族也在讲，讲本民族古代的大英雄射日的神话，人们就这样几千年、上万年地用口头一点点流传下来，积累到今天。从口头的说一直到唱，积累了那么多口头文学遗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像中国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小戏剧种就至少有三百多种。我的《民间小戏论》里只收集到二百四十八种，还应该再收集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生产习惯、生活习惯、语言习惯的产生就是文化的诞生。不像有些国学研究者讲的：文化所以叫文化是因为产生了文化人，产生了精英，才有了文化。我认为这样说不妥，有了精英，只是使某些文化更文明，这是两个概念。文化的产生仍然还是马列主义那个基本原理——历史和文化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我们不知道大饼是谁最早发明的，也不知道蒸馒头那个蒸法是谁发明的，答案应该是老百姓，是我们的祖先祖辈群体不约而同地发明的，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些成语，叫做习以为常，不约而同，约定俗成。你那里叫“爹爹”，我那里叫“大大”，他那里叫“爸爸”，但现在全世界孩子在儿童时期叫爸爸，很多都叫 papa 或 daddy，很多都叫母亲“妈妈”、mama 或 mummy。语言的一种叫法，很多是雷同的，于是约定而成俗，上面雷同的称谓语就产生了民俗的称谓法。民俗文化中的语言习惯并不仅仅指的是说话，而是语言的产品、精神的产品。发明文字之前，人类全是靠这样用口语一代接一代地往下传。所以代代约定相传的习惯体系，就是人类文化，也就是人类最早的民俗文化。可以简单地说一句：人类的民俗文化和中国人的民俗文化都是与生俱来的。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从我们最早的祖先出生以后，只要一动，只要一吃，只要一穿，只要生活，就开始有了文化。中国的神话告诉我们，燧人氏发

明了火，有巢氏发明了房屋，那些都是氏族群体的创造，不只是一个人的发明。像西南少数民族那样用干栏式的木架构架搭出来的房屋，叫做“构木为巢”。中国的干栏式住屋，是世界上重要的一种古老的居住方式，土著原始民族住在楼上，底下有支架，既防止了地面的潮湿，也阻挡了野兽的侵害。所以，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就是民俗，就是最早的文化。

民俗文化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并不是两种性质的文化，它们具有同样的一种性质，都是附着在生活上的，中国的民俗文化跟全人类的民俗文化一样都是附着在全民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信仰娱乐等等，都是文化。今天我们一提到现代文化，那就指的是文明社会的人“自觉的”创造的一整套文化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制度，它们不属于民俗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习俗，而是后来文明人创造的，或者说是精英文化创造的。但是有一点，无论我们多么现代化，我们下班都要回到家，回到这个原始时期就有的家族群体。我们的公社化曾经想打碎小家庭，但是家族群体是打不碎的文化根基。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础决定了生活是以家族为最基本的群体，从家族群体再繁衍出来族群社会。由小的族群形成更大的族群，繁衍成为民族，进而成立国家。现代人类应该知道所有现代文化都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的根基上，要懂得民俗文化的产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要知道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条件非常险恶艰苦，各种各样的猛兽猛禽，远比人类强大，人类不得不崇拜它们为神。人类所以崇拜太阳，是因为它对于人类有利。早晨它从东方升起，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光明，晚上，它从西边落下，留下一片阴冷和黑暗，这时人们才知道它的珍贵，企盼它明天再来，所以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跪下来迎接它，现在的原始部落还在举行早迎日、晚送日的仪式，这就产生了崇拜和信仰。又比如捕猎一头猛兽，一个人战胜不了它，就要用很多人围猎它，最后牺牲了多少人，终于把它捕获，以后，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肉吃它，才感觉它很厉害，吃到它很不容易，于是就得做祈祷，希望它乖乖地被人们捉住，希望它千万不要怪罪人们的捕杀。早年，鄂伦春族在猎熊的时候，要举行祭祀熊神的仪式。取下熊头，扒下熊皮，摆放在凳子上表示供奉熊神，全体跪下，由首领致祈祷词，向熊神表示和解、谢罪。人类最为本质的本性在这里都表现出来。我们不能说他们愚昧，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信仰文化。所以列宁在讲到俄罗斯农民的信仰时说：“他们在吃母亲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旧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我跟各位一样，对几大宗教都是很尊敬的，宗教教义中那种悲天悯人的精神真的是很好的。但我并不信教，我在探索更深的真理，我们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里就有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信仰的基因。

文化最早的根基不是外在的东西，就是说不是谁给你外加上去的。比如我们今天学一门

学问，就是外加的。比如说化学就是外加的，物理是外加的，中国学生还得学英语也是外加上的。而与生俱来的民俗文化可是自然而然就学到手的。孩子们一进入黑夜，没人告诉他，他本能地会觉得恐怖，这时候如果老人们再讲鬼呀、神呀，那他们肯定就会觉得更恐怖了。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鬼神信仰影响。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当人类处于天灾人祸的危害中，个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时候，人们的那个信仰基因，那个信仰的文化符号思维就开始萌动，开始寻找一个救命的依托。就像那年南方出现大洪水灾害的时候，一条蛇为了求生，爬到一颗小树上，一个小孩也爬了上去，那么长时间就在那趴着。这是求生本能的欲望。在这个时候，信仰才容易产生。所以中国老百姓到这个时候就会说，“老天爷呀”，“天哪！”就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被恶霸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一出场就喊：“天哪！杀人的老天哪！”像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和原始的习俗文化一样，全都留在我们人类的童年。人们小时候接受的那些风俗，到现在都会常常怀念。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人类的童年积累的古老的文明，在当时看来相当了不起。一个部落首领在那里念念有词，“老天呀，要给我们下雨啊！我把我的亲儿子投到河里去了。”全世界都有过这样的用人作牺牲品的习俗。中国的“河伯娶妻”等等故事，都是这么来的。慢慢地人类发现了不少规律，才慢慢地从信仰里脱胎出来，找到了许多科学办法，到十八世纪以后人类终于走向近现代的科技文明。

大体上说，自古以来的民俗文化包括四大类和五十个系列。

第一、物质生产与消费的民俗，又叫做经济民俗类，包括生态、采集、狩猎、捕捞、游牧、农耕、工匠、商贸、交通运输、医药和衣食住行等系列。生产主要是产食的农耕生产，再就是工匠生产，要有房屋居住，要有衣服鞋帽穿戴。我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服装真的是琳琅满目，五彩缤纷，非常好看。汉族的传统服装也很讲究，按季节穿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颜色，佩带的饰物都是很有特色的。其中有些被许多少数民族继承了，汉族却失传了。

第二、社会群体、聚落生活及人生仪礼的民俗，又称社会民俗类，它包括家族亲族、村寨乡里、都市城镇、行帮、交际、两性、孕育、婚姻、寿诞、丧葬等系列。其中还包括关于人的自身生产的两性文化。现在民俗文化研究在这一点上还是个禁区。中国的两性文化其实很古老，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全是封建的。大家知道，孔子时代，仲春时节，令男女相会，“奔者不禁”。《诗经》的时代是很开放的。现代汉语“青春”的“春”字不就是古代“思春”、“闹春”的青年两性文化“春”的民俗含义吗？古代礼教的精英文化也尊重传统民俗，人们划出一个特定的仲春时节，让青年男女用来谈情说爱，谈婚论嫁。一到种庄稼以后，没时间，都得男耕女织做农业。所以仲春时节令男女相会，可以幽会、私会，“奔者不禁”。祖

先要繁衍后代，于是两性民俗文化中出现了人生仪礼的民俗，包括育儿习俗和诞生礼，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三朝”、“满月”、“命名”、“百岁”、“抓周”、“挂锁”等等仪礼都要度过。接下来就到了成年礼。汉族的成年礼失传了，很可惜，少数民族如今还在过。成年礼的仪式很重要，就是让孩子知道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南方有的少数民族习惯是男孩成年礼后，就可以结交女友了，可以和成年人一起参加生产了。女孩也是，成年礼那天，举行穿裙子礼，全村寨人都来参加，就是让大家知道她可以结交男友了，可以准备婚嫁了。

第三、信仰崇拜民俗和传统节会民俗，由于民间节日、祭日都有信仰民俗意识的遗留，所以把它们统归为信仰民俗类，包括大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灵信仰、神灵信仰、祖灵信仰、禁忌、巫卜传统节日、祭日、庙会等系列。古代先秦的史家就是当时的巫师，他们记录了很多三皇五帝的神话，就成为史。司马迁把巫师讲的那些古代的口头传说都变成史料或史实记下来，所以我们至今也难以说清楚黄帝到底是部落酋长还是一位大神。黄帝为中央神，黄颜色的帝，黄色代表土；东边叫青帝，青色代表木；西边叫白帝，白色代表金；南边叫赤帝，赤色代表火；北边叫黑帝，黑色代表水。最早夏、商、周时代只有“天”或“皇天”大神，又把“天”称为“帝”或“上帝”，自西汉开始中国就信仰了五帝，没叫上帝，后来有了基督教，才把至上神翻译成“上帝”。过去叫天帝，就是民间叫的老天爷。信仰五帝标志了中国的信仰是多神的。我们承认黄帝是我们的祖先，那就是中央的帝，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央属土，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古老王朝的首领。

祈求老天保佑庄稼丰收，希望人们生活过得富裕，那就要举行仪式，逐渐形成观念形态的信仰，所以信仰是与生俱来的。是积累了几千年上万年的信仰，根深蒂固。中国的多神信仰就是这样出现的。在中国，非常突出的就是民间禁忌，现在还是如此。比如有的老人教导小孙子不可以对着太阳撒尿，说那是对太阳不敬，我们七十年前那一代的小孩这样做了是要挨打受骂的！在农村里，女孩做饭烧火，不得正面蹲着往灶口添柴，必须侧身，不可以对火神不敬，认为女孩不吉利，于是女孩在心理上就留下一个观念，女人天生就是不吉利、不干净的。在农村，女孩晾晒裤子时，必须把裤子搭到僻静地方阴干，不得放到明处，免得有男人从女孩子裤子底下走过，冲了鸿运。

这些观念是非常多的，不仅中国人有很多禁忌，非洲土人、澳大利亚土人也有很多，欧洲文明国家的人也很多。现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地方人们的禁忌习俗都有很多。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里，这些民俗禁忌观念有大量的遗存。

占卜是民俗文化生活中最普遍流行的信仰形式和手段，《易经》占卜其实是一种平衡心理的学问，平衡帝王、圣贤和平民百姓心理的知识和技能。在古代，许多人都或多或少懂得

一点《易经》占卦的知识。懂了《易经》八卦的知识以后，人们遇事心理不平衡时，就能立刻用它做出调整。每个上上吉的卦后面隐藏着一点凶，每个下下凶的卦里面也深藏有一点吉，就像“太极图”似的。一黑一白，像两条阴阳鱼，那个黑鱼里有一个白眼睛，白鱼里有一个黑眼睛，那两个黑白因子一旦扩大了，最后就使白鱼变黑，黑鱼变白。《易经》占卦就是这样，需要懂得卦爻的辩证关系，要懂得祸福相依、吉凶相伴的道理，不要强求出它的具体答案。走江湖的阴阳先生的算卦是对《易经》的歪曲解读。魏晋南北朝以后把《易经》占卜给弄成神秘化的一种数术。其实《易经》占卜是根据占卦人此时此刻的时间，或者诞生的时间，推算出来该人以后的运气走势，提供你及早注意调整。所以古代人从来不用《易经》算“死卦”。真正懂《易经》的没有问“你看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而是要问：“我的孩子怎样才能考上清华、北大？怎样就不能考上？”占算出成败吉凶两条道来，你照着调整就行了。它的辩证法就在这里。

第四、民间文学艺术、游艺竞技活动的民俗，又简称游艺民俗，包括民间工艺、雕塑、绘画、音乐、歌舞、戏曲、游艺娱乐和竞技体育，还有民间口头遗产的神话、故事、歌谣、史诗、谚语、谜语等系列。所以说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非物质文化的无形资产作为优秀遗产。中国今天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我们已经启动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现在由文化部、财政部也联合签署了文件，各部委都在协调，很多群众团体也都起来参与了这样一个伟大工程。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工程。中国民俗学界也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年代来到了，要重新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珍藏多少年多少代的文化瑰宝抢救出来，包括那些曾经被人们看不起的，那些被认为是粗俗的文化，从音乐到舞蹈，到戏剧，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形式，一个一个地展示出来。

粗略统计，民俗文化的小类过千，细目过万。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俗事象，多如牛毛，不计其数。这是文化领域的基本国情，它在全人类民俗文化的总量中也占有较大的份量。总之，把这说完以后，我们就知道民俗文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我们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它？就是因为民俗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同，它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关注它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就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不以为然了。

下面谈谈民俗文化的特点：

第一、民俗文化是从远古原始文化传承而来，所以，以口传心授为手段，世世代代传习不断的传承性特点，是民俗文化产生发展的最基本的文化传递特点。

第二、在空间上向四面八方不断扩散是民俗文化借助地缘关系移动的传播性特点，民俗文化因此形成了许多同质的和异质的文化圈、文化带的分布空间。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首先我们的民俗文化是以族群为单位的。当你到了新疆以后，你马上就能感受到维吾尔族民俗，然后到哈萨克自治州，你就感受到哈萨克族民俗。外国人到了中国，不仅能感受到中国的民俗，还能分门别类地感受到傣族、彝族等等多民族的民俗。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民族的族群观念，特别要注意各个族群文化之间的混合。新疆的民族文化不完全是维吾尔族的，也不完全是哈萨克族的，都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

第三、关于民俗文化的群体性是很重要的，以家族、村镇、部落、社区、民族等群体为单位，不约而同地参与民俗活动，是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特征。特别是在节日民俗、庙会民俗、婚丧寿诞礼仪民俗、集市贸易民俗、集体生产民俗等大规模活动中，这种群体从众聚合的特点十分鲜明。

第四、在社会长期处于缓慢演进的条件下，中国民俗文化总是出现文化保守倾向或缺少变化的稳定性特点。

第五、在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条件下，民俗文化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或被动的变异性特点。

第六、民俗文化事象都有独具特色的象征符号体系。符号思维的象征性体系是民俗文化的一个最醒目的特点。特别是通过视觉看到的标记、图形、纹饰、色彩、样式等符号和听觉接收到的各种声响代码，就可以立即了解到它们所象征的民俗信息和内涵。中国民俗的象征符号体系极为突出，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各种吉祥符号，令世人惊叹。比如，庆贺寿诞就画“鹤鹿同春”，画寿星和桃子。画五个蝙蝠围着一个圆形寿字符号，就叫“五福捧寿”。对婴儿诞生表示祝贺，就用“文王百子图”或画石榴开裂的“榴开百子图”，表达多子多孙的含意。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存在着层次差别，既有上层文化，又有下层文化。中国上下两层文化的分野非常鲜明。上层文化又叫做圣贤文化、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下层文化又叫做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或民俗文化。在中国，上述两层文化缺一不可。贬低、轻视、忽视民俗文化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民俗文化是在各个族群体的民众中自然、自在、自发产生的约定俗成而又习以为常的文化。它的创造者、享有者、维护者和传承者是祖祖辈辈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源远流长。它不是广大民众主活的外在文化，而是民众日常生活本身，它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在人生养成中内化了的精神文化，根深蒂固。一直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文明古国，五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始终保持着本民族民俗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和汉族的民俗文化相互交流，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各民族民俗文化。为此，今天充分评估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地位和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内容极其丰富深厚，形式异常多样，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进而为全人类所共享。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文化工程就充分证实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上层文化是在不断吸取民俗文化的精华中发达起来的。民俗礼仪上升为皇家礼法，俗信崇拜上升为庙堂祭祖，民间文学和通俗艺术不断被汲取为高雅艺术样式，使民族文化得到充分发展。民俗文化是精英文化的母胎。古史证明：儒家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源于民间，古典文学的文学体裁形式几乎都来自民间文艺。

中国的民俗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保持了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色。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

民俗文化支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它潜移默化地养育了世世代代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其中俗信观念：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吉凶、祸福、生死、阴阳等对中国人一直影响深刻。在天灾人祸面前，民俗文化所显示的“天人合一”观念，深深地打上了因果报应的民间俗信的烙印。凡具有规范模式的民俗文化对大多数人都有程度不等的约束作用；凡具有威慑力的民俗事象，都会显示出对人们民俗心理暗示的作用，甚至产生或强或弱的控制作用。在我国，禁忌习俗和巫卜习俗的功能就长期具有这种对精神上的深层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交织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作用。

民俗文化在传承中鱼龙混杂、良莠并存，并不都是有益无害的事物和现象，许多已经形成了的恶俗和陋习，形成了某种习惯势力，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影响了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最后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民俗文化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只就下面几个问题说说。

民俗文化中的精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中的主体部分，我国在保护这一大部分宝贵遗产方面，还应当再加大力度，特别是在宣传上，应该达到全国上下人人皆知其重要性的最大限度。以便动员全民自觉关心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国家和各地方应当尽快把各级民俗博物馆的建设纳入规划，列入日程。

中国的民俗文化丰富多样，民俗文化保护，现在看来是最辉煌的事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正是日、韩各国实施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时期。比如说端午节，一九六七年，我国正是破四旧的时候，韩国宣布：“江陵端午祭”为无形文化财产第十三号国宝，给予保护。日本保护下来的也不少。明治维新以后破坏的江户时代以前的文化艺术都恢复了。让大家知道一个真正的日本，既发现日本很现代，又看到日本也很传统。现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护，要继承，保护好音乐舞蹈不用说，还要把更大文化圈里很多的精华保护好。比如庙会，中国的庙会具有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特点，但是我们从来不把它拿出来作为文化瑰宝。今年河南省就把伏羲太昊陵庙会确定为省重点保护的试点。如果保护得好，也可能成为世界遗产代表作。

在现代科学飞跃发展的环境下，对民俗文化的“自在的”发展，应该格外关注和加强研究，不能任其放任自流。社会科学界和文化界以往较普遍地轻视民俗文化的研究，偏爱圣贤文化或高雅文化的探讨，这既是一种学术偏向，也是一种文化偏见。民俗学科的发展建设至今还没有提升到应有的地位。我觉得政府对这么博大而深厚的民俗文化，常常是放任自流的。甚至有时候嫌弃它。我认为不能嫌弃，就算它混杂着肮脏的、低级的东西，也是这个民俗文化根基派生出来的。我刚才说了，最有文化和最为文明的东西，它都伴生着野蛮。古老的民俗文化从来都伴随着“愚昧”，岂止“野蛮”。

传统民俗文化优秀遗产的知识、技艺应当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全面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规教育。大学应当设立文化遗产学系或专业，培养这一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面对民俗文化自发性的传播蔓延特点，建议政府设立整体综合性的移风易俗对策研究机构，而不是条块分割的单项对策研究单位。它是以调查、观测民俗文化的全局动态为对象进行科学决策研究的机构。从业人员必须既掌握民俗文化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又有民俗调查作业的实践经验，甚至应当把对民俗文化的关注纳入到基本国情、国策的研究范围。

鉴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特点，对于那些古老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风俗习惯或民俗观念，对民俗信仰的各种俗信和迷信等历史文化的难点、重点问题，都要细心地做

出科学的分辨。比如，我到贵州山区去，那里的少数民族有几个寨子，树林非常茂密。像我进去大声说话，他们都告诉我，“小声点！不要惊动了寨神！那里有神。”人们无论家里怎么缺柴烧，也决不动这块树林，因为这里有他们信仰的神。所以至今这片森林保护得非常好。一种民俗传统信仰的形式一旦渗透在民族群体中，这个民族就用这种信仰形式去进行自然生态的保护，客观上难道不是一种积极因素吗？

所以，我觉得面对着习以为常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式的文化，要不要重新分辨？我们今天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这样一个思想，我是非常赞成的，就因为我在研究民俗文化，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应该细细地分析，不是所有的传统巫术完全是百分之百的装神弄鬼。有些巫术经过调查，在跳神和唱神歌的仪式里，有大量的心理治疗功效。所以迷信这个词，在我国的大词典上解释错了。大家看《辞海》去，《辞海》里迷信的定义是什么？说：“像星占、卜筮、命相、阴阳这都是迷信”。但这只是民间信仰的一些形式和手段，并不是“迷信”的概念。各国的词典，包括英文的、德语的、日本语的词典，都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迷信是蛊惑人心的谬误的信仰”。所以我们有的无神论者偶尔地去占卦，这不是迷信。有的老工人、老干部每当右眼皮一跳动，就找个火柴杆粘到眼皮上，这是因为他们有“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的俗信习惯。夜间做梦，梦见去世的亲人，第二天就准备去陵墓给亡人烧钱化纸，这是一种俗信，也是一种心愿，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那么赞赏那些农民运动，但是我们研究民俗文化史的都知道，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曾经有过蛊惑人心的谬误信仰。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都有，所以靠蛊惑人心的谬误的信仰不可能成功。

文化也有个科学规律，要想把民俗文化做好，现在距离还相当远，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已经知道的音乐、舞蹈、口头说唱的艺术，都比较容易识别。但是面对一些其他的综合艺术就不容易了，比如皮影戏，从雕刻技艺到演唱、制作等等各方面，都是瑰宝。剪纸也同样。但是其中有相当多古老的信仰符号，有很多关于吉凶、祸福、善恶、美丑、正邪、好坏、黑白，阴阳对比的内容常常出现，这就需要正确的分辨。即使有一些民间信仰的色彩，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也不必随便去改动它，因为有些遗产标志着一个历史的时代。应该让后来人认识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现在我们每个人去怀旧，想起童年时候都是老样子，不会用现代去代替它。

关于说普通民众存在迷信的问题，我的考虑是：有些自然科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破除迷信的事情，我也很赞赏很钦佩。但是我想提出一个破除迷信的建议，应该统筹安排，综合研究。不能单纯从自然科学和科技科学去破除，事实上自然科学和科技科学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破

除。比如说老大娘终于知道了“地球原来是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但是这个科学知识并没有解决她一生命苦多灾多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她拜娘娘庙求孙子的问题。她还得上去拜菩萨求孙子，烧香祷告，祈福求吉。这并没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必须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社会科学里像民俗学这门科学是薄弱的，大学里这门专业的课程总是被人看不起。民俗改革需要提倡新风。比如说春节要贴春联，红对联，这就要感谢明太祖朱元璋。这个皇上提倡红纸春联，在他之前都是砍桃树做“桃符”，在门两边钉两块桃木，上面画门神、写吉祥文字，每年都是用新桃换旧符。到了明代开国后，选红色为国色，朱元璋提倡用红色的纸写对联换掉桃符贴上。他亲自拟对联，亲自出来查验，从此门两边张贴红纸春联变成一个新习俗。

所以，我觉得破除迷信必须一点一滴做，而不是讲述大道理，或者采用取缔的简单办法。据我做调查，长征以前，老苏区和老解放区拆掉的寺庙现在都没有恢复，但是，直到今天，就在那些原来的寺庙遗址上，每逢过去祭祀神佛的日子，还有人偷偷地摆放供品。因为人们心中的庙没有拆，灵魂中的神佛没有倒，拆庙也没有用。因此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最终得到改善，没有了天灾人祸的侵害时，民间供奉的众多杂神自然就会被请出神坛。所以民俗的改革家需要在公众人物那里产生，民俗研究家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真正的民俗改革家要出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中，他们将是地地道道的有效的改革家，而不是简单化的改革家。顺便说一下，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准确把握“迷信”的概念是“蛊惑人心的谬误的信仰”。因为只要抓住这一点，作为一个标准尺度，我们就能够把各种各样民间俗信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迷信形式分辨出来，从大量的鱼龙混杂的民俗文化中挖掘出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来。

谈谈中国戏曲

马明捷

今天来的人可能少一点儿，不过这没关系，来的人越少，咱们就越是知音。当年我在北

京读大学（北京戏曲研究院）的时候，我的院长梅兰芳先生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他在北京吉祥剧院演出，那天下大雨，有人就跟梅先生商议，是不是咱们回戏吧，这么大的雨，观众不会太多。回戏就是演出取消了，买票的人可以退票。梅先生问有来看戏的没有？剧场负责人说也就来了一百人左右吧。剧场最少也有一千个座位，梅兰芳唱戏，只来一百多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梅先生说不能回戏，这一百多观众，冒着大雨来看咱们演出，这是真正的知音，你告诉后台，我今天加一出戏，唱完了《霸王别姬》，我再加一出《苏三起解》，来答谢这一百多冒着大雨来看咱们演出的观众。这是我四十多年前听到的梅先生讲的一件事情，我始终记在心里。所以，今天来的同志虽然不多，但都是真正的想求学问的同志，所以我感谢诸位今天来听我讲课。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咱们大连图书馆举办传统文化讲座，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些年，我有一种感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地发展，但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却在逐渐地衰落，比如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相对来说是后退了。我们常听说这样的话，大连这座城市文化土层比较薄，文化底蕴不厚。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大连的现代科学技术并不落后，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大连和关内一些城市比，确实不如人家。原因是我们城市的历史太短，只有一百零几年的历史，而且大连是移民城市，移来的都是山东破产的农民，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传统文化的基础比较薄弱，再加上建国后工作上的失误，传统文化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薄弱环节。大连图书馆举办传统文化讲座，特别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我们中国的戏曲以京剧为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那么中曲在

马明捷，大连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一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国戏世界戏曲史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世界上有三大古老戏剧文化，第一是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以雅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非常长，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形成，距今有两千六百多年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其次是印度的梵剧，大概在公元前后基本形成了；第三是中国的戏曲，形成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十二世纪左右。古希腊的悲剧、喜剧，印度的梵剧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已看不到演出了，戏里是怎么演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比如西方的歌剧、话剧、舞剧都是在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东南亚的歌舞受印度梵剧的影响很大。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唯一还存活在世界上，并且还在发展的，只有中国的戏

曲了。

中国戏曲形成时，正值宋金时期，以杂剧、南戏为标志，中国戏曲逐渐成熟起来。元朝时，出现了元杂剧，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为代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戏曲高潮。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发展到今天，就是从宋金戏剧一直发展演变而来的，很多剧目现在仍然还能看到。比如说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剧《六月雪》，这是程砚秋先生最拿手的程派剧目；再比如王实甫的经典名著《西厢记》，直到现在京剧舞台上还有两个版本：田汉改编的张君秋先生演出的张派代表作《西厢记》；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经常演出的《红娘》，那可以说是《西厢记》的通俗本。另外，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赴会》，在昆曲舞台上也在演出，而且唱的还是关汉卿的原词儿，当代舞台上还能见到演唱八百年前原词的戏剧，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被外国人称为世界奇迹。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唯一存活在世界上并继续发展的中国戏曲，在世界古代戏曲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

那么中国戏曲在世界当代戏剧文化中又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世界当代戏剧文化中，有三大戏曲表演体系，第一是俄罗斯的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斯氏体系；第二是以德国的布莱希特为代表的布氏体系；第三就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也叫做梅氏体系。斯氏体系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完全脱离自我；布氏体系则要求演员在舞台上时刻记住自己是在演戏。有一个小故事，在意大利威尼斯有两座坟墓，其中一座埋葬的是一位演员，另一座埋葬的是一位观众。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一个剧团在威尼斯演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其中有一个情节：奥赛罗非常爱他的妻子，有一个小人挑拨奥赛罗和妻子的关系，制造谣言，说他的妻子不忠实他，奥赛罗信以为真，一气之下掐死了妻子。当舞台上演到小人向奥赛罗进谗言时，由于演员演得太好了，太真实了，有一个观众当即掏出枪，打死了这名演员。这名观众死后，当地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个人，就把他们埋在了一起。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威尼斯时，建议给这两个人立两块碑，并刻上“最优秀的演员和最忠实的观众”。而当布莱希特路过这里时，却建议碑上应该刻上“最蹩脚的演员和最愚蠢的观众”。这个故事说明他们各走极端，一个主张越真实越好，一个主张越像演戏越好。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从来不走这样的极端道路。中国的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一刻不会忘记自己是演员，同时又时刻在体验角色和人物的感情，这就像中国的中医一样，不走极端，很讲究辩证法的，这就是中国戏曲在世界现代戏曲中的位置。

下面有几个概念和同志们交流一下。

中国戏曲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但是中国戏曲不等于就是京剧。中国有三百多个地方戏种，

几乎每省都有自己的剧种，京剧只是它们的代表。那么我们如何给京剧一个准确定位呢？

京剧译成英文是 **Beijing opera**（歌剧），这个翻译不对。第一，京剧不是歌剧。歌剧就是唱歌，只有这一种表演手段，而京剧不然。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给中国戏曲的定位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事就是剧情，那么剧情怎么演出来？歌剧是用唱歌演出来，舞剧是用跳舞演出来，话剧是靠说话演出来，而中国的戏曲是以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四种高度综合的演出手段演出来。唱、念都是歌，做、打都是舞，那么“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以“唱、念、做、打”四种表现手段来演戏。因此从表现手段来说，不能把“京剧”翻译成“**Beijing opera**”。第二，这种翻译容易误导人们，认为京剧是北京的地方剧。比如，豫剧是湖南地方戏，川剧是四川地方戏，湘剧是湖南地方戏，沪剧是上海地方戏。按照这种说法，京剧就是北京地方戏。虽然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但是它现在不仅仅是北京地方戏，在我们中国，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东自山东半岛，西至新疆帕米尔高原，全有京剧，所以京剧是全国性的，全民族性的戏剧。京剧这个名称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定下来的，当年曾叫过平剧、国剧等，台湾至今仍叫国剧，这种叫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代表国家的戏剧。

为了给京剧一个准确的定位，有两个概念需要明确一下。首先京剧不是高雅艺术。第一，京剧是通俗文化，它始终没有离开民间，一直生活在老百姓当中，京剧的所有剧目几乎全部来自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作品都是民间的；第二，京剧不是文人创造出来的，是艺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京剧它不高雅。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看不懂京剧，其实京剧很容易看懂，因为从剧情到唱词都很通俗，其中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化身。京剧是在清朝咸丰年间进了宫廷，到慈禧太后时倍受重视，而此前受宫廷欢迎的一直是昆曲，由于昆曲属于高雅艺术，慈禧太后听不懂，所以京剧就成了宫廷主角，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京剧的通俗性。

在清朝时，戏剧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花雅之争。那时的人们把中国戏曲分成两部分，一个叫花部，一个叫雅部，京剧是花部的代表，昆曲是雅部的代表，在北京舞台上，花部、雅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花部胜利了，雅部失败了，也就是高雅的失败了，通俗的胜利了。当时慈禧经常把戏班子召进宫里唱戏，唱完之后，戏班子再回到社会上去演出，这一方面使京剧越来越规范，精益求精，演出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使京剧不脱离民间。因此可以说京剧始终是雅俗共赏的艺术，上自宫廷、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凡夫俗子，都十分喜爱京剧，这也是京剧成为全国性的剧种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中国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曲之一，但是京剧历史并不古老，

至今不过一百六十多年。一七九〇年乾隆皇帝过八十万寿（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全国大庆，征调各地戏班进京演出，包括安徽三庆的徽班。在所有戏班中，徽班最受欢迎，所以大庆之后，其他戏班都撤走了，只有徽班留下了。一九九〇年文化部还举办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活动。但是三庆徽班进京只是京剧形成的源头，所以徽班进京和京剧的形成是两个概念。那么京剧是怎样起源的呢？

由于三庆徽班在北京的演出大受欢迎，所以随后不少徽班陆续进京，著名的有四喜徽班、春台徽班、和春徽班，再加上三庆徽班，形成了四大徽班称雄北京的局面，后世并称为“四大徽班进京”。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艺人麇集。徽班到京后，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泛吸收各种剧目的表演方法，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后来湖北省的汉调戏班也陆续到了北京，湖北与安徽相邻，同是皮黄声腔，在安徽演出称徽调，在湖北演出称汉调，虽然因受地域影响有若干区别，但它们都以唱西皮二黄为主，所以汉调艺人到北京后，加入了徽调戏班，同徽调艺人同台演出，甚至同演一出戏。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必然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走向统一。后来徽班又吸收了昆曲、梆子等很多地方戏的演出技巧，大概又过了五十多年，即一八四〇年前后，徽调和汉调，在相互融合中都发生了变化，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形态，一个仍以演唱西皮二黄为主的，既不同于徽调，也不同于汉调的新的皮黄戏的剧种——京剧诞生了，当时称北京皮黄戏。“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的上海《申报》上。

由此可知，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向京剧擅变的过程，而这一嬗变完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徽调、汉调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终于在一八四〇年前后衍变成为京剧。

下面我用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回答大家的提问。

问：请问京剧有几种念白？

答：京剧的念白有两种：京白和韵白，京白就是通过艺术处理的北京话；韵白的韵是指中州韵，中国古代称河南为中州，把中州话作为普通话，最早运用中州韵念白的是昆曲，京剧是继承了昆曲的中州韵念白。

问：请问京剧何时出现在大连的舞台上？

答：我们大连虽然一八九九年才建市，一九一〇年才有了第一个戏园子（剧场），但有资料能证明，早在一八九四年大连就开始了京剧演出。

问：请您介绍一下京剧脸谱的来历和种类。

答：中国京剧的脸谱说来话长。最早在南北朝时期，南齐有一个将军兰陵王，他武艺高强，能征善战，可是因其英俊潇洒，每次带兵打仗，敌人不仅不怕他，而且很喜欢看他。兰陵王感觉自己很没有威严，所以后来征战时，他就带上一个很恐怖的面具和敌人作战。后来就有艺人把兰陵王的故事搬上舞台，开始时演员是带着面具演出，后来发现带着面具演出很不方便，于是就把面具上的形象画在脸上，这就是脸谱的起源。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脸谱艺术。

关于脸谱的种类，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红必忠，紫必正，黑必刚，白必奸，黄必诈，绿必勇，蓝必猛，不同的人画有不同的脸谱。由此可知，脸谱包含着是非标准，包含着道德评价。当然同一脸谱，由于对人物、剧情理解的不同，也有各自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来谈。总之，脸谱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很值得研究的艺术。

问：在有些戏中，关羽是红生，而有些戏中，关羽又是红净，那么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正确？

答：这两种说法都对，中国戏曲从有关羽戏以来，生行也演，净行也演，生行演关羽就叫红生，如米喜子、程长庚、王鸿寿、汪桂芳、周信芳等人都是生行演关羽；净行演关羽叫红净，如程永龙、刘奎官等人属于净行演关羽。所以既可以说他是红生，也可以说他是红净，关键看是哪一行演的。

书法创作及其特点

宋 民

书法的创作和其他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相比较，有它自己的特点。很多人

从美学角度、艺术理论角度探索过书法创作的规律。但是西方的美学也好、艺术理论也好，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套到中国书法当中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书法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一个写字的艺术，它离不开字。字怎么写才能写得好，写到什么程度才能符合艺术的标准，这些都要遵循书法本身的艺术规律。书法的汉字形象，有形、有势、有义。它有外在的形态，更有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的一种势，称笔势、字势、书势，此外还有它的字义。下面我就从形、势、义这三个方面，结合一点儿现代术语，通过和其它艺术样式作比较，从书法创作的角度，阐述一下书法的艺术特性。

首先，从“形”这个角度来讲，书法造型形象是“不脱离字形的抽象形象”。

书法以汉字形体为审美意味表现的媒介、载体，它不直接摹拟客观物象，不再现、反映具体的自然、生活场景，具有抽象性的造型特点。对古代书论中有关“状物”、“象形”的观点要有正确的理解。所谓“各象其形”、“须入其形”、“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的文字形象，是一种具有微妙暗示意义的形式符号。它可以使人联想到“高峰坠石”、“千里阵云”，但要说其笔画、结构就是巨石、云朵的形象摹拟，那就大错特错了。文字本是远离实物的符号，初始的象形文字已与现实事物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到了楷书、草书等就更难看出文字与实物外形上的直接联系。说横如“千里阵云”，是指一横画的笔意有千里阵云般开阔舒展之感。这种摹状更是一种气势、韵律、情态的暗示，是一种笔墨意味的探求，是在相似联想基础上的意味寄寓。“生动”的审美意味使书法形象与具体的生命物象建立了暗示、联想的审美关系。对具有强盛生命力的审美物象的联想式意味摹状，使书法获得了概括而丰富的审美内涵。古代书法美学对那种向绘画看齐、力求形似

宋民，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二〇〇四年四月三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的做法是极力排斥的。曾有一些艺术家举办了一次现代书法展，其中写山就画个山，写水就画个水，把很形象化的东西放到书法里来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未尝不可，而作为书法来讲，它恰恰把书法的本质抛弃了，因为你考虑的是绘画的形象，你的笔墨专画那个物象之形，书法本身的笔墨魅力没有了。我们的书法创作不能去画一个什么东西。

书法不同于具象绘画，不摹拟、再现客观物象，它又不同于纯抽象绘画，不能脱离文字结构形式。书法之抽象形象是相对于画一座山、一个动物等客观物象的抽象。汉字形体是书法不能舍弃的基本因素。一些书法创新论者认为，现代书法如果摆脱汉字结构形式，纯粹以线条为媒介，便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审美创造、抒发情感。人们最愿把书法与音乐相比拟，认为书法的笔画形式如同音乐的乐符，笔画的曲直刚柔如同旋律、节奏的起伏变化。我认为，

书法特有的表现媒介不单纯是笔画、线条，而主要是由笔画组成的文字结构形式。字形是书法构成中不能最终舍弃的因素。笔画不能脱离字形而孤立存在。与其说书法与音乐最相似，不如说它与表现性舞蹈更接近。书法之文字形式如同舞蹈之人体媒介。二者都有其诉诸视觉的外在造型形式。舞蹈以四肢、躯干的不同姿态、富有节奏性的运动，构成人体情感表现符号。书法则以曲直结合、短长变化、骨肉相称的笔画构成一个个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字审美形象。文字形象是书法用来表现审美意味的感性形式。

当然，书法与自然物象的审美联系确实有，而且更需要大家去观察、去体验自然、生活中生机勃勃、具有气势的物象。我们文联曾组织各协会去采风，画家下去以后，可以画山、画水，诗人感受到热火朝天的场面，可以写一首诗，小说家、戏剧家都可以把当时看到的场面写出来，可书法家去采什么风，到了黄山不能把它画出来吧，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也不会把它展示出来，因为我不能去画它。因此有人认为书法家不必采风，在家里看看字帖就完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虽然说书法家不去画什么东西，和自然景象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个自然物象和你创作的某个特定的审美的意味、意境有相同之处，需要感受、体验。比如刚才说的，“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并不是说写的点一定要像石头，写的画像一块云彩，那就错了，而是说横画给人感觉好像是一种扩充的有开展力的气势，点如高峰坠石一样有力度。古人之所以把书法中有些生动气韵的形象和龙虎、惊蛇入草等相比拟，重视的是字的形象要有龙虎一般的气势。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一讲到书法美的根基时，往往离不开所谓气，所谓神，所谓骨筋血肉，这些都是有生动气韵的东西。要达到这个目的，古人要求去观察体味宇宙自然。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自然当中去感悟，不单纯是讲诗，书法更是这样。假如你没到过泰山去感受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那么你在欣赏、创作这样书风的书法的时候，可能你的心境就不会那么开阔；假如你未曾感受长江、黄河的奔流不息的气势，那么那种奔放的气度在你的书法里很难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给人的感觉是硬作出来、硬撑出来的。越是书法技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越需要在创作时多多去感悟、去体味和某种自然物象意味相通的地方。书法虽然说是抽象的，但在抽象意韵里面蕴含着那些有生动气势、气韵的具象，蕴含得越多，你创作的抽象形象可能越生动、越有气势，否则的话，只是按照字帖描、写、画，让人感觉你只是像谁或不像谁。所以书法形象虽然是抽象的形象，但和具体形象有关系，既不能脱离开字形这个形象，同时还要体味那些有生动气韵的客观具象，否则字只会写得越来越死，只有间架，而没有气韵。作为一个书法的形象，它抽象里面蕴含着具象，这是在相似联想基础上的一种意味寄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形式也有自己的“具象”特征。由笔画构成字形可以说是一种特

定的具象造型过程。文字有自己的形象性，写的是不是字，不在于笔画线条样式，而在于笔画线条的组合方式。文字不像山水草木和楼堂衣冠等那样有可以触摸的特定物质实体，它是一种人造符号形式，呈现为一种结构状态。这种结构状态是可以凭视觉直观把握、凭既定图式加以认同的。此结构不是隐于事物内部，而是以较纯粹的笔画线条关系呈现于外的。文字结构形态具有独立自足性。它可以看成是一个终极化的组合结构。只能由点线笔画来构成它，它却不再为构成它物之形服务。在艺术形式中，它只是情感表现的符号性媒介，而非造型性、描绘性的媒介。从摹拟自然物象而言，它比线条更具有抽象性。线条可以成为组合任何形象的基础因素，文字则始终是一个不造他物之形的抽象结构形态。

书法形象是以字形为基础的具象与抽象的统一。其“具象”特征使书法形象具有了完整性、可识性。书法笔画的“皆拱中心”是以字形结构为依据的，书法形象的空间方位与时间结构是以字形为基础的。文字形象使审美理解有了较明确的定向，避免了纯抽象绘画般的模糊难辨。在书法形象中，它比纯粹的抽象画多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形式。不能小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完备的字形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东西，它使点画有一个相互凝结的框架，使点画不至于散、不至于乱、不至于让人摸不着头脑。写每一个字，都有字的骨架在里面，笔画组成了这个字。字的结构比较抽象化，但是又有一个具体的文字形象。其“抽象”特征又决定了书法的非摹拟性、非象形性。作为结构形态存在，字形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摹拟。作为审美表现媒介，它更不能用来摹仿再现自然物象。对书法美的创造者来说，不能搞“文字画”，背离书法本性。对欣赏者而言，不能作具体的形象附会，而要注意从文字造型本身去体味抽象性的审美意味。

从文字形象自身看，它又是笔画与结构统一的双重媒介系统。字形结构之中的笔画线条是构造字形的因素，其本身又具有突出的表现功能。古代书法理论把笔画的书写——“用笔”——放在审美要素的首位。相比较而言，在钢笔书法中，大家关注更多的是结构，要把结构写得平衡、稳定、匀称、协调、漂亮，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到毛笔书法的时候，恰恰寻求的用笔意味更足一些。有些时候太漂亮、太好看、太整齐的字形恰恰味道就不足，审美的内涵就少了一些。当你欣赏那些以朴、以拙、以简为主的书法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虽然它的字形貌不惊人，但是笔画确实很有味道。因此毛笔书法在某种程度上更看重用笔。笔画本身要有力，这个“力”主要是指生动有力。生动有力的笔画会给人一种很有韵味的享受。笔画是写出来的，要有生动的气韵在里边，要骨肉相称、灵活、有厚度、不死板、不僵硬。在字形里边，笔画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供你欣赏、供你玩味的重要因素。在具象绘画中，线往往是描绘物象的一种手段，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它所塑造的具体形象。而且，绘画造型因

素还有色彩、明暗等等。而在书法之中，笔画是组成文字结构的唯一因素。所以说，字形结构也就是笔画线条本身的组合结构，文字形象就是笔画线条组合的感性形式。抽象绘画中的线条主要是以几何性的纯粹形态出现的，是比较单纯的。而书法的笔画线条则既是具有抽象表现力的，又是具有文字具象结构的。笔画的结构，结构形态的笔画，笔画与字形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使书法具有了既纯粹又丰富的表现力。

其次，书法特有的“笔势”、“字势”，使其形成“时序性的定向连续空间”。

书法形象有“形”又有“势”。“形”者静，是空间的形态。“势”者动，使书法视觉空间具有了时间的、运动的性质。具有时序性、方向性、联系性、连续性的“笔势”、“字势”，是书法造型空间的独特审美因素。造型空间的时间性，使书法比其它静态造型艺术增加了许多审美内容。而时间过程的空间凝结，可以由结果推溯过程等特征，又使书法有别于一般时间艺术、表演艺术。书法虽然侧重空间造型，但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形态比较，它更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书法造型是时间性的空间，书法审美形态是空间—时间性的形式。在书法笔画结构形态中，具有明显的先后、连续的时间性质。汉字书写的笔顺字序使书法形象构成具有了时序法则。具有物理意义的书写时间过程，在书作中存留为具有结构意义的造型时间形态。

具有结构意义的时序递进转换，通过“笔势”、“字势”得以实现。“势”在古代书论中有不同侧重的含义，但对书法根本性、本质性的含义，是指富有时序性、联系性的笔画、结构趋向。它使书法形象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笔画、结构联系，使相对孤立的笔画、结构形成了有始有终、前后相承的运动整体。“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递相映带”。无生命的、静止的汉字在书法中组成了气脉贯通、生机勃勃的运动结构序列。通过某一点画的过去、未来的暗示，使它的现在形态与前后笔画之间得以衔接，产生虚实相生的气脉贯通的效果，达到“笔断势连”、“意到笔不到”的视觉感受目的。“势”的运动性质和在书法中的重要价值，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人讲“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得势而出”。能否得“势”，是书法形象塑造的重要审美标准。

这种决定书法空间运动的有方向的“势”，恰是书法区别于其它造型审美形态的主要因素。有些人把书法与建筑相比拟，来说明书法的空间审美特色。但建筑的空间分割，是偏于静态的。其结构虽然严谨统一，但并不要求由此及彼的线性连续。和美术字这种文字造型形态比较看，书法的先后时序性、有方向的连续性在美术字中没有必然的审美作用。美术字先写哪一笔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打好轮廓，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去涂绘。在字与字的排列上，可以随意调换不同位置的字，因为它们是以方整单一的每个字的封闭空间为基础的，字的排

列是寻求整齐划一的形式美。而书法（尤其是行、草书）的字序是有“气”有“势”的，上一笔与下一笔、前一字与后一字处在一个不容颠倒的时间之链中。

书写顺序的合理安排，使笔势连贯，行气通畅。从篆书到隶、楷，再由隶、楷到行、草，从无严格笔顺到有笔顺规范，再由固定笔顺到变化笔顺，书家在书写顺序上的探究可谓大下力气。他们想方设法使前一笔与后一笔、前一字与后一字顺势过度、不逆不背。甲骨、金文甚至小篆等，在笔顺上要求不严，没有统一的笔顺规范，但书写时书家也有自己的笔顺习惯。隶书，尤其是楷书，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等笔顺规范确立了。其笔顺没有外在映带呼应痕迹的笔画间得以“渡”势——“一画方竟，即从空际飞渡二画，勿使笔势停住”。这种“空际飞渡”的书写，需要对笔画顺序的熟练程度。如果不是由第“一画”很顺畅地递进到第“二画”，而是有所滞顿，或者错误地递进到第三画第四画，都会打乱了先后时间序列，“使笔势停住”。在行、草之中，与楷书的笔顺规范又有所不同。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从楷书到行书就不会写了，为什么呢？其中很大问题是把“势”丢了，太考虑楷书点画结构的完整性，而行书的点画联系被忽视了。行草书中，一切服从于笔画与笔画、字与字之间呼应的势。为了笔势，笔顺也不同于楷书。楷书中从左往右写的笔顺，行、草书则从右往左写。大家注意，行、草书中有些笔画可以变化，是为了让上下笔呼应，使上下笔之间特别连贯。拿“必”字为例，“必”字并非先写完心再写撇。行、草书中有两种写法：一个是先写上面一点，然后带到中间这一撇，撇下来之后，引带上去，然后在中间卧钩，最后是左点、右点。还有一种方法是先写撇，然后连带卧钩，再写上点，最后写左右两点。为什么这样写？就是为了笔顺与笔顺之间的连贯。所以笔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结构的问题，笔顺决定了你写的字是不是有势。如果说，隶、楷的笔顺更基于一个字的笔画安排，那么，行、草的笔画顺序更受到字与字上下贯势的影响。

书法之“势”显现出笔画、结构的运动趋向。它使有限的形获得了延伸，并为这种延伸规定了方向。有了势的暗示，点画的收笔并不意味着点画的结束和此一空间的封闭。它为欣赏者提供了一个连续观看的轨迹，引导着你过渡到下一个承应的笔画、空间。笔画的书写有自己的方向规定性。撇的自右上到左下，横的自左至右……在隶、楷书是相对稳固的。而在行、草之中，则因特定笔势的要求，而有书写方向的变化。如“小”字左右点，左点变为自左至右，由左点递进、延伸到右点，右点则写为由右上到左下的引带之笔，暗示、规定了向下一个字的递进。草书中横画等的逆向书写也正是为了笔画与笔画、字与字的有方向性的联系、连续。

富有时序性、定向性、连续性的笔顺、字势、书势，使徒手书写的笔画、结构有秩序地

成为一个整体。徒手书写不像美术字绘制那样可以打轮廓、反复修改，它的随机性、偶然性较强。而过分随意的书写必然导致紊乱。但有了时序和方向的规定，有了势的引导，众多笔画放在一起却不会无序而互相抵触，字与字、行与行也不会各自孤立地分布在纸面上。尤其是以“散乱之白”见长的行、草书，看似杂乱散落的章法布局，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转左侧右”之“转”与“侧”达到字势相倚相联的统一。大疏大密的空间因为有了势的流通，便会疏而不散，密而不闷。徒手书写的个性的自由有着理性化、规律化的秩序内涵。

富有时序性的定向的连续的文字书写，使书家的情感力度表现获得了造型形态上的节奏性与连贯性。书家不仅可以表现静态呈现的情感倾向、情感意味，更能传达动态变化的情感过程。绘画、雕塑重在描绘、塑造某一运动瞬间，所表现的审美意味、情感内容也呈现为相对固定的总体状态。而书法则又具有了音乐、舞蹈般的过程性，可以表现变化起伏的情感力度。尤其是那些长卷书法，一行行，一段段，字形或大或小，笔势或急或缓，起伏跌宕，变化多端。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较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特点。第一至四行，精严而庄雅，五至十三行，锋实墨重，沉重凝涩，字形或欹或正，字势或舒或敛，擒纵交织；十四至十六行，字形硕大与精小参差，笔画厚重与清丽相间。怀素《自叙帖》亦然。奇纵奔放，笔轻墨枯，运笔疾速，至高潮处似狂风暴雨，一泻千里，字形大小变化，结体斜正呼应，连绵一气，诡异纵横。张旭《古诗四帖》、黄庭坚的长卷大草，都给人情感力度、审美意味起伏变化的连续性审美感受。

书法时序性的定向连续空间形态引导着欣赏者的审美感受顺序，决定着书法欣赏的动态知觉方向。这与其它造型艺术是大不一样的。当我们观赏一件雕塑或一幅绘画时，我们审美知觉的次序并不受这些作品本身次序的制约。对于画本身来说，眼睛究竟按照什么样的先后顺序去扫视，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于中国书法来说，欣赏者恰恰正是受着笔顺字序、笔势字势的引导，去把握书法的运动空间结构。整个知觉次序中的不同位置都对应着不同的意义。在定向连续的欣赏中，欣赏者可以感受到微妙变化的情感力度、审美境界，把握高低起伏的运动节奏。

书法的空间形象，不仅是富于时序的、有方向性的、连续的和有动感的，而且这个空间形象的塑造过程也突出地表现了时间的一次性、不可重复性。因而，书法的显现为塑造结果的文字形象，凝结着书写创造过程的审美特征。

“信之自然，不得重改”，是中国书法审美创造的突出的原则。不可逆的时间序列对空间造型进行限制，每个过程都是一次性的，任何重复、修改都是不允许的。书写式的文字形象塑造不同于描绘式的绘画、美术字等创造方式。从书法与美术字的比较来看，它们虽然都

是以文字形体为造型对象，但造型方法、过程是不同的。书法是“书写”过程的空间呈现，美术字则是空间形式的“描绘”结果。美术字可以打草稿，画轮廓，可以重复修改。这是一种平面空间设计，追求的是整齐美观的装饰效果。而书法则强调气韵贯通、一气呵成的“一笔书”，注重的是可以使人联想到“挥运之时”的动态气息。

从审美创造结果可以追溯审美创造过程，是书法美的专长。在静止的成为结果的书法作品，通过点画、结构的形与势，可以体味出书家书写时的先后、轻重、缓急，在脑海中仿佛呈现出生动的挥运情景。姜夔谈自己的欣赏经验说：“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点画振动”，使人追溯到“挥运之时”。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有不重复的“挥运之时”，才有了充满生机、振动鲜活的点画。空间造型形象的过程性审美因素，使书法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是单纯的空间艺术和单纯的时间艺术所不能相比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以结果胜，对它们的鉴赏把握是在成为结果的作品中来感受这个结果。其创造过程不是可以清晰追溯把握的审美内容。音乐是典型的时间艺术，其创造结果与创造过程同步产生，同时消失。对音乐美的把握只能是在过程中来感受过程中的结果。它没有可以存留的空间形态。甚至舞蹈，这个集时间与空间为一体的艺术，其空间形象也依赖于时间性的表演过程。表演结束，空间形象也不复存在。它的创造结果与创造过程也是同时同步的。而书法的富于时间性的挥运书写，却有了空间形态的存留结果。对它的欣赏，便不单纯是就结果而结果，而恰恰可以由结果到过程。

不重复的书写创造显现着生命意味，洋溢着生动的气韵。书法形象可以说是呈现出生命活动的典型特征的形象。“书写”的方式使书家挥运创造的生命活动显现于纸面，存留在书写结果上。书写过程的痕迹无不保持着鲜活的生气。书家的个性不容伪饰地诉诸笔端。行笔而不停，着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简断，永存乎生意。任何修改、重复，都会破坏创造结果的自然生动的意境。对“生气”的追求是书法美创造的突出特征。其“生气”的显现离不开一次性挥运的创造方式。

对形象塑造的过程性审美因素的重视，使书家们格外强调“无意”、“即兴”的书写创造方式，而反对过于理性化的刻意安排。“信手”、“兴来”、“初不知”、“不可复得”，没有事先的安排和安排后的制作，一片天机，一切结果都由挥运的过程同时产生。是时间性、过程性的书写造成了空间形式，而不是先设计出空间模式再在时间过程中去完成它、修改它。“不可复得”的审美创造效果，恰由一次性的不重改的即兴书写所获得。正因为强调这样一个不可重改的创作方式，因此古代书家非常强调即兴化的“稿书”式的创作方式。就是说随着兴致所到，然后即兴发挥，创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一气呵成的书法。讲究“无意”，当然这

是在“有意”基础上的升华，达到一个自由境界。我们现在特别欣赏古人所写的那些很随便的一些书信，它们当时并不是艺术作品。古人当时写的时候是很随意的，就像我们现在写便笺一样，并不是写一个非常严肃的文章。古人说，和行书、篆书、楷书、草书相比，写得最自然的是“稿书”。打草稿的那个书法想涂就涂，想抹就抹，当初并没有想发表，越是这样心境，随意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更好。我想我们现在为了展览而制作的书法，创作时千万别太去想我是为了展览而写。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体验、经历，写正文的时候先打格，再考虑字的安排，写得很规整，然后想可写完了，题个款吧，年月，某某。最后感觉正文没有题款满意，就是因为题款时很放松，随意去写了，不是刻意去做的，反而写得好了。

即兴率意的书写，却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次性的不重改的挥运，却是准确无误。这便突出地说明了书法美创造的功夫性审美因素。只有“积学累功”，经过“寒暑不移，风雨无间”的刻苦训练，才能达到“心手相忘”、挥运自如的书写自由。这样的自由创造，下笔即成，无需修改、重复，自然神化，毫无造作，一片天机。古代不论书法创造还是其他艺术创造，都有一个最高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但是不超出规矩。比较典型的是怀素和张旭。据说张旭喝完酒之后，即兴作书，兴致所到，甚至以发濡墨。但古人说“张颠不颠”，虽然狂放，但是恰恰是无一笔不全规矩，达到了那种最高的自由境界。这和功夫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从字“义”的方面看，书法呈现为“兼顾字义的综合审美形态”。

从书法造型形式看，字义、语义、句义的识读及其关联，对书法笔画、结体、布局等具有视觉上、心理上的审美整合效应。因形见义是汉字的重要性质，由义联形又是书法造型及其欣赏的特殊规律。古代简札书法的间跳、转行，造成行间结构的大疏大密，但由于语义、句义关联，它们又是“行断义连”的，从而也有了结构上的连。古代文稿墨迹中的一些夹注、增删，自然造成行间的分合、轻重、密疏、虚实变化。这些特殊章法结构的可行性，正是来自于书法形象识读知觉的语义关联功能。隶书等字距疏、行距密的布局形式，在外在结构上把左右行间联系起来，而在识读性书写与欣赏中，上下间的字与字也得到整合联系，使整幅书法浑然统一。这种整合性识读知觉方式是形式性的、造型意义上的，而非概念内容和情感表现意义上的。

书法的时间推移效果，也有赖于时序性的识读书写与欣赏方式。字形结构的书写安排是以特定的句式篇章来组织的，存在着一个由文字内容获得的形式秩序。字义的内在逻辑影响了字形的外在结构联系。在逐字、逐句、逐行的识读性书写、欣赏中，书法造型形象的时序性、定向性、连续性又得以突出，书法的“不动而动”的审美效果又得以加强。

从书法的情感表现看，文字内容对书家的书写起到情感激发作用，也构成了审美欣赏的一条线索。书家在书写不同情感内容的文字时，产生相应的审美感受，形成不同的心境、情绪状态。《兰亭序》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面对这样的文词，书家怎能不心旷神怡，思逸神超呢？而《告誓文》则是王羲之在父母墓前所发的不再出仕做官的誓言。官场不顺，冤家路窄，不得不称病辞官。这些确实叫人“情拘志惨”。由于心境不同，所书写的作品便呈现出不同情感力度和审美意味的境界、气氛。愤激的心境具有不平静、动荡剧烈的情感力度，“心平气和”则是与之相反的情感境界。书家的书写创造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不同的情感意味。

文字内容为书法欣赏提供了一定的情感线索，起到意味提示作用。欣赏者往往借助文词、字义去体味、把握作品的审美内容。读了《兰亭序》文，有助于品悟其书法的潇洒俊逸、平和舒畅的审美意趣。看了《祭侄稿》词，更便于体会视觉感受的跌宕率然、苍崛沉郁的气势神韵。但是在借助文词内容欣赏书法美时，要避免伦理道德态度情感的直接比附和逐字逐句的形、义对照。不能望文生义，不能说这一段是文意奔放，那一段是平和的，就一定要求书意与其完全相对应，这就错了。如苏轼《寒食诗帖》，颜真卿《祭侄稿》，只能说从大的意境上有一个起伏跌宕的气韵，绝不能比附每一段的书文一致，否则就有悖于书写的自然和随意了。

文字内容与书法形式的审美对应点在于概括性、宽泛性的抽象审美意味和起伏变化的情感力度，而非具体明确的伦理化的情感态度。特定的文字内容使书家有所感，产生或喜或怒或哀或乐的情感反应。但这些具体明确的心理状态、情绪内容，在书法的抽象形象中是难以表达的。那种作为某种内在心理状态的感情，常常是艺术品的源泉，但并不是艺术品最后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只有文字内容中和书家心理因素中那种起伏变化的情感力度和或奇纵、或潇洒、或沉雄、或雅典的抽象审美意味，才是书法可以表现的内容。从前面引文看，《祭侄稿》的文字内容具有激愤之情，让人“心肝抽裂”，这些书法形式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而其不平、不宁的动荡情调、“奇崛之气”，则通过“顿挫郁屈，不可控勒”的笔画结构表现出来。如果硬要从书作中寻找、比附非常具体明确的伦理态度，则是以字义取代以字形为主的书法美，远离了书法美的性质。

字义与字形、文字内容意境与书法形式意味的和谐统一，是书法美的重要方面，它会给人以更丰富、更全面的审美享受。因此它成为书法美创造与鉴赏的重要审美尺度。《醉翁亭

记》和《丰乐亭记》是欧阳修互为姊妹篇的著名散文。前者描写怡情山水与宴饮的欢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放逸、脱洒而大度、宽阔的胸怀溢于言表。文风骈散结合，平中见奇。《丰乐亭记》赞美社会安定、民享丰乐，描述自己欣赏山水的愉悦之情，行文平易而意境高远。二记在平和舒放的情感基调上融汇深沉阔大的胸襟，流畅简洁的文笔中又有顿挫跌宕的气韵。“雄古”而“秀媚”、“无意于佳”而自然天成的苏书，恰与此二记之意境风貌形成比较和谐的审美对应关系。如果用一种非常规整的楷书去写的话，很难和这种散文那种既萧散又平和，同时又深沉的意境相称

书意与文词意境不协调、不相称，会使人们的审美欣赏产生冲突感，书法美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如果字写的很奔放，而文词的内容却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不合适的。同样，用很秀气的小楷去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也是不对的。清道人李瑞清曾谈论以碑书之法写笺启：“余学北碑二十年，偶为笺启，每苦滞钝。曾季子尝笑余曰：‘以碑笔为笺启，如戴磨而舞！’”。用涩重沉实的北碑笔法书写随意抒放的笺启，自然会“滞钝”不畅，如“戴磨而舞”了。

在达到字义与字形的和谐统一的过程中，有双向审美选择。一是由文字内容到书法形式。文字内容、文体形式影响、制约着书写形式的选择。

书家不断变换书法表现形式，以期与文字意境相协调。董其昌说自己写《琵琶行》用米法兼拔镫意。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琵琶女弹奏琵琶、诉说身世的情景，抒发自己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心绪。但董其昌看重的更是其中的凄婉但又艳丽的情意，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错杂跌宕的曲致。请看诗歌中一段：“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水流秋月白。”这种诗境，用旭、素大草来书写过于狂放，用庄正的隶、楷为之则嫌板滞，王羲之稍含蓄，李北海稍硬朗，颜真卿则多了一些厚重，只有米元章那种既沉着又痛快、俊爽灵活、转折微妙的书风是理想的形式。而且董其昌又在米书基础上“兼拔镫意”，更增添了些许灵转和畅之致。无论人们将“镫”释为“灯火”、“灯芯”之“灯”，还是“马镫”之“镫”，“拔镫”之法较之其它执笔法更有灵活之长。后来他又用虞世南的笔法来写《圆通偈》。虞世南的书风以圆润为主，当写《圆通偈》的时候，如果还用那种跳荡的、过于轻松、灵活的笔法来写就不太适合了，于是就用虞世南的笔法来写。这就是说他能够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不同的内容。

形、义结合的第二种审美选择是由书法形式到文字内容。书家有意识地选择与自己书风、情感力度相称的文字内容。王献之、赵孟頫一书再书曹植的《洛神赋》，正因为“才情气习，有所相类者”。 “相类者”何？“翩翩逸气”与“丽”、“媚”之意也。请看《洛神赋》中一段描写：“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瑰姿艳逸，仪静体闲。”王献之、赵孟頫的小楷书风不正体现了“瑰姿艳逸，仪静体闲”的韵味吗？

当然，形与义的综合不是平分秋色。其综合是以字形为基础、为核心，用书法的视觉文字形象“同化”文字概念内容。文字概念、文学内容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否则便把书法美变成了辅助的装饰。书法兼顾字义的综合形态，是以字形塑造为主导的形与义的和谐统一。

今天我从书法创作的角度，对书法的不脱离字形的抽象形象、时序性的定向连续空间和兼顾字义的综合审美形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要地讲解，走马观花地介绍了一点。大家耐心地听着，非常感谢。

漫谈今日书画市场与收藏

杨 新

这个题目不是太新颖，但是又很现实，我想今天来的很多朋友，一个是对这个题目有一点兴趣，或者是自己有点收藏。最近我遇到很多疑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那个鉴宝栏目，动不动拿出个东西好几百万，这个就有点惊人。大家都希望自己一下得到几百万，上千万的，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期间，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写信给我，主要内容就是我家里有一件什么什么东西，家传多少代，很有价值，问故宫博物院要不要，他可以出

让，其中包括书法、玉器、陶瓷等等，他 very 希望这是个很大的宝。但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有些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宝，有些故事只是讲起来很动听。

我想就我个人的专长来谈书画市场。讲这个市场，难免要提出一些批评，说老实话这得罪人，确实是不太好谈。就书画而言，书画的创作和书画的欣赏本来是挺雅的，因为艺术它是很高雅的，可是问题是书画它跑到市场里头去了，这个事情就有点变质了、变味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王羲之的字，除了《兰亭序》是一个“序”以外，其他都是信件，都是写给朋友的信、家里的信。我想王羲之当年写信，绝对不会想到这封信以后会卖多少钱。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道士，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他就要求王羲之写几个字，写完之后，王羲之看见道士家一只鹅挺好的，就拿回去了，你看很简单的。可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吴冠中的画就不知道能换多少鹅了，李可染的画恐怕换千只万只鹅都不止了。虽然艺术本来很雅，可它变成了市场，变成了商品，就有利害冲突了。作者、收藏者、中间商，这三者之中就有利益在里头。画家、作者要赚钱，收藏者要交钱，中间商要两头赚。当然收藏者还不见得是真正的收藏者，他要收藏，就要投资，投资问题本来是经济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叫做古董投资，或者叫作艺术品投资，投资是为了更大的收获，有利益就有欺诈行为在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于是书法伪品就出现了。伪品什么时候出现的，可能我们

杨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二〇〇四年七月三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小川整理，王雨霖校订。未必知道。咱们中央台最近还播了个《水浒传》，《水浒传》里面就有书画作伪的，那个仿蔡京的不是就作伪吗？在最早的南北朝时代、两晋时代、东汉时代就有伪造别人书信的。欺诈行为有政治上的欺诈，有经济上的欺诈，我们今天碰到的市场问题都是经济上的欺诈。

十五年以前我在《文物》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作《商品经济、世风和书画作伪》。当时中国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讲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来才改成市场经济。

“世风”就是时势的风气。商品经济、世风和书画作伪三者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们是互动的。当时我只是研究历史，没讲现实，想检查一下历史上某些情况，再来讨论今天，知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它有这么个规律：凡是经济比较发展的时候，就是书画作伪最兴盛的时候，现在我们叫作“盛世收藏”，太平盛世喜欢收藏，而收藏中有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伪的问题，收藏和作伪是共生的，书画伪品的出现和当时的经济发展，当时的时势风俗变化有很紧密的联系。

我认为第一个出现书画伪品最多的是北宋后期。北宋后期，书画市场上出现伪品太多了，

当时的学者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米芾就讲到：他所见到的李成作品不下数百本（李成是五代到北宋初年一个大画家），而真的没有一两件，所以他说要作“无李论”，即世界上没有李成了。另外一个收藏家在搜集材料中，看了很多当时收藏家的作品，他说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可以用几头牛的毛来计算，但是真正够上刻骨的好东西也不过几千件，这是当时的一个比喻了。这是作伪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第二个高潮时期应该是明代的后期。这个时期比起北宋时代要超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作坊都出现了，于是大量书画伪品也随之出现了。今天书画鉴定中特别讲到有一种叫“苏州片”，就是苏州地方做的书法。这个时期除了书画作伪以外，铜器、古玉伪品也很多。

第三个高潮时期就是清代末年到民国。这个时候作伪的东西也不少，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民国时期的伪品可以说数量很大。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很多作伪名家，比如张大千，他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作伪做得最多的。

这篇文章我是在一九八九年写的，到今天十五年了。我再回过头来看这十五年，那确实是书画伪品第四次高潮的到来，这种汹涌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收藏者、收藏家对它的到来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前三次高潮期的到来有个历史的延续，而第四次高潮期的到来是没有历史延续的，为什么我说它没有历史延续呢？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书画作伪在大陆基本是绝迹了，不可能有人做假字画去卖，去赚钱了，所以它是个历史的断截，但是技术可以传下来。那个时候有些人去搞临摹复制，特别是一些文物商店，经常仿一些古画卖外宾，因为外国人有钱，我们没有钱，不过卖的价钱很低，而且还标明是某某复制的，所以当时大量复制古画不是为了投入市场骗人，最多可以说是有一点蒙“老外”，这个“老外”确实也蒙不了他多少，因为才一百块钱、几十块钱一幅画，那不能算什么欺诈。所以半个多世纪是断了的，绝了的，现在突然出来这么多书画，对收藏者、鉴定者来说没有精神准备。比如说我到台湾去，有一位台湾的先生买了很多陶瓷，另外有少量的书画，因为他在山东、广东投资，赚了钱，然后看到大陆有好多古董，就买回去了。他有一座五层楼房，层层都摆满了陶瓷，因为我是和耿金昌先生一块去的，他是陶瓷专家。他鉴定一大楼的陶瓷用了两个小时就鉴定完了，最好一点的是民国瓷，少数几个是宋代民间窑出土的，而大部分是作假的，什么均窑、定窑，都是假的。看完后，收藏家全身汗都下来了，因为这些都是成批生产的，可他是一件一件作为古董买下来的。当地人就笑话他：“你在大陆赚的钱，大陆人又给骗回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情况呢？他有一个心理：大陆穷，你们都穷，你们买不起古董文物，你们收藏不起，而且还不识宝，文化大革命把文化都革掉了，人人都是大文盲似的。我们台湾人，第一有钱，第二识宝。所

以大陆上自己的宝都不要，还做假宝吗？他没有精神准备，结果买回一大堆垃圾。

书画市场主要有这么几种：

第一是拍卖公司，它是最大的市场。像北京佳德、瀚海、太平洋都是比较的，小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你要到北京去的话，要参加书画拍卖会，每个月都有机会，月月有。过去我们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拍卖公司的槌声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还达不到，但是周周有。老拍卖公司这一块儿量就相当大，因为一个大拍卖公司一次就拍好几千件，小拍也有上千件，你想这个量多大呀！这么大的量，肯定这里头就要有欺诈的行为了。

第二个市场是画廊。咱们大连也有很多画廊，北京画廊也不少，画廊是专门经营书画的地方。

第三个市场是地摊。地摊也不可小看，买卖量也相当不少。

第四个市场就是个人，即个人皮包商，就是互相单线联系，单线介绍的。这里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质很高，他不会三五块钱卖启功先生的字。

这些市场所需量非常大，那么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要认真地画的话，他能画多少？我们今天成名的艺术家有多少？有的成了，他已经故去了，他再也不能创作了，他存世的东西有多少？我想这个量可以去作一个精算。而我们今天每一场每一次拍卖会又拍卖了多少？这个很显然比例差距很大。我没有学过统计学，但它一定是不相称的，这个不相称里面肯定有问题。下面我谈一谈书画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假书画充斥市场，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我在过去写文章在市场与作伪中间加一个“世风”的问题，我觉得“世风”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假书画能够卖掉，特别是买卖双方都明白的情况下能够卖掉，这个就是时势风气的问题。比如说地摊上，就在荣宝斋、琉璃厂那条街，可以看到启功先生的对联，有没装裱的，就是直接写的，你要去买的话，摊主就会告诉你多少钱。我记得我去试过，好像开头要五十块钱，后来砍砍价就说十块钱，如果批发几百件的话，就还便宜，甚至五块钱。你看五块钱，十块钱，最多五十块钱买一副启功的对联，那是卖者心里明白，买者心里也明白。我就问他：“启先生的字哪有这么便宜的？”他说：“你这几块钱买什么真的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买的人知道启先生的字是不可能几块钱买得到的；卖的人也知道启先生的东西不能卖这么一点钱。那么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卖？这就是社会风气不正。我个人掌握的材料很有限，所以对这个问题研究不透，但是有一点可以见端倪，可以见一些痕迹的，那就是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在年节以前卖的好。为什么在年节之前去买这些东西呢？过去买灶王爷、财神爷、年画，

都在年节之前。买一个活佛菩萨，往家里一贴，全家和睦；买一个财神回去，我们来年好运气。那么启功的字跟财神、活佛菩萨有什么关系呢？启先生的字既不代表财神，也不代表活佛，但它可以作为年节礼品送给朋友，或者送给领导。这里头问题就大了，问题大在什么地方呢？大在真假上。那个卖的人他没有盖章，就是仿的启功啊，买的人和受礼的人都没有在意。所以大家琢磨吧，这个里面社会问题不少，这个社会问题应由社会学家去研究解决，我们就管书法鉴定这一块，你拿一个东西来，我们只认真假，不问来源，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有这样广阔的销路，所以假书画充斥市场，这和以往是不同的。大家知道《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清明上河图》是无价之宝，那是真的，在故宫博物院还留着呢。听说到了明代末年的时候，严嵩就知道它是无价之宝，到处收也找不出来，怎么办呢？有人就搞了一个送严嵩了，这时候他的一个裱画师就告诉他是假的，因为真的麻雀在屋上，一脚踏双瓦，这个不是。这可把严嵩气坏了，以后就找机会把送画人杀了。这说明古代送礼送假的可了不得，一旦被知道就不好了。当然我们今天送礼，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不过也有书画纪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谈了。

市场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书画价格出奇的高。我们用“飙升”这个词形容书画市场火爆，就是飙升得太高，我总感觉不太踏实，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没有价，没有行市，如果买，我们也买不起，卖也卖不了几个钱。像故宫买的东西当时最贵最贵的，就是一万、两万，可是到后来一下要出一千万、两千万。那时候特别是从东北买的东北货，都是很便宜的。这里面有好多故事了，一个从东北出来的赵孟頫的《水村图》，是溥仪带走的，这个《水村图》今天估价最少也得一千万到两千万，可是当时故宫就给人家两千块。这里边还出了个小笑话，这位老先生好像是个农民的穿着打扮，他拿了两千块钱就到了沈阳，没有回家，就进了百货商场，看到什么东西都买，这引起了商店的注意，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他怎么这么有钱，买这些贵东西毫不在乎，于是就报告给派出所，派出所人来了以后就问他：“你这钱哪来的？”他说“我卖了东西。”“你卖了什么东西？”“我卖了画。”“卖给谁了？”“卖给故宫博物院了。”派出所马上往北京挂电话，故宫证实确实如此，这样公安机关才放了人。

虽然价格飙升得很快，但是仍然赶不上国际市场。我们知道，欧洲画时代很晚，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印象派作品，动不动就是上千万美元，比我们上千万人民币要高八倍，拿到中国来就是以亿来计算了。但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比，飙得就太快了，飙得太快就有危险，就有炒作之嫌，就不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做，这里面就要出问题了，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日本某公司十几年前，花一千多万美元买了梵高的《向日葵》，结果砸在手里了，几百万美元也卖不出去。所以凡是重大投资要注意，我觉得平稳前进比较稳妥、踏实。

第三个问题是书画市场作假没人管。有些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呼吁过；有些地方也曾经举办过这类讨论会，可我觉得总是少数人在活动，对市场，对作假不起任何作用，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而且还干得很欢。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假酒、假烟、假药，打这个假有人管，谁管呢？商检部门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实在不行还动用法律手段，可是书画市场作假没人管。最不可思议，令人不可解的是前不久荣宝斋拍卖了二十几件启功的假字，拍卖前送给启先生本人过目，启先生说这个不是我写的，可是他们照样拍，而且照样卖好价钱，二十几张就卖了十几万。启老是不生气的人，这回生气了，可是他生气有什么用呢？报纸上对这个现象也进行了抨击，《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都发表了文章，还把拍卖公司老总批评一顿，可是批评了又如何？又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些官司也打了，像吴冠中那个官司，报纸上也公布过，打完以后又怎么样？有没有不作吴冠中的假了？现在吴冠中的字画在市场上多得不得了，你们给我五十块钱，我可以给你买来。所以在群众中就流传这样的笑话：你要去走私毒品，是冒生命危险；你做假酒假烟，查出来要判刑；惟独做假字画最安全，因为没人管。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市场上真假谁说了算？拍卖公司告诉你：我卖的这幅画是最可靠的，它在什么年代的杂志上、书刊上，或者说画册上印刷过，有的把印刷品揭下来，附在要卖的这个作品上，证明这个不是假的。另外，还有的人跟作者照相，这张字是刘炳森写的，那个人就拿着字的这一头，这个人就拿着那一头，照了一张相，把这个证明也帖在要卖的字上面，说明这个是真的；还有的写明：这个作品是来自画家本人或者家属，这个难道就可以保证是真的吗？这也不能保证，因为电脑作假很厉害，在图像合成上很厉害。有的家属挺好的，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特别为了维护祖先的声誉，态度很严格的。但是，家属也要区别分析，不一定就可靠，我就亲身经历过一个事情：有人给我拿来一幅朱老总的字，我说是假的，他说，这怎么是假的呢？就从他家拿来的。我说，你从他家拿来的也是假的，因为你那个家不是他那个家，我还打疑问号。这个事情不是现代社会才有，古代就有，有个人想要董其昌的字，于是就被带到了董其昌的家，求了一幅墨宝，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队人马，看见一个人从轿子上下来，就问：“那个人是谁呀？”人说：“唉呀！那人你不认识啊，那是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啊！”他说：“唉哟，他长得样子怎么跟我刚才看到的不一样啊？”那个真的董其昌跟他看的董其昌不一样，这说明连董其昌本人都做了假了。所以有的家属也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不见得不作假呀？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有人拿着仿某画家的作品给他看，问他这东西是不是自己画的。看了半天，认定是自己画的。后来人家告诉他这是假的。自己看自己的东西都走眼。所以究竟谁说了算？谁是权威？现在有很多鉴定中心，它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

能不能负法律责任？是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这都是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作假技术层出不穷。比如除了老字画以外，新书画作品，印章基本不起鉴定作用了。从前我们讲印信，“印信”从来都是信的，可在现代技术上，他不起信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机器容易造出来，它照着原稿真迹，把印章拍下来，一模一样。我们看印章，无非是比较，拿这印章与那印章比较，看哪个部位不对，哪个地方距离太短、太长，说明它是后制的、假的。但是照相技术，底版一合，打出来一个样，基本上印章不起鉴定作用了。七十年代中期，我跟徐邦达先生到苏州，他们拿来很多旧纸，解放前的了，落款都是吴昌硕，其他地方就是白纸，这就是准备来做吴昌硕的假，一个人先落款，一个人作画，另外一个人专门做他的印章、题款。因为碰到解放了，来不及做了，就被遗留下来，一擦纸只有做款的人了。我们知道书画作假可不容易，要模仿别人的签名，模仿别人的落款，是比较困难的，可是现代技术电脑翻新，手段越来越高。以前人们作假还不敢做旧的，因为旧的跟新的差得太远，做不出来。可是现代能做，有人告诉我连唐代纸都能做出来。唐朝纸跟现代纸差得很远吧。

我们面对这样的书画市场怎么办？

作为一个收藏家，买了假画没人管理怎么办？打官司打不起，打官司又得不到一个结果，怎么办？找人鉴定，权威在哪里？鉴定机构在哪里？面对这么多作假新技术，怎么办？我下面想讲一讲这个了。

有一次我碰到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到中国旅游，特别欣赏中国文物、书画、艺术品等东西，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买了一幅画，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独一无二，特别高兴，回家以后就把他的朋友都找来，跟他们讲这个画怎么好。过了不多长时间，他的另一个朋友来了，他说，你上次买的那个东西，我也有一张。两张画往那一挂，差不多大同小异，同一个作家，同一个画法。唉呀，他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难受？我本来是要第一的，结果人家跟我一样，从此再不买了。这是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在日本“月落乌啼霜满天”多的不得了，因为这句唐诗在日本作为小学生课文，一般有文化的都知道，而且一般的有点文化也就知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所以一看“月落乌啼霜满天”就高兴，就非买不可，结果这个东西很多。

我讲了一大堆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应该有办法。第一，要了解市场。要收藏，要投资的话，了解一些情况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产品都是有市场的，这跟其他生意都是一样的；第二，提高自己的艺术欣赏能力，鉴别能力；第三，进入市场时不能靠侥幸。

现在北京劲松很热闹，一到星期六、星期天人山人海。为什么这么多人到那儿去？我认

为无非是想拣个宝，这里面就有很多侥幸，有投机，想贪便宜。还有就是讲故事的特别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怎么个来，怎么个去。我讲一个最离奇的故事，有一个人写信给我说，在桂林一个山洞里面，发现了故宫博物院的东西，无价之宝，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搬，故宫文物迁移过程中就留在那里。他又说有几个外边的什么人，要来购买这东西，他要故宫出面干预这个事情，要叫当地政府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还说有九个大箱子装着名贵书法、名贵东西。我一看这个信件就不理他，为什么不理他？因为故宫文物迁徙过程中，每走一步都有很严格的记录，他哪里会落掉好几箱啊？不可能的。他后来急得不得了，又告到了文化部，文化部又把那信件转到我这里，我说：你们给他回个信，说我们不管这个事。还有更离奇的故事，说当年宋美龄撤离大陆时装了多少多少宝贝，后来在大海里遇到了风浪，船就跑到菲律宾去了，跑到印尼去了，那些东西在当地又被谁收了，藏在哪个山洞里。结果我一看照片，就是咱们在文革时出口外销的工艺品。这种故事太多，不能听故事。

大连白云书院这个讲台，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借这个讲坛的影响要呼吁三件事：

第一个呼吁的是，凡是从事书画经营者，应该把“诚信”两个字摆在第一位。现在我们大家不都在提倡诚信吗？实际上，诚信不是小学生做不到，是我们大人做不到。商业最讲究的是诚信，特别是拍卖会要讲究诚信，他们基本上不负责真假的问题，但是有些明显是假的，就不能拍卖，不能登市。

第二个要呼吁的是，法律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规定。因为这牵涉到很多收藏者的利益，这个应该有法律，特别是复制品、仿制品应该有明显的标志。

在国外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艺术品复制的，你必须打上标志。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主讲：咱们怎么办？我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市场上也有假我的东西，假我的字也有。我就建议：每一个书家、画家自己找一个角落，按上你的指印、指纹，然后，指纹去国家档案里面备案，将来就用指纹鉴定真假，指纹一般比较可靠。可是这件事大家不愿意做，谁愿意按指纹呢？咱们现在到美国去要按指纹，我都不愿意去，但是应该有些法律的办法。

第三个要呼吁的是，鉴证人员要有良知。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前不存在什么大问题，现在有问题，书画鉴定很难，但是作人更难，就是鉴定人要作好他的为人也是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牵涉很多利益，又包括很多人情世故。启先生说，书画鉴定里头有人情世故，这是古往今来都有的。

台湾故宫所藏《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以前都说它是真迹，但我们现在看，它不是真迹，是摹本，指摹的，特别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看，它那个“顿首”划中没有韵味，像是蚯

蚓似的形状，可是赵孟頫在上边题了几行字，说它是真迹。他的题字，我觉得很有问题，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东晋至今近千年，真迹绝不可得，真迹没有了，刻本有，今见真迹，诚不胜欣幸之至。说我今天是看到真迹了，感到很高兴。他这几句话里面的文章大了，你既然说王羲之到你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了，真迹是没有的了，像这样有名的《快雪时晴帖》只有刻本，那么今天怎么又是真的了？而且赵孟頫一辈子就学《兰亭》、学王羲之，今天王羲之真迹摆在你面前了，你难道一点表示、一点评价也没有吗？没有说它写得好，也没有说它写得坏，毫无表情，这有问题。所以我估计这个东西是皇帝要他写的，他后面落款是臣子款“臣翰林承旨赵孟頫题”。为什么他这么写呢？他有难言之隐，一个可能是皇帝说了这是真的，赵孟頫你能说这是假的吗？或者皇帝咨询他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皇帝他自己不会来，就派大臣来，如果这个大臣是作为一个真迹送给皇帝的，你赵孟頫说它是假的，那样就是欺君之罪，那肯定要涉及一大批人了，所以他说真说假都很难。可是他说假的，不能直截了当，说真的，可以这样说，所以他来了个模棱两可，说了这几句话，他要留给我们今天人来评判。赵孟頫有难言之隐，不是他眼力不够。

现在鉴定家很多，满街都是。我就要求在这方面还是踏踏实实，少蒙一点儿。有时候，他并不是要骗你，因为他水平达不到，但是要真的说真的，假的说假的，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知道多少算多少，我觉得要讲真话，要出于良心。

我看今天讲到这里差不多了，下面请大家提问吧。

问：在判断字画真伪上，从字的简繁体上能不能分辨出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比如，图画的“图”，清朝时它是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

答：这个问题有时可以参照，有些简化字，现在有些人作假，不太小心把它写出来了，但是，也不完全，简化字它来源于古代，所以我们现代的简化字不等于以前就没有，单看这一点是不足以证明的。另外有些草书的字有很简的写法。文字是一个参考，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

问：元朝赵孟頫的书画有没有竖着的？

答：赵孟頫的手卷有立轴，这个没问题，这真有。

问：有一种观点，说假字画也有他自身的价值，你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就看价值在哪里了，像我们故宫，碰到一些好的假的，也买。比如说，柳公权的《蒙诏帖》，就是故宫买的，当时是按假字画来买，价格不能像真的那么贵，另外它这个帖子从宋代开始，一直到现代，有这个流传过程，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就靠拓本，我

们永远搞不清真假，有了它的话，就可以鉴定真假，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里。买张大千的，就有张大千的价值，如果是张大千作的石涛，作的徐渭，这些人他作得很多，那么你要作徐渭买，就是假的，但是，我不作徐渭买，我作张大千买，我用张大千的价来买，那就是这种价钱。但是有的作得不好，粗制滥造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像五块钱、十块钱买启先生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垃圾。

日本的中国学漫谈：以京都为主

木田知生

二〇〇五年即将过去，二〇〇六年就要到来，在辞旧迎新之际，能来到大连，来到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参加活动，旧友重逢，新友云集，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今天讲座题目是《日本中国学漫谈》。内容并不深奥，也不系统，因为我所了解的中国学是有限的。主要内容有十几个小题目，在这些题目中，我会经常提到时代，从飞鸟时代开始，经过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

日本和中国交流的历史很早，有明确记载的是从两千年以前东汉时开始的。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皇帝把一颗金印授予了日本九州地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这颗金印在一七八四年（即江户时期），在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上面有五个字，叫做“汉倭奴国王”。这就表明东汉时，日中两国已经有外交关系了。后来在公元三世纪中叶，日本的女国王卑弥呼派使

节到当时的魏朝，魏国皇帝把“亲魏倭王”的称号授予了女王。这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有明确的记载。之后中国的历代史书中，都有两国交流的记载，见诸《晋书》、《南齐书》、《梁书》、《宋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中。

从飞鸟时期开始，日本政府派使节到中国进行交流，主要向当时的中国学习文化、政治制度等等。我们把这个使节叫遣隋使，后来又叫遣唐使。最早的遣隋使叫小野妹子，他在六〇七年第一次到隋朝进行外交交流。后来在唐代时期，从六三〇到八九四年，又派了十几次的遣唐使，这些都有记载。在晚唐时期，由于昏暗时期比较长，日本政府就中断了使节的派遣活动。从此，日本国比较流行学习中国文化的国风，使得日本“国风文化”很发达。当年在中国收集的或者中国政府送给日本政府的文物、书籍等等，现在保存比较好，均收集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里，共有文物九千件，都是七八世纪很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每年在十

木田知生，日本龙谷大学文学教授，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王雨霖整理。

月初开展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日本人很早就开始收集中国的书籍，书籍的内容我们现在也可以了解，因为有当年收集的目录，叫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它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儒者藤原佐世(八四七~八九七)按照《隋书·经籍志》编写的汉籍书目。收录晚唐以前的舶来书籍共有一千五百七十八部，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七卷。里面有不少当时在中国已经找不到的佚书的记载。通过这些内容，可以了解当年日本汉学的水平和唐代以前中国的珍贵书的存亡情况。书目收录的书籍最晚的是晚唐时期的，一定是晚唐以后开始编的。

经过几百年交流，日本开始了汉文研究，主要地点还是宫廷的所在地奈良。七九四年，日本朝廷从奈良迁都平安宫，即京都。从此，京都成为汉学研究中心，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研究人员以贵族为主，因为能看到这些珍贵资料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日本佛教比较发达，想去中国朝拜的和尚很多，唐代时期去的叫做入唐僧，宋时去的叫入宋僧。现在有好几个人很有名，他们都留下了很珍贵的资料。如传教大师最澄，生于七六七年，八二二年云世。他在浙江天台山学习了几年，回来在京都附近的比睿山建造了一个大寺庙。这个寺庙现在还有。同时还有个语言大师空海法师，也叫弘法大师，生于七七四年，死于八三五年。他是到了长安城学习，师事惠可法师。前几年日本还拍了纪念他的电影。另外，日本还有圆仁法师，也叫慈觉大师(七九四~八六四)，这位和尚于八三八年入唐，并撰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记》。宋朝时，日本有两个和尚来到中国，一位是奝然(九八三~一〇

一六),他是京都的和尚,于九八三年来宋朝,得到了宋代第二个皇帝太宗的接见,还带回来了刚刚印刷出来的北宋初年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开宝藏》。非常遗憾的是,《开宝藏》的大部分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了。神宗时期,就是王安石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叫成寻(一〇一一~一〇八一)的和尚也来到了开封,他是一〇七二年入宋的,当时已经很老了,有六十几岁。他去了天台山、五台山两座佛山,朝拜了佛教的遗址,并撰写了《参天台五台山记》。后来他死在开封的相国寺。这一时期,促进日中文化交流的主干阶层都是佛教界的人士。

通过他们的努力,现在日本收集了不少中国刻的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仅留下了部分。目前中国刻的所有的大藏经,除了辽藏、金藏以外,其他的都收藏在日本大学、佛教寺院里面,现在都可以看得到。目前比较流行的大藏经是按照《开宝藏》做的高丽国的大藏经《高丽藏》,按照《高丽藏》翻印的大藏经比较流行。这是日本活字印刷的东西。近几年,好多单位进行了数字化,所有的经典可以进行检索,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京都的中国文化研究,在平安时期,是以文化为主,宋朝以后,学到了南宋时期的寺庙的管理制度。南宋浙江地区的和尚把先进的寺庙管理制度带到日本来,经过小小加工,日本也成立了“京都五山十刹”制度,包括五个大寺庙,还有十个中型的寺庙。现在在京都地区还可以找到京都五山的寺庙。比如说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在这六个寺庙中,除万寿寺比较衰落外,其他的五个寺庙现在都很活跃,信徒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南禅寺、东福寺收藏了不少宋代、元代的刻本,宝贵的文物比较多。京都地区以外,还有镰仓五山(镰仓就是镰仓时代的镰仓)。平安时期以后,镰仓地区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这地区也就建立起了“镰仓五山”管理制度。现在这几个寺庙还在进行教育。

除了寺庙管理制度外,宋代茶道、书法等的艺术、文化都带到了日本京都来。茶道在公元十六、十七世纪时,有个和尚叫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他总结了饮茶的一些做法、制度,成为了一个新的日本茶道制度。现在千利休的后裔还在做茶道,他们的本部就在京都。

通过文化交流,日本人很喜爱中国的文物,特别喜爱中国的书,通过很多办法,购买了很多中国书籍以及汉文的材料。现在这些东西都收藏在日本的学校、寺庙里。个人收藏的也不少,比如我们龙谷大学,它是私立的大学,原本是寺庙,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培养僧侣的学校。净土真宗是亲鸾法师(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创办的日本最大的佛教派系,公元十六世纪时比较大。后来历代宗主,就是寺庙里的最高领导,一直喜爱中国的文化、书籍,购买了不少中国的古籍。现在收藏的都比较好。历代宗主的藏书,名字叫做《写字台文库》,主要内容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出头,经过五百年的购书活动,收集了几万册的汉文书。净土真宗第二十一代明如上人(一八五〇~一九〇三)在一八九一年,把《写字台文库》的大

部分藏书赠给了龙谷大学图书馆，大约有三万册左右现在收藏在龙谷大学。不过，因为历史原因，有些善本收藏在大连图书馆的善本库房里，有些书很明显地盖有“写字台文库”印章。现在我们学校开始编《写字台文库》的古籍目录，已经做了初步的目录，共有三万四千册，可能还更多点儿，会超过四万册以上吧。

中国学的研究，到了江户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江户时期年代比较长，从公元十七世纪开始，到明治维新的一八六七年。这时期，是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高峰，特别是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父子在京都开办了“古义堂塾”，这是个私人开的学校，父子俩人把中国儒教的经典作为教材，教授武士、贵族的子弟。学校的遗址现在还有，就在京都的堀川，而且保存得比较好，有人说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父子的中国学是目前京都中国学的起发点。这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可靠，可以肯定地说，伊藤仁斋是京都地区近代汉学研究的鼻祖。有人还说京都现在有好几个研究中国学的学校，学校的来源可能追溯到伊藤仁斋和东涯父子。他们活动的年代距今有三百年了，伊藤仁斋是一六二七年生，一七〇五年去世，他的长子东涯是一七三六年去世的，所以现在京都的中国学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

京都地区中国学高峰的第二期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是一八六八年发生的，后来日本的国都就迁到了东京，京都只留下了皇宫而已，皇宫里面是空空的，没有天皇，没有行政机构，不过，文化一直留在京都地区，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明治以后，在一八九七年，在京都建立了一所大学，名字叫京都大学，现在已经建校一百多年了。当年在京都大学教中国学的著名教授有内藤虎次郎湖南先生、狩野直喜君山先生，还有桑原隲藏先生等汉学家，这些老先生现在都不在了，不过他们在京都大学教授中国学几十年，培养了许多年轻的汉学家。

当年的汉学，我们叫做“支那学”，这个词现在不用了，一般都叫汉学，不过当年的刊物有《支那学学刊》等等。

明治末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朝的遗老到日本去的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振玉先生，还有王国维先生。罗振玉先生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来到京都，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回国，先后九年在京都地区活动，和当年京都大学、龙谷大学以及各寺庙的汉学家交流得很密切。王国维先生是和罗振玉先生一起来到京都的，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到上海。罗振玉先生住在日本的房子叫宸翰楼，非常遗憾，现在已经没有了。前几年日本拆了很多房子，包括宸翰楼在内，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王国维先生住在离宸翰楼很近的地方，现在由韩国先生来管理这个房屋。这两座房子离京都大学比较近，房子周围的环境现在还好。上周我陪北京的朋友去了罗振玉先生的故居遗址，很遗憾，现在已经寻觅不到当年的风貌了。

后来，整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了。本来只有一个中国学，后来中国学分成了几个部分，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音韵，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此外，还要分研究的时代，研究的对象。现在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

京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主要有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著名教授，他们继承第一代汉学家的经验，继续教授了不少新的汉学家。我本人是他们的孙子，不是直接向他们学习，他们的弟子教过我。

当年汉学主要材料是古籍，古籍怎么念呢？日本和中国的语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读中国古籍的时候，必需要加上一些特殊的符号才能读通，否则是没办法读的，这叫做“训读法”。日本刻的书籍都加了这种特殊的训读的符号，所以中国的先生看了日本刻的东西，就觉得有点怪。不过，这也没办法，日本、中国语法不一样，日本人读中国古籍，不得不加这些古怪的符号。

京都地区研究中国学的重点是在大学里面。京都地区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万，面积并不大，不过小小的京都市现在有四十多所大学，其中有十几所大学里有专门教中国学的，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思想等等。举个例子说，有京都大学、龙谷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大谷大学、佛教大学、花园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京都产业大学等等。中国古籍收藏单位，除了刚才我说的大学以外，还有京都大学附属人文科学研究所、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阳明文库、京都府立、市立图书馆，还有京都各个区立图书馆等，好多单位都收藏中国古籍。

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佛教寺庙也收藏不少中国古籍，像我上面说过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等。前几天，我和北京的同学一起到了东福寺，东福寺是京都五山之一，南宋时期，它和浙江的观宗寺有好多来往的，这些在日中两国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东福寺的小庙很多，有十几个，其中有个叫普门院，它过去收藏过《太平御览》，这是北宋初年编的四大类书之一，现在比较流行的刊本是《四部丛刊》本。一九三〇年代，中国的张元济先生专门到日本国，访问了不少寺庙和国家级的收藏单位，找到了三部珍贵的宋版《太平御览》，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东福寺普门院宋版《太平御览》。现在《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本的第一页都有普门院的印章，这就是说东福寺的《太平御览》很有价值。对于我们搞古籍的人来说，《太平御览》是很珍贵的东西。收藏单位现在保存得很好，不过《太平御览》现在已经不在普门院里了，而是保存在专门为它建造的一个很好的库房里。

世界大战期间，日中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进展不顺，彼此之间互不了解，思想感情有些隔阂，影响了研究、教习的环境。出现了学古汉语的人不学现代汉语，学现代汉语的

人不学古汉语的歪风。现在在日本，学古汉语的学生逐渐减少，出现了研究古汉语基础弱化的危机。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西夏汉语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里说：“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这对于我们思考促进日中友谊，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日本和中国的未来来说，一定要互相认识对方的历史、文化、语言，通过互相的学习、了解，开展各种友好活动，在日中两国人民之间驾起一座互通文化的美好桥梁。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话。无论日中两国的历史，还是当今整个世界历史，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共同携手，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认真学习近现代的历史，以造福于日中两国人民，努力创造日中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桃太郎故事为例

宋协毅

一般来说，学习外语的人，在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接触到对象国的文化。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表层与深层的表里关系。而且一般说来，学外语的人随着对对象国文化不断深入的了解，其外语水平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外语学习者，认为我只要把语言学好就可以了，什么文化不文化的，有什么用？那就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在认识上有所不足，其外语虽然可能达到一定水平，但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因为，没有深层结构文化的支持，语言表层就如同无根草一般，很难达到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化境。对对象国的文化来说是这样，对本国文化来说更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个连本国文化都一无所知的人，会学透一门外语。当然，这样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假洋鬼子”，但决不会成为一个学贯中外的大家。

今天主要把焦点集中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上，具体说来，是以日本“昔话”（民间传说）中较为有名的“桃太郎”为中心，讨论一下这个表面看上去充满稚气、很多地方甚至常常引人发笑的故事所具有的文化方面的寓意，探索一下其故事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令人吃惊且鲜为人知的东西，界定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此类民间传说影响的程度，以便使日语学习者及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个故事的本质部分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对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一范畴的程度产生新的认识。

桃太郎确有其人

桃太郎的故事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学过点日语的外国人也大抵知道其梗概。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跟同样是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西游记》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

宋协毅，大连大学教授，二〇〇四年四月三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范旭仑整理。

首先，就像《西游记》的主人公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先暂且

不去追究桃太郎故事的形成与《西游记》的这一段有否因缘关系), 日本的桃太郎是从一颗硕大的桃子的核中“生”出来的。虽然两者的“出身”有相象之处, 但试比较一下, 我们又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了: 中国的孙猴子一开始对其他动物有“偏见”, 孤芳自赏, 只是在花果山水帘洞聚集了一帮同类大小的猢狲, 占山为王, 自鸣得意。后来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自命“齐天大圣”, 惹得玉皇大帝都火了, 撒下天兵天将前来捉拿。但老孙一根金箍棒竟让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大丢脸面, 打得他们丢盔卸甲。直至天宫王牌、“大内顶尖高手”杨二郎出手, 使出浑身解数, 才勉强将其拿下, 压在太行山下。这是《西游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对此都是如数家珍、耳熟能详。与“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极强、愿出风头并且瞧不起其他动物的老孙相比, 日本的桃太郎一出生便极具“大和”色彩。想必他对人一定是客客气气, 点头哈腰, 而且也肯定不会跑到扶桑列岛的哪个小岛上, 占山为寇, 对大日本天皇称帝。而且可能是因为除了他以外, 再也没有其他从桃子里蹦出来的“次郎”、“三郎”之类的缘故, 桃太郎便大胆起用了一只狗、一只山鸡和一只猴子(这猴子是不是水帘洞的逃兵也不得而知), 自告奋勇地、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鬼岛”讨伐去了。想来此举应该是为了效忠天皇, 而且是完全自愿的吧。这样一来, 虽桀骜不逊, 却因为额头套上了金箍, 慑于唐僧咒语的“淫威”, 不得不护卫唐僧同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与平日里“温文尔雅”, 却突然主动请缨, 在“鬼岛”大动干戈的桃太郎的区别则是泾渭分明了吧。

就是这个桃太郎, 他率领“众将”砍菜切瓜般地将本来十分和平的岛上的“鬼”们杀得落花流水, 将岛上的金银细软一扫而空, 打道回府, 大胜而归。据考证, 这段故事是在日本室町时代(一三九二至一五七三)出现的。后经多人改编, 几次改头换面。如前所述, 桃太郎故事如今也是极为经典且家喻户晓的。

因为是故事, 所以一般人们都认为这桃太郎与孙猴子一样, 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可是就像中国历史上唐僧唐三藏确有其人一样, 近年来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桃太郎的“故乡”, 他们都声称桃太郎是在他们那儿出生的。甚至不仅桃太郎确有其人, 连他率领的那一帮动物也都是确有其“人”的。

那么, 事实到底如何呢? 在日本各地这些桃太郎的众多故乡里, 呼声最高的是冈山县。无独有偶, 冈山恰好又是著名的桃子产地。早在一九六〇年, 冈山车站就建起了一尊桃太郎铜像。当然, 光凭一尊铜像是说明不了什么的, 可是据称冈山市吉备津神社里就保存着很多桃太郎等人确有其人的确凿证据。

实际上, 这个吉备津神社是为了祭祀在大和朝廷时代(三〇〇至五九二)平定了吉备津地区的武将吉备津彦命而建立的。不过当地人认为这个吉备津彦命就是桃太郎的原型。

根据传说，在他平定吉备津地区以前，一伙被称为“温罗”的海盗在此地称雄。他们有点像《水浒传》里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一样，经常把当地送给大和朝廷的贡品一抢而空。据说，这伙海盗的头子温罗本人实际上是当时朝鲜半岛百济国的王子。因此人十分骁勇，精通兵法，人们很难打败他，所以当地人称其为“鬼”，他们的老巢也因此被称为“鬼城”。当地人说，就是如今神社里祭祀的这个被称为桃太郎原型的吉备津彦命，将这伙凶悍的海盗打败，平定了这一地区。而当时随他讨伐的犬饲武命、中山彦命及乐乐森彦命三员大将，因他们不但要在战场上厮杀，还要分别负责养狗、养猴和养鸡（想来这些动物不会被用来打仗，定是被充作“警卫”和军粮的）的任务，所以后来在故事里他们几经各代作者的雕琢，最后竟变成了原本由他们饲养的动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三员大将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大喊冤屈吧。青史留名，万世流芳，这是人们所崇尚的理想，可是青史上留下的自己变成了动物，那就另当别论了吧。

说到这里，如果冈山人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桃太郎和孙悟空的不同。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统治阶级的鹰犬，唯命是从；后者却是百分之百的叛逆者，富有正义感。

桃太郎与战争

桃太郎的故事很容易被看作为孩子所写的童话，很幼稚，没有任何毒害。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孩提时期，懵懵懂懂，美好的东西或是丑恶的东西，都会先入为主，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以日本由良为代表的学者对世界最著名童话之一《格林童话》初版中所隐藏的一些残酷的思想、歧视观念进行了尖锐的分析和批判：格林童话的结尾，灰姑娘对那几个眼睛被捅瞎了的姐姐们不闻不问，因此，格林童话的灰姑娘故事最可怕的是：灰姑娘虽然受到继母和姐姐们的百般虐待，但她却咬紧牙关坚持着，并表现得高高兴兴、毫不在乎。到了最后她又表现出了极为冷酷的一面。

桃太郎的故事也正是这样。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几经改编，先后几次风靡日本。值得注意的是，桃太郎在江户时代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江户后期的泷泽马琴的桃太郎，还是一个去取宝的小英雄。可是从明治时期二十年代开始，其他作者手下的桃太郎就变成了惩罚恶鬼的英雄，实际上是侵略者。应该说桃太郎的故事比灰姑娘更为露骨地宣传战争，美化强盗行径。而且近代日本历史上，桃太郎的故事每次一流行，就肯定要发生战争。近代以来，这一

童话多次被选入日本的教科书，用来作为煽动日本人发起战争、鼓舞士气的工具。具体说来，比如，近代桃太郎的原型是从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发表的岩谷小波的作品开始形成的，而恰恰在这一年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昭和八至九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左藤红绿发表了《桃太郎远征记》，经过他的改编，这次桃太郎是从“大和村”出发远征，接二连三地讨伐那些“精神上已经混乱已极的鬼国”。而此时的日本正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向全国全土发动侵略，进而入侵东南亚、偷袭珍珠港，引起了太平洋战争，最后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因其文笔犀利、才思敏捷，又不幸早逝而被称为“鬼才”。他才是最早认识到桃太郎故事所具有的巨大危险性的人。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描写懒惰而粗暴的桃太郎无端侵略掠夺本来很和平的鬼岛的故事。

纵观日本历史，无情的事实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冈山人的说法也为桃太郎的“侵略者”出身作出了最好的脚注。桃太郎从出生那天起，就肩负着统治者鹰犬的使命。无怪乎到了近代，深谙其中奥妙的一些御用文人，常常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将桃太郎改头换面推出来上窜下跳，而每当此时，日本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危险起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桃太郎本是日本中古时代的民间传说，可是后来在御用文人的篡改下，又增加了代表日本的太阳旗等等，这一点就更加证明了近现代的桃太郎故事的政治上的煽动性和危险性。

为什么是“桃”太郎？

桃花，是我们中国人所非常喜爱的一种花。阳春三月，桃花盛开，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谈到春天时，几乎谁的眼前都会浮现出来的一种景象。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象，深深地渗透到每个炎黄子孙的遗传基因里。桃花与春天，这已经是一个分不开的组合了。

桃花因其甚美，在汉语中又可用来描述女子的美貌（按现代的流行语则应称其为“美眉”吧）。“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又是多么美妙的图画呀，难怪古人在吟唱“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时，会给人一种刻骨铭心的伤感了。

自古以来，桃就是一种驱妖避邪的植物。我们中国人都有过在家门两旁悬挂桃枝避邪的体验吧。这一点《山海经》上已有记载“元旦设桃符于门”。王安石的《元旦》诗中也有如今广为人知的“新桃换旧符”的名句。再者，桃还可入药，这就更加证实了桃的避邪作用了。

在桃子驱邪这一点上，严绍盪《中国文化在日本》认为这是一种贯穿于中日两国文化中的除恶意识。虽然严绍盪指出在日本远古时代的“记纪神话”里，就有男神伊耶那岐命从桃

树上摘下三个桃子，打退了追赶他的黄泉军的内容，而且在其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关于这一神话也有相同的记载。但是严绍盪还指山，在“记纪神话”形成的十个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中早已出现了同样的“桃意识”。比如《春秋左氏传》中就有鲁襄公在公元前五四四年访楚时，不巧碰上楚康王死去，于是楚人便请鲁襄公为康王穿衣。为消除他的恐惧，楚人先用桃枝扫除棺木，表示驱除了邪恶。这说明，公元前六世纪汉民族就具有这种驱邪的“桃文化”了。同时严绍盪还指出，“记纪神话”和《日本书纪》中桃驱邪文化的故事情节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及晋代《荆楚岁时记》中的传说，在基本情节和心理形态上非常接近。由此可见，桃太郎之所以为“桃”，完全是中国桃文化的驱邪作用的影响。

另外，虽然汉民族民间传说里还没有发现与桃太郎相似的故事，但据林新乃《中华风俗大观》介绍，土家族的民间传说里就有一则与其极为相似的传说。传说中土家族远祖婆不能生育，她吃了河里飘来的八个桃子和一朵桃花，就生下了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后繁衍成了土家族。土家民间传说只在桃生子的过程上与日本桃太郎故事相似，但桃太郎其后的烧杀抢掠，则是日本人的借题发挥了。另一方面，我们基本上可以从日本民族起源说中的“照叶林文化”、“高床式住宅”，即中国云南省的阔叶林文化及竹楼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根源之一这一点来断定，云南土家族的这个传说就是桃太郎故事的原型。

还有，桃子好吃，而桃色原本也是一种很美的颜色，可是桃字往往与性联系在一起。严绍盪认为，中日两个民族把自己的“桃崇拜”的审美意识，充分展现在自己的神话传说之中。而且据古文献可以推测，是由“女阴崇拜”衍化成了“桃崇拜”。王秀文《传统与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就中日两国桃文化的性象征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揭示了自古以来贯穿于中日两国的桃文化与性文化的密切联系。

从文字的构成来说，桃字为木字旁加一个兆字，按象形文字原意来说，兆字是指龟甲占卜时的龟裂纹路（所以我们常说“征兆”、“兆头”等等），原本就有“多数”的意思，十亿为兆，自然是大数，加之桃树结实累累，所以木加兆就成桃字，同时桃字又具有了多产的意义。按照中国古俗，女子送给男子桃子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众所周知，日本人十分喜欢樱花，日本人自己以及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把樱花作为日本的象征。战前，樱花甚至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地，世界各国的樱花都是从日本传去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最近日本学者高桥认为，樱花虽然有日本原生种，但是在中国四川和云南等地分布着大量原生樱树，不能说只有日本才是樱花的原产地。再者，我认为虽然日本原本没有梅花，但《万叶集》里所指的“花”却都是梅花，而在其后出现的《古今集》中的“花”才是樱花这一点，首先可以证明从梅树到崇尚

梅花的文化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之外，樱花崇拜是在梅花之后才出现，这一点更加证明了这可能是一种用来对抗从中国传来的梅文化而人为制造渲染出来的樱文化。也就是说，樱文化出现的当初，就带有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因而到了近代就很容易被改变为军国主义的象征了。

另一方面，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向日本流传的过程中，不光梅花到了日本，桃树也到了日本。有关桃子的各种传说，避邪作用，药用价值，以及略带“桃色”但还很健康的部分，也都传到了日本。比如在日本东北地区，人们为了避邪，在雪洞里供奉桃树；现代日语中，“桃尻娘”一词虽然有些色情之气，难登大雅之堂，但这也是用桃子来比喻女子的一种说法，可以说是典型的桃文化的性象征，也应该说是现代日本人将我们古人的“人面桃花”这种唯美主义的比喻，变成了真正具有“桃色”意味的词语了。

在现代中国，“桃色事件”是一个可怕的名词。现代人，尤其是政界巨头、商界巨子、当红明星等等，常常会纠缠在“桃色事件”里而不能自拔，也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但是近年来，尤其是一些在演艺界沉寂多年，或者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本明星们，常常故意挑起“桃色事件”，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借此东山再起。近来中国演艺界中也有人加以效仿。这也算是现代人的一大发明吧。但归根结底，这个桃字的运用还是基于其古来就具有的性象征意义的。

综上所述，关于为什么日本人偏偏选用了这个“桃”字来为桃太郎表明家世这一点，可以明确地说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致。故事中的老奶奶拣回了大桃子，将其送给老爷爷，这本身就是基于“桃崇拜”的性意识的具体体现，具有一定的“桃色”意义。桃太郎从桃子里生出来，这也是汉语中桃字所具有的多产意义及性意义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土家族是这样，日本大和民族也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桃字所具有的驱妖避邪意象才是其命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桃太郎这一命名及其故事情节，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土家族的充满和平与浪漫色彩的传说，却在日本被逐渐演化成充满杀戮的故事，这也是土家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桃太郎与唐僧

前面谈到了桃太郎与孙悟空，现在再谈一下桃太郎与悟空的师傅唐僧。

最近有中国学者着重研究中国的《水浒传》等小说对日本泷泽马琴、山东京传（同为日

本江户时代读本作家)等人的创作的影响,证明很多日本的读本小说都是中国明清章回小说的翻版。我也在此讨论一下《西游记》与《桃太郎》。

历史上确有桃太郎其人,亦确有唐僧玄奘其人。桃太郎带着狗、猴、鸡讨伐鬼岛;唐僧带着悟空(猴子)、八戒(猪)、沙僧(水怪)、白龙马(龙)西天取经。这两者之间如此相象,那在两个民间传说的形成上,肯定有一定的联系,绝非偶然。而且当然首先可以考虑的就是《西游记》对《桃太郎》的影响。不过,目前这还属于推测阶段,还需要经过多方的验证。在此想着重强调一下,桃太郎与唐僧,或者说两个故事所表现出的两国文化的不同之处。

谈到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之处,一般人们常说的就是文与武的区别。的确,中国人尚文,日本人尚武。中国皇帝上朝,两侧排列的是文武百官,文在上,武在下,哪怕你是赳赳武夫,也要听从文弱书生的摆布。中国人所说的文化,本意就是以文来同化,就像《孙子兵法》这部奇书,名为兵法,但却是为了如何才能不兵戎相见,也就是如何才能不打仗而写的书。另外,其实日本人起初也是崇文的,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学的抬头,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便日益增强。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富国强兵的思想直接与“脱亚入欧、八纮一字”等等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终使日本走上了桃太郎式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历经千辛万险,为的是取回真经,为国为民,求得国泰民安,以免生灵涂炭,走的是以文救国的道路;而桃太郎带着三个同伴,怀揣着几个米团子,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为的是杀掉众鬼,也是借此求得国泰民安,但他走的是以武卫国的道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份并不一样:玄奘纯粹是民间人士,而吉备津却是朝廷命官,其所作所为及其身份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两国文化的不同。今天日本政府拚命想把自卫队派到海外去,这不依然是要重蹈桃太郎的旧辙吗?虽然,可能有人会举出汉朝皇帝派出大将卫青、霍去病千里长击匈奴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也崇尚武力。但是,中国人历来都是先礼后兵,决不会搞突然袭击的把戏的。汉朝初期,国力不济,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和亲政策,希望通过裙带关系带来的友好会使汉、匈两族相安无事。至于后来的武力抗争,那也是由于匈奴方面多次无理要求,并侵犯边界,烧杀抢掠,而汉朝朝廷方面对此仍然是好言相劝,百般忍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大举出兵的。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的这种文化的区别更是明显。

可以说,桃太郎的故事完全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入日本之后逐渐形成的。从远古时代的桃崇拜、桃的驱邪作用到桃文化所具有的性意识,到土家文化跟随阔叶林文化的东渐,及至于《西游记》对《桃太郎》的故事情节的影响。从日本由崇文到尚武的转变与梅文化的衰落和樱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学的勃兴与军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关系,还有土家传说原本十分和平的内容却经日本御用文人的有意篡改而使桃太郎变成鼓吹侵略战争工具等等,这些都是我十分

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及世界人民都能重温历史,维护和平,能够享受和平的恩惠,不要让可怕的战争历史重演,千万不能让“桃太郎”再次“出征”,从而危害和平。

下 辑

书法危机与书法家的责任

张本义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二十多年，中国书坛出现了持久热潮，为传统文化的回归增添了色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十分深刻的内在危机。如果书法的路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前景堪忧。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书法界的高度关注，大家见仁见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窃以为，中国书法面临的危机是多方面的，而究其根本仍然是与几十年来传统文化的流失有关，书法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其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越来越少。

书法危机之成因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外乎由如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书写工具的改变。书法对工具有其独特的要求。几千年来，中国人日常写字，使用的都是毛笔。书法的基本美学要求，都是建立在毛笔的物理特性上的。而现在国人日常写字，使用的是钢笔、圆珠笔等硬笔，毛笔则几乎完全退出实际日常使用领域。书写工具的根本差异，使笔法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写字者已越来越难以体会掌握书法的操作规范及其美学意义。特别是随着电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字是靠键盘打出来的，以至于硬笔也很少派上用场了。这对书法来说，真的是一场灾难。

第二、更深层次的，是教育的失误。教育，首先是公民义务教育，其首要目标就是普遍地提高公民的素养，使生命意义上的人“化”成人学意义上的人。没了独特性，也就没了生命体的自我，没了生活意义和方向。人若想保持其独立性不淹没在工业化的大潮中，首先要有人格的完善，审美教育即是完善人格的主要途径。

但是，这种教育必须有所附丽，必须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不能想象出，在今天情况下与应试教育完全脱钩的公民教育，会得到切实有效地推行。而书法就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一种艺术。中国的教育千百年来，一直是应试教育，故考试的内容左右了教育的内容。科

举成绩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进入上流社会，也是安身立命的工具。由于科举时代重视书法，所以，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对书法的重视程度恐怕要比现在人重视英语、电脑、汽车为甚。正因为书法教育的普及和被重视，从而成为历史上中国读书人审美教育的主流，以至成为中国文人的“脸面”。写好汉字，不仅可以提高审美能力，保持东方人特有审美心态，而且还可以培养观察力、领悟力、模仿力，培养细心，耐心和恒心。有教养的中国人对美的感受和对事物的抽象能力，也很大一部分从书法教育中来的。

这种情形，在现代中国，都不复存在。现代中国，步入上流社会，基本用不上书法，身份教养的象征也与书法不沾边。更有甚者，有的年轻人视书法为“老朽”的代名词。书法进不了我们普通义务教育的课堂，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时间、没有兴趣。由于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照搬西方来的，所以，现今青年人受的审美教育，也是发端于西方现代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审美的标准也在相当程度上惟西方人马首是瞻。中国特有的传统审美心态，包括书法艺术中蕴涵着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淡化。现行书法教育的缺位造成的恶果，不仅是中国人越来越不会写自己的母文（据说这在全世界也是罕见），更严重的是给我们的后代在文化的认同，传统的承袭，人格的养成和审美心态上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第三、书法理论的混乱。我国传统的思维是实事求是的，极少长篇大论。文学、艺术、美学等诸方面的理论，也大都是点评和顿悟式的。这在饱受欧风美雨浸淫的现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看来，很不正规，很不先进，群相鄙薄，视为敝屣，弃之唯恐不远。于是，竞相引进西方各种成体系的理论，真可谓繁荣热闹异常。只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都是人家白种人针对自己的美学艺术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与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尤其是书法艺术实践方柄圆凿。

因为，人家西方当初压根就没有中国艺术的概念，是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们，见猎心喜，按捺不住，又不能融会贯通，于是只能拾人牙慧，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再热闹，再成体系，也只是削足适履，隔靴搔痒。郑板桥有一幅对联叫“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看写来送给我们一些热衷于舶来名词、舶来理论的文艺评论家们，真乃恰如其分。

另外一种理论上的混乱，还牵涉到评论家和书法家的学术道德和修养。举例说，“匠气”一词，在现今中国书法界是很多人用以作贬低别人，蔑视传统的大棒。什么叫“匠气”？真须认真研究一下。“匠”指有专门技术的工匠，或指在某一方面造诣和修养很深的人。“匠心独运”，是指工巧和心思与众不同。唐人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诗中有：“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可见其对“匠心”是赞佩的。

而现如今，由于很多所谓“书法家”根本没有书法的基本功，对书法传统也知之寥寥，写的字张牙舞爪，鼓努为力，却自鸣得意，反而将一笔一画、清雅典丽的传统书法，统统贬之曰“匠气”，嘘蜃成气，很多也不甚了了的人跟着呼叫。

实际上，要说“匠”，古代的写经生们可称之为“写字匠”了。可平心而论，现今域内，有几个人写的字能赶得上经生们的工整典雅？看看魏晋宋唐以来经生所写的卷子，扑面而来的那种传统的静谧冲和之美，难道不令我侪汗颜吗？近代诸体皆精的书家、著名学者罗雪堂曾批评悖离传统的书家和书作是“中不足而饰于外”（《跋自临孔宙碑》），可谓振聋发聩，一语破的。

而今书界，还有一把狼牙大棒曰“俗书”。实则所谓“俗”是与“雅”相对的。主观判断者的好恶和修养决定了对书家及其作品的判断。自古以来，雅俗之辨，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裁定标准。古今大多数学书者膺服王羲之，称之为“书圣”，唐太宗形容其作品“尽善尽美”（《晋书·王羲之传论》），可唐人韩愈就在《石鼓歌》中说“羲之俗书趁姿媚”。世人皆重颜柳，可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就说，“自柳始有俗书”。而后竟有书家说米字是“俗书”。梁山献甚至称其“实肇恶派”。

什么是“俗书”？我认为，既然“俗”、“雅”相对，则“俗书”当指没有文化的市井之人或因士子媚俗而通体习气的书作。其标志是文化含量不足，表现手法匮乏呆板，或非务妍美，或故托丑拙。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评论家或反传统主义的书家，频频随意胡乱挥舞这个大棒打向崇尚传统的书家书作，其用意一是掩饰自己功力的不足，二是破坏书法的传统。

第四、部分媒体的误导。正因为目前书法理论界存在着混乱，许多专业报刊及其影响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发表的书作，往往非常低劣，对青少年和一般受众起了误导作用。还有一些电视台举办的所谓书法讲座，也非常糟糕，可以说在误人子弟。

第五、书家地位的尴尬。这是造成书法危机的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现今中国，很多书家无法以书法谋生。书法历来被文人学者视为雅事，因而大都耻于言钱，也很少有完全靠鬻书为生的专业书家，即使在当今商品社会，也一仍如初。一些所谓书法名家，由于身居要津，不管书作好坏，都能轻易出手，且动辄千万。一些真正的书家的作品却往往无人问津。另外，学书法的学生，哪怕读到博士，毕业之后也得改行，因为中国很少有书法研究所，一般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开书法课，很少需要教师或从事书法的专门人才。而在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由于有完美的书法教育体系，需要一支庞大的书法教师队伍，书家可以凭借书法艺术谋生，书家的社会地位也自然很高。

书法危机之表现

历史上的书家都是读书人。儒家历来讲究“修身”。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即用学问和德行来养成自己。中国历来都强调“未学作书先作人”，强调书家的个人品性和对社会责任的发挥，故有“书如其人”一说。这种说法，并非对书艺的要求，也非说正人君子的字一定比奸佞小人的好，而是对书家如何安身立命的要求。

而今部分书家的表现是否可以以下六气来归纳？

一、匪气。表现在一些书协内部。“协者和也”，书法协会本来是大家在一起和和和气气，切磋技艺，共同提高的团体。而现在的一些书法协会已成为个别人拉杆子、立山头、树大旗的工具。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书家不是以文雅为尚，而是聚在一起时则以粗野为美，甚至于在批评书作时，往往不着边际地互相肆意贬低。

古人也有贬人的时候，但是讲究文雅中肯。如苏东坡就曾评黄庭坚的字：“笔势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清代刘墉和翁方纲在书法上互瞧不起。盖因为翁的字方正可风，笔笔有自，而刘的字，丰腴浓重，独创体势。一日，翁方纲问其婿戈仙舟说，你去问问你的老师，“哪笔是古人的”？刘墉却让他回去问他的丈人，“哪笔是自己的？”这是古代先贤由于审美取向不同而发生歧见的正常辩论，是文人的境界，值得我们学习。

二、俗气。其主要表现在书作内容千篇一律，形式上跟时尚赶潮流，甚至违反“六书”，大写字。

文化素养高下对书家形象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由于我们的一些书家不读书，腹中空空如也，则为人做事或作书必然其俗在骨。刘熙载说：“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艺概·书概》）。杨守敬说，治俗“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学书述言》）。

三、躁气。浮躁之气，成为当今书坛的流行病。朝学执笔，暮誇己能，大师满天飞舞。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曾说：“写字总得写六十年，才能象个样子”。可现在很多人把功夫下在推销自己，哪有功夫练字与读书？孔子说：“不学礼，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黄山谷也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乏味”，这都是讲做人要讲品位，不努力加强自己

的文化底蕴，如何成得名家？即使徒有虚名，又有何喜？

孙虔礼《书谱》将“书名”归为三类：一是“藉甚不渝”，即当时名气大，死后仍不衰减。一种是“人亡业显”，即生前并不显赫，死后名声却显露出来。还有一种是“凭付增价，身谢道衰”，即生前因为权势大，活着有人要字，死了全当废纸。吴昌硕说：“小技拾人则易，创造者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引自张謇《吴昌硕画集序言》）。

我们常说“厚积薄发”，意思是需要很多文化积累和付出很多心血才能够成名成家，才能够被人认可。蚕蛹作茧把自己包起来是为了一朝破飞。可现在一些所谓书家，却好像乍刺的刺猬，看起来乍乍乎乎很吓人，其实最空虚和虚弱。

四、野气。书法家必须有文人的素养，也可以说必须是个文人。班固在《汉书》中就说，“中国，礼义国也。”可是到如今我们的一些书家在日常生活中，连一点礼貌常识都没有，遑论书面语言和书作！《颜氏家训》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尽管相距万里之遥，但一封书信，即可看出你的文野之分和全部的教养。因为尺牍不但字要工整规范，且要懂“平”、“阙”和称谓避讳。书法作品更是如此。可现在我们的书家的作品，根本不懂行文规矩，也不屑讲究这些，尤其在上下落款时，由于不讲究礼貌用词，令人芒刺在背，无法忍受。

五、狂气。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愈演愈烈，以致于现在变本加厉了。而今，我们的青年已渐渐地失去对圣贤，对大师的敬畏，有的甚至刚写了几天字，看了几本书，就洋洋洒洒写文章，狂妄地批评和谩骂经过历史考验的，经过历史浪潮淘出来的大师及法书。

六、怪气。以怪为新，以丑为美，是当下书坛的时尚，据说深合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世界艺术大潮流。明末清初的傅青主主张“四毋”，其中就有“宁丑毋媚”（《霜红龕集》），但傅青主的字乍一看，缠缠绕绕，颇为丑怪，然细细分析，则看出其书学功底极深。徐青藤和郑板桥的书故作丑态，但他们都胸有丘壑，只是由于想另辟蹊径，不免有时也堕入魔道。现在许多主张“以丑为美”的人，不懂得“美是共同的道理”，也不知当初提出“四毋”主张的傅青主用的是“媚”字，而不是“美”字，世上真有人喜爱丑恶的事物么？

怪风狂吹的结果，以至现在有人创造出了诸如“反倒书法”：即从正面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字，要翻反过来，再调转一百八十度才能读懂。报上吹嘘说，“这是一种创造，是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似这种杂耍，竟成为美学的新方向，奈何？

书法文化之精髓

今之书法界所以存在着上述种种怪现象，关键在于很多人没弄懂什么是书法，什么是书法家。什么是书法？我认为它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因为书法是因为汉字而生的，是中国固有的艺术，从而必须以汉字或及其衍生的字体（诸如日文的假名）为创作素材，西文没有我们所说的书法。二是，它的书写工具必须是毛笔。蔡邕《九势》中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只有毛笔在纸上提按的轻重，行笔的徐急，用墨的浓淡，才能出现各种神奇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才能表现出作品的笔画、结构和意境之美来。三是，有超越写字的深刻内容。季羨林先生说过，“全世界文字可以成为审美艺术的，只有汉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实实在在占有重要的位置。”

书法为什么被称为“国粹”？就是因为它是中国艺术中的艺术，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了历史、文学、哲学、伦理、教育、民俗等一切应世的知识领域。这些方面的修养和知识不仅长久地主导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以至于影响着东方的社会。

在我国古代，用“写”的形式记载和传递信息是很神圣的事情。对古人而言，善书就有了读书人起码的体面，也就有了干禄入仕的本钱。尤其是科举时代，字写得不好，很难得到功名。“书”有了“法”，才进入了艺术的境界。这里的“法”，即法度，包括了写字的技巧，诸如身法、笔法、章法等等。

然而，学习书法并非只是为了写好字，真正的目的，还应是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在训练过程中学习知识、熟练技巧、磨砺意志，陶冶情性，升华品位，完善人格。日本将书法称为“书道”，我认为比较准确。因“道”与“法”相比，更具有文化内涵，更接近这种写字艺术的本元。因为“道”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纲领，它投射到书法上就是“书道”。它要求书家首先写好字，其次要有持恒高远和宁静的文心，温柔敦厚和润籍的境界。“道可道非常道”。“道”为何物？很难说清楚，所谓“包罗羽客，总括神仙”（王羲之《用笔赋》）讲的都是书法的玄妙和神秘。惟其有了这种东方式的玄妙和神秘，才使得其个性更加地鲜明。

虽然我们未必也改称“书法”为“书道”，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书法艺术决不单单是书写文字的技艺和方法，书法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更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准宗教。古人对于文字和书写都怀着敬畏之心，甚至将书写过程也当作准宗教仪式来对待。有报道说，日本的一些书法家到山东省平度市参访郑文公上碑，全部顶礼膜拜，有的竟然激动得泣不成声，这对我们国内一些书法家来说几乎不可理解。

我认为，书法表演是应该讲究仪式的，因为仪式的对人的震撼力有时超过仪式内容的本身。如同日本的“茶道”，通过仪式达到静敬净的感受，从而起到陶冶性情化成人心和气质的作用。日本书道表演时，参加者往往是按长幼尊卑次序站立，行礼之后，表演者上场，其余的人安静地观赏，而且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实际是一种礼仪，一种准宗教的仪式。可反观我们“礼仪之邦”的现时书坛，各种正式书法表演场合和参观书法展览时，常常是乱成一团，人声鼎沸，颇伤大雅，大失书法古道。

现在还有人提出书法应现代化。这是一个原本就不应该提出的问题。京剧之所以成为京剧，因为它是传统的、中国的。如果将其唱、念、坐、打等程式改成芭蕾式的，尽管服装、音乐等外表不变，还能称作京剧吗？要知书法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全部信息，仿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决不可轻易地、盲目地、草率地追求所谓现代化，尤其不能胡乱套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对其加以改造。现在如若想成为书家，首先必须埋首虚心，认真地浸润传统、追随古典，深刻掌握历代书法以一贯之的精神本质，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再加上现代人的视觉、心理和思维方式，毋须刻意追求，则必然创造出有别于古代的现代书风。

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书风，因为每一个人在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写字工具和书写条件都不会完全相同，所产生的书法作品风格也必然有异。窃以为，汉魏尚朴，晋人尚简，唐人尚法，宋人尚态，元人尚温（以赵子昂为代表，甚至连胡人康里子山书风亦尚温雅），明人尚逸，清人尚工。到近现代呢？因为时代巨变，传统发生断裂，流风所至，竟以野为尚！唯其野，也就失去了书法中庸、冲和、典雅、清丽的最高境界。近现代人崇尚张牙舞爪式的所谓的淋漓痛快，真乃“过犹不及”。王铎说，“书不入晋唐，终入野道”，真是肯綮之言！

由于书法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菁华，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书家，决不是简单地会用毛笔写字的人。时下某些自吹自擂，招摇过市的“书法大师”们，往往不及书家的皮毛。须知历代大书法家，无不以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无不同时是大学问家。大家熟知的王右军、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朱晦庵，到清末近现代的何绍基、翁方纲、罗振玉、沈尹默、林散之等等，无不是学富五车的儒者。正是由于他们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上，才长成了参乎天地的大树。而那些真正能在书坛上站得住、淘不掉的大家，更都是风骨自标，立朝有节的仁人志士。古人所谓“书如其人”，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得到诠释。

书学复兴之意义

尽力吸收传统书学的营养，大力匡正当今书坛上的流弊，使不绝如缕的书学传统得以复兴和弘扬，不仅只对书界有意义，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约略总括，当为以下二端：

一、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

现在全球化的大潮汹涌澎湃。由于全面西化，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也越来越丧失，这着实令人担忧。

汉字是我们的母文，我们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主要是靠汉字这个纽带传承下来的。汉字隐藏着我们祖先薪火相传的文明智慧和密码，是我们的精神起点，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依附于汉字的人文精神，还可以帮助解决灵魂及信仰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说，若无汉字，则无中国古代高度的文明，也难以有今天和明天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辉煌。

但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汉字遭到了厄运，甚至提出过“消灭汉字”的口号。延宕到今日，我们对承袭了我们的文明，创造了我们辉煌的汉字越来越不恭敬了，可以说已经到了肆意践踏的程度。君不见，城市路边设计签名的，非要将我们的汉字设计成英文字形，而我们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各路明星，往往以自己的签名颇类英文为尚。电脑上新造滥造的字形字库不堪入目。虽然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可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却都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啊！而且不仅仅是用正楷繁体，很大一部分是用行草和其它不易辨认的字体流传下来的。相比较之下，已改成简化字的传统文化典籍的数量，沧海一粟而已，而且还有很多是简化得谬误百出，甚至于句读不通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怎么办？现在的青年人大部分不识繁体字，也都不愿阅读繁体字写成的书。正楷繁体字尚且不能读，以行书、草书写成的典籍谁来阅读，谁来整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系到继承和弘扬我们文化传统的问题。著名学者袁晓园先生一直提倡青少年“识繁用简”，这个建议应该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书法界的高度重视。我们书家应主动担负起“保卫汉字”的责任，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我们的心智。

二、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需要。

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部分国人素养低下，为什么这部分人素养低下？因为这部分人已无根柢。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异质文化挟持着尖船利炮和糖衣炮弹，打进了我们的国家，蹂躏着我们的民族，我们招架无力。但奇怪的是，我们不是发愤图强，自思进取，而是一古

脑地把所有的原因都怪罪到我们老祖宗创造的传统文化上来了。把自己的祖宗骂倒了，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自信心从何而起，民族凝聚力从何而来，难道我们要做世界上二等公民么？

现在大家都已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重视我们民族特有的汉字，重视我们民族特有的书法艺术，就是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这才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正途。连自己的文化都不尊重，况且我们的传统文化，曾创造并延续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古老文明。自己不尊重自己，谁还尊重你！现在读经在华人世界里被重新重视并大力推动，可以说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潮流的反省。它说明，人们已经开始向我们民族传统和文化，寻求发展的原动力了。这中间，有我们书家的责任，也有我们书家广阔的用武之地。

结语

北宋大学者、哲学家横渠张载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旧时私塾开课前往往往要背诵一遍。张载先生的“四句”，讲的是文人士子要有使命感。我们的书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我们应该看到现今中国书法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我们要振臂直呼，身体力行，多做继承和弘扬的事情。这不仅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

农事与艺文：秋胡戏妻作品中的桑树

李勤璞

一、前言

秋胡戏妻，又称桑园会，讲获得功名回家探亲的男子跟采桑女之间的故事，是一类文学和戏曲的本事，从汉代一直流行到今日。情节大体是：一个男子见到路旁或桑园中采桑的青年妇女，爱其色而挑之，希望结欢，被这位贞洁的女子峻拒¹。读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采桑者跟桑树的关系：在有的作品中，桑树比人高大，采桑者是站在树上采桑；有的作品中则是树与人齐，人站在地上采桑；更多的作品，则因叙写简古或完全没有提示，至于采桑者究竟立于树或立于地，无从判断，桑树的高矮也就知道了。

“桑（桑树，桑林）与文学”是汉文学、汉文化重要的课题，最早的研究者为铃木虎雄（一八七八至一九六三）²，后来一直有许多研究者；近年大陆对秋胡戏妻故事的文学研究更多。本文则限于说明以“秋胡戏妻”为本事的各作品内桑树的歧异，旨趣在传统农桑与文学理解的关联。到目前为止，没有论文从农业方面做研讨。

二、秋胡戏妻作品里的两种桑树

秋胡戏妻故事既有文字记述，也有图象资料传世。最早的文字资料在西汉（西元前二〇六至西元八）刘向（约西元前七九至前八）《列女传》（西元前一六年编成）卷五“节义传”，

¹ 参看铃木虎雄，〈採桑传说〉，收入同氏《支那文学研究》（京都：弘文堂，一九二五），页五五九。此文原载京都《支那学》一卷七号（一九二一年三月）。

² 铃木虎雄，〈採桑传说〉、〈桑树に关する传说〉，载同氏《支那文学研究》，页五五九至五七一；五七二至五八五。后一篇原载《支那学》一卷九号（一九二一年五月）。

这里先称引全文：

鲁秋洁妇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下贲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纆，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贲与筴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君子曰：洁妇精于善。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妇之谓也。《诗》云：惟是褊心，是以为刺。此之谓也。

颂曰：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遂东赴河³。

其后有众多的作者，歌咏或发挥这个故事。而近代以来的作品，本稿且不遍论各地方戏中的这个故事，而仅涉及京剧。

就故事中出现的桑树或采桑而言，不明确采桑者站在地上还是站在树上的作品可举以下诸种：

- 一、刘向（约前七九至前八）前引《鲁秋洁妇》，系传记。
- 二、傅玄（二一七至二七八）《秋胡行》二首，诗⁴。
- 三、葛洪（二八四至三六四）《两秋胡曾参毛遂》，载《西京杂记》卷第六⁵，系小说。
- 四、颜延年（三八四至四五六）《秋胡行》，诗九章⁶。

³ 张涛，《列女传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页一八六。

⁴ 逯钦立（一九一一至一九七三）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页五五四、五五六。有诗句“百草扬春华，攘腕采柔桑。素手寻繁枝，落叶不盈筐”。

⁵ 葛洪，《西京杂记》，载无名氏、葛洪，《燕丹子 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页四三至四四。此书系当年胡玮琪女史惠赠者（西藏大学，一九八六）。

⁶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页一二二八至一二三〇。第五章有“蚕月观时暇，桑野多经过。佳人从所务，窈窕援高柯”句（页一二二九）。

五、谢惠连（三九七至四三三）《秋胡行》二首，诗⁷。

六、高适（约七〇六至七六五）《秋胡行》一首，诗⁸。

七、杨慎（一四八八至一五五九）《秋胡妻》，载《升庵集》卷四九，系笔记。

八、萧冰厓（明朝人，生卒年未详）《秋胡妇歌》⁹。

九、阙名（明朝人）《鲁秋胡妻疑冢志》¹⁰。

另外还有些名字叫“秋胡行”的作品收在《乐府诗集》第三六卷，“相和歌辞·清调曲”，但仅在标题上有“秋胡”字样，歌词曲调名称而已，内容全与秋胡之事无涉¹¹。

在下面列举的作品中，采桑者站在树上采桑，知桑树较为高大。

一〇、唐《秋胡变文》：“其[桑]树拂地婆娑，伏乃枝条掩映，[秋胡]欲觅于人，借问家内消息如何。举头忽见贞妻，独在桑间采叶，形容变改，面不曾妆，蓬鬓长垂，忧心采桑。……其妇下树，敛容仪。”¹²

一一、民国《桑园会》（《戏考》本）：秋胡妻：“来此已是桑园，不免采桑便了……在头上整整青丝发，身上抖抖旧衣衫，腰中紧紧丝罗带，足下蹬蹬破鞋袜；轻轻奴把桑树上，惊动了蝴蝶乱飞扬”。

一二、民国《桑园会》（《戏典》本）。这个本子描写的桑树与《戏考》本相同，不再徵引。

桑树跟采桑人等齐，采桑只须站在地上的情况，可举二例：

一三、一九四九年以后整理本《桑园会》：

〔罗敷〕来此已是桑园，待我采桑便了。（接唱）

在腰间紧紧丝罗带，

移步向前手攀桑。

轻轻搭在桑枝上，

惊动了雀鸟乱飞扬。（中略）

〔秋胡〕坐在刁鞍用目望，

见一位大嫂手攀桑。

前影好象罗敷女，

⁷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页一一八八。第一首提示有关桑园故事。

⁸ 清《（钦定）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卷二〇“相和歌辞”，页二三八。有陌中赠金之事。

⁹ 载《萧冰厓诗集拾遗》（《四部丛刊》续，集部）上卷。

¹⁰ 唐褚遂良《鬼冢志》附，收入《唐人说荟》（中华图书馆印行）第二函第一四册。

¹¹ 郑樵，《通志》卷四九，“乐略、相和歌、秋胡行”有解说，可参看。

¹²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页一五七。

后影好象我的妻房¹³。

一四、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

〔秋胡妻〕放下我这采桑篮，我拣着这鲜桑树，只见那浓阴冉冉，翠锦哎模糊；冲开他这叶底烟，荡散了些梢头露。（做采桑科。）（中略）

〔秋胡〕（做见正旦〔即秋胡妻〕科云）一个好女人也，背身儿立着，不见他那面皮，则见他那后影儿，白的是那脖颈，黑的是那头发。可怎生得他回头，我看他一看可也好那¹⁴。

归纳以上所述，秋胡戏妻作品中桑树有两种：一种高大，采桑须攀树；一种低矮与人齐，采桑者站在平地。

一般而言，同一本事的各个作品，后继者总是继承、参照甚至反对从前作品的艺术表现。这种前后关系，使一文学本事的因循与变异呈现了清楚的表徵；最引起注意、最需要解释的也就是这些表徵。

秋胡戏妻本事的各作品，汉唐之间的，桑树高矮不明确。唐代《秋胡变文》开始，才能区别桑树高低。秋胡变文在诸秋胡戏妻作品内无桑树高矮描写的先例可循。所以它对桑树大小的描写是汲取于此前同本事作品之外。那以后，除了明代的（作品第七，八，九），均于桑树高矮描写分明。

后来秋胡戏妻作品之间“高桑树：矮桑树”这一对立现象的出现，是通过对《秋胡变文》中高桑树意象顺应或反对来实现的。顺应，则有作品第一一、一二的出现；反对，则产生作品第一三、一四。这是限于本事自身的解释，作品间关系的解释。

但是，顺应或反对的动机是什么呢？对于艺术作品，动机可以是功能的：如此描写的桑树才具有表现力（比如戏剧性）；也可以是经验的：如此描写才符合生活经验中桑树的实际情况。概览汉文学可以知道，秋胡戏妻，即桑园会这个本事，隶属于一个关涉“桑”（桑园，桑林，桑中……。作为地点、场景、情境，等等）的众多作品的序列¹⁵之中。对于这样更大的作品序列而言，依笔者观察（这里不能论证），具有中心意义和表现功能的是“桑”的意象（image），“桑树”在形成人物行动情境时是决定性的。而细审秋胡戏妻各作品——多是写实的、富道德教训的性质——桑树高矮不具有特别的艺术表现力，但提供妇女走出宅院之外的机会（采桑）。那么，动机就是生活经验方面的。看来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解释秋胡

¹³ 载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京剧丛刊》第四八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九），页八九。

¹⁴ 臧晋叔，《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第二册，页五五。

¹⁵ 像《诗经》就有许多关于桑林中事的诗篇。

戏妻本事诸作品“高桑树：矮桑树”歧异的发生。

从这个方向考察的结果，下面将看到，这些作品高矮不同的两种桑树，正好对应于中国农业上桑树两个历史悠久的品种。可以设想：文艺中的两种桑树是生活中的事物呈现于语言领域、表演领域。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作品都这么直接撷取自农桑经验，后继者可以是依循先前作品。

三、农史方面的观察

现在看农业文献。贾思勰《齐民要术》（写于后魏，五三三至五四四年之间¹⁶）卷五，“种桑、柘第四五”：

今世有荆桑、地桑之名¹⁷。

佚名《士农必用》（完本不存，可能写于金代[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末年¹⁸）：

桑种甚多，不可遍举；世所名者，“荆”与“鲁”也。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劲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荆之类，根固而心实，能久远，宜为树。鲁之类，根不固，而心不实，不能久远，宜为地桑¹⁹。

石声汉（一九〇七至一九七一）《农桑辑要²⁰校注》“鲁桑”注：

据《[齐民]要术》及……所引《士农必用》的论述看，“荆桑”是乔木型而具有“多形叶性”的高桑树，可以种作“树桑”；相对地，“鲁桑”则是止具有心脏形“幼态叶”的灌木型矮树，止能种作“地桑”。因此，《要术》说：“今世有‘荆桑’、‘地桑’之名。”所举出和荆桑相对待的“地桑”，即是“鲁桑”²¹。

¹⁶ 根据梁家勉（一九〇八至一九九二）的研究。见梁家勉，《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一九八二），倪金根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二〇〇二），页二八。

¹⁷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页二八一；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一九九八），页三一六。

¹⁸ 石声汉并认为这是黄河流域的古农书。见其著《农桑辑要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六九。

¹⁹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页八〇。

²⁰ 至元十年（一二七三）成书。看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原序注。

²¹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页一〇三。据“校注后记”，稿本完成于一九六五年。

比较之下，秋胡戏妻作品内采桑者上树采桑的，应该就是农书上记载的“荆桑”“树桑”；而立于树旁地上采桑的，桑树是农书所记的灌木丛矮树：“地桑”“鲁桑”。

“荆桑”“地桑”之名最早见于《齐民要术》，年代稍微迟了一些。而这两种桑树的实际培植，肯定要早得多。西汉末尾的汜胜之总结汉、汉以前黄河流域农业知识，著成《汜胜之书》，于地桑即有明确记载：

种桑法，……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镰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至春，生。一田食三箔蚕²²。

这样当年刈去，来年春上，树不会长很高，采摘桑叶容易。而它的叶子又宜于饲蚕。显然地，这是人工栽培的品种，应较自然生长的“荆桑”为晚出，那么荆桑用于养蚕，就更加早了。

按，汜胜之跟《鲁秋洁妇》作者刘向同为汉文帝（西元前三二至西元前七）时的政府官员，刘向《别录》曾道及汜胜之氏²³。而《列女传》西元前一六年编成。

在《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五”中谈到采桑必须踩长梯高架。这种桑无疑是荆桑：

春采者，必须长梯高机，数人一树，还条复枝，务令净尽；要欲旦暮，而避热时（梯不长，高枝折；人不多，上下劳；条不还，枝仍曲；采不净，鸠脚多；旦暮采，令润泽；不避热，条叶干）²⁴。

另有一点也令人感兴趣：前引元曲《秋胡戏妻》中描绘秋胡妻来到桑园时桑树的情景：叶下有雾霭，梢头有露珠，正是前此秋胡母介绍的，秋胡妇去采桑是在清早，与《齐民要术》记载的采桑恰当时辰（要欲旦暮，避热时）符合。

这是偶然碰巧，或者作者石君宝（女真族。姓石琰，名德玉。平阳[今临汾]人）深通农桑之术，竟像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一样，是一位农学家？目前不能研究，谨志以待问。

以上是古代文献的考究，再看考古方面。更见桑树中荆、鲁品种的渊源久远，或竟达于上古²⁵。

²² 初见于《齐民要术》，见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页二八七至二八八。又，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初稿）》（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页三一；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七），页一六六至一六七。

²³ 《汉书·艺文志》：“汜胜之一八篇（成帝时为议郎）。”唐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汜音凡，又音敷剑反。”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卷三〇，页一七四三。

²⁴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页二八四；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页三一八。

²⁵ 中国养蚕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夏鼐（一九一〇至一九八五），《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九七二），载同氏《考古学和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一〇〇至一〇五。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有采桑图。图亦有两种：一种是人立于枝杈上采桑叶子，树较高；一种是人站在树旁采摘桑叶，树低矮。特别的，在今山东嘉祥县境（两周时是鲁国的中心地区）东汉（二五至二二〇）晚期武氏石祠画像石，经后人考订，有一图是秋胡妻采桑图²⁶。再往上追溯，战国的铜器上有采桑图，一类图里桑比人高很多，一类桑与人等高；跟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情况相同²⁷。这或者就是《鲁秋洁妇》的生活背景；鲁桑始产于鲁地，鲁复为《鲁秋洁妇》故事发生地点。事情有这样凑巧者。

但也有不凑巧的地方。秋胡戏妻各作品的这头一篇，写到采桑，却对桑树高矮没有写明，为荆为鲁，终究是个疑问。

四、总结

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历代都有这两种桑，一种高大，采桑叶要上到树枝杈上去；一种低矮，站在树边即可。这在农书记载频繁。当然它们在地理、气候带的分布，因人们的技术和生计的变迁，古今会有改变。就当代的情形，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三年间，笔者在江南（苏州）求学，屡见从根分条、一行行一片片的桑树，扩展在平坦的农田，大致是地桑之属。这与笔者家乡（赣榆，古昔属鲁地）植于河堰田边不成林的高高的桑树形成对比。近日笔者（七月初）在长城口子之一的杀虎口往附近樊家窑村走，山路上仍见高大的桑树，这里当长城一线，毛乌素沙漠的东南边缘，属干燥的内陆亚洲气候。这样看来，秋胡戏妻本事的各个作品，其中所显示的两种桑树，乃是生活中实有情形的写照。

²⁶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页一〇五。参看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页四二至四三；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页三六（有一幅武梁祠“采桑图”）。

²⁷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页一〇二；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页四三。

《从朔编》考朔

王雨霖

《从朔编》，稿本，不分卷，行书体，版框高二十六点五厘米，宽十七点二厘米，每半叶九行至十行不等，行十八至二十字不等，凡四十又六叶。卷首题“嘉禾竹岑沈铭彝辑”，钤有“半窗松雪”闲章一枚。原为罗振玉旧藏，今归大连图书馆。沈铭彝，字纪鸿，号竹岑，嘉兴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于道光十七年，官至教谕。著有《云东遗史年谱》一卷、《后汉书注又补》一卷、《孟庐札记》八卷、《沈竹岑日记》行世；国家图书馆藏其稿本三种：《听松阁诗》、《沈竹岑笔记》、《云门书院随笔》。《从朔编》乃名物考订之汇辑，略类宋人高承之《事物纪原》。“从朔”语出《礼记·礼运》，意为追溯事物之本原。今经查证，是编大都取材于陶宗仪、杨慎、顾炎武、赵翼诸人之著述，特稍经裁补统纪耳，自目为“辑”，亦固其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著录为“沈铭彝撰”，盖未尝细检之过也。今为理董，并稽考出处，不知者则缺如。

从朔编

嘉禾竹岑沈铭彝辑

生祠

《史记·万石君传》：“庆为齐相，大治，为立石相祠。”又《汉书·于定国传》：“其父于公为郡守，决狱平允，郡中为之立生祠，曰于公祠。”此立生祠之始。至唐则此风渐盛。朱庆馀《送林使君》云：“想得化行风土变，州人应为立生祠。”卢延让《送友赴阙》云：“却笑郡人留不得，感恩惟拟立生祠。”

按出自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唐人之诗证则为辑者自增。辑者颇善以诗为证。

茶

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自魏晋以来有之。”坡翁亦云茗饮出近世。《洛阳伽蓝记》又谓始于梁天监中。盖前古虽有茶而未云饮啜之事，（自唐至宋，有一片值数金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然考《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汉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之语。又《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晏餐，无不竟日。曜素饮不过二升，因初见，或为裁减，或赐茶笋以当酒。”如此言，则魏晋以前已有之矣。《尔雅·释木》：“檟，苦茶。”郭璞注：“树小如梔子，叶可煮作羹饮。”张华以为异闻，载在《博物志》。《野客丛书》云：“世谓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数种，惟《尔雅》茶檟之茶即今之茶也。”汉以前但作茶。《汉书》年表“茶陵”，师古注音“涂”。自《汉书·地理志》易茶陵为荼陵，师古注：“茶，丈加反”，遂改茶为荼矣。唐陆羽著《茶经》三篇，言茶甚备。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乃与煮酒相抗。

按节选自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四、清陆廷灿《续茶经》。括号内文字出自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后为辑者钩删。《汉书》云云当为辑者自撰，“汉书年表”中无“茶陵”。

嘉平

十二月为嘉平，不自秦始也。《风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汉曰腊。”

按汉应劭《风俗通》原作：“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曰腊”，此则为《礼记·月令》所云，辑者误著主名。

井田

井田之废，始于管仲作《内政》，至秦乃尽坏耳。元陈孚《题管仲井》诗曰：“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汗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可谓阐幽之论。

九河

九河之坏自管仲始，《诗纬》谓“移河为界在齐吕”是也。

按此则及上则均出自《升庵集》卷七八《坏井田》一则。

八大家

明初天台林伯贤始以宋之六家合唐之韩柳为八家，茅顺甫因之，迄今为定论云。

按如此简明易知者，固不劳一一考溯其源矣。

去思碑

去思立碑昉于唐时。《集古录》云：《虞城李令去思颂》，李白撰文，王逵篆。

按见欧阳修《集古录》卷八。

及第出身

宋景德四年定《亲试进士条例》，考第之制，凡五等，一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

等五等曰同出身。

按出自《宋史·选举志》。

探花

《天中记》：唐进士杏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人被罚。《蔡宽夫诗话》：故事，进士朝集，择中最年少者为探花郎，熙宁中始罢之。按此则唐之探花，非今所谓探花，而其名未始不相因也。《云麓漫钞》云：世目第三人为探花郎。《漫钞》作在绍兴时，盖罢择年少之后，遂以其名归诸第三人矣。

按出自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八；《云麓漫钞》云云则为辑者增补。

传胪

《史记·叔孙通传》：群臣朝议，既定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云谷杂记》：胪句传者，即传胪也。胪字乃衍文。苏林注《汉书》，乃析“胪句”为二事，云：“上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不知何据。郑康成注《仪礼》，谓胪为众，盖众相胪传。《庄子》有“大儒胪传”之语可证也。

按出自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八。

庶吉士

其名始于《书》之《立政篇》。《明史》：“洪武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等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又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

按出自《陔馀丛考》卷二六。“八年”应作“十八年”，见《明史》卷七〇。

蜀正统

司马温公《通鉴》帝魏，朱子作《纲目》黜魏帝蜀，后人以为文公独得之见，不知其说昉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盖以蜀为宗室，得为正统，魏虽受禅，是篡逆。是在晋已有此论，非创于《纲目》也。

按出处未详。元黄溍《日损斋笔记》早曰“朱子《纲目》推蜀继汉本于习凿齿”。

先辈

《诗·采薇》篇郑笺：“今薇生矣，先辈可以行也。”二字昉此。

按录自《日知录》卷一七。

五律

沈东阳《八咏楼》诗云：“登台望秋月，会浦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野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杨升庵云此诗乃唐律之祖。

按见明杨慎《升庵外集》卷六九。“浦”原作“圃”，“野”为“夜”之误。

试帖

试帖之名始于萧山毛奇龄之选《唐人试帖》。

按此言非是，试帖之名早见唐孟棨《本事诗》。

图画

郑渔仲论图谱之用，不可无者十六，谓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郡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是也。然则图象之用广矣。试约计之。

《左传》：“夏方有德，远方图物。”此图禽兽草木之所祖也。《周礼·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郑注谓“若今之舆地图”。此图地理之所祖也。《汉·天文志》：“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图、官宫物象之类”。此后世星象之所祖也。汉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此图宫室之所祖也。

有图之以昭训戒者。如周明堂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及周公负扆之图，孔子尝观焉。《益州记》载汉献帝时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二弟子于壁间。顺帝梁王后尝图画刘向《列女传》八篇中像于左右，以自鉴戒。唐贞观中李袭誉撰《忠孝图》。永贞间陆贽侍东宫，为《古君臣图》以献。贞元十二年寒食节，图汉名臣于麟德殿屏风，仍纪其嘉言美行于下。明皇时宋璟尝手写《无逸图》以献。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书其中君臣事迹，令画工图于太湘斋，朝夕观览。宋仁宗图《农桑耕织图》于延春阁。郑侠上《流民图》于熙宁六年。辽太和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辽太宗令图画古帝王于日月四时堂。元臣邦宁进《农桑图》于延祐五年，赵孟頫为诗纪之。塔失不花亦进《鬮风图》。明永乐时绘《汉文止辇受谏图》及《唐太宗纳魏徵十思图》悬之左右。此皆德业之所係，治忽之所关，有益于治化者也。

又有图之以志其前之绩者。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行貌，署其官爵姓氏，凡十一人，博陆侯为首。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初止二十八，其后有王常、李通、窦武、卓茂，合三十二人，以椒房故，独不及马援。梁元帝镇荆州，作《职贡图》，首虏而终蛋，凡三十馀图。梁宗炳画《瑞应图》。唐武德四年作文学馆，收聘贤才，令阎立本图像，使褚亮为之赞，号十八学士。贞观十七年，图长孙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代宗广德元年，图雍王至曹楚王三十三人。宪宗贞元五年又图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颜师古奏云：“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编》。”乃令阎立德绘《王会图》。开元中图张说等

十八人于东都上阳宫会象斋，御赞述之。建中三年诏考定功臣可配享者，刊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于武成庙。宋真宗图祥瑞于龙图阁，英宗时张焘请图乾兴以来文武大臣于神宗御殿壁。宋高宗图配饗功臣像于景灵宫廷之壁。元至大二年九月，河间等路献嘉禾异亩同颖及一茎数穗者，命集贤学士赵孟頫绘图，藏诸秘阁。

更有图画书籍，用祛未悟者。《汉书·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图》九卷、《齐孙子图》四卷、《兵形势十一家图》十八卷、《楚兵法图》四卷、《孙轸图》二卷、《王孙图》五卷、《魏公孙图》十卷、《兵阴阳图》十卷、《黄帝图》三卷、《风后图》二卷、《鬼容区图》一卷、《别成子望军气图》三卷、《兵技巧鲍子兵法图》一卷、《伍子胥图》一卷、《苗子图》一卷，凡兵书五十三家、图四十三卷。任宏校兵书为四种，此兵法之有图也。汉明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官，诏博约之士班固、贾逵辈取经史事，命尚方画工绘图。此经史之有图也。后汉阮谡有《礼图》，郑康成有《三礼图》九卷，杨杰有《补正三礼图》。后汉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鉴戒，谓以刘向《列女传》十八篇图画其像也。郭璞《尔雅序》云：“别为音图，用祛未悟”，谓《尔雅》中物状难名者，则披图以别之也。戴安道有《南都赋图》，梁薛景和有《周易新图》、《周易普元图》八卷，是《周易》有图不始于邵子也。晋明帝时卫协画《毛诗图》，梁有《毛诗图三卷》、《毛诗孔子经图》十二卷、《诗古圣贤图》二卷，唐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召程修己图之。开成中又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草木虫鱼图》。是《诗经》有图不始于马和元也。梁有《春秋古今盟全地图》一卷，又《崇文总目》云唐张杰以《春秋》所载衣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绩而表之。是《春秋》图不始于苏轼《指掌》也。梁有《孝经图》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孝经古秘图》一卷、《孝经左右契图》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事图》二卷、《孝经内事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有《口授图》一卷，俱见《隋·经籍志》。是《孝经》有图也。梁张僧繇画《山海图》十卷，咸平二年，舒雅重编《山海经》为十卷，见于《中兴书目》。陶靖节诗亦云“流观山海图”也。《唐书·刑法志》云：唐太宗尝览《明皇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于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此针灸之有图也。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勣等修陶隐居所注《神农本草经》，复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二人别为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谓之《唐新本草》。是《本草》之有图也。宋景祐二年，大乐署以律准考定雅乐献之。上召问李照以锤律大要，照请用黍尺求声，遂命照制新乐。聂冠卿讨论故事，以御制乐曲及锤律议说制器之法，与古今乐器图象之异，为书一百二十六篇上之。是乐器之有图也。又宋宣和中王楚集三代秦汉彝器，绘其刑范，辨其款识。是博古之有图也。又东嘉叶仲堪重编《六经图》七卷，是《六经》有图也。此皆载志简端，古人读书所

谓左图右史是也。他如列仙有图，则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传》。中元六年冬，东平王苍来朝，帝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佛像有图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汉明帝梦见金人，或曰西方有人，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此仙佛之有图也。又有画变相者。《广川画跋》云：唐张师孝入冥，见画阴刑，拘囚众苦具在，酸惨怨怛使人畏栗。此地狱变相之有图也。

画体之变十有四。一曰一笔画，献于宗炳。宋武帝东征刘毅，至庐山，隐士宗炳献一笔画一百事，帝赐以犀柄麈尾。二曰战笔体，善于孙尚子。《历代名画记》云：隋孙尚子善为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惟须发独尔调利，他人效之，终莫能得。三曰着色画，精于阎立本。米芾《画史》云：阎立本画皆著色而细，销银作月色布地。四曰手画，善于张璪。《图画见闻志》云：唐张璪以手摸绢素而成画，毕宏问璪所授，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五曰点簇画，起于韦偃。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韦偃常以越笔点簇鞍马、人物、山水、烟云，千变万态，曲尽其妙，宛然如真。六曰泼墨画，始于王墨。墨之性多疏野，好酒，醺酣之后，即以墨泼，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不见其墨污之迹。七曰金碧山水画，始于大李将军思训。汤垕《画鉴》云：李思训画着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八曰金错刀画，创于李后主。《宣和画谱》云：江南李后主煜画作颤笔，穆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画。九曰折枝画，始于南唐徐熙。《画史》云：徐熙画大小折枝，尝画桃一大枝，谓之满堂春色。十曰戏笔人物，始于宋石恪。都穆《寓意编》云：石恪画戏笔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纹粗笔成之。十一曰没骨画，始于徐崇嗣，以其无笔墨气骨而名之，但取其浓艳生态。蔡君谟题云：前世所画，皆以笔墨为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赵昌辈效之也。十二曰凹凸画，善于尉迟偓，盖本诸张僧繇。杨升庵云：张僧繇画于一乘寺，远望眼晕，如凹凸，近视即平。十三曰罨画。罨画者，杂彩色画也。十四曰白描画。白描有二：一铁线描，始于顾恺之，传于李龙眠，龙眠后赵松雪得其宗；一兰叶描，始于吴道子，道子后，宋马和之传其法。此又画家变格，而各呈其巧者也。

至于画分南北宗，非其人有南北也。北宗则自唐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皆北宗也。南宗则自唐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拗研之法，传至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及元之四大家，皆南宗也。

宋郭若虚云：古之秘画珍图，名随意立。典范，则有《春秋》、《毛诗》、《论语》、《孝经》、《尔雅》等图，其次后汉蔡邕有《讲学图》，梁张僧繇有《孔子问礼图》，隋郑法士有《明唐朝会图》，唐阎立德有《封禅图》，尹继昭有《雪宫图》。观德，则有《帝舜娥皇女英图》，隋

展子虔有《禹治水图》，晋戴逵有《烈女仁智图》，宋陆探微有《勋贤图》。忠鲠，则隋杨契丹有《辛毗引裾图》，唐阎立本有《陈元达锁谏图》，吴道子有《朱云折槛图》。高节，则晋顾恺之有《祖二疏图》，王廙有《木雁图》，宋史艺有《屈原渔父图》，南齐蓬伯珍有《巢由洗耳图》。壮气，则魏曹髦有《卞庄刺虎图》，宋宗炳有《狮子击象图》，梁张僧繇有《汉武射蛟图》。写景，则晋明帝有《轻舟迅迈图》，卫协有《穆天子宴瑶池图》，史道硕有《金谷园图》，顾恺之有《雪霁望五老峰图》。靡艳，则晋戴逵有《南朝贵戚图》，宋袁倩有《丁贵人弹曲项琵琶图》，唐周昉有《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风俗，则南齐毛惠远有《剡中溪谷村墟图》，陶景真有《永嘉屋邑图》，隋杨契丹有《长安车马人物图》，唐韩滉有《尧民鼓腹图》。凡此皆有关典章风土，而非仅以一草一木逞其技巧而已也。

要而论之，唐张彦远有云：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造作。古先圣王受命应策，则有龟字効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庖牺氏发于蒙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壮焉。因俚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天雨粟，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其六曰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广雅》云：“画，类也”；《尔雅》云：“画，形也”；《说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释名》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钟鼎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旂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尊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故陆士衡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夫曹子建之言曰：“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故因论图画之原而详及之。

按出自清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一一、一二，辑者特条贯部分耳。有误钞者：“夏方有德”应为“夏之有德”，“官官物象之类”为“官官物类之象”之误，《王会篇》误为《王会编》，《列女传》十八篇应为八篇；有漏钞者：《周易新图》漏钞“一卷”、“更有图画书籍，用祛未悟者”一节漏钞“《鵙冶子图》一卷”，“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之“局”漏钞。段落为整理者所分，以清眉目。

万岁

万岁之称，楚优孟肇之。汉武帝时制呼万岁必三声，谓之山呼。

按盖出自《艺林汇考》卷一。

王者之称

大禹始称王，商始称天子，秦政自以为德并五帝、功过三王，乃称皇帝。蒋济《万机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称官家。”司马迁作《史记》乃称天子曰上。

按出处未详，当为辑者归纳。

西昆体

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

按录自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有熊大汉

轩辕称有熊，其后国号但加有字，如有唐、有虞是也。汉武帝始于国号上加大字，曰大汉，至今因之。

朕

古者人皆得自称曰“朕”，《书·皋陶》曰“朕言惠”是也。秦政以“朕”自称，而其名始有专属。

按出自《说郛》卷四〇。

改元创号

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汉武帝创年号为建元元年，此年号之始也。

按出自《陔馀丛考》卷二五。

三场

宋宝元中，李淑言：“唐太和以后试进士，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陛下欲得取士之实，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诗赋，次帖经，而勅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为去留。”诏议施行。

按出自《宋史·选举志》。

乡会试

元仁宗延祐二年，始倡为四书经取士之法，既三年，八月乡试，二月会试，皆三场。首场四书二、经一，二场诏诰、表赋、内科各一道，三场时务策一道。其四书用朱子章句而断以己意，限三百字。是今时帖括取士法本于元也。相传元天历年，有“子曰”二字，破题用昌黎“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亦一证，而其文不可考矣。

按出自《元史·选举志》。

拜

《周官》始辨“九拜”，唐武后制女拜不跪。

坐立

古者天子朝诸侯，南面而立，秦始皇乃坐而朝东。古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秦始皇制侍立之礼。汉制赐大臣坐，则开宣室，此后世赐坐所由起也。

弓足

《墨庄漫录》云：“考妇女弓足，起于李后主。”《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窈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窈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鞋舞其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缙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窈娘作也。乐府《双行缠》辞曰：“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合观之，起于六朝明矣。然《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缠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阳耆旧传》云：“盗发楚王冢，得宫人玉屣。晋世履有凤头、重台、分梢之制。”唐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云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诗云：“醉袂几侵鱼子缬，彩缨长夏凤皇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绣鞋。”《花间集》云：“慢移弓底绣罗鞋。”亦屡见于诗咏矣。

按出自清汪景祺《西征随笔》。《道山新闻》为辑者增补，“五云”为“五陵”之误，“绣鞋”原作“锦鞋”。

关节

《旧唐书》穆宗诏：“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又考段文昌言于唐文宗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以关节得。”

传递

宋嘉定十五年，何澹言举人之弊有曰传递，曰换卷，曰易号。宝庆二年，朱端常乞差有风力者为监门官，入试日一切不许传递。门禁既严，再立赏格，许告捉传题、传稿之人。”则其弊自清矣。

按出自《宋史·选举志》。

槐黄

俗语有之曰：“槐花黄，举子忙”。谓槐花之方黄，乃进士赴举之时。而唐翁承赞有诗曰：“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乃知俗语有自也。

按出自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

誊录

宋仁宗时始有考校之律。虽曰至公，然已有识认字画之弊。其后袁州人李彝宾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

按出自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

室舟医箴

《吕览》云：“高元作室，虞姁作舟，巫彭作医，巫咸作箴。”

按见《吕氏春秋·审分》。

笔纸墨

蒙恬作笔，蔡伦造纸，邢夷作墨。

戒碑

欧阳公《集古录》云戒碑起于唐明皇，特不见其词耳。或云宋高宗颁是，黄庭坚书。又按宋太宗立郡国戒碑：“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乃景焕《野人闲书》中语也。或云摘蜀王孟昶之文。又考元至元癸巳吾浙《戒石铭》，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按出自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二。景焕云云不见梁书。“野人闲书”为“野人闲话”之误。

寒食

世俗于清明日谓之寒食，在春最为佳节，以为介子推火死，故为之不举火而食熟食。寒食之义，盖始于此。然以史考之，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火死，至其正月，皆谓神灵不举，由是，士民于冬中一月皆寒食，莫敢烟爨，民甚不堪岁，多死者，举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所忍为。即此考之，则子推之死当在十一月，故言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节与盛冬盖远，岂自有故耶？考《周书·司烜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然则禁火乃周之旧制。又按宗懔《荆楚岁时记》：“冬至后一百五日必有雨风，谓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后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寒食之义，可备一解。

按出自宋吴箕《常谈》，“考《周书》”云云出自《说郛》卷六九。首句辑者原作“清明前一日”，旋圈去“前一”，而《常谈》作“清明前二日”，寒食确为清明前一日或二日。

馒头

诸葛武侯南征班师，祭泸水之神，作馒头。

按录自宋高承《事物纪原》。

兜肚

兜肚一名抹胸，盖杨贵妃始之。

无常鬼

今人谓魍魉曰无常，亦有典。《国语》申生之仆人曰：“奇生怪，怪生无常。”

按见《国语·晋语》卷七。

折桂

世以登科为折桂，由于郗诜对策东堂，白云桂林一枝也。

按出自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进士举人贡生

进士见《礼记·王制》，举人、贡生见于《后汉书·章帝纪》：“每寻前代举人贡士，或起蚰蚘，不系闾闾。”是也。“进士出身”入诗则始于唐徐凝《答施先辈》云：“料得仙宫列仙籍，如君进士出身稀。”“举人”入诗，则白居易有云：“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

监生生员

《唐书》：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自天宝后，生徒离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按生为监生，员其数也，以监生、生员为两等人。盖别自宋以来，州县设学也。

按见《新唐书·选举制》。

封君

男子封君自秦孝公封商鞅为商君始，妇人封君自汉武帝封太后母藏儿为平原君始。

字

苍颉制字，其初曰蝌蚪文。周史籀作大篆，石鼓文是也。秦李斯作小篆，峯山、泰山诸碑是也。蔡邕作八分，石经是也。昔人又云：史游作草书，蔡中郎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

按出处未详，当为辑者归纳。“昔人”云云盖出自唐张怀瓘《书断》。

缺襟袍

今人有穿缺襟袍者，盖从军之服也。《唐书》：高祖武德元年诏：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膊袄子。自隋时诏武官服之，今亦其遗制。

按录自《陔馀丛考》卷三三。

仰

今官府文移，以上临下，皆用仰字。按《北齐书·孝昭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

议之。仰字盖始此。《增韵》：仰，资也。

按出自宋孔平仲《孔氏杂谈》卷四。

乌丝栏

《国史补》：宋毫间有织成界道，名乌丝栏。又《丽情集》霍小玉出乌丝栏素服，李生援笔成章。

按出自明方以智《通雅》卷三二。

行马

《周礼》设陛互，即今之行马也。

按录自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

路引

汉时军民出境，皆封长标与之，即路引也。

行

《礼记·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曰冬祀井，《太元数》曰冬为井，《白虎通》亦曰冬祭井。《唐月令》亦曰冬祀井，而不曰祀行，不云井即行。井，间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

按录自《升庵集》卷四四。

掷筹诗

谚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亦有出处。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筭筹》诗云：“一朝权在手，看取令行时。”

按出处未详。此谚见于明顾大典《青衫记》，朱湾诗见《全唐诗》卷三〇六。

衾影

晏子云：“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此为宋人衾影语所祖。

按此语本北齐刘昼《新论·慎独》“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非晏子云。

表章《学》《庸》

《大学》一书，宋以前未有知为曾子书者，自温公始为《广义》，遂得专行于世。至《中庸》单行，亦不始于二程也。刘宋散骑常侍戴颙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学》《庸》之表章，有所昉矣。

按出处未详，亦见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一一引李恢垣说。

上巳

《岁时记》三月节巳日为上巳，月建辰则巳为除日，以除不祥也。魏以后，但用三月三

日，不复用巳矣。上巳一曰上除，一曰元巳。

按录自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〇。

下九

《娜嬛记》：九为阳数。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日为中九，十九日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达旦者。古诗：“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是也。

按见元尹世珍《娜嬛记》卷中。亦见清闻人倓《古诗笺》。

延洪

《书·大诰》中“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延洪”二字孔传连读。《尔雅·释诂》云：“延，长也；洪，大也。”自王荆公以“不少延”为句，蔡《传》因之。

县

楚灭陈为县，县之名始此，非始于秦。

按出自《史记·管蔡世家》。

弋人何篡

《扬子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取也焉。”自唐张九龄《感遇》诗误篡为慕，后人沿之。

按出自《法言》李轨注。“篡”原作“篡”。

西施

东坡诗云：“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渠依旧姓西”，西，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称西施，盖东西施之谓耳。坡乃以为姓，误矣。

按出自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三。

弥封

《日知录》：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后范文正公、苏颂呈议，罢弥封法，使有司先考其行，以渐复两汉之旧。卒未能复。然此则用之选人，而未尝用之贡举。按糊名即今之弥封也。宋景德时，定考校式编排官第，以学号付封弥官，用御书院印封弥。景祐时诏开别头试。封弥、誊录，二字转易，盖互文耳。

按见《日知录》卷一七。

龙虎榜

《唐书》：欧阳詹与韩愈、李观、李绹、崔群、王涯、冯宿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

按见《新唐书·欧阳詹传》。

加级

加级之称始于秦。秦法，斩敌一首，拜爵一级，故谓一首为一级。后世因以晋秩为加级也。

按出自《演繁露》卷一七。

艇

杨升庵曰：杜诗古本“野艇恰受两三人”，浅者不知艇字有平声，乃妄改作航字，以便于读，谬矣。古乐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

按见《升庵外集》卷七五。

杜荀鹤诗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欧阳文忠《六一诗话》称为周朴佳句，实乃杜荀鹤《官怨》一联，非朴诗也。

按录自《临汉隐居诗话》。“官怨”当作“春官怨”。

朝鸡

宋袁文《甕牖闲评》云：朝鸡鸣极早，盖以惊入朝之人，故谓之朝鸡。晁以道诗乃云：“鸡鸣本候海潮信，不为金门上马时。”如此则当为潮汐之潮，未知何据。

按见《甕牖闲评》卷五。

牢九

束皙《饼赋》：“春馒头，夏薄持，秋起搜，冬汤饼，四时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及读苏东坡诗云：“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虽东坡亦未知何物也。《赋汇》载束皙《饼赋》，“薄持”作“薄壮”，“起搜”作“起溲”，“牢九”作“牢丸”，殆传各异乎？

按录自《甕牖闲评》卷六。

丧家之狗

东坡诗云：“惘惘可怜真丧狗”，丧作去声。元微之曰：“饥摇困尾丧家狗”，作平声，本《韩诗外传》也。

按出自清梁学昌《庭立纪闻》卷二。

醜扇

《尔雅》：“蝇醜，扇。”本蝇醜二字句，扇一字句。曾仲绎诗云：“已无醜扇几边乱，空见春锄天际飞。”二字连用，可谓创见。

按出自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曾仲绎为曾成绎之误。

畔

吴语“避人为畔”。古时无此字也，然亦有本。陈后主造齐云观，谣云：“齐云观，寇来无际畔。”

按陈后主事见《隋书·五行志》。

二十三

后唐潞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小字二十三。人臣奏对但云两旬三日，数物则云二十二，更过二十四，不敢斥尊也。今满洲有以数名者，潞王其先声也。

按出自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

夏屋

升庵曰：《诗》“夏屋渠渠”，古注：屋，里也。字书：夏屋，大俎也。今以为屋居，非矣。《礼》“周人房俎”，《鲁颂》“边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为居，以房俎为房室，可乎？又《礼》“童子幘无屋”，亦谓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按见明杨慎《升庵集》卷四二。

万里桥

唐李潜《松窗杂录》：明皇幸东都，偶因秋霖，与一行师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悽然叹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幸万里，圣祚无疆。”及幸成都，前望大桥，问是何桥，节度使崔圆跃马进曰：“万里桥！”上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按此则洪昉思《长生殿》传奇《闻铃》有曲云“万里巡行”，确有所本。后人以明皇西幸，道无“万里”，改为“玉辇巡行”，不自知其贻笑大方也。

按“按”以下出处未详，当为辑者自撰。

高结

杨升庵曰：韩文《石鼎联句序》：“长颈高结，喉中作楚语。”结字断句，结音髻，义亦同。《西汉书》“髻”皆作“结”，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结喉”，误矣。且云“中作楚语”，成何文理！

按见《升庵外集》卷七五。

鯀

《庄子》曰：“北溟有鱼，其名为鯀。鯀之大，不知其几万里。”此寓言也。按《尔雅》云：“鯀，鱼子”；《内则》：“卵酱”，卵音鯀。《国语》亦云：“鱼禁鯀鲋”。皆以鯀为至小之

物也。庄子乃以至小为至大，便是滑稽开端。后人不知其意。晋江逌诗曰：“巨鳌戴蓬莱，大鯤运天地。倏忽云雨兴，俯仰三洲移。”孙放诗曰：“巨细同一马，物化无常归。修鯤解长鳞，鹏起扇云飞。抚翼转积风，仰凌垂天翠。”皆不得其意旨也。

按出自明杨慎《异鱼图赞笺》卷一。“大鯤运天地”之“地”为“池”之讹。

石刻木刻

古者惟勒鼎彝，周宣王始刻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

讳

生名死讳始于周也。《礼》云：周人以讳事神，名，讳将讳之，然临文不讳。

按出自《左传·桓公六年》。“讳将讳之”为“终将讳之”之误。

下官

梁武帝改称臣为下官。

尼姑尼庵

汉刘峻女出家，又洛阳妇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何充舍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公主

汉制娶天子之女曰尚公主，娶诸侯之女曰承翁主。

侍卫

《史记·弟子传》王肃注云：子路为孔子侍卫，故人不致有恶言。侍卫之名本此。

刑

五刑之制见于《尚书》，汉文帝始除肉刑，唐太宗始置役流。

河源

河源古无所见，《禹贡》导河积石。汉使张骞持节到西域，度玉门，见二水交流，发葱岭，趋于阆，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唐刘元鼎使吐蕃，访河源，得之闷磨黎山。然皆历岁月，涉艰难，其所得不过如此。世之论河源者，皆推本于二家。顾考其实，皆非本真，至元都实始得其真。后潘昂霄从都实弟阔，阔得其说，撰为《河源志》。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自有二家之说，而始瞭如矣。河源出今西蕃界巴颜喀拉正东，名阿克坦河。巴颜喀拉与阿克坦齐集巴尔希哈，总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东北流三百余里，合鄂敦塔拉诸泉源，即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至我朝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上遣大学士公阿桂之子阿弥达往西宁穷河源，复知星宿海西南一河，名阿勒坦。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此河实系黄河上源。上因令儒臣辑《河源纪略》一书，而都实之得又不足言矣。

按节选自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三、清纪昀等《钦定河源纪略》卷三六。

江源

中国水之大而流长者，惟河与江，源皆出西蕃界。河之源自《元史》发明后，后人因得知其大略。江源从未有确指其地者。酈道元《水经注》颇言其端委，而于发源之处则云“以今所闻，殆未滥觞”。道元亦阙疑而不敢信也。今三藏之地皆归版籍，山川源委皆可按图以稽，乃知所谓岷山导江者，江水泛滥中国之始，江源实不在是也。江源发于科山之东南，有三泉，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名七七拉噶纳；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纳；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名古科克巴噶七七拉噶纳。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译言岷山也。是为岷江之源。南行至岷纳克地，名鸦龙江。又南流至打冲河，入于金沙江。东流经云南地，至四川叙州府，与川江合。

按出自清圣宗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卷三一。

量移

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开元二十年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处，是也。今人以迁职皆曰量移，非古意矣。

按出自《日知录》卷三二。

河洛

数学皆起于河洛。自黄帝画井田，夏后明九畴，周公师其意，作明堂，而九宫之用益广。

六礼

同姓不婚始于周也，爰有六礼。

短丧起于周康王

父丧三年之制，创自唐尧。周成王襁褓之时，周公负扆以朝诸侯，而流言起，则此制不得不变。故康王葬毕，遂即位。而汉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又古者父在则为母齐衰期年，父亡服母丧亦齐衰三年。唐武后始制父在服母丧亦齐衰三年，后世因之。

按周成王、汉文帝事出自清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一七，徐为辑者归纳。此题辑者以墨勒帛，以示删汰。

神像

今人已死，设形貌于室以事之，乃楚俗也。宋玉《招魂》：“像设君室，静闲安些。”

四言五言七言

四言始于虞帝作歌。五言始于苏李《河梁赠答》。至汉武《柏梁》一诗为七言权輿，亦后人联句之所祖。要皆本于《三百篇》。

六言

任昉云六言始于谷永。按《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于谷永明矣。乐府《满歌行》尾一解：“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亦六言也。

按出自《升庵集》卷五六。

隐语

《国语》单子对鲁成公指叔孙侨如为“长翟之人”，此隐语之所昉也。后蔡中郎题曹娥碑云：“黄绢幼妇，外孙鞶白”，隐“绝妙好辞”四字。魏伯阳《参同契·后序》云：“郗会鄙夫，幽谷朽生；委时去害，依托邱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又孔融诗云：“渔父屈节鱼，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行施张日。吕公钓矶，盍口渭旁口。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或。好是正直，女回予匡子。海内有截，隼逝鹰扬乙。六翮将奋，羽仪未彰鬲。蛇龙之蛰，俾也何忘虫。玫瑰隐曜，美玉韬光文。无名无誉，放言深藏与。按辔安行，谁谓路长井。隐“鲁国孔文举”六字。

按录自《升庵集》卷四六。“鲁国孔文举”原作“鲁国孔融文举”，为辑者疏漏。

寺人

寺人始自《诗·秦风》。开国之君如此，其后即以赵高亡。可为千秋龟鉴。

隶书

上古王次仲始作楷书，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宣官为最。庾肩吾曰：“隶书，今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观法帖中《天得一以清》帖可见。”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凡汉石刻皆目为汉隶。《东海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书也。

按出自清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一。“天得一以清”帖见《淳化阁帖》。《东海大觉寺碑》为《东魏大觉寺碑》之误。

赋

宋玉始作赋。

子细

《北史·源思礼传》：“为政当举大纲，何必太子细也！”杜诗“野桥分子细”，俗语本此。按出自《升庵集》卷四七。

陛下

蔡邕《独断》：“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陛，以戒不虞。谓陛下者，群臣不敢指斥天子也。”按出自《日知录》卷二四。

钱

自禹汤有历山庄山之铸，而钱法以兴。周太公立九方圜法。《周官》有外府泉府之掌，其用乃广。古时皆谓之泉。自周景王铸大钱，遂易泉字为钱字。然亦不详其有文与否。今之所见半两布泉、货泉，殆周汉之间乎？汉有五铢、大泉五十、大泉五百。而以年号铸钱，则唐之开元通宝始；或云魏孝武始以年号铸钱，是又一说也。

按出自《能改斋漫录》卷四。

老师

《旧唐书·令狐峒传》。张籍《寄白使君》诗有“登第早年同座主”句。李肇《国史补》：进士称有司曰座主。《觚不觚录》：嘉靖以前，门生称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至分宜枋国，始称老翁，其厚者称夫子，此后但相承称老师。

按“令狐峒传”后疑漏引田敦“始见座主”语。

门生

《令狐峒传》：“田敦，峒门生也。”白居易诗：“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裴皞诗：“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王仁裕《见诸门生》诗：“三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而其称谓盖汉始之。欧阳文忠《孔宙碑阴题名跋》：“汉世公卿多自教授，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者为门生。”

按出处未详，当为辑者归纳。“见诸门生”为“示诸门生”之误，“三百”原作“二百”。

同年

《国史补》：“进士俱捷，谓之同年。”刘禹锡《送人赴举诗序》：“今人以偕升为同年友。”李远《陪新及第赴会》诗：“满座皆仙侣，同年别有情。”杜荀鹤《试后别人》诗：“同年多是长安客，不信行人欲断肠。”

按出处未详，或为辑者自作。

中隼

《左传》士文伯谓投壶之中曰中隼。后遂沿为文场中式之称。

按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即席

宋武帝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萧介染翰即成，文不加点。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言笑自若。帝曰：“萧介之诗，臧盾之饮，皆即席之美也。”后世即席二字本此。

按出自《南史·萧介传》。

丫头

吴中呼婢曰丫头。刘宾客《寄赠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二三，春来绰约向人时。”

按出自《南村辍耕录》。“十二三”原作“十三四”。

长老

陶九成《辍耕录》曰：吾乡称舟人之老者曰长老。长上声，盖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诗云：“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长老三老之意。

汉子

《辍耕录》云：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又段成式《庐陵官下记》：韦令去西蜀时，彭州刺史被县令密论诉韦前，期勘知屈，刺史诣府陈谢。及回日，诸县令悉远迎，所诉者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谓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则公便是研朱汉子也。”

温暾

《辍耕录》曰：南人方言曰温暾，乃怀暖也。唐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又白居易诗“池水暖温暾”，则古已然矣。

环纽

今窗户上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古之金锈也。亦名屈戍。《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梁简文诗：“织成屏风金屈戍”，李商隐诗：“锁香金屈戍”，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

按出自《南村辍耕录》，惟《长门赋》句未见。“金锈”为“金铺”之误。

客作

《辍耕录》：今人指佣工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为人客作，饱食而已。

利市

《辍耕录》：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巽卦》：巽为利市三倍。

不耐烦

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传》。

按出自《南村辍耕录》。实出庾登之弟炳之传。

阿谁

阿谁二字见《三国志·庞统传》。

按出自《南村辍耕录》。

素领

《辍耕录》云：项后白发曰素领。汉冯唐白首为郎官，素发垂领。

不中用

《左传》：成二年，郤子曰：“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杜预注：“不中为之役使。”按出自《南村辍耕录》。

经纪

《辍耕录》：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唐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勅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韩昌黎作柳子厚墓志铭：“舅弟卢遵，又将经纪其家。”则自唐已有此言。

𠄎

《辍耕录》：𠄎即卷字，《真诰》中谓一卷为一卷，或以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按“一卷为一卷”后卷字应为𠄎。

刚卯

《辍耕录》：刚卯者，许慎《说文》：亥爻音开改，大刚昴，以逐鬼也。《玉篇》：开改，刚卯大印，以辟鬼也。《广韵》：开改，大开坚也。《王莽传》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着佩之。”又注：“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爻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芟刚瘳，莫我敢当。’又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国化，伏兹灵芟。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刚瘳，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亥爻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谓刚卯，又谓之大坚，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师古曰：“今往往于土中得玉刚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刚卯及金刀皆禁之。”

家主翁

《辍耕录》：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奴材

《辍耕录》：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

居士

《辍耕录》：今人以居士自号者甚多。考之六经中，惟《礼记·玉藻》有曰“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居士也。”吴僧《能改斋漫录》云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时。按《韩非子》书曰：

“太公封於齐，东海上有居士任雋、华仕昆弟二人，立议曰：‘我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吾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仕而事力云。”然则居士云者，处士之类是也。

按吴僧为吴曾之误。

亲家

《辍耕录》：凡男女缔姻者，两家相谓曰亲家。此二字见《唐书·萧嵩传》。今北方以亲字为去声。按卢纶作《王骙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则亦有所祖。亲家又曰亲家翁。《五代史·刘昫传》：昫与冯道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之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苏氏开谈录》：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中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谴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家翁，今日好雪。”

石敢当

《辍耕录》：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按西汉史游《急就章》云“石敢当”，颜古注曰：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

按颜古应为颜师古或师古。

新妇不令履地

《辍耕录》：今人家娶妇，輿轿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不令履地。然唐人已尔。乐天《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

耳环

《辍耕录》：或者谓晋唐间人所画士女，多不带耳环，以为古无穿耳者。然庄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点心

《辍耕录》：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唐史》：郑僖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饌。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且可点心。”则此语唐时已然。

墨

《辍耕录》：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汁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唐高丽岁贡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

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伪也。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元祐间，潘谷墨见称于时。自后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峰、齐峰、叶茂实、翁彦卿等出，世不少墨。惟茂实为得法，清黑不凝滞，他人莫及。

按雪峰原作雪斋。

拗花

《辍耕录》：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诗：“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拗折杨柳枝”。

娘

《辍耕录》：娘字，俗书也。古无之，当作孃。按《说文》，烦扰也、肥大也，从女襄声，女良切。其义如此，今乃通为妇女之称。

上头

《辍耕录》：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而倡家处女初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

按所录《辍耕录》止于此。

主客司

今礼部有主客司，二字本《史记·淳于髡传》，以髡为诸侯主客。

按出自《南村辍耕录》。

弓矢

《世本》曰：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

按出自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六。

小旦

叔孙通定郊祀，制伪女妓。此旦色滥觞之始。唐开元中以伶工之金者为立部伎，次为坐部伎，又次为雅乐部。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义取于狙，盖狐之淫者。狐狸顶骷髅向月而拜，则变为人形。

按出自清吴长元《燕兰小谱》卷三。狐狸顶骷髅拜月事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宋赞宁《高僧传·志玄传》。

诰封

诰封即古者返王之意。如人子居官，返崇其亲，唐始有之，见于《文苑英华》，如郭子

仪、杜佑、田宏正皆赠其祖父官，略早于其人。至宋则及曾祖，且官阶与其子同。至于官之虚阶加级，皆深崇封，亦孝理之日上也。

兆朕

郭忠恕《佩觿集》：吉凶形兆谓之兆朕。字从目，与朕义别。今考左思《魏都赋》：“兆朕振古，萌柢畴昔。”《云笈七签》：“方知兆朕，庶观希夷。”古书中所用皆然。八股中相沿作朕，且倒拈曰朕兆，误也。

按“字从目”应为“朕字从目”。

医方

按《从朔编》止于此。

罗振玉、罗继祖点评《桐阴论画》

房学惠

《桐阴论画》晚清秦祖永著，分首卷、上卷、下卷、附录四部分。首卷论自董其昌至石涛十六位书画大家，上卷、下卷论自恽向至费丹旭一百零四位书画名家，附录论顾媚、李因、马荃、陈书四位闺秀名家。分逸、神、妙、能四品，并各附小传，首卷前有叶法、李秦、绷业三序，张之万赠言，何基祺、马履泰二跋，李铭山、梁敞、钱灿题词，秦祖永自撰例言。附录后有社友楞烟外史后跋。《桐阴画诀》前有社友李铭山跋。旅顺博物馆所藏《桐阴论画》系罗振玉旧藏批点本。上卷序文首页押“肃启”（罗振玉印）白文方形印一方，首卷首页押“继祖读过”朱文方形印一方。本文对罗氏点评进行整理移录，从中可见二人的见地与造诣。

一、《桐阴论画》的点评

王时敏。罗振玉：烟客之邱壑浑成，其所长诚在此，然用笔太繁，是其所短。

王鑑。罗振玉：廉州在四王中最弱，乃谓其沉雄，可谓适得其反，其摹古者差佳耳。罗继祖：廉州画用笔似太常，而无其繁复，无石谷之甜熟，麓台之重拙，四王中最为杰出。

王翬。罗振玉：宋以后南宗多，北宗少，石谷无南宗也，谓为镕铸南北宗，未见其然。

王原祁。罗振玉：茂京得力于大痴，然大痴变化多，茂京变化少，此古今人不相及处。又：娄东一派为国朝变法之导师，然后人多囿其法不能进步，此国朝画史上一大关键，亦犹唐代书家元和以后不能出柳家新样，殊可恨也。罗继祖：麓台邱壑几于千篇一律，是其最短处，虽笔意沉郁，却少灵虚，亦无庸为之讳也。

恽寿平。罗振玉：南田写生直欲追步两宋，人徒知尚其山水，何耶？“前代画家擅长三绝者，卓然惟唐子畏一人，当代惟南田翁可与并传千古”。罗振玉：媿拟精当。

吴伟业。罗振玉：骏公画多，所见皆松秀有余，精练不足，列之大家，仆所未晓。

邹之麟。“用笔圆劲古秀，虽皴染不多，一种解衣磅礴之概，卓然大雅不群”。罗振玉：衣白画颇不免粗犷，究嫌疏野，此所论公也。

陈洪绶。罗振玉：老莲自出新意，动与古会，与仇唐比肩，尚恐出一头地。罗继祖：老莲山水虽非所长，然亦脱尽时习，如其人物。“深得古法，渊雅静穆，浑然有太古之风”。罗继祖：精确。又：老莲人物后来惟任渭长能仿佛，今遂绝响矣。

杨文骢。“杨龙友文骢天资潇洒，下笔有风舒云卷之势，盖其负质异也。余见尺幅数种，均系一时兴到之作，不为蹊径所拘，而静逸之气充溢缣素间，纯以士气胜也。”罗振玉：龙友之画，以予所见传本，殆不能副此书所言。

张风。罗振玉：大风恬静，至是确论，惜稍弱耳。

释髡残。石溪苍坚秀逸，至是国初杰匠，石涛虽苍逸，然视石溪有愧色矣。

释道济。罗振玉：石涛画之佳者，逸趣横生；其随意之作，不免放纵太过，失之野。

恽向。罗振玉：玉见香山先生所作，有皴法极粗、点圆大如豆者，苍坚浑厚，真为本朝独步，殆从唐人法中悟出，非余子所及也。又：玉又尝僧口画极似先生，僧口无可考，或先生晚年为僧时号耶？又：此误。近考僧口乃七处和尚，见周栎园《读画录》。罗继祖：香山画有时微嫌用笔拙秃少韵。

程嘉燧。罗振玉：松圆老人画淡而益腴，非枯淡也。

程正揆。罗振玉：侍郎腴隳处大似香光、眉公。

杨补。“惜皴太率易”。罗振玉：此语公。

胡宗仁。罗继祖：长白画未见，其弟可复宗信画，余家藏一帧，朴茂坚厚，酣畅淋漓，自是杰作。

傅山。罗振玉：誉之太过，玉所见傅征君画，殆未能造至地位。

萧云从。罗振玉：尺木画颇薄弱，佳者甚稀。

释宏仁。“余见卷册数种，不过笔墨秀逸，并无出奇制胜之处”。罗振玉：此论公，予有其尺幅，有千里之势，乃善学云林，而得精遗粗者。

赵左。“余见尺幅数种，似甜熟家数，并无古隳沉郁之趣”。罗振玉：文度画雅近香光，此论未公。

赵澄。罗继祖：雪江仿古功力甚深，谓病在“板”亦是确论，第奔放之余正赖以挽救耳。

祁豸佳。罗振玉：祁先生画略近邹衣白，不免粗放，但稍润耳，此书誉之，未免过当。

龚贤。“但墨太浓重，沉雄深厚中无清疏秀逸之趣”。罗振玉：此大不然，半千画得之元人，浓而不浊，□而弥隳。罗继祖：既云“独出幽异”，又云“墨太浓重”，可谓失辞。使用

墨太浓重，安所见“幽异”哉！浓重固易流拙浊，然以浅见测，名家多见其不知量矣。

吴宏。罗继祖：远度画殊不多见，予家藏其古木寒鸦一小帧，亦未能副此书所言。

胡玉昆。罗继祖：“胡元润玉昆，性情孤癖，画亦如之。用笔设色，好作缥缈虚无态。余昔藏一长卷，用淡墨渲皴，深得元人神趣，境界极空灵淡荡，作家窠臼摆脱殆尽，真逸品也。”所论甚确。

王武。罗振玉：近人喜白阳、新罗，故以简率为生动，其实忘庵画何尝有一丝“板木”乎？

吴山涛。罗继祖：塞翁山水简老，尚在口及口上。

程邃。罗振玉：山水用渴笔终非正宗，予于垢道人未能十分满意以此。惟石溪用渴笔不嫌枯滞，穆倩尚未能徵此境也。“程穆倩邃山水纯用枯笔，模糊蓊郁，别具神味”。罗振玉：枯笔见戒模糊。

高简。罗振玉：山人画，玉所见无一佳者，大率薄弱口苍润之趣。

张宏。罗振玉：君度之佳者几驾石田而上之，且君度之画亦非师法石田者。

陈舒。罗振玉：原舒山水不仅疏秀且清劲绝俗，自是高手。

徐枋。“惟笔锋太秃，无秀灵劲峭之趣，邱壑亦平实板木，既无生气，又少变通”。罗振玉：甚为确论。

姜实节。“但落笔不甚谨严，处处有荒率态，盖荒率是其所长，亦是其所短耳”。罗振玉：予曾见其极精到之作，绝不荒率，此未为定论。

梅庚。罗继祖：远公画似在雪坪上，此录雪坪而遗远公，何也？

黄鼎。“笔墨苍劲秀逸”。“大幅稍嫌精彩不足”。罗振玉：信然。

沈宗敬。罗振玉：玉所见狮峰画嫌太秃，然不失古法。

戴本孝。罗振玉：务旃画突过穆倩，其大幅尤精且枯而能腴，但所失在稍薄耳。

沈士充。罗振玉：子居画果然明丽超逸，在松江派中之杰匠也。

马元驭。罗振玉：元驭远不如南田之超逸。罗继祖：南田画最难神似，元驭何尝入室。

杨晋。罗振玉：子鹤先生画，予未见佳者，其画牛尤有名，然实不可人。

释上睿。罗振玉：睿师得力于元人，其花鸟则几造宋人之堂，概以“思力薄弱”评之，可谓唐突。

王昱。“但过为师法所拘，未能另辟町畦，终是寄人篱落”。罗振玉：此语道着。

王愨。“特笔意薄弱，未能浑厚，故秀润中无苍古之趣”。罗振玉：诚然。

邹一桂。罗振玉：小山先生上法有宋，下师泰西，乃有板木之说，可谓痴人说梦。

金农。罗振玉：冬心画静穆渊厚，独出手眼，此云奇古，似是而未当也。

华岳。罗振玉：本朝花鸟一误于死守白阳，再误于规抚新罗，致宋元矩范荡然无存，可惜！

方士庶。罗振玉：循远画沉着精到，妙在无“四王”习气。罗继祖：小狮师黄尊古，实胜尊古，又小狮卒年六十，非短折也。

郑燮。罗振玉：板桥画竹虽有郁勃之气，然去宋元人甚远。

董邦达。罗继祖：东山画，《沈芥舟学画编》谓直绍二董之传，推挹备至，然所见传本实未能副所言，岂所见非其至者耶？

钱载。罗振玉：箨石老人笔墨静穆，非画史所能到，此书乃以“笔墨奔放，兀傲不群”评之，可谓痴人说梦。

张宗苍。“微嫌笔墨细碎，无浑沦气。古大家用笔随浓随淡，一气成之，自然精湛，不待冷焦墨醒也。篁村特未知其妙耳”。罗继祖：道着病处。

钱维城。罗振玉：以摹仿麓台目茶山，失言。

王宸。罗振玉：渴笔作画本非正宗，垢道人与蓬心其失一也。罗继祖：吾家藏蓬心仿古一册，为七十一岁所作。苍秀沉郁，足称平生合作，此讥其晚年“枯而秃”，非确论也。

方薰。“此等笔墨，所嫌无沉雄苍古之趣，故终觉单薄而无精彩”。罗振玉：甚确。罗继祖：尝见兰士仿云林山林殊稚弱，列之逸品，未见其可。

奚冈。罗继祖：蒙泉画笔太松无气力，花卉有逸韵，胜山水。

钱杜。罗继祖：松壶功力气韵两臻绝诣，此谓“六法未到家”，误甚。

张问陶。罗继祖：船山之画皆非绝诣，且文人弄笔所在而有，不仅一船山也，似不应列之大家。

王学浩。罗继祖：椒畦大笔淋漓，妙在不依傍“四王”，自较黄尊古辈出一头地，谓“用力太猛，失之霸悍”亦道着病处。

戴熙。罗继祖：文节虽有功力，然兢兢师法耕烟，终属寄人篱落，此谓“无灵警浑脱之致”，确论也。

李因。罗继祖：今生真迹绝不板木。

二、《桐阴画诀》的点评

论用笔。罗继祖：论画竖执干笔之说，总缘未见董巨真迹，大痴虽不如董巨之痛快淋漓，然岂专尚干笔者？特皴染较少渐趋细腻，后世不善学，遂一味干枯，气势卑弱，画学所以不振。若程穆倩、孟阳、戴务旃辈，文人墨戏不必苛求，然终非正格也。又：先用湿笔，后用干笔，提醒钩勒，亦胜纯用干笔，大痴画亦不尽干笔也。罗振玉：取逆势者，定□□□也，□□则□□。

论画法。罗继祖：宋元人画法不同，未容显分优劣。

论画树。罗振玉：不只作画先从树起，山水精神大半在树。

论娄东派。罗继祖：娄东一派即不免窒塞之病。

论姚云东画。罗振玉：云东画变化甚多，有明一代巨手也。其画亦有繁者，予藏有云东仿黄鹤山樵，精绝。

论吴渔山画。罗继祖：渔山画不逊石谷，此谓“得唐子畏神髓”，亦觉拟不于伦，“四王吴恽”皆南宗无北宗也。

论王石谷画。罗继祖：石谷青绿殊少见。

论用墨。罗继祖：色中参墨少许即不觉有火气，不必专于笔法讲求。

三、《续桐阴论画》的点评

黄宗炎。罗继祖：晦木山水雅洁，然笔力弱，未臻苍老之境。

黄向坚。罗振玉：端木画苍老而不能疏秀。

崔子忠。罗继祖：道母真迹并不板滞，“南陈北崔”岂虚誉哉！

蓝瑛。罗继祖：田叔画以仿古者较佳，其本色之作习气重，几堕恶趣矣。

劳澂。罗继祖：在兹山水有极俊逸者，此取其工细之作，尚非的论。

朱彝尊。罗继祖：竹垞画不经见，此云“笔墨湿俗”，殆本不工画，不必入列。

叶欣。“画似甜熟家数，不足珍也”。罗继祖：此说未允。

王概。罗继祖：安节法半千，却未入室。

罗牧。罗振玉：饭牛拙于布局，不但近板。

李寅。罗继祖：东柯画不如颜桐客，然亦有工力。

赫颐。罗继祖：澹士山水虽师麓台，然去麓台尚远，由于笔力松弱，无浑朴之气也。有时法香光亦无似处，较诸唐静岩诸人尚逊一筹。

高凤翰。罗振玉：西园乃苍劲渊朴，与冬心同，但不如冬心之静耳，“狂譎”二字未当。

边寿民。罗继祖：苇间不仅工芦雁，花卉小品亦工妙，用墨尤精。

潘恭寿。罗继祖：莲巢画宗元人，与张夕庵皆卓然自拔于俗尚者。

张赐宁。罗继祖：桂岩虽有“魄力”，究嫌粗犷，特尚无习气耳。

张栋。罗继祖：玉川画非师麓台。

顾洛。西梅山水、人物、花卉均未到家，以“高手”推之，何耶？

青泥诗文补

孙海鹏

大连地处海隅，以山川秀丽著称于世。清末至民国，众多文士诗人寓居于此，或躲避战乱，或流连山水。其行止多系以诗文，又结社吟咏唱和，若金州益友社；大连嚶鸣、以文二诗社，诗人汇集，诗缘广结，佳句纷呈，影响远至辽沈、京津、海上诸地。然岁月更迭，当日诗文资料难于一见。余自庚辰岁始搜集相关诗文，得若干，皆不经见者，名之《青泥诗文补》。今刊于此，聊补乡邦文献之不足。乙酉初秋桂山孙海鹏记于石门山下小那罗延精舍。

魏燮均

《铁岭县志》：“魏燮均字子亨，号铁民。初居八里庄，移居红杏屯。咸丰间府学贡生。工书法，善古文诗词。家贫，负笈远游，多览名山大川，平生所得，见于讴歌。著有《九梅村诗集》，刑部侍郎铭安慨然出资为之付梓。时邑乘久未重修，百数年之文献凋零殆尽，独发愤与二三同志搜讨甚夥。残篇断帙，考乾嘉以前故事尚多因之。垂成，稿毁于火。青年以授徒为业，后游于公侯幕府，以舌耕终其身，然其善书能诗之名，邑人无不知者。”著《香雪斋笔记》《梦梅轩杂著》《荒史纪闻》《采遗集》《嗣响唐音集》。

燮均原名昌泰，因景仰板桥道人，故更名燮均。又字伯阳、公隐，亦号有梅居士，别号耕石老人，又号芷老农、芷翁，所居曰十砚斋。善写梅。尝题画梅句：“自从锄月种林家，谁向空山问年华。不受天心寒气动，越遭风雪越开花。”

咸丰元年为金州海防同知衙门书记。公余喜游览，到处多以诗记之。《题响水寺壁》：“前山狭且深，古木阴翳长。隐隐见寺垣，水近声更响。下马系树阴，徒步奋前往。当道阻湍濑，踏石水湿屐。草秽行荒径，摄衣穿树上。岩瀑骇人鸣，颇讶风涛荡。禅扉向山辟，洞口窥殿敞。中有泠泠泉，饮之清且爽。山僧引入池，水渚鱼可养。善哉慈悲心，放生脱罗网。嗟我堕红尘，有如儿在襁。惭愧衣未覆，烦恼发欺颡。安得拜山僧，度我离尘鞅。”《游大赫山胜水寺》：“风散禅堂磬，云生石鼎烟。路曲绕山足，石多踣马蹄。随云盘石磴，扶树到山门。坏塔立寒烟，残碑埋落叶。幽境忽险绝，断崖悬作棚。石危风欲落，殿压佛能擎。两膝顿无主，千年终不倾。山灵创奇格，太觉使人惊。”

宋庆

金州龙王庙有钓鱼台，甲午后宋庆尝立木碑，题云：“遥望金州疮痍满，倭贼杀戮勇三千。英灵永垂铭千古，龙岛南边埋骨白。光绪二十二年。宋庆立。”山东蓬莱阁中有宋氏草书虎字，作异体。

王志修

王志修《曲氏井》诗，闻于一时。张松石师有专文述之。顷于《庄河县志》得其《般若

洞钟楼石壁上题诗：“千岩佳处访仙家，到此休争一念差。只为游山屏冠盖，漫将出岫笑烟霞。洞深疑有巢云鹤，天小观如坐井蛙。似恐重来误刘阮，门前不复种桃花。”署云：“岫岩州王少庐志修光绪庚子题。”

朱铭盘

癸未夏，余自津沽得民国二十六年孟秋听涛轩重印四卷本《陈百生遗集》一册。百生名宝，江苏东台人。幼有才名，后入袁保恒幕，同治十三年授翰林院检讨，光绪四年病逝京师，年四十有二。百生诗崇尚平和，绝少险峻语。书前有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九日泰兴朱铭盘于金州之序。铭盘原字日新，改字俶傥，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三年自南京投吴长庆幕，八年举孝廉。赴京会试落榜，遂弃功名。光绪八年随长庆入朝，十年归国，退驻金州旅顺，时南通张謇亦在军中。曼君《寄肯堂》句：“旅顺所居屋，俯听大海波”。及长庆病逝，曼君遂离去。十四年重返旅顺。甲午前一年，卒于旅顺军中。年四十有一。著《四裔朝鲜长编》《两晋宋齐梁陈会要》。其泰兴旧居，有其父手植桂树一株，同治末其父卒，明年桂树亦枯萎而死，曼君名所居为桂之华轩，有《桂之华轩诗文集》。子肇经字权伯，为作《曼君先生纪年录》一卷，《桂之华轩诗文补遗》一卷，为序者乃金衡蕙、章太炎二名士。

余久觅曼君诗文集而不得。乙酉大暑，自海上归，蓬莱萧与权文立先生以《桂之华轩诗集》四卷相赠，闻乃以重值得于川中。余欣喜难耐，夤夜读之。录与连湾相关者。《答人问旅顺》：“君问南苏叹壮游，那知风物逼人愁。昼中海气晴翻雨，晡后腥风夏变秋。舟客仰鱼穿泪水，贾人挈妇出营州。管宁不值公孙度，谁识辽东有旧楼。”《显忠祠书壁》：“木底南苏远更疑，近思崇德驻兵时。一城碧血沙虫魄，二帅彤弓虎豹旗。废垒尚余崇正炮，哀丘惟阙显忠碑。当年全力防辽溟，追惜黄金塞漏卮。”《杂诗》之一：“南苏城外海如天，东出丸都路几千。早有辽东贤太守，龙城不入慕容燕。”《寄怀彦升二首》之一：“苦忆蓬莱共月明，冬同羹酒夏同冰。南苏城外天连海，季札碑前雪满滕。世上马牛遇庄叟，山中鸾鹤辨孙登。美游枉得江山助，四十归田尔独能。”曼君诗慷慨激昂，有燕赵壮士之声。善书，四体皆工，行书取法黄山谷，偶为画，文士游戏而已。多藏书，王佩诤《续补藏书纪事诗》：“小山轩筑桂之华，遗宅萧条有暮鸦。诗品溧阳平等阁，必传之作一名家。”曼君生平可见《清史稿·文苑传》。

张謇

南通状元张季直謇，号啬庵，别署季子。向以书名冠于天下，亦善诗。大魁天下前，入吴长庆幕，与泰兴朱铭盘，长庆子保初为至交。光绪十年，长庆率军驻金州旅顺，时謇亦从军驻金州。有《赠金州同知陈鹤洲士芸联句》：“平生回首信陵门曼君，于我渠渠夏屋存。刀

璧似闻求故器，风云徒悔信招魂。金州司马贤无对，曼君，盛府宾僚事莫论。天壤皋牢成弃物，炊粱翦韭意何温。曼君。”《金州述别连句》：“西风吹送幕庭寒，曼君，万里惊秋客袂单。辽海无因悲远戍，燕云有梦促征鞍。清笛一迸州门泪，邱履平心坦，苦酒难平壮士肝。出塞王师近乘胜，曼君，一时诸将自登坛。”其二：“平津宾客几人存，往事低回仆射恩。岂谓平生托簪履，履平，更烦涕泗到荃菰。凄凉丹旆横秋色，曼君，零落青袍惜故痕。杖策何如归隐好，迪维皇甫各山村履平。”履平姓邱，字心坦，军功出身，好吟咏，与季直、曼君多有唱和。民国十五年八月，季直卒。年七十有三。子孝若，为辑《张季子九录》。

范当世

通州范当世字无错，一字肯堂，号伯子，别署古瀛狂客。早岁客吴汝纶幕，光绪十七年入李鸿章幕，得合肥赞赏。能诗。有《闷极为诗寄曼君旅顺兼示晦若》：“泛览轩窗复几何，北风尘土日经过。未能低首三条烛，输却澄江一棹歌。幕府青山徒怅望，故人朱绂亦蹉跎。谁能拨动乘槎兴，回合沧溟万里波。”光绪三十一年，肯堂卒，年五十。有《范伯子先生全集》行世。肯堂与弟钟、铠同有文名，世称“通州三范”。女孝嫦，适义宁陈三立子衡恪，衡恪字师曾，工书善画，闻于一时。

张锡銮

复州境内有村名“快马张”，至今存焉，或与张今颇锡銮有渊源。锡銮字金波，一作今颇。钱塘人。二十岁即从军，光绪元年始，驻守辽东，凡四十年。戎马之余，亦喜吟咏。《暮春感赋》：“去住真无计，行吟又暮春。如何天上月，长照来归人。故国青山在，关河白发新。飞花应有眼，片片过西邻。”《舟泊德州尚会臣观察邀饮督粮道署临行感赋》：“墨波浓染指，醉写菊花看。仿佛东篱下，疏枝开未残。月来疑有影，霜后定能丹。何日如三径，滋培傍药栏。”其诗多关乎辽东之事，《甲辰复官东边道值日俄衅起所以志之》：“云津八载著闲身，歌啸曾容放逐臣。花月有情春梦寂，河山无恙战场新。两军戈马腾边塞，半壁安危仗比邻。垂老一官重问治，勉持中立卫斯民。”《甲午统军南进马上口占》：“轻寒恻恻入春衣，大纛南征莽鼓鼙。峻岭摩天盘健马，临风一笑万山低。”《自团防暮饮归营》：“薄饮村醪趁醉归，长河一带晚烟围。暮天风紧雪平野，匹马冲寒山欲飞。”诗极雄健。番禺叶恭绰尝有诗：“万口齐呼快马张，雅歌裘带拥壶觞。谁知楚汉兴亡际，帷幄机谋赖子房。”又云：“白山迤迤见旌旗，系颈降王事可师。定远已侯毛颖在，营平未老羽书驰。爱姬都了明驼愿，衰须无惭快马姿。读罢残篇更凝望，前朝玄菟几人知。”郑海藏尝述及今颇：“长身赭面，眉目耸异，三十年间，驰骋关外，捕贼却敌。崛起牧令，以历监司，其排难解纷，抑强扶弱，满蒙羌汉，望若神人。家人婢媪，举其名以止儿啼，此又一张辽矣。”民国十一年，今颇病逝。年七十

有九。故后，袁寒云挽云：“矍铄哉是翁，不遇真龙，空悲射虎；逍遥以容与，中年快马，老去骑驴。”有《张都护诗存》行世，晚岁集所著为《卷庵剩稿》。

陈曾寿

湖北陈曾寿字仁先，号苍虬。嘉庆状元陈沆曾孙。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寿精诗词，工书画，其山水清远超迈，元人气息甚浓，善画松，逸笔草草。与义宁陈三立、闽侯陈衍并称“海内三陈”。辛亥后，以遗老隐居西湖苏堤第一桥外小南湖，名所居为“陈庄”；家藏元人吴仲圭所作《苍虬图》，故名其所居为“苍虬阁”；又庭院中横卧太湖石一，两端上翘，状若如意，故又名“石如意斋”。一九三一年二月，曾寿携婿周君适自天津赴旅顺谒逊帝溥仪。旧王孙溥儒有《送苍虬侍郎出关》：“云满秦关路，风生辽水波。此行思赠策，弹铗莫空歌。赵客轻毛遂，荆人失卞和。音书应不达，奇计近如何？”君适善画，作《旅顺小楼图》，曾寿题《鹧鸪天》一阙：“横海青峰占小楼，邻家爆竹动离愁。一年客邸将除夜，万里沧波不系舟。黄石约，赤松游，古人志事等闲酬。衰慵不称风云事，破砚寒香独自修。”一九四九年八月，病故于上海，年七十有二。平生著述有《苍虬阁诗》《旧月簾词》二种。余于京肆尝见其家刊本《苍虬阁诗》十卷，惜值高未购归。

孙宝琦

钱塘孙宝琦字慕韩，谥让子。清末任山东巡抚，民国任外交总长，曾署国务总理。民国十六年与黄炎培、蔡廷幹同至大连。《丁卯孟秋之月中浣西园亭宴集待月不置》其一：“西园雅集乐今宵，伫月停云久寂寥。惟祝风驱浮翳静，冰轮一片照疏寮。”其二：“百年身世几时开，爱月情多比爱山。玉宇琼楼虚想象，蟾宫兔窟费跻攀。举杯岂让豪情减，索句应教俗虑删。知己天涯欣聚首，流连且莫唱阳关。”民国二十年病逝于上海，年六十有四。弟宝瑄，著有《忘山庐日记》。

杨钟羲

杨钟羲原名钟广，字子勤，号雪桥，又号圣遗居士，晚号南湖鲜民。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庚午九月朔，与田冈淮海、王季烈、徐宗浩、黄伟伯等人宴集连湾太白楼，雪桥有诗：“鹤语来何晚，龙蟠地有灵。酒痕重酿碧，山色四围青。润泽资群雅，根源在六经。欲求文轨合，更于访东溟。”民国二十九年卒，年七十有六。有《圣遗诗集》《雪桥诗话》。子懿涑字鉴资，号澹园，工书善画，能继家学。

涂稚衡

长沙涂景涛字稚衡，亦作子衡、茨衡，号卧知斋主人。光绪元年举人，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任桓仁县知事，创修莲沼书院，“栽培士子，颇费苦心”。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任金州厅

海防同知，二十五年奉派与俄人勘分划界，拒理力争，不辱使命。戊戌夏，题诗金州胜水寺壁上，中有“酒酣拔剑叹汪洋，长鲸未斩心忧惶”之语。八指头陀有《涂茨衡太守由奉省罢官还乡为庵男诗韵见怀次韵奉寄》二首，其一：“紫微山上碧湖庵，佳节同游三月三。集鲫已曾成妙语，听鸡且共佐清谈。喜闻彭泽官休早，不恋邯郸梦正酣。我为故人频礼佛，祝君多福更多男。”其二：“不将朱户易茆庵，谁识先生所贵三？早许雕龙成绝艺，还思扞鼠接新谈。有才身遁名难晦，无酒诗成兴亦酣。还忆老怀应自慰，盈阶瑞草并宜男。”又《丁亥三日陈伯严涂稚衡褙集碧湖》：“夭夭桃始华，融融日初丽。碧湖风日佳，衣辰肯虚逝？轩盖纷如云，言修会春禊。春林恣幽讨，孤亭喜新制。湘流环前汀，岳色隐云际。广筵列希榻，芳尊袭兰蕙。时鸟宣法音，微言契真谛。既惬少长情，缅怀永和世。古今若转丸，风流复谁继。”按陈三立于湘中结碧湖诗社，涂稚衡与八指头陀皆社中股肱。稚衡有《观吴夫人舞剑歌》：“吴人有妇字莫邪，金容火色光丹蛇。投之爪发成灵宝，敬从夫子进官家。香云夫人亦吴女，行神如龙气如虎。相士当时数将家，北山会见即心许。两心相应奏同心，美人名士本知音。旌信由来如白水，感诚何至须黄金。岂但修容并修德，南威西子无颜色。清虚忽下月中仙，人间可望不可即。我从吴子见如君，神通绝大真天人。宝气彩悬三尺水，阳文光被十方尘。步光流彩各神异，往来向背还向刺。阶下如观大将坛，庭前云是天女戏。髻垂堕马手不龟，古来妙手今见之。年来少作开口笑，观斯喜步少陵诗。”乃观北山楼主吴保初妾香云舞剑之作。其《漱盂铭》云：“慎旃慎旃，毋多尔口，惟口滋疾，物汗口，犹可漱也；口汗人，不可救也。”极有意趣。

涂氏精楷书，惜墨迹流传不广。尝于千山题“仙人台”三字，至今存焉。有《涂稚衡集》行世。

胡嗣瑗

胡嗣瑗字晴初，亦字琴初，号愔仲。贵州开阳人。同治七年生。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内阁中丞。长于诗词，有书名。辛亥后追随逊帝溥仪，至天津、旅顺。入伪满洲国，充参议。《舟抵大连》：“扬帆飘渺别蓬莱，故国三山宿雾开。万点晴鸥不相识，海风鬣面我来归。”亦工于词。

高树

“金州人士秀且文，王郎兄弟皆轶群。延平一剑化龙书，干将孤举摩风云。”此蜀中高树赠金州王永江永潮兄弟句也。树字蔚然，别署珠岩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奉天知府，善书，年七十余，尚能作蝇头小楷。有《珠岩山人三种》《鵝原集》。

张元奇

吴青云《大连历代诗选注》有张元奇《由瓦房店至复州》，注清人，余未详。案元奇字贞午，又字君常，号董斋，别署知稼轩主人。福建侯官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监察御史，弹劾贝子载振，一时有“强项令”之誉。后入湘任岳州知府，光绪丁未入辽任锦州知府，皆有诗记行。宣统二年董斋寓居连湾。民国三年，出任奉天巡按使。董斋长于五古，纵横跌宕，有东坡遗韵。晚岁寓居于京，以吟咏为乐，约民国甲子之前卒。年近八十。生前手定《知稼轩集》。福建陈石遗为序。

早岁有书贾售《知稼轩集·辽东诗》，惜未得。甲申大暑，自大连图书馆觅得民国二年福建石印本《知稼轩诗》一册，分作兰台、洞庭、辽东、翰林四集。其《辽东集》有《读报纸安重根末日记书后》：“博浪有副车，秦宫有匕首。刺客多蹉跎，安氏子不朽。”沉郁雄健，压卷之作也。《解任赴大连湾养痾述怀》：“一官即我家，久与民事习。辽民固易治，世变乃日急。武汉启兵端，如火不自戢。版宇亦云大，崩裂直呼吸。辽居东海滨，鞭腹岂遽及。矧界两强间，尤惧开门揖。军心固如山，能使刀口执。省门秘深严，威信慑旁邑。保安诚已安，蠕动一齐蛰。嗟我赋性迂，临事惭补葺。谬承邦人推，老马苦维繫保安会成立各界公举余为内政部长。衰病日见侵，私忧但哽噎。大的悬国门，行看众矢集。群公且駸駸，我病实岌岌。诗卷与药炉，海壖好响湿。言辞神武归，便算玉关人。”有宋人意韵。《雪后携瀚才孙观电气公园》：“不知何者为吾土，乞得闲身到此间。雪后园林足萧散，病中愁绪若回环。一孙如杖能扶我，半日出门先得山。十数年来欠消受，固应猿鹤笑痴顽园中多畜猿鹤。”《廿八夜又雪枕上感作》：“燕台惯就玉玲珑，沈水年年舞朔风。孤枕沈吟云海夜，半生流转雪天中。身抛官爵忘残腊，梦逐征鸿入远空。自向寒边拓世界，酌斟为德睡为功。”《夜坐》：“海气吹寒直到门，残宵炉火与留温。过街市语偏难晓，震屋歌声不厌喧。再造合成新世界，孤思长荡古精魂。天昏月黑邻鸡警，坐觉灯前万象奔。”董斋与张今颇亦有唱和。《寄张今颇》：“据鞍再出尚苍颜，兵气全销娘子关。劫去疮痍人望岁，军前笳吹气如山。共匡世难群才出，独倚天门老泪潸。雨笠烟蓑吾欲老，海波占得片鸥闲。”

董斋能书，《知稼轩诗》乃其手题。居连时，亦有索书者，《连日为人作书尽数十纸》其一：“肥瘦区区较丑妍，临摹多事乞人怜。平生不耐元和脚，醉后欹斜欲自贤。”其二：“心折坡公守骏言，朝来砚水已全浑。缣金论值如相许，便合傭书榜此门。”《知稼轩诗》自序云：“此后如能抽身引退，当求吾所好，以诗人终矣。”张氏后人亦多才俊，东瀛棋圣吴清源乃其外孙。

王晋卿

“忽报雄关坼，羈臣泪满腮。烟轮东海沸，铁鑰北门开。数载经营力，中兴将帅才。如

何垂手失，烽火徹光莱。”此新城王树枏《十月十七日闻旅顺失守》诗也。树枏字晋卿，号陶庐，晚号绵山老牧。所居曰文莫室。咸丰元年生。二十四岁举孝廉。光绪十二年进士。后署新疆布政使。精于史地之学，纂有《新疆图志》。辛亥后，入清史馆，任总纂。民国十年与上虞罗雪堂主持敦煌经籍辑存会。十九年主讲于奉天萃升书院，从学者甚众。二十五年卒于北平。年八十有五。有《陶庐丛刊》。

周馥父子

壬午，旅顺发现明将黄龙墓残碑，乃清末周馥、刘含芳驻守旅顺时所立。至德周馥，名玉成，字玉山，别字玉溪。本名复，因李合肥误将保奖单中“复”书作“馥”入呈，故更名为馥。入合肥幕协办洋务三十余年，凡北洋水师，开平煤矿，唐胥铁路，无不参与谋划。合肥故后，署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两广总督致仕。民国十年卒，年八十有四。谥愬慎。有《周愬慎公集》。

玉山能诗。《随北洋大臣阅海军归途成六律》其一：“我自茹荼苦，人思食蜆甘大连湾本名大蜆湾。彻桑当雨未，求艾恰年三。势已龙头踞，威防虎视耽。长城新壁垒，几度路曾谖大连湾布置防务，余曾参议其事，惟恨工未全备耳。”馥与芑林刘含芳同守烟旅北洋重地，交往至厚，芑林以女许与馥子学熙为妻。《湖上对酒寄刘芑林观察》：“将进酒，杯莫停。桃花满地梅青青。春风一去谁能挽，夸父追日徒伶俜。日光西落犹再晓，白发還元古来少。对花不饮空叹嗟，相看不若花前鸟。风涛漫天瘴不开，长蛟食人骨累累。我无斩蛟三尺剑，坐听隳突声如雷。年年客到收帆好，我道收帆不如早。楚州城西水如毂，淮南米贱酒初熟。春风待尔到秋风，莫到雪霜满岩谷。”小注云：“芑林接此诗即告归。”芑林逝，玉山有《哭刘芑林观察》：“天勒功名复勒年，苍苍何意毓英贤。横流沧海将谁挽，潦倒风尘各自怜。心血尚存戎政牍，宦囊都付义庄田。伤心三十年来事，翘首辽天一惘然。”

玉山又有《李蠡纯检讨讯旅顺风景占此答之》，其一：“北斡西分渡海山，飞轮遥指白云间。朝宗万派瀛寰水，此是神京第一关。”其二：“四山雾起知风发，九月云阴见飞雪。共道今年天气暖，征人三伏著春衣。”其三：“军容如火照瀛洲，白发元戎十载谋。蛟鳄爪牙应自敛，雷霆终古护神州。”

子学熙字缉之，号止庵，晚号松雪居士，砚耕老人。光绪十九年举人。后署天津道，补长芦盐运使。入民国，任财政总长，倡导实业，于天津、青岛诸地开办华新纱厂。民国二十七年抵连湾。越明年，赴青岛。晚年隐居于京，以吟咏为乐事。民国三十六年卒于京，年八十有二。女淑贞撰《周止庵先生别传》。

余家藏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初吉至德周氏藏版所印行《止庵诗存》二册与《止庵诗外集》

一册，海盐张元济作序，有止庵自序一通。题端者乃竹溪沈尹默。《外集》皆学熙师古堂课作。今录其关于大连诸作于右。《重阳大连作》：“十年孤剑江尘老，九日清樽白发新。对菊却怀忘世客，插茱方觉忆家人。心萦戏马千秋感，梦断啼猿万里身。几緉青鞵吾愿足，不妨海外作遗民。”《咏牛》：“难从物外起田园，聊幸清时长子孙。卖剑家家还买犊，桃林处处是桃源。”小注云：“大连舍右有桃林庄、桃源台两地名。”《大连老虎滩即景》：“数椽聊借虎滩头，门掩松阴曲径幽。野市偏悬沽酒旆，村童惯习弄潮舟。天连水远浮仙岛，雨散云开见蜃楼。寄语缁尘名利客，何如物外得清游。”《参观傅笠渔青年会学校》：“安定遗规世鲜宗，何期今日见高风。百年尘劫归辽鹤，万里烟雨付冥鸿。周室菁峨开治谱，汉家草泽屈英雄。佇看海宇澄清业，尽在先生杖履中。”《喜晤李董隐同年赠诗奉和原韵》：“联臂簪花日，惊心已卅年。清风怀海上，旧雨聚樽前。高卧云封屋，营生果代田。商山今再见，未让采芝贤。”《题王岷源字幅为慎亭》：“一日班荆成永诀，数行珠玉见平生。他年化鹤归来日，华表山头看海潮。”《九月中由大连至旅顺沿途满山红栢青松炫烂可爱》：“海濞延秋逸兴酣，林峦秀色扑征骖。此中合着诗人未，红树青山忆剑南。”诸诗当作于民国乙丑丙寅间。民国癸亥乙丑丁卯，学熙三度闲居大连，寓居光风台。于桔梗町购地建屋；于革镇堡购山场，备百年后用。遍游旅顺、响水寺、老虎滩诸地，与傅笠渔、邵慎亭、李义田诸人交游甚欢。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建德周止盒学熙，为玉山老人之季子。人但称其精于理财，而不知诗诣之深，亦远迈并时流辈。比岁谢去尘务，相羊山水，青鞋布笠，大有少伯泛湖之风，卜筑大连光风台下，屋小如舟，高旷可想。今春与余有海上观樱之约，余寄诗柬之，有‘避世光风锄菊径，传家秋浦爱莲图。青山咫尺劳招隐，迟我花期手一壶’之句，君悬之山斋中，把臂入林，信有夙契。”光风台即今光风街。又云：“止盒诗不轻示人，闻所至以《剑南集》自随，且为精钞本，寝馈既深，自然闲适。潜夫录示其《题邵慎亭册子》一律云：‘浮生已是再眠蚕，俯仰乾坤入梦酣。风卷落花红片片，雨沾新柳碧毵毵。蔬斋一钵忘兼味，茅屋三间当住庵。何日得寻云水去，芒鞋竹杖遍江南。’亦近作也。”此诗《止庵诗存》不载。

咏左宝贵诗

复州清真寺悬左宝贵书“亘古清真”四字匾。宝贵字冠廷。山东费县人。回族。光绪十九年巡视复州防务。甲午之战，守平壤玄武门，中炮而亡。谥忠壮。莱阳王爵生侍郎埈为作《左侍郎宝贵墓志铭》并书丹。钱塘张今颇锡銮有《甲午中秋前一日左冠廷军门战歿平壤》诗吊之：“屹屹孤城独守难，祖邦西望客军单。大同江上中秋月，长照英雄白骨寒。”

康有为

民国十四年八月，康有为应李子明之邀至连湾，举办书法展览。旋赴金州祭孔，游响水

观。壁间题诗：“金州城外百果美，瑶琴洞内三里深。尚记唐王曾驻蹕，犹留遗殿可幽寻。”今存响水观北院东壁上。南海至大连，相迎者金州张文海。时金州文士若孙宝田、车成桂、刘占鳌辈皆得谒南海。

李经芳

李经芳字伯行，一作伯型，又字端甫。髫龄即随朱静山习英文。举孝廉后，遂跟随合肥襄办外交事宜，精通洋务，驰骋清末外交二十余年，毁誉参半。辛亥后，寓居海上，入宗社党。民国六年，参与张勋复辟，败后蛰居连湾，流连山川景色，挥毫吟诗，不问政事，闭门读《易》自晦。

能诗。《游旅顺》：“沧桑几度说前因，山海依然气象新。自古若无兴废事，辽东今日尚辽人。”《将自大连移居津沽》：“呼童竟日趣行装，一度迁移一度忙。弱女牵衣含笑问，痴憨犹认是还乡。”末句尤可玩味。伯行善书。尝见其行草，字大如拳，腾挪恣肆。隶书高古方正，工稳有余。民国二十三年九月病故于连湾。年七十有九。越明年，葬于上海虹桥公墓。义宁陈三立为撰墓志铭。子国焘、国熙、国杰。女国香字道清。适常熟杨云史圻。善词。有《饮露词》。

伯行弟经迈字季高，历任江浙豫三地按察使。辛亥后，与兄同居海上。民国二十七年病故。合肥侄经羲字仲仙，与赵尔巽、严范孙、徐世昌并称“嵩山四友”。亦参与张勋复辟，败后归隐海上。李氏一门，皆以诗书名。肆坊间偶见李氏诸子书，索价极昂，罕有能购之者。

阎献廷

金州阎献廷字宝琛，光绪甲午科举人，参与公车上书。有文名，重气节。诗流传颇少，尝有《奉和岷源先生》：“当年羊叔游行地，今古流传说岷碑。今日同君一临眺，龙山千载系人思。”金州响水观院内有碑一通，乃献廷撰文，孙人镜书丹，述响水观重修经过。今录其文于右。“金州城东十里响水观不知创自何时。四围山色，磊落嶙峋，中有一带清流，涓涓自洞中出，奔腾倾注，挂壁飞泉，骤听之如谡谡松涛，潇潇夜雨，因其水声喷薄，漱玉敲金，故名响水云。相传李唐时有古刹一间，中祀后土女娲观音之神。清乾隆元年重修大殿三楹，客堂三间，山门一座。四隅洞开，诸峰罗列，诚胜地也。迄今二百余年，丹青剥落，梁栋朽摧。住持道不忍观斯庙之倾圮，几度募化而善缘难结，三载未成。辛酉春，大连诸善士来游此地，览泉石之清幽，挹山川之秀爽，乃大宏善念助捐资。而城中本会诸檀越更复竭力捐输，集成鉅款，于是庙宇重修，亭台点缀，山门水径焕然一新。从此，天地启秘，山水效灵，仿之天竺诸峰，庐山瀑布，未遑多让。后有诗客游人登览胜境，睹山容之壮阔，听水声之潺湲，庙貌巍峨，台岑掩映，思捐助诸君子之功德不置，吾因之有感矣。沧桑屡变，岁月递更，前

乎此者，吾不知起于何年；后乎此者，吾不知始于何代。千秋而万岁兮，吾知乾坤不老，山水长新，乐善好施之君子继续兴修此观，将与同终古也。谨将善士芳名开列于后，敬勒贞珉，永垂不朽。有清甲午科举人阎宝琛撰文。有清秀贡孙人镜法名义真书丹。”碑乃民国十三年所立。孙氏端楷正书，书风端庄醇秀，不着点星火气，极为雅致。昔年张松石师为余书献廷句“董狐已逝温公邈，回首沧桑百感生。”原诗题作《连湾车行遇雨作》：“乘兴轻车载雨行，连滨缥缈接蓬瀛。愿将一邑留真录，岂为千秋博盛名。人物至今谁健在，山川终古是多情。董狐已逝温公邈，回首沧桑百感生。”献廷作此诗时，与邑人郑心源经日人岩间德也介绍，自金州赴大连满铁图书馆查阅金州隋汝龄《辽海志略》稿，故有此作。松石师云，每诵此诗，辄感慨系之。

成多禄

吉林成多禄字竹山，一作竹珊，号澹堪。所居曰榆庐、小游仙山馆，迁居北京后名所居曰澹园、旧雨轩、十三古槐馆。祖居山西，清初迁往乌拉。汉军正黄旗。光绪十一年拔贡。后入依克唐阿、程德全幕。辛亥后隐居乡里。晚岁寓居京华，结交当世名士，唱和吟咏。早有书名，与莱阳王垆、大兴冯恕、茶陵谭氏昆仲齐名。与宋小濂、徐鼐霖并称“吉林三贤”。善诗，尤精律诗。《和铁隍赴旅顺有感之作二首》，其一：“一别金州雪满身，河山破碎岂无因。幽怀未免鹃思蜀，往事空谈鹿逐秦。愁对樱花搔短发，强浮竹叶醉余春。尊前一样沧桑感，独倚东风忆远人。”其二：“老我飘然物外身，闭关渐了六尘因。丹黄文字评迂固，翠墨碑铭拓汉秦。随意养花三月雨，及时行乐四山春。惟余一事难抛却，浅草骑驴觅句人。”铁隍，沈水谈国桓字也。此诗堪称澹堪七律压卷之作。《戊辰四月二十九日留饮李东园斋》，其一：“初日上岵嶢，人来瓦子窑。疏篱清入画，石路远通桥。陇麦青犹润，山云白未消。知君陵下住，心迹异渔樵。”其二：“久喜故人约，来登君子堂。妇贤宜饌美，世乱觉醅香。丹鼎余鸡犬，妖氛避虎狼。闲来斲山骨，宝篆重琳琅。”其三：“琴书金石外，风味似田家。栗里朝锄豆，於陵夜绩麻。饭香烧径叶，人语落山花。笑彼尘山客，栖栖诵法华。”其四：“辛苦趋行在，麻鞋去复回。可怜天宝后，又见杜陵来。沾上十年梦，辽东三老才。生平多抑郁，把酒一颜开。”诗淡而意永，为集中所不载。民国十七年十月，澹堪病逝于吉林老宅。年六十有六。著《澹堪诗草》。

郑孝胥

海藏楼主郑孝胥字太夷，一字苏戡，号海藏，所居曰夜起庵、柳下居。辛巳岁秋，余得见所书四尺条幅一件，民国装裱，字大如拳，笔力极遒劲爽利，云：“泱泱渤海意如何？腾碧翻金眼底过。出世只应亲日月，浮生从此藐山河。南归不用怀吾土，东去谁能挽逝波。爱

煞滔天露孤岛，弃船聊欲上嵯峨。”款署“孝胥”，下钤“郑印孝胥”与“太夷”二方印。海藏以文章书画闻于海内，诗名尤著，有“射雕手”之誉，然晚节不保，人以为虽阮圆海亦高其一筹，皆不齿之。海藏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有诗：“寥寥诗卷寄平生，惭愧才人意尽倾。已逼晚年成定论，那堪低唱换浮名。弥天纵有逢辰恨，倒海难为变徵声。谁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笔掣长鲸。”其二：“绝胜张园二十年，消磨人物作云烟。繁华事散空余恨，儿女情移莫问天。词客有才应赋此，老夫无梦亦凄然。后村秬至清真丽，为汝伤怀到酒边。”

民国二十年十月，携子郑垂随溥仪渡海至营口，旋至旅顺。年底购宅大连文化台，因在岩谷之间，故名“遐谷”，有诗：“云峰山中白驹谷，中岳先生吟不足。此山近市绝市尘，谁抱遐心止山麓。谷口微通斜入海，海势弯环山起伏。静中日月任窥窗，岁暮烟云欲遮屋。子真道昭虽往矣，一叟狂歌独来复。辽东避世多名士，只有幼安可追逐。真人已出犹龙潜，反掌乾坤见新局。岂知投老归何所，梦想旧京倚乔木。结邻莫厌暂婆娑，自顾未甘弃沟渫。”暇时游览连湾风光，有诗纪事，《星浦》：“何年奔星坠天阙，长扼惊涛作飞雪。我来踏星欲浮海，星不能飞海难越。家山只隔海一涯，廿年国破空思家。国人望如如望岁，临海怅惘还长嗟。楼中候潮日再至，潮声动天破吾寐。桑田沧海眼中人，袖手沉吟待天意。”“谁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笔掣长鲸；反掌乾坤见新局；自顾未甘弃沟渫”云云，理固然矣，其奈跌于伪政府中何？邓粪翁尝有诗论太夷书：“将军舞罢孺吹笙，又向词坛问老兵。数尽摹碑南北手，几人簪笔小公卿。”注云：“郑太夷书出颜入苏，苍郁雄健，有鹰隼盘空之妙，晚参北碑，尤得拙朴之旨，真当世大手笔矣。”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病逝于长春，年七十有八。著《海藏楼诗》。

孝胥弟名孝桎字稚辛，精于诗。能书。海藏事伪满，荐稚辛参其事，屡征不应。孝胥二子，长曰垂，次曰禹，皆能书，书风一如其父。禹有女，名挥，自幼受海藏训导，尽览家藏金石书画，善山水。

段祺瑞

合肥段祺瑞，民国梟雄，政余好手谈，自比曾文正。民国十六年蛰居连湾，有《旅大游》诗：“重来四十年，不禁悲与伤。子徵镇金州，芟林旅顺王当时有此语。鲁卿继其后，毅军屯其傍。甲午一战后，相率去不遑。旅大俄所租，专横恃力强。比邻偏斗狠，促促走彷徨。不及十年间，几度荆棘场。白骨冢如山，表彰有一坊。当时豪杰士，已尽还北印。荣华浮云去，大梦若高粱。”

王揖唐

合肥王揖唐又作逸塘，所居曰今传是楼。光绪进士。入民国，屡任要职。任汪伪政府考

试院院长，为人所不齿。光复后入狱，被枪决。民国十六年寓居连湾，有诗纪事。《辽东杂咏》：“尘襟乍涤倦怀开，信宿淹留仅快哉。海上石礁莫相笑，此行不为买山来。”小注云：“黑石礁为星浦海滨名胜。诸寓公多置别庄于附近处。”好游览，每纪以诗。《星浦观月》其一：“小园秋气夜沉沉，一片清光万古心。藤榻斜支星斗近，漫天风露噪虫吟。”其二：“月明海静助吟思，不觉推敲夜漏迟。如此清光如此水，逡巡欲去又多时。”《海滨看月怀人》：“今年海滨幸三至，万松深处无俗意。东山恣赏更西山，寻诗每爱观音寺。杨子诗清胜妙文，久耽禅悦证声闻。月明夜静潮音好，愿借天风持赠君。”时止庵周学熙亦避居连湾光风台，揖唐有《送秋浦周止庵还光风寓庐》：“万顷烟波访钓徒，白云天外任人呼。早师管子筹煎海，晚似陶公喜泛湖。避世光风锄菊径，传家秋浦爱莲图。青山咫尺劳招隐，迟我花期手一壶。”揖唐有《今传是楼诗》。所著《今传是楼诗话》，闻名一时。

吴恩培

吴恩培字冠一，又作灌依。沈阳人。与袁金铠为儿女亲家。实业起家，能诗。有《大连海港》：“廿载经营力，洋洋具大观。风随涛怒吼，云集客相安。玉垒成今昔，金瓯抱残缺。苍茫独立处，心事诉狂澜。”《老虎滩》：“是甚风飘堕，来游老虎滩。山深绝纤垢，涛怒撼危栏。海色连天碧，霞光射壁丹。此中成世外，垂钓羨鱼竿。”

刘大同

诸城刘建封名石荪，字桐阶，号芝叟，别署疯道人、芝里老人、天池钓叟。倡导大同，遂以为名，本名弃不用。光绪二十年任奉天候补知县十二年，渐有政声，三十四年奉徐世昌命勘测奉吉两省界及长白山三江之源，历时四月，成《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及《长白山灵迹全影》。宣统元年，任吉林安图知事，辛亥宣布独立，建立大同共和国，遭赵尔巽镇压，遂率部避于千山。民国二年，于大连成立平民社，讨袁起义。翌年春，大同遭北洋政府通缉，举家避祸于连湾，七月为日人所驱。三年初，陈其美自日本神户密抵大连，晤刘大同，商讨起兵之事。在连期间，大同有诗数首，今撮其可述者如右。《思亲》小序云：“癸丑夏四月，全家老幼逃于连市。秋七月，因事泄被人逐赴江户。倏忽二载余矣，身不得归，亲不得侍，故感而赋此。”诗云：“老母频年病，远游子泪垂。祇因除虎政，不得尽乌私。侍药药谁侍，思儿儿倍思。中原平定日，解甲舞莱衣。”《寄内》：“吾母赖卿侍，卿劳吾亦知。两行儿女泪，万里梦魂驰。家室亡何日，恩仇报有期。嘱磨刀剪利，为我作征旗。”《连埠被逐致日署福岛大内两君》：“报国还图尺寸功，纵然被逐亦英雄。又身漂泊如蓬转，任尔东西南北风。”《癸丑连湾被逐有感》：“连湾又起不平波，亡命穷途可奈何。世少李斯谏逐客，谁容张俭破全家。东西南北悲蓬转，春夏秋冬惹梦多。老母病中犹

嘱我，嘱儿莫忘大风歌。”《过辽东》：“壮游人渐老，不老有雄心。海内皆兄弟，辽东作主人。天荒自可破，世界不常陈。握别一樽酒，风花沿路所。”《连埠被逐感作》：“当年事业成陈迹，愧我于今亡命来。老母不知儿被逐，病中犹问几时回。”民国三年石磊、刘敢等人就义于复州，大同有诗记其事，“烈烈丈夫二十四，天教辽水血红时。风号雨泣复州塔，来吊忠魂知未知。”其《梅花吟》第十三首：“新月出东山，不觉春风冷。把酒自吟余，推窗看梅影。”小注云：“纪元三年居东闻石巨甫、刘耀忱、白耀宸相继引渡，殉国于复州，悲而赋此。”大同诗戛戛独造，多铿锵悲怆之语。

善书，四体皆精，尤能左书，有乡人高凤翰遗风，尝集其先人刘子羽、刘石庵及其本人书作刊行《诸城三刘合璧》，章太炎为题端，景梅九跋。亦善画，梅花尤佳，直取宋元笔意，每写梅，必题诗于其上，相得益彰，所作梅诗即多，成《梅花吟》一册，中多佳句。亦精古玉鉴赏，著《古玉辨》，近年有重印者；好藏砚，著《砚乘》；好储古泉，著《古今名泉影》。一九五二年七月卒于济南，年八十有八。

宋小濂

吉林宋小濂字铁梅，一字友梅，晚号止园。筹边二十余年，为捍卫我东北边疆国土与沙俄谈判近二百余次，屡挫俄人。与成多禄、徐鼎霖并称为“吉林三贤”。

能诗。《寿张今颇上将军八十生辰》其一：“卅年旧绩在辽东，妇孺知名仰德风。跃马横戈销敌焰，当筵击钵擅诗雄。精神潞国文丞相，贵寿汾阳郭令公。笑看堂前老莱子，斑斓舞彩拜而翁。”其二：“早识人间有凤麟，一时耆宿望天民。当年号我为三硬，今日欣公庆八旬。过眼浮云看富贵，息心得地远风尘。自惭将退仍难退，可许樽前去问津。”“三硬”者，张今颇谓铁梅“作硬诗；写硬字；行硬事”，故铁梅亦自号“三硬先生”。

民国十一年，小濂应南满州铁道会社长早川千吉郎之邀赴大连游赏，同行者辽阳袁金铠。有诗纪事，《长春之大连道中》：“旷望平原旷望秋，年来无此快心游。嘉禾满地香风起，一路行行听野讴。”《山行》：“才过千山又万山，万山深处路湾环。巉岩历尽开平路，天海茫茫接大连。”《星浦游筵即席有作》其一：“缥缈仙山不可望，天风浪浪海茫茫。且从星浦寻源入，何处蓬瀛水一方。”其二：“太古何年陨大星，至今历历在沧溟。酒酣自棹扁舟访，补入东荒山海经。”《游旅顺鸡冠山观俄罗斯废战垒》：“此处从来战迹多，是非成败竟如何？世人莫漫矜天险，骇浪惊涛付逝波。”小濂诗极瘦硬，戛戛独造，张今颇硬诗之评确然。民国十五年春卒于京，年六十有七。有《边声集》《东道集》《晚学斋诗草》。

梁启超

于肆间偶见梁启超楷书联，摹其字形，而神彩全无，的伪无疑。任公书端庄肃穆，间以

北魏之峻峭，为一时所重。任公至连湾，有诗。《舟抵大连望旅顺》：“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醉抚危舷望灯火，高风狼藉暮潮哀。”《自大连夜乘车至奉天》：“濛濛印沙月死，瑟瑟摇风草黄。一夜似梦非梦，眼前千里战场。”《自奉天赴大连道中》：“穷秋朔雪动征骖，知为美游为恶归。时人颇惊辽鹤返，长路终羞宋鷁飞。水赤磨刀判伤手，月明绕树怨无枝。横流满地见龙穴，欲障泥丸力恐微。”

吴保初

庐江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所居曰北山楼。父长庆，光绪初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光绪八年，率兵靖朝鲜之乱，十年移师驻屯金州，寝疾，旋卒。谥武壮。是年保初十六，渡海省视，割臂肉和药以疗父疾，孝声著甚。少有文名，结交海内文士，诗酒风流。光绪十年居金州，有《得袁蔚廷书述韩京战事》：“历历朝鲜事，防边岁又终。烽烟悬独戍，蛮触更争雄。辽海曾传箭，天山且挂弓。英英都护在，魏绛已和戎。”蔚廷乃项城袁世凯字。民国二年二月卒于上海，年四十有五。著《北山楼集》，南通张謇题端。故后，弟子陈诗为刊《北山楼续集》。长女弱男，亦能诗，适长沙章士钊。

林心裁

林心裁名培基，别署酸叟，又作珊叟。山东牟平人。民国间至连，与杨成能友善，任宗风社副社长。入嚶鸣诗社，日与李义田、傅笠渔、黄越川、黄伟伯、陈尘隐唱和。能诗。《壬戌伏日游响水寺》：“一到朝阳寺，车停慰我情。忽听野叟语，须作后山行。路曲蝉鸣乱，天空鸟语清。禅关逢眼底，门外水声声。”民国十七年春病逝于连，年五十有六。胡子晋《挽林心裁》云：“初春曾哭柳洲翁，春尚淹留又哭公。一袭遗衣呈惨绿，半床令稿付残红。酒筹欢笑成今昔，粒豆艰难感异同。五十六龄今止此，愁云低绕福山东。”

金毓黻

近世治东北史者，辽阳金毓黻为巨擘。毓黻字谨庵，又字静庵，号千华山民。所居曰静晤室。辑《辽海丛书》，开东北史研究先河。民国十六年九月至连，有诗数首。《赴大连车中》：“客路浑忘气候更，秋风吹送不胜情。入窗碧色连青嶂，隔岸浮光动远城。林影参差村舍暝，人家历乱夕阳明。依稀华表千年鹤，来证丁令旧日盟。”《大连街头即景》：“半岛风光接碧天，浪花冲破海门烟。苍茫万顷迷秦史，仿佛三山遇汉贤。堤畔英雄谁驻马，尊前估客几停船。从知观海难为水，一著轮争祖逊先。”《大连杂诗》：“经年客梦温星浦，一枕潮声落虎滩。绝代佳人空谷远，南山虽好不胜寒。南浔刘澄如先生锦藻来隐于此，构屋于南山麓，欲往访不果。”“管王避地总名流，窃国无诛罪窃钩。到处路旁劳指点，贵人今日尽高楼。今年

海内显宦多避地于此，新筑楼栋相接，皆其居也。”“磨墨三升洒素笺，汉碑晋帖互争研，一联珍重鸡林贾，从此江山不值钱。各旅店多挂寓公所书联幅，争相矜耀。”“万轴牙签插架高，礼求于野此称豪。松崎一老真无敌，九市神游驾六鳌。大连满铁图画馆收藏中籍。皆馆员松崎鹤雄一人之力。”静庵旅连，与连湾名士多有唱和，其《赠杨橐吾》：“薄游连湾，饱看山海，既承指引，复饫郁香。回味莼羹，甘犹在舌，赋此为谢，兼志离怀。皋比沈水尊中立，书画连湾重少师。士有轶才偏负俗，世无真赏岂疗饥。栖皇尼父居夷日，萧瑟兰成去国时。十载故人逢异地，细凭尊酒话相思。”一九六二年八月病逝于北京，年七十有六。著《东北通史》《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静晤室日记》《千华诗稿》，辑《辽东文献微略》《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辽陵石刻集录》。

傅立鱼

安徽傅立鱼字德新，号西河，别署读秋山房主人，又署西河渔父。民国二年自天津至连，入日人金子雪斋《泰东日报》社，任编辑长。后筹建大连中华青年会，任会长。西河善诗。《大晦日与赵舜如游菱角湾》：“人事纷如此，无端岁又终。携朋访岩壑，忧国祷苍穹。水静冰如镜，山弯谷似弓。登高望辽海，游转夕阳红。”《初春即事》：“底事辽东春到迟，东风二月始来吹。闲搜菜种播南圃，为护花圃补北篱。逐暖游山携稚子，抒诚念佛学沙弥。一年好景从今起，行乐吾侪要及时。”民国十一年冬，筑新室，地近老虎滩，有诗：“尘缨解脱此优游，辽左风光一望收。得失忘忧心荡荡，澄清无策思悠悠。室能容膝何嫌陋，花解宜人不得秋。明日与君共樽酒，万松山畔数诗筹。”民国十五年，为日人驱逐离连。民国三十四年病逝于天津，年六十有三。遗文散见于《新文化》《青年翼》《东北文化月报》《泰东日报》中。

黄炎培

川沙黄炎培字楚南，改字韧之，又作任之，号抱一，亦号观我生。民国十六年五月与妻王纠思寓居连湾。有诗纪事。《星浦感旧》：“为寻皂帽辽东隐，早谢缁衣洛下淹。定坐忽惊身是客，劳生始笑突无黔。十年宿草才余艳，万古昆冈火自炎。惨惨山花红欲醉，海潮音里读楞严。”《丁卯避居大连中日吟朋颇多投赠临别感赋即呈浩然诗社诸公教正》云：“天生万物皆吾舆，论交四海恨犹窄。问客无好惟好游，七万里程接几席。謁来渤海一舸闲，挂书牛角行看山。相逢谈笑樽酒外，百日文宇时往还。方今交道成灰烬，朝结金兰暮白刃。家国汹汹貉一丘，覆雨翻云焉取信。君不见星浦潮南山月，潮信分明夕与朝，月光不改圆和缺。吾徒怀此向谁说，各抱孤云自怡悦。”《星浦中秋望月》其一：“海水砰訇夜乐张，山云滃

滄幕无光。靓妆儿女齐看月，隔着笼纱十幅长。”其二：“乍明忽堕震云深，愁绝孤阳战众阴。合坐酒人拼独醒，一杯凉饮入冰心。”其三：“土风伐鼓逐清辉，海仗笼灯醉不归。惊起林鸟啼远夜，绕枝百匝欲何依。”其四：“万唤千呼白玉盘，举头望断海天宽。琼楼高处独惆怅，谁识蛟宫深更寒。”其五：“去去回眸对碧霄，山妻鼓兴约明朝。酒阑灯灭人声绝，却放清光入帐绡。”《秋之星浦》：“大字淡无极，数峰青奈何。忽疑天入定，真见海波平。得势萧萧叶，禁寒薄薄罗。夕阳红没处，山外乱云多。”又有《宗风浩然两社中日诗人观月西园亭招游不果往》：“西掩人家谁最乐，东山月色我无缘。眼前了了成蕉梦，天下汹汹苦豆煎。得句聊当金谷酒，听琴何必剡溪船。云端放却孤飞鹤，瓜李南皮上客筵。”《怀人》：“谁识瀛洲画日云，渊源强半出源汾。墙桑宅彘生平梦，付与隆中策鼎分。”此二诗为集中所不载。炎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病逝于北京，年八十有八。著《黄海环游记》《杜诗尤》《黄炎培诗集》《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

毕大拙

金州毕乾一字庶元，号大拙。祖居榆林。父序昭，字宗武，号蔗农，金州名儒。大拙于《泰东日报》任编辑，熟悉戏曲掌故。善诗。《镇东闻兵匪交战》：“十年梦入邯郸道，蓦地惊心战血红。莫笑轻身三尺剑，风云草莽亦英雄。”《响水寺即事》其一：“路转峰回处，梵宫隐翠微。渊深惊雪喷，磬响带云飞。花落还迎客，山浓欲染衣。归间服芳草，物我两忘机。”其二：“来作清游客，萧然物外身。云山谁作主，花鸟总宜人。煮酒开丹火，题诗藉绿茵。吾生如有涯，曷弗任天真。”民国十四年一月欧阳予倩来连，大拙有诗：“坐沈红烛望中天，歌哭无端付管弦。秋雨几番调雁柱，春灯一曲叠莺笺。舍身救世心原苦，赋句招魂迹亦仙。碌碌尘途谁健者，缚将奇士作龟年。”后因事开罪日人，遂赴哈尔滨图书馆任馆员。六十年代中期病逝于抚顺，年近七十。著《关外春秋》《旅大外史》。子克祯，冶金学家，能传家学。

恭王溥伟

恭王溥伟，号锡晋斋主。善诗，多故国禾黍之思，慷慨悲凉之感。《偶感》：“处处中原血战红，犹鞭怒马蹴秋风。勾骊河畔霜如雪，猎虎山头月似弓。慷慨志清南北斗，激昂人唱大江东。共君努力勤弧矢，多少苍生水火中。”颇有帝王气象。《感时》：“往事徒劳梦里思，乡园佳问故迟迟。天心未必移周鼎，孤愤惟应续楚辞。虚堂读书人语静，竹窗又雨夜灯知。一年容易秋光老，万里西风上柳枝。”亦多惆怅之感。与肃王相契，其《题〈肃忠亲王遗集〉》：“轻舟海上垂纶日，烽火中原落照时。一片伤心谁共语，潇潇风雨夜吟诗。”金州李东园西隐居沈水，有《赠李东园》：“金州山下老松青，霜雪年来已饱经。举世沉酣看尽醉，壮怀慷

慨独为醒。难求辟谷神仙诀，赖有怡情笔砚灵。茅屋一椽容大隐，幽居漫拟子云亭。”《和李东园》：“中夜闻鸡客梦惊，萧萧风雨对寒檠。频瞻江浦黄旗远，无那人间白发生。诗思每从行路得，月轮偏向故乡明。十年避地居东海，青眼逢君万里情。”《过金州》：“露苗烟蕊满平畴，春水无声绕郭流。乍见东风吹燕子，杏花如雪过金州。”结句韵味独绝。《太子河》：“塞花簇簇开仍落，河水滔滔去不还。欲访龙泉探古迹，霜华一夜满千山。”伪满时旅顺第二中学礼堂上悬有溥伟题词：“自强不息；约礼复畔。”今早已不存。晚年奉老母定居连湾星浦山庄。民国十五年病逝于长春，年五十有六。弟儒、德，皆善诗词，精书画。子毓蟾，能书。

溥儒

云飞老人邢昭远先生辛巳岁首为余作书：“结屋临岩绝世情，天风吹下传经声。苔花满地无人扫，松际云来鹤不惊。”旧王孙溥儒所作诗也。溥儒乃清末恭亲王奕訢之孙，字心畲，号西山逸士。兄末代恭王溥伟。溥儒诗书画均精绝，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其《题牧牛图》诗：“秋色苍茫四望空，半林落叶半溪风。牯牛任向前村去，睡足斜阳浅草中。”顷读《寒玉堂集》，此二诗均不见，疑为佚诗。心畲妻乃升允之女，集中有《赠外舅吉甫总督》：“渭水东流入乱山，秦兵卷甲一时还。灞陵夜宿无人识，木落秋高出武关。”《东道不通》：“明月西飞辽海湾，不闻诸将唱刀环。沈阳霜落秋风起，只有边鸿夜度关。”《乙亥送犹女芝归星浦》：“乱世离乡国，艰危匹马从。边行冲雨雪，海宿犯蛟龙。星浦霜初落，秦关路不通。还怜远兄弟，送汝意无穷。”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病逝于台湾，年六十有七。有《寒玉堂集》。

溥侗

贝勒溥侗字厚斋，又字西园，号红豆馆主。精于皮黄，昆乱不挡。辛亥后，以票友下海，名闻一时。工书善画，晚岁鬻书画荣宝斋。《壬子春游老虎滩同友人作》：“海月楼前柳色新，相逢异地倍相亲。多愁春雨疑秋雨，久客行人即主人。我已无家问松菊，君会有第寄鲈莼。且将竹叶频频饮，不是桃花莫问津。”瞿蜕园有《海上赠西园王孙》长歌，叙述西园经历，多掌故，可作清末史料读。一九五二年西园病逝，年七十有七。

三多

三多字六桥，亦作鹿桥，号可园，别署瓜园主人。所居曰粉云盒。蒙古正白旗人。同治十年生于杭州。举孝廉。从俞曲园习汉隶，从樊樊山学诗。任杭州知府，辛亥后充盛京副都统，兼事金州。善书，隶书间以魏造像诸碑，取法平直，求其简逸，朴茂雅秀。

民国二年至连，寓居文化台。有《大连湾》诗：“宁海几曾宁，南关久莫扃。春从墙外

望，潮在枕边听。宦海沉人黑，他山夺主青。且寻游宴乐，何处不新亭。”《海滨拾石》：“南山隐宁戚，西域使张骞。我游东海畔，袖海怀坡仙。坡仙不可作，空仰蓬莱颠。不如携婵娟，跳上米家船。行厨煮石食，一去三千年。”《次和谈铁隍国桓秘书旅大感怀原韵》：“笙歌丛里偶抽身，来结残山剩水因。仙境更佳如望蜀，神州虽广莫逃秦。刚圆又缺云中月，乍暖还寒塞下春。岂独此间陵谷变，归家都是烂柯人。”寓居连湾，常熟杨云史圻有《题六桥丈文化台山居》：“一犬吠墟落，到门苍翠环。平生见中孝，此别动江关。暮马竹间密，寒山人外闲。夕晖相送处，清照水潺潺。”六桥与金州王岷源永江订交。岷源有诗云：“前朝陵殿尚峥嵘，回首沧桑百感生。八载驹光知己少，一官鸡肋有人争。寄情风月诗千卷，托兴弦歌酒数行。贝锦萋菲随处在，不关心处转心清。”民国三十年去世，年七十。有《可园诗钞》《粉云盒词》《瓜园诗词集》。

黄棣华

黄棣华字伟伯，所居曰知稼穡斋。广东顺德人。约民国十六年至连湾。工书。精诗。《嚶鸣社友开诗会追悼胡子晋怆然赋此不胜今昔之感矣》颇关连湾诗坛掌故，云：“嚶鸣诗社十八人，子晋群英推领袖。年来寥落似晨星，人间天上纷纷走。关林前后已凋殒，关乙仙林心裁，杖履难亲商句读。陈杨早驻沈阳车，陈尘隐杨囊吾，傅安共醉燕京酌，傅立渔安淮阴。觉园南为孝感官，许觉园现为孝感县知事，清禅北向龙沙狩，蔡清禅现客黑龙江。越川蠡郡屡猷新，黄越川在绍兴办电器事业，介甫汉口操旧业，尹介甫在汉口。太初皖水自遨游，徐太初在安徽，大拙台安难邂逅，毕大拙在台安。回思骚社全盛时，秋月春风将韵斗。欢然畅饮酒楼中，击钵催诗诗立就。岂知聚散太无常，连湾莫把游踪逗。何堪子晋又骑箕，正当风雨重阳候。本来生死亦寻常，胡为斯人偏不寿。山房尚有未完书，子晋辑万松山房丛书，肇椿哲嗣当研究，子晋子名肇椿。喙公从此不忧喙，子晋又号喙公，留得诗名弥宇宙。”《醉后漫笔》：“诗魂清过山间月，酒胆狂于海上涛。只为壮怀伸未得，一杯一笔寄牢骚。”《公主岭郊游即景》：“塞外风景异大连，深秋景物此凋念。云垂四野山疑睡，冰合长流水渐坚。驰道瘦驴枯似鬣，栖枝冻雀小于拳。扑人一阵狂飚起，高卷黄尘上半天。”与连湾文士多有交往。丁燮生有《戊辰元宵前一日赠伟伯》：“羨君著作富多多，报载琳琅满目过。相见虽然恨已晚，元宵明日镜新磨。”丁氏《怀黄伟伯先生》：“几度访君不见君，缘慳一面怅离群。借问高躅从何处，公主岭前见翠雾。”略可知伟伯行藏。有《知稼穡斋纪游吟草》。

陈锡庚

陈锡庚字尘隐。江西人。善作山水，亦精花鸟，尤以写梅见长，能以指作梅。

善诗。《杏花村独酌》：“相印黄金六国轻，万花楼畔一壶倾。刘伶荷锸犹多事，醉卧何

须问死生。”《书愤》：“砚作雕鞍笔铁弓，词坛驰骋误英雄。抛书猛射南山虎，醉饮葡萄看血红。”与连湾文士多有唱和。《得静修寄诗次韵》：“难得故人杨万里，伴谈红拂破寒宵。诗思迟在灞桥雪，酒渴狂吞东海潮。妙手不闲吟草积，深情移爱落花浇。群芳诞日拼吾醉，鞭马寻君约昨朝。”静修，杨凤鸣号也。《赠燮生先生》：“吉金乐石久罗胸，铁笔纵横刻画工。国粹消沉谁管得，嗜痂我独爱雕虫。”《赠山县九孔》：“平生心醉惟书史，昂首樽前发浩歌。千载辽东风月夜，锦囊赢得好诗多。”《和越川梅花诗》：“倩影娉婷恨东风，醉醒我亦赵师雄。寒花依旧枝迟北，香雪难逢海欲东。仙到能癯游世外，人因寄傲峦山中。铁鞋踏破边关冻，春信凭谁报汉宫。”欧阳予倩至连，尘隐有诗：“正欲冲霄敛羽翰，自家辛苦任人劝。知音寥落琴心远，侠骨摩挲剑影寒。强醉要从豪客饮，忍饥差共腐儒餐。李宁已逝中山老，歌哭英雄到夜阑。”尘隐其人生平不详。丁燮生有诗赠尘隐：“惟诗与酒最浇胸，李杜才华吐属工。咏物感时多逸兴，山川花鸟及鱼虫。”王健堂《送陈尘隐词宗应奉天南满洲医科大学之聘》：“谈笑雍容四座惊，风流儒雅早知名。毕生耻作公侯客，半世欢居诗酒城。今日阳关三叠曲。来朝平地万重程。雪泥争说留鸿印，从是嚶鸣失一声。”徐守一《书感兼示陈尘隐》：“世路崎岖孰铲平，功名千载一楸枰。人情阅透秋云薄，愁绝猖狂阮步兵。”其二：“劳劳天未慨浮生，怕听胡笳塞上鸣。夜静更残人不语，疏林黄叶作秋声。”或可窥其生平一二。

黄广

黄广字越川，号小梅苑主人，别署余姚布衣。所居曰喻樾室。江苏余姚人。工于书。民国十六年左右居连。

能诗。《忆梅》：“辽东气候不宜梅，自古吾闻绕屋栽。妙句徒吟何水部，嘉名几负贺方回。临风恨我三山隔，镇日思君百念灰。任石溶溶明月夜，杳然消息美人来。”又：“昔时曾住古钱塘，岁岁看梅我欲狂。一角孤山嗟判袂，六年辽海阻归航。巡檐莫索低头笑，卧殿空怀点额妆。萼绿仙人灵可乞，相逢或在华胥乡。”《乐游原》：“此中何者号游原，合是登临第一门。乱石叠墙围竹径，清溪夹录到桃园。闲观鸟集山如滴，精静鱼多水不浑。指点前途风景好，明朝我欲入冈墩。”入嚶鸣诗社，与李义田、胡子晋、杨橐吾为至交。《创十三白字诗寄薑隐伟伯并柬嚶鸣社同人》：“白玉山前太白居，葭苍露白我停车七月既望偕隐伟访薑隐于白玉山。白堤空作白云望余离西湖四年，白屋闲将白石储余惟喜石罗列颇多。白乐天成香火社，白栖霞著湛渊书。衷怀欲白凭谁白，白战君休白眼予。”《寿胡喙公五秩》：“豺虎中原感慨频，廿年辽左作诗人。乘槎我亦浮于海，文字论交有宿因。”喙公乃胡子晋号也。爱连湾风景，每游览，必以诗记之。《响水寺即景》其一：“桃源未必在人间，一日清游一日

闲。五月披裘观世变，赫山权作富春山。”其二：“水韵琴声两不分，清幽未许俗人闻。庭前更有花王在，四面风来扑鼻香。”其三：“几日风声又雨声，而今忽放一天晴。最高峰上遥相望，隔海齐烟点点明与橐吾登赫山之巅。”越川在连日，连湾文士与之多有唱和。杨凤鸣《和黄越川五十自寿》：“两浙湖山旧主人，十年听雨寄连滨。不须著句悲迟暮，百岁光阴一半春。”丁燮生《戊辰元宵前一日赠越川》：“粤东萍迹寄辽东，二十余年客邸中。到处烽烟无净处，青泥洼里乐时雍。”胡子晋《题黄越川小梅苑唱和集》：“六载辽东尚未归，忆梅魂梦总依稀。连湾亦有小梅苑，韵绝余姚老布衣。”《己巳春越川布衣南旋诗以送之》：“小合无端忍泪看，青泥洼畔一辛酸。澹交能契偏慳具，离别方知亦劝餐。杜老怀人春树远，江淹得句水波寒。胜游拟订兰亭约，三月桃花许未残。”越川于民国十八年南归。有《在越中怀大连》：“我爱松山山爱我，十年无日不相亲。而今两地分南北，满径涛声入梦频。”越川生平不详。

高起元

高起元原名国松，字孟贤，号北海钓徒。光绪举人。先世驻防广州。辛亥后，与肃王善耆同至大连，侨居旅顺，设帐教徒为生。有书名。与金州孙宝田交善。后不知所终。

偶为诗。《登肃忠亲王阁书楼》：“故国谁从赋远游，贤王长啸指危楼。萋萋芳草增春恨，脉脉青山入海愁。辽左琴樽今宛在，洮南鞍马旧同仇。书城百尺荒云外，筹笔谁当继武侯。”《口占》：“慷慨辞尘网，行藏问钓竿。十年沧海曲，独倚暮潮寒。”《旅中书怀》：“丝丝凉雨故山秋，离绪萧骚附杞忧。永夜蝉声空怨瓦，十年燕子尚依楼。天涯马交生残梦，海上云心倦远游。边柳不缘青女妒，霜痕摇落古营州。”《铁山垂钓》：“偶办渔竿命小舟，西风十里海天秋。苍茫老铁山前水，一角斜阳挂钓钩。”《和小平绥方海棠诗》其一：“多谢春阴护此花，翩翩西府擅名家。园丁好洒坡公酒，五度东风醉倚霞。”其二：“锦幕春寒日影迟，晓妆才罢艳方脂。最怜袅娜迎风立，恰是华清出浴时。”

松崎鹤雄

张松石师壁悬郑海藏条屏：“万户风光为子寿。松崎鹤雄先生周甲之庆。孝胥。”松崎鹤雄号柔甫。民国二十二年应罗雪堂之请与何益三同主整理内阁大库史料之事，襄协者乃雪堂子福成、福颐，何益三乃雪堂姊夫。松崎从叶德辉学，时为满铁图书馆司书。光复后，仍留大连图书馆协理馆务。何时离去，待考。

能汉诗。《咏牛》：“清流芳草不知饥，却怕人间好事羁。一路东风古关外，仅随仙客说无为。”罗鲤厂有《寄怀松崎柔甫》：“朝餐湖绿夕山岚，灯火人知老学龠。世难抱经修凤好，道穷集蓼喻偏甘。襟期恍接羲轩上，风景真如晋宋南。我亦金根同不学，荷衣延誉到今惭。”

林长民

闽县林长民《题乃木大将像》：“老父功成子死忠，早期怀骨黑江东。吟成立马斜阳句，想见山花满地红。”所咏即日俄罪恶之战中滥杀中国无辜人民之日本“军神”乃木希典，立马斜阳者，乃木战胜，踌躇满志，所咏之句也，诗虽佳，其奈满地红之山花，实有我无辜民众之血何？长民此诗，亦尚佳，然不类中国人所应为也。奈何？长民字宗孟，号双栝庐主人，自号桂林一枝室主。善诗词，工书，少时习灵飞经，后参北碑，骨秀体健。长民好为政事，且每每碰壁，遂有投机之意。郭松龄倒戈，召之，待若上宾，长民于火车中为运筹帷幄，及郭大败，长民自火车仓皇出逃，时方大雪，遂死于雪中。年五十。弟天民取道大连赴奉天白旗堡为收尸，将骨殖暂厝于连湾本愿寺，日人多往吊唁。陈宝琛挽云：“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长民有女名徽音，适新会梁启超子思成，治建筑学，卓有成就。

田边碧堂

癸未初春，于琉璃厂来薰阁见中华书局印本《凌沧集》，两卷一册，日本碧堂田边华秋谷氏所著，编于东京四谷须贺町精研阁。多关旅大人物，择其精要者录之。《旅顺谒肃亲王》：“铁马南来帝业空，亲王长啸返辽东。黄金白玉山无恙，回首中原落日红。”附肃王原诗云：“赐座高楼到夕曛，一尊且许共论文。亲王把臂欣然语，东海诗人始见君。”《天津访罗振玉》：“金石探源辨异同，罗君鉴画亦精通。云烟几载仙帆上，送与扶桑壮海东。”《赠梁任公》：“梁君警世有文章，木铎江湖谁颉颃。老气横空一枝笔，秋来字字挟飞霜。”又有《旅顺怀古》十首，描绘日俄旅顺之战，语多横霸。其一：“貔貅百战陷坚垒，河岳千年铭伟勋。赦敌宽仁圣天子，奉公忠烈大将军。”其二：“铁券山河感慨中，低回怀古立秋风。王师本自宣仁义，不与开边汉武同。”其三：“尔灵山失碧峥嵘，战骨成堆草木赭。假有勋功壮关塞，岂有魂魄返神京。”其四：“北伐天骄宣国威，烽烟已敛始班师。屹然白玉山高塔，肯拟燕然第二碑。”其五：“关东天险比金汤，百战功成归我皇。十万兵为忠义鬼，黄沙白木屹祠堂。”其六：“悬崖会此斲千兵，犹见沙中折戟横。天似清霜染岩壑，十分秋色在荒城。”其七：“夜踏崩沙过礞台，西风猎猎卷黄埃。角声吹起关山月，木叶初飞鸿雁来。”其八：“草木凄凄风露稠，吟过废垒夜云幽。千岩碧血销将尽，月白二龙山上秋。”其九：“海军勇将气吞牛，乘夜曾沈几只舟。今日来过夕阳里，黄金山水下如油。”其十：“御防策尽敌轮诚，忽见白旗翻晓晴。大将辕门迎握手，三间茅屋受降城。”余送呈张松石师，师读罢，掷纸于案，大呼：“此国耻也。”是书函侧有钢笔签字，大意为，此诗为日人所做，日人能通汉诗达此境界者亦难，遂购归。签名为英文，草草难读。日人诗文集，刊印多精美，此《凌

沧集》亦然。田边氏当于民国初游学中土，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费念慈诗条云：“君（费念慈）又有《和田边碧堂诗》云：‘长堤披拂柳丝青，折赠柔条半醉醒。海气昏黄衔落日，楼边金碧带春星。座中旧雨兼新雨，别后长亭更短亭。欲向蓬莱问深浅，骊歌凄断不堪听。’碧堂，扶桑诗人，亦余旧识也。”

挽乔芝三诗

乔芝三德秀撰《南金乡土志》，绘图者旅顺鞠建烈，审定者金州刘心田、曲作楷，济宁潘复、辽阳袁金铠为之序，皆一时名士。金州张伯川辛未年题“南金乡土志”隶书签，古雅朴拙。芝三光绪间讲学奉天萃升书院，辽南名儒也。民国十五年，芝三十周年祭，连湾文士公祭之。陈尘隐《乔芝三先生十周年诗以祭之》：“莽莽山河下夕阳，所南心史见柔肠。椎狙事在韩难绝，麟笔书成鲁未亡。栾布没应存祭社，严光今独贖祠堂。人民城郭虽非旧，化鹤归来尚恋乡。”大洪山人许学源《哭乔芝三先生》：“作客辽东梦已孤，又从宿草哭真儒。白杨信有萧萧树，黄绢谁怜磊磊珠。议虏榆关存卧子，释难漆室见潜夫。焚香细读南金志，心史千年并未枯。”沈林茂《祭乔芝三先生》：“从来有德不为孤，敬仰心香引宿儒。节比管宁居割席，才如立白唾生珠。一篇志足垂千古，百世师还是匹夫。十载人天伤永隔，精神依旧海难枯。”尹十八《乔芝三先生十周年祭奠次感作》：“如梦幽幽又十年，人生到此始听天。墓前草已埋翁仲，地下魂应化杜鹃。同榜仅存袁白燕，比邻高卧李青莲。老成近日凋零尽，回首秋风一黯然。”诗中袁白燕指辽阳袁金铠，李青莲指旅顺李义田。

叶恭绰

番禺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号遐翁，别署矩园。光绪七年生。富收藏，工于书，精绘事，能诗词，通佛理。自清末至民国驰骋政坛近四十年，历任要职。七十岁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遐庵重情义，笃忠信，罗瘿公、潘兰史、曾刚甫等人著述，皆其所刊。家藏《遐庵汇稿》四册，胡汉民、于右任题端。载其《大连即事》：“数峰低压海天青，信美山川入杳冥。犹有闲情消未得，篝灯重上扇芳亭。”扇芳亭下自注：酒楼名。亭今在何处，已不可考。一九六八年八月病逝，年八十有七。一九八零年，遵遐庵遗嘱，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仰止亭旁。著《遐庵诗》《遐庵词》《遐庵汇稿》《矩园余墨》。

胡子晋

黄晦闻节《蒹葭楼诗》卷二有《大连湾留别胡子晋》云：“渡辽无地託身难，惭愧生平慕幼安。强为故人回别泪，眼中沧海有停澜。”作于民国戊辰。胡子晋，广东南海人。因患哮喘，故自号哮喘公，别署椎铁、骏男，所居曰眠琴书屋。民国十年春，侨居连湾，与在连之老同盟会会员及官吏、文士共立嚶鸣社，任社长。明年秋，征为新疆实业厅长不就。且辞嚶

鸣社长，寄居营口，办理实业。民国十五年暮春，刊《嚶鸣社诗钞》四册，录二十一人诗七百首。傅立鱼有《寿胡子晋五十》：“岭南之人尚至诚，笃爱朋侪如兄弟。我生交游遍天下，粤中二友最多情。在辽吾爱胡子晋，在燕吾爱宋才卿。才卿任侠出群众，吾以方之宋公明。子晋博学能任事，安定之堂差可升。我自癸亥离燕京，辽东雌伏逃浮名。当时内外融融洗甲兵，花好月圆人上寿，环球人类各安宁。”

子晋有《辽东杂咏》其一：“闲于话茗采遗闻，儒将风流自不群。好句人人传诵遍，斜阳千古两将军。”注云：“张今颇上将军锡銮督奉时，曾有句云‘庭前古树老于我，天外斜阳红上楼。’又，日俄之役，日本乃木大将师次金州，得句云：‘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丁卯生日作》：“五十无闻岁月淹，山林城市却何嫌。少经霜露庸难老，贪买图书未得廉。悔学屈平疏香草，漫夸胶鬲隐鱼盐。半生何必重回首，世味由来知冷炎。”与李义田为莫逆之交，《述怀和董隐元韵》：“研诗未解宗山谷，写字还殊慕率更。补习词章嫌失学，尚容耕钓岂忘情。渐除热恼空三火，别友吟僧契二清。利籛名场嗔易怒，好从著述快余生。”《柬董隐》：“管见谈诗敢自矜，詹詹言小动聋丞。无能恨我沦尘俗，好静如公傲老僧。懒性却因人事累，深交似讨俗缘憎。双台日也多情甚，酬和吾惭杜少陵。”

王永江病逝，子晋有《王省长岷源先生挽章》：“关东山气正崔巍，郁此殊才拔地来。得主已成今管晏，陈书休说旧邹枚。民生憔悴谁同悯，文献凋零我独哀。还念金州李遗老，卅年交好泪盈腮。”黄越川南归，有《己巳春越川布衣南旋诗以送之》：“小合无端忍泪看，青泥洼畔一辛酸。淡交能契偏慳具，离别方知亦劝餐。杜老怀人春树远，江淹得句水波寒。胜游拟订兰亭约，三月桃花许未残。”

民国十八年重阳前一日子晋病逝于营口，年五十有二。黄晦闻节《挽胡子晋》：“海波真见有停澜，送别湾头语未阑。解识分舟为永诀，早应回路更来看。岁时一过能如故，富乐相逢不改寒。无复大壶烹热酒，雪宵谭谑共忘餐。”杨凤鸣挽云：“魂去明知不可招，亦难人事任无聊。愁云冻月登瀛阁，一柱清香带泪烧。”

子晋长子肇椿，号寰盒。亦能诗，尤善词。精于考古，民国中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译有《考古发掘方法论》。九子肇东，侄肇杨，亦工诗。

徐宗浩

癸未岁春，余赴京华，于琉璃厂来薰阁得书数卷，中有《石雪斋诗稿》一册四卷，乃久觅而不得者。有小行书题记四行，云：“己巳十月初旬，航海作辽东之游。在大连小住数日，走访石雪，出此见贻。越岁辛未九月望日，灯下泚笔记之。屏庐。”钤“金钺”白文方印与“浚宣”朱文方印，印工极佳。序又有“御赐大吉”朱文腰圆印及“屏庐”朱文古玺小方印。

金钺字浚宣，一作复宣，号屏庐。天津人。清末官于民部。家富有，辛亥后专心著述，不问政事。尝出任天津修志局编修。搜罗天津文献，更修刻之。高凌雯《天津志·序》云：“天津有藏书之家，无刻书之人。近惟浚宣喜为此，网罗旧籍，日事铅槧，十余年未尝有闲。由其先人撰述推及乡人著作，已刊行二十余种。”刊有《辛酉杂纂》《天津金氏家集》《许学四种》，辑有《屏庐丛刻》。金氏于庚午冬刊《屏庐题画》百余则，天津王守恂序。乃其平素画竹之题语也，中多佳句，若：“疏疏淡淡悠然尘表，数竿相对已足怡情，何必渭川千亩弥望无极耶？”。

徐宗浩著《石雪斋诗稿》，民国丙寅年夏刊行。严修题端，成多禄题署，天津王守恂及赵芾二序，又有吕光辰、钱振鏗、吕陶、唐鼎元、成多禄、李云庆题词及自序。前有汤定之所作《石雪斋图》与俞涤烦所写《石雪居士四十有六岁小像》。

宗浩字养吾，幼而聪慧，诗词书画，皆有深好。尝以巨金购得文与可石室与苏东坡雪堂大幅墨竹，宋元明人题跋甚夥，清人张井尝据各家跋文刊成《澄鉴堂法帖》，故号石雪居士，颜所居为石雪斋。《近得文石室苏雪堂墨竹二轴赋长句志之》：“平生画竹真成癖，泼墨年年手不释。竿梢枝叶差足拟，精神气魄那可获。学竹当学文湖州，妙墨今日如琳球。无已只有思其次，作手如山将谁由。松雪房山与丹邱，下逮有清郑克柔。风情潇洒气挺拔，余子蹀躞难与侔。心摹手追二十纪，举笔总觉羸垂死。写竹曾闻须写真，何日扁舟泛湘水。忆昔客游来太原，得交处士梁禹珊。座中知名有庞子，博学多才今傅山。谓我石谷富藏诸，墨竹巨幅有文苏。文竹一丛起石罅，狰狞直欲干太虚。苏竹一竿自上发，寻丈之间气不竭。排山振谷叶纷纷，我欲赞之从何说。拈豪局促只深愧，未敢放手出神异。此轴神奇真骇人，回头曩作应焚弃。宝剑高情赠知己，笃好岂惜倾囊易。人生万事如浮云，宝此不知天地大。”实皆清初人所摹，宗浩不知也。

石雪书宗赵松雪而洗其柔媚，以顺通畅达独步一时，画师从王振声劭农，得其真传，花卉翎毛山水，皆超逸有致。能治印，义州李放评云“苍劲秀雅。”宗浩亦自有诗：“龙泓遗法素钦宗，早岁雕虫亦拟工。一见缶庐成搁笔，不堪虚厕印林中。”注云：“西泠印社兼寄丁辅之。余刻印喜丁钝丁、李狷厓。《补印人传》前有印谱存目，尚录及余。”与当世名士交。有《为成澹翁刻旧雨二字印并写旧雨轩图》诗：“十年不作金石刻，今为先生一奏刀。久媿狷厓期许意，欲将工力拟金高。”注云：“李狷厓赠诗云：‘三绝才华迈等伦，即论篆刻亦通神。求之今世岂易得，竟是金高一辈人。’读之滋愧。”又“平生私淑龙泓老，心所能知手不从。周鼓秦碑看太仄，奇文搜得楚齐钟。”注云：“旧为齐侯钟文，雨为楚钟文。陈石遗题余《遂园印稿》有‘龙泓丁钝丁，端可与平揖’句”。善写竹，每题以诗。“轻风摇竹拂阑干，

历乱阶头碎影寒。安得清秋有闲日，与君把酒月中看。”此石雪题画竹寄王希哲光烈诗，当作于民国己未岁冬。又有《题画寄石工》：“千里家山空入画，十年江海未归人。清秋不用悲寥落，沙上闲鸥自可亲。”

石雪约于民国十八年至连湾，结交名流，以金石书画自娱。有诗纪事。《庚午重九日同人登驿楼寻龙山故事口占戏呈诸老斧正》：“大赫山前红叶秋，大连湾外碧涛流。以文诗侣诗兴道，同登海滨七层之高楼。淮海清吟谁可酬，水天景色尺幅收。伟伯工饮道衡讴，英才雅慕黄孟浏。烟尘瀕洞迷九州，举杯相对真良谋。人抱龙山落帽忧，风萧萧兮不可以久留。”田冈淮海、黄伟伯、李道衡、黄孟浏诸人皆以文诗社中人，乃连湾善诗者。《庚午重阳登高》：“高楼秋色使人狂，回首中原意独伤。从古疲民惟战伐，即今报国有文章。惊鸥疑起风前雪，病菊犹撑冻后霜。沧海欲枯天欲坠，长宵宁我自徊徨。”《旅顺阻风用淮海韵》：“浩荡银涛去复还，舳舻摇曳夕阳间。千帆坌集黄泥浦，一塔孤悬白玉山。苍狗白衣拼变态，酒杯诗卷好开颜。莫嗔前路风波恶，赢得浮生几日闲。”《渤海道中遇风忆故园二首》其一：“三日楼船底，昏昏似病醒。壮心灰已尽，短梦定还惊。骇浪疑山倒，危樯等芥轻。日斜风更紧，愁听鹧鸪声。”其二：“久作江湖客，今霄最苦人。饥蝉宁敢食，屈蛟不求伸。板荡真吾懼，风波促发新。故园深可念，岁晚共松筠。”《苇村闲居》：“苇花深处有人家，草阁萧然近水涯。矮纸闲临东坡竹，高田好种召平瓜。心无一事贫堪乐，胸有千秋气自华。豆饭藜羹吾愿足，养生何用蓄丹砂。”此五诗皆石雪于连湾时所作，为集中所不载。民国二十一年离连，寓居北京琉璃厂西太平巷。

尝见石雪绘《瓷盎株兰图》，上配诗堂，其诗云：“乌皮小几黄磁斗，破晓幽兰发两三。放下垂帘对花坐，铜炉不用爇沉南。”跋云：“墨兰始于所南翁，元明两代作者甚众，至克柔先生则秀劲刚健，超前绝后矣。世有知者当不何汗余言。”钤朱文“石雪居士”小印。题云：“希文先生正，石雪居士徐宗浩写。”用印同上。笔力洒脱，有大家之风。石雪富收藏，晚年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七年病逝于京，年七十有七。歿后，家人承其嘱，将所藏悉数捐公。

吴宓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吴宓应大连中华青年学会之邀至大连做讲座，题为《人文主义论》。越明年一月二日，自大连乘船赴上海。有《海行杂诗》二十首。其一：“初日出云中，金光照碧海。奇景美如斯，可怜人不解。”其七：“神交感知遇，依依鱼水情。世岂有昭烈，而今无孔明。”乃赠复县汪兆璠者，时兆璠任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宓字雨僧，一作雨生。陕西泾阳人。早岁就读清华，后留学美国。民国十年归国，与梅光迪创办《学衡》

杂志。十三年，受东北大学之聘，赴辽沈讲授英文，翌年离去。一九七八年一月病逝于故乡，年八十有四。著《吴宓诗集》。

阎传绂

金州阎传绂字纫弢，号稻农。尝出任伪满司法部大臣。工诗，曾入嚶鸣诗社。《早春金州东城楼观日》：“离水昭阳照剑红，一天云气五更风。鸣空鸿雁排文字，横野长桥飞玉虹。眼望瀛洲沧海外，神驰辽左戍楼中。雄心未减鹏程志，愧为琴书误此躬。”《车窗夕眺》：“红日西沉榆柳村，车窗眺望近黄昏。何人伸出擎云手，拨出长空月一痕。”《星浦作》：“鸿雁鸣空几度过，诗情画意两如何。莫嫌野外秋容淡，万叠青松拥翠螺。”《邀觴淮海伟伯越川星浦海楼》：“天上云峰幻峻奇，中流倒映水涟漪。扁舟一叶浮波去，正是衔山日落时。”一九六二年病死于抚顺战犯监狱，年六十有七。

杨凤鸣

壬午初冬，余谒植元先生，得赐扇面一纸，字若龙眼，跌宕生姿。先生以山东官话为余诵曰：“铜驼荆棘任萋萋，莫化鹃魂带血啼。海内风传鼙鼓远，天边云压塞鸿低。红颜就义轻胡羯，志士成仁起吠蛙。众举何愁鼎鼐重，重光九庙有丞黎。”云乃四十年前旧作，系为京剧《文天祥》所写唱词，剧中有一宋室宫女，不愿为金邦所掳，遂自决。倾读《于植元书法作品集》，亦载此诗，注云：“京剧《文天祥》唱词一段。六二年余同岐山翁为之。”岐山乃连湾名医杨凤鸣字。凤鸣号静修。光绪十八年生。祖居天津，父乃北洋军官，驻防旅顺口，遂借籍旅顺。幼聪慧，习医，民国十年与傅立鱼合组大连中华青年会，任副会长，投身青年教育，渐有声名。二年后于大连西岗大同街自办岐山医院。凤鸣重气节，伪满屡召其为卫生部大臣，皆拒。

能诗，多吟咏连湾景物，其《金州道》颇为今人传颂：“明珠合浦几时收，国破山河恨未休。到此无端增感慨，孤城乔木古金州。”实此乃二首之一。其二：“丰碑巍岿势凌云，胜负当年此地分。社稷兴亡关士气，斜阳立马忆将军。”《响水寺》：“翠靄凝空不可攀，通幽端赖画桥弯。寺名何待山僧说，悬瀑投溪响漩湫。”《重游小平岛》：“旧时烟柳旧时村，旧地重游旧梦痕。旧雨今番何处去，不堪人事暗销魂。”《延月得二十八字》：“连宵放棹兴如何，又向清江载酒过。醉与沙鸥分野席，满身明月卧烟波。”与连湾文士黄伟伯、傅立鱼、林心裁、黄越川交往深厚。《送越川归浙》：“何日扁舟酒一瓢，空江明月再听箫。故乡继令湖山好，莫忘同游老牧樵。”《赠李东园》：“有清三百载，谁唱黍离歌。古道衰如此，斯人奈若何？高怀传画笔，浪迹托渔蓑。不尽兴亡感，佯狂混醉魔。”上虞罗鲤厂先生《萝村吟草》有《寿杨岐山七十》：“活人魂梦自安恬，辛苦红专两得兼。肝胆照人何坦荡，错盘

阅世重隅廉。披图我讶朱颜悴，遣兴诗窥老律严。更仰历年功不懈，藏山事业岁时添。”作于一九六三年。 鲮厂《东华集》中复有《赠杨岐山凤鸣》：“人间口绝子云亭，秘枕亲承素女经。病起膏盲侔上相，节更盘错试新砮。江湖律较诚斋细，兰茝情摹楚泽馨。社栝何修逢哲匠，年来书剑叹飘零。”小注：“时杨任新政府卫生厅长，与予倾盖定交。文革中以遭难役。”凤鸣于丙午之劫初起时投井而亡，年七十有三。有《岐山诗集》行世。壬午五月二十八日夜，罗鲮厂病逝，年九十；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晨，于植元病逝，年七十有五。一代人瑞，香返天上，徒留手泽遗文，惜乎。

陈从周

癸未秋，游扬州，访石涛和尚所造之片石山房，忆梓室老人陈从周。近世以园林家而兼书画家、诗人、散文家者，唯陈梓室一人。一九八零年夏，陈氏有连湾之游，《大连好·调寄忆江南》：“大连好，浅画自成图。一径绿荫通夹道，万山深处出平湖。初日步徐徐。”陈氏早岁师从大风堂张氏，山水花鸟造诣皆深，余尝见其《菊石图》小品，笔恬墨淡，一派名士风度。

参考书目

东北人物志，武南阳编纂，大连满洲日报社

大连市志·人物志，大连市史志办公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旅大文献微存，孙宝田，稿本

金州名胜与风光，张本义，辽宁人民出版社

白云追思集，萧文立编，大连双守箴刊行

静晤室日记，金毓黻，辽沈书社

于植元书法作品集，于植元，青岛出版社

范伯子先生全集，范当世，北京中国书店刷印

周恣慎公诗集，周馥，民国十一年刻本

周恣慎公文集，周馥，民国十一年刻本

止庵诗集，周学熙，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止庵诗外集，周学熙，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桂之华轩诗集，朱铭盘，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蒹葭楼诗，黄节，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张季子九录，张謇，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石雪斋诗稿，徐宗浩，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苍虬阁诗附词，陈曾寿，民国十年铅印本
圣遗诗集，杨钟羲，民国十七年石印本
知稼轩诗，张元奇，民国二年福建石印本
可园诗钞，三多，光绪十八年石印本
北山楼集，吴保初，黄山书社
成多禄集，成多禄，吉林文史出版社
宋小濂集，宋小濂，吉林文史出版社
刘大同集，刘大同，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藏楼诗集，郑孝胥，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杨圻，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宓诗集，吴宓，商务印书馆
寒玉堂集，溥儒，新世界出版社
黄炎培诗集，黄炎培，中国文史出版社
今传是楼诗话，王揖唐，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东诗坛，同文社编
两启轩韵语，罗继祖，大连双守篹刊行
梓室余墨，陈从周，三联书社
大连历代诗选注，吴青云编著，大连出版社

石涛新论

孙绍华

三百年前，桂林出现了一位奇男子石涛。一提起石涛，人们都会想到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画圣，即此一点，称之为奇人也固无可；但我这里恰恰不去论述他的绘画成就，而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石涛留下的三百年来未被重视的诗文予以开掘，便不难发现，这位具有博大胸襟与进步思想的杰出人物，并不为世人所理解，他的许多行事，不幸被他过于突出的画名所掩。今天我们对这些可贵的文献进行新的探讨，便会明确地感到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男子，更是桂林人的骄傲。

石涛是一位被当时社会扭曲了整个人生的不幸者，他是在矛盾的漩涡里扑朔迷离地度过他抑郁的一生。比如说，他原是锦衣玉食的王子朱若极，但却遁入空门，成为石涛上人；他是一位有胆识的干练人物，却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压抑和紧缩在绘画艺术上。又比方说，他既已皈依佛门，又是画坛巨匠，可谓地道的世外高人，但这位血性男儿却深切地关注着当时社会的水旱灾疫与民间疾苦。就这样，他把自己的感受寓之于画，而更多地是通过题画的诗歌以倾泄胸中的郁闷与不平。这便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文献，而且全是手书墨迹，真实可靠，这应是深入研究石涛的最有价值的依据。

然而，要深入地研究石涛的生平，历来都感到十分困难。三百年来，多少大家都想为他写一部翔实的传记或编一本确切的年谱，这类著作迄今已有许多。但谁也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的一生经历，包括他的生卒年月。看来他是有意地用些恍惚迷离的手法使人难辨行藏，从而在复杂的矛盾中得到保全。正如清人方鼎锐所说：“独其生平，惝恍支离，莫能窥测。故一涉笔，往往多不解。”（《清湘老人题记》）而我们现在不必仍去重蹈前人覆辙，只要从新的角度对他的诗文手迹直接进行探讨，便可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亡家破遁空门。

石涛原名朱若极，是明朝的宗室，第十三代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是地道的公子王孙。

首代靖江王朱守谦，是朱元璋兄长之孙，藩治在桂林，自此，石涛一支便为桂林人。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祯帝缢死于煤山，明王朝实质上已正式灭亡。此后，先后出现了几个短命的南明小朝廷：即在南京即位的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在福州即位的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朝以及在桂林即位的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朝。这里和石涛一家有关的则是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小朝廷。由于石涛的父亲靖江王朱亨嘉不肯臣服隆武帝，自立为监国，表明有即位的可能，当即受到两广总督丁魁楚和广西巡抚瞿式耜的反对，不久即将朱亨嘉逮捕入狱，幽禁而死。接着便是搜捕朱亨嘉的家属，年少的石涛在仆人的保护下逃至桂林附近的兴安暂避，兴安距桂林太近，又逃至湖南的全州。为保全性命，无奈在全州湘山寺剃度为僧，法名石涛，字原济。湘山寺又名清湘寺，寺边有丘曰济山，故石涛常用清湘、济山僧等名。此后，云游及挂锡之地颇多，比如庐山、南昌、黄山、宣州、扬州、南京和北京等。由此可见，石涛是国亡家破双重灾难集于一身的受害者，和另一位王子画家八大山人相比，八大比石涛要幸运一些。

二、矛盾丛中度过此生。

佛门高僧与画坛巨匠，这在石涛生活的当时和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此皆无异议。但当你仔细品味他偶而在画或诗中流露出真正的内心思绪，便可发现他的为僧为画可谓皆非本志和自愿，甚至有着所为与所思二者大相径庭的情景。

被迫遁入空门，这使他极不甘心。按他的家世和才干，如果给以适当的机遇，他也许会成就一番事业，但现实又迫使他有志难申。这在他的画中、诗中，尤其在行事中都表现出他对自己遭遇的愤激与不平。比如，他在《山水画册》中有一幅醒目的作品：两株茁壮的双笋和一支劲细的新竹，右侧用了几乎二分之一的空间大字题诗道：“出头原可上青天，奇节灵根反不然。珍重一身浑是玉，白云堆里万峰边。”不须任何解释，他的心志便一目了然。为僧何尝是他的本意，此其一。

最有说服力的是，石涛晚年在扬州大东门构建了一座大涤堂，作为栖老之所。他请八大山人为自己画一幅《大涤草堂图》，信中说：“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徐邦达《僧原济生卒年月新订及其他》及汪世清《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诗文）所谓“向上一齐涤”，说明他对为僧不仅不甘，甚至有急欲摆脱的激愤之情，所以，尽管他在画中使用的别名极多，但使用率最高的莫过于“大涤子”，其心志可见一斑。与此无独有偶的是他留下一幅自画像，免冠而蓄发有须，着便装而不用僧衣，以表示这是自己心目中的本来面目，此其二。

最使人意想不到的，他的晚年，实际上过的是半僧半俗的生活。这在他的诗、文、印

中皆可证实。石涛的性格热诚坦率，热爱正常的人间生活，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而且敢于冲破世俗的羁绊，具有反传统的大胆和勇气。在他的《清湘书画稿》中今存一首七言长诗，曾有“半生南北老风尘，出世多从入世亲。客久不知身是苦，为僧少见意中人。”这样痛快淋漓的自白。他也真的有着一家人众。他用杜甫“如今为庶为清门”的诗句制印，表明他敢于向世人宣告，他此时已经过的是庶民的清贫生活。又如他在一首题画诗的小序中说“乙亥夏五月，舟泊芜城，忆岩夫、实公诸旧好十无一在，舟中泪下。复夜深月上不能寐，家人皆睡，余孤灯作此以遣之。”这里不仅看出对旧友的深情，而且说出“家人皆睡”，便知他此时的生活景况。此其三。（参考《石涛书画全集》上卷肖燕翼所写《叙论》）

为僧非其所甘，作画师亦非本志。他在一幅山水松树作品的题诗中大胆地流露了自己的内心：“自笑清湘老秃依，闲来写石还写松。人间独以画师论，摇手非也荡我胸。”套一句孟老夫子的话，那就是：予岂好画也哉？予不得已也！

三、诗句长留天地间。

石涛是一位诗、书、画全能的大师，如果不是由于画名太高，诗名为画名所掩，单以诗论，他应是清初的一大杰出诗人。他富于才思，多情善感，往往一幅画甫一完成，题画诗便随之而来，常常一幅画一题再题，甚至三、四次题诗。而且古体、今体、七言、五言无不擅长。而其内容除对山水景物或画学技艺的题咏外，最有价值的是大量对当时社会风雨水旱民灾民苦的大声疾呼与深厚的同情。石涛存留的诗篇较多，我们择其要者以作评介。

故国之思与有志难申的慨叹，占石涛诗歌的一部分。这类思想有时在画里体现得比较含蓄，只有在他的挚友题画诗中才可以看出，因此，石涛的画有时必须与别人和他自己的题诗相印证，方知其深刻含意，试举以下诸例：

先看《清凉台题画》系登清凉台有感之作：

薄暮平台独上游，可怜春色静南州。陵松但见阴云合，江水犹涵日夜流。故垒归鸦
宵寂寂，废园花发思悠悠。兴亡自古成惆怅，莫遣歌声到岭头。

充满了故国之思的黍离之悲，但仍有言未尽意处。试看自称海峽遗民的南强在此画上的题诗：

故国河山久寂寞，荒烟丛林共魂销。看师醉舞虬龙笔，万里秋风卷怒潮。

既是“遗民”，知其为前朝故老，故其所见与所思自与石涛画意相辅相成。再看石涛《社集西园送秋分得十二侵》诗：

离离禾黍动愁深，无语凭栏泪不禁。老去悲秋怀宋玉，行来觅句效依林。三千客路
水云梦，九月途穷感慨心。赖有文场诸长者，惜阴诗赋大家吟。

石涛本人也毫不讳言，黍离愁深，竟使他面对摇落的秋光止不住“无语凭栏泪不禁”了。但

这是分韵诗，不像自己吟诗那样自由。再看他在一幅山水轴上的题诗：

摇落吾徒道已非，疏情应与世相违。喜看侠客芙蓉剑，爱说幽人薜荔衣。已有青毡甘懒慢，何妨白眼看轻肥。徘徊燕市悲今昔，易水萧萧红叶飞。

虽有雄心壮志，但知大势已去，尽管“喜看侠客芙蓉剑”，也只能“徘徊燕市悲今昔”，“爱说幽人薜荔衣”了。那么，只有甘守清贫“白眼轻肥”以守自己的节操。他认为“翱翔最爱云中鹤，逼侧难甘茧里蚕。”以及“天影山光皆似染，肯将野服易朝簪？”他追求的是自由，尽管有志难申，他也绝不“将野服易朝簪”去走仕途。（以上引诗均见《砚旅泊停步驿之作》墨迹）

值得注意的是石涛所作一小横幅山水画，画面下端约三分之一处水边作小丘、平屋、短树以及直立的孤细木干，水面一小渔舟垂钓作业。看去似极平常，但画面上端用大字由石涛本人抄录友人张鹤野为此画所题二首七言绝句，其全文曰：

昨乾净斋张鹤野自吴门来，观予册子题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

这是用张鹤野的题诗以点透石涛的画意，而且张鹤野不自己题于画面，却由石涛代抄，尤其值得深思。

说到这里，记起一件往事，也许不少人都曾读过黄敬写的一篇《关向应同志在病中》的回忆录，文中写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喜看书画作品，看到这幅画时，他不禁极有感触地说：“你看，大地鱼虾都捕尽了，还要搜刮，可见剥削之残酷。”关向应同志理解到诗的内里是暗喻当时社会的征敛之重与百姓难堪之苦，可谓深得石涛之画旨。

石涛诗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当属对当时社会水旱风雨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大胆暴露，试引以下诸作为例：

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元一六八四年）的正月十五，正值元宵节赏灯的良辰，居然风雨雪霰一时袭来，造成灾害，贫富人家处境截然不同，对此石涛在诗中作了深刻的反映：

雷电轰开新甲子，风雨雪霰何时止？蛟龙入海百虫伤，鸟鹊投入为食死。中天有怒降灾殃，非时雨雪多不祥。回天转地贵自力，古来过分谁久长？纷纷豪贵赏花灯，只论一醉何论金？东家老翁多黑坐，欲眠不眠愁水侵。

在这里，石涛以激越的感情，大胆地写出他对这次气候反常的感受。他非常气愤地指出，在这种情势下，有钱人“纷纷豪贵赏花灯，只论一醉何论金？”而平民百姓呢，非但无钱也无心绪观赏花灯，而且“多黑坐”，连一般的灯油也买不起，他们“欲眠不眠愁水侵”，再困倦

也不敢入睡，因为要提防水患的袭来。当他揭露出在大灾面前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实时，进一步喊出：“回天转地贵自力，古来过分谁久长”的警告性语言，他认为，要改变自然灾害不能靠天，而是要人们“贵自力”，重视自己的斗争力量。而且认为，这种灾殃虽属自然灾害，但也由于社会治理不当，“古来过分谁久长？”矛头敢于直接指向当权者，胆子可谓不小。

对于百姓来说，水旱都是灾难。再看他对旱灾的担心和喜雨的愉悦。在一首题作《癸亥夏日客吴山亭喜雨对坐》的诗中，他既画出了一幅烟雨苍茫的山水画，又高兴地题上这首诗：

五月六月六十日，口口南风抱双膝。但闻霹雳火云堆，枕簟欲焚望山鹑。城中豪富十万家，米贵金多何用嗟？农子吞声互相泣，相逢道看秋胡麻。五日禁屠三日开，欢声饱肉轰如雷。立坛祷雨雨不至，坛收雨下天何催。天有至道非人力，安坐但听空中极。空中极，极不亟。大坛小坛饱我林，世外何劳共太息！

看出他对两月不雨的焦灼，更看出他对喜雨的振奋，而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大旱面前城中的豪富“米贵金多”，非但不用“愁嗟”，而且可以借荒灾以敛财。而平民百姓“农子吞声互相泣”。是这样鲜明的对照，牵动着这位世外高僧的心。在这里，石涛的心是和人民相通的。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元一六九五年）石涛客巢湖时被洪水阻留，人们劝他登凤阁以排遣忧怀，他为此画了一幅《巢湖图》，而且颇有感触地写了《登凤阁二首》以纪其事，他说：

百八巢湖百八愁，游人到此不轻游。无边山色排青影，一派涛声卷白头。

一开头便点出水患使他处处生愁，即使登阁想排遣忧思，而心绪仍难改变，所谓“游人到此不轻游”，人们的心情依然是沉重的。他更想到巢湖一带连年旱灾水灾交替为患，所谓“巢湖地陷赤乌事，四邑水满至今灾。”先陷于旱灾，现今又是“四邑水满”，他感到无法使自己高兴，“几日东风泊沙渚，途穷对客强徘徊”，可以看出他对于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怀。与此相类的尚有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六月十六日，雨后洪流千里，直下淮扬，两郡俱成泽国，极目骇人，难安心地……”，他写了《记雨歌》纪其灾害给地方和百姓带来的灾难：

四月五月天不昼，风师雨师天不宥。家家向水不观天，却笑天人两不究。雨深水塞路不通，农不望耕市不贸。人民畏雨不畏天，只怪司天错时候。……

淮南三十六扬州，千里洪波倾水窦如此多雨无奈何。何当又被水之又。

沿途向驿往来希，州岸城围悲莫救。世间薪米喜者登，世外轸恤真难救。乾坤不发眼前疮，人民怎去心上肉。

水患使他“极目骇人，难安心地”，水旱灾疫、百姓疾苦，时时掣连着石涛的心，他用画笔、用诗歌暴露现实，从而抒发自己的忧心愁绪。

在石涛的诸多诗作中，尚有对荒淫无度的统治者的鞭挞，比如《淮扬洁秋图》中长诗批评隋炀帝的荒淫误国，便是一首深刻的咏史诗。也有对普通百姓可贵品德的歌颂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景仰等等，限于篇幅，恕不列举。

这便是本文中要评介的石涛。全都根据他留下来的手迹墨本进行开掘，史料是可靠的。石涛是高僧，是画圣，此为世人皆知者。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杰出诗人，一个血性男儿，一个优秀的炎黄子孙，一位三百年前的奇男子。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全面的认识石涛的为人以及进一步研究他的作品及美学思想，都是有意义的。

罗雪堂兴农思想句玄

萧文立

引言

要义第一

甲兴农之道

乙兴农之术

丙兴农之事

特异第二

甲现代眼光

乙实践精神

丙系统意识

渊源第三

龟鉴第四

践履第五

甲兴农实务

乙兴农教育

丙兴农宣传

引 言

於戏上虞罗雪堂先生其异人乎！文立曩梳理先生之教育思想，以为虽成于百有馀年前，而其原则宗旨、方略措施，履理切心，一贯至今，在在切实可行，诚所谓俟诸百世而不废者。其详已具见拙作《罗雪堂教育思想柬释》（载《白云追思集》），兹不具论；今掇拾先生之农学思想，益惊叹先生之目高于顶，境界深远，规划井井，措施得力，一同其论教育，洵百有馀年我中华实学思想之典范。案其所论，约之再约，概以五端，

曰广开利源以富国裕民，

曰奖诱劝导以扶助殖产，

曰注重流通以发展经济，

曰利用科技以改良产业，

曰保护环境以持续发展。

凡此皆今世发达国家所以发达之故，亦我中华近世以降所以落伍之原。今之人或以我中华曾无一人会此妙道要义，而詎知百年以前，即有高瞻远瞩、洞悉款要、周密计划、大声疾呼如雪堂先生者乎？世之人咸痛诋先生晚年之失足，有戟指痛骂为老贼者，有委过诬衅以自示其清白者，有苛责先生不食周粟为矫情要誉者，有居高临下轻薄先生陷身泥沼为必然者。甚且先生早为家督，长而博综繁巨，略备经营之才能，小焉者自食其力，振恤灾黎，大焉者弘扬古人之绝学、延续古书之生命，亦横遭诬衅为奸商市侩，先生几于永世不得翻身矣。然曾几何时，奸商市侩，摇身一变，今之人又摇尾乞怜，竞相奔走，以谋杯羹之不暇，纷纷为之粉墨登场，被之管弦，讴歌唯恐不足，而仍污先生不改旧涂。且先生有功现代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之巨，事实如山，世之学者，不得视而不见，抑仍造作种种讹言，以图丑化之渺小之：以为不过多印古书，多蒐集考古资料而已，甚或指责所刻书，动辄兼金，不啻垄断，学者望洋向若兴叹；以为学不逮王，攘其心血，以区区数百元，逼王自沉；以封建礼教，诱王同流合污，为溥仪殉葬云云。苛责谰言，自薄厚人，狙于情理，而层出不穷。然则反躬自问，即今之世，出版机构以国家财力为后盾，此类图书定价之昂，雪堂亦瞠乎其后；考古发掘报告，学者望眼欲穿，持久不得一见；又不知观堂于世事主见甚深，于做人极重人格，断非“老实得象火腿”，不谙世事；“拖观堂下水”云云，不独厚诬雪堂，实置观堂于何地？甚矣，雪堂先生之蒙污受垢久且厚矣！世之人有目无心有眼无珠众且甚矣！今若宣示，雪堂先生匪徒大有功于我中华学术之兴灭继绝；当有清季世，拳拳服膺我先儒古圣正德利用厚生之义，以教与养为致君尧舜、再醇风俗、富国强兵、自立世界之涂术，为稳健务实之改良党，与康梁斤斤走上层政治路线，谋兴宫廷政变，孤注一掷，希冀万一倖进者，有上下床之别；于新式国民教育与新式农学，为先知先觉，凡所论述，振聋发聩，百世以下，仍为对症之药、治本之策；文立知或以为妄言惑众、立异鸣高，则请少安毋躁，雪堂之文章具在，曷学而后知不足乎？若甚而以文立谋为“巨奸大憨”招魂张目、别具肺肝，则惟有为今人惜，为雪堂痛，更为我中华哭而已矣！於戏，糟粕所传，丹青难写，王荆公固痛切言之，文立复何言哉！复何言哉！岁次癸未秋分，蓬莱后学萧文立，谨记于莲湾锦绣寓居之双守窠，时方侵晓，彷徨绕室，掷笔三叹。甲申清明稿定。

要义第一

甲兴农之道

清之末造，国用之绌，捉襟见肘，尽人皆知，开源理财，当务之急，亦人之共识。

《垦荒裕国策》：今日寰球各国，财政之支绌，莫中国若；而理财之易，亦莫中国若。

财政之绌，待用之殷，莫今日若；况又当外侮内变初定之际，理财之策，更须妥筹；若聚敛失宜，国益不堪。故得百分利之策，不如得一开源之方。

理财之策，众说纷纭，涂术百端，雪堂则以兴农为理国治生之本原大要，

《农事私议序》：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外侮频仍，海内虚耗，利用厚生，尤为要图。

《郡县兴农策》：今日理财，利远易兴者，莫若农。

《农政条陈》：阜财之道有三，曰农，曰工，曰矿。三者之中，农之利尤远而效尤速。

《务农会略章》：农居四民之一，虽与工商并称，然必地面生材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

《务农会略章》：中国患贫久矣，谋富者颇不乏人，要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此固当务之急，然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

论其效，即以垦荒一例为言，已足惊人。

《垦荒裕国策》：（东三省不计）今以至少之数断之，假定各省荒地为一千万平方里，令民间垦熟，至第五年，国家收地九万顷，岁收九百万元；第三十年，除去赏功田十分之一，计五万四千顷外，增官田为四十八万六千顷，岁收四千八百万元。国家不费一钱，而坐至每岁数千万之巨款，其利岂不溥哉！

且农本为我国传统，然揆诸当下实际，则我国农事，既不如古，更不如西。

《农官私议》：今举古今中外之农业而比絜之，今不如古，中不如外，盖彰彰矣。

《务农会公启》：中国地处温带，气候和平，风雨时节，西人每叹为全球沃壤。秦汉以后，教稼明农，久置不讲，土宜不辨，嘉种不求，丰穰之岁，仅足事畜，一遇水旱蠹贼，束手坐叹，农民日贫，生计日蹙。近日西学大兴，有志之士，锐意动商诸政，而于农学，绝不讲求，未免导流塞源，治标忘本（载于《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务农会略章》：中国壤土之沃甲地球，乃汉唐以后，民趋末富，不究根源，致士夫不辨粟麦，农民贱于舆台，土壤不辟，水利不修，耕畜之技日绌，收获之效逾微。使再阅数十百年，将并从前之农法农理，尽失靡遗，可惧孰甚？

《务农会略章》：古人农事最重，《周官》所载，任土辨物，理教粲然。后世以农

为贱业，于是有农事无农学，一切辨土宜、兴水利、制肥料、防螟等事，虽叩之躬亲南亩者，亦茫然不能措对，不知其法，遑论其理！

所以如此，首在无专官以理兴农之职。

《农政条陈》：古昔，农事掌之司农，今日欧美各国，亦特设专官，以重其职守；而中国之户部，虽曰承司农之旧，然不修其职久矣。

《农官私议》：夫以中国地土之广，气候之适，人民之多，古今无异也；絜之欧美，三者殆皆逊于我；而我之农事，有退无进者，何哉？不立农学启发之，不设农官以维持劝厉之故也。

欧美各国，特立农商务省，以司农商之事。凡山林、道路、水利、畜牧、制造、学术、税课，一切官为之定法令规则；欲兴一利，民力不足者，官为补助之；发明一器，可以利用者，官为奖励之。于是民智日启，事业日兴。稽之于我三代之法，殆无以异。

三代农官之可考者，以周为详尽，上自司徒，递次而甸师、载师、甸师、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鄮长、里宰，以至草人、稻人、土训、廩人、仓人、司稼，所以教稼利氓、急时简器、稽数收敛者，至周且密。

秦汉以来，虽存大利归农之说，而司农之职，不修久矣。至今日，则由户部以迄牧令，不闻教稼之举，而徒有催科之令；无官为之保护启发，而责农夫以田事之不修，乌乎可！

故兴农之首务，在专设农官以诱农。

《农官私议》：今日欲修农事，立学固矣，而设官尤亟。

《郡县兴农策》：今日治民，切近而易图者功，莫如牧令。以牧令之力兴农，而佐之以士绅，行之十年，利源不十倍于今日者，殆未之有也。

《农官私议》：《记》有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立官，其兴农之始也夫？

其农学各篇议论，结末大抵归结于是在贤有司之提倡诱导耳云云，可窥其重视官员提倡之亟。至其要论，一设专职农官，明其职守，

《农政条陈》：今宜改户部为农部，设长官一人，次官一人，属若干人，以掌天下之农政。至各省农政，则统于各督抚，而分任于各地方官。农部主颁法令，掌册籍；督抚主劝耕垦，课官吏，励学术；地方官主任管内兴农之百职事。如是，则责有攸归，而政可举矣。

《农官私议》：仿宋代以提点刑狱官兼任劝农使之制，而今各道之道员兼摄劝农事

事务，管内之农事辖焉。凡荒地之开垦，水利之兴修，学堂之建立，制造之规创，皆责之，而尤要者，则在以劝农之勤惰课吏。

《农政条陈》：农部既立，各省督抚宜立农务局，考求地产及劝业课吏等事，选谙练农学者为之长，更遴选委员之熟悉农事者，于各府县查考农事状况。委员之责：每县绘农地图一，撰物产表一，呈农事状一。农地图以记沟洫田亩之数，物产表以记管内谷产、水产、林业、制造以及岁收之多寡、价值之贵贱等；农事状则记田亩荒熟、土性腴瘠、人工勤惰、水利通塞、艺事优绌等。局长更就本地情况，而筹兴利劝业之策。如是，则各省之地产可稽，而殖产改良之法，乃可施行矣。

《垦荒裕国策》：每省立稽查荒田局，设员总其事。局中总办，必选夙究心农事、能举其职者，不拘资格。局中散员亦然。

二以兴农为地方官考核之要则，严其赏罚，

《农官私议》：凡地方官能垦荒、兴学、修水利，实力创办者，予以异常之奖励；政学不修明、荒芜失治者，褫罚之。

《垦荒裕国策》：由大府飭各地方官呈报管内荒田之数，绘图贴说，不厌详细，予以期限。逾期不报及报而不详实者，一经查出，轻则降调，重则斥革，以示惩戒；其举报速而查核精者，予升赏，以示优异。

此次垦荒，务谆戒地方官，令不得如从来故事，敷衍禀报，苟且塞责；故必须派员核验其禀报，以行赏罚。总以不留一寸荒地，令地利尽辟而后已。

其所例举之兴农各事，无不以提倡兴办，责之于官。其详具见于下论诸项中。

三重视绅士即社会自组织力量之作用，

《农官私议》：更举绅士明农学、公正肯任事者为农正，令佐长吏从事焉。事治职举，奖之；与振荒河工军营等不称职者，易之。

四奖励农民之经营自主。主张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奖励农户发展生产，改良农事，并保护其利益。如论垦荒，鼓励农户开垦荒地，由民自主兴办，民与国分其利。

《垦荒裕国策》：凡荒地无论多寡，既由一人领垦，则资金由其自筹，章程由其自订，或招股，或独任，地方官不加限制。领田时不须领费，垦熟后亦不必升科，惟必限五年内垦熟，捐其所垦之田六分之一于国家；再五年，又如之；以后每五年，须捐其田六分之一；三十年而尽收为公田矣。

其详见下节所述。如论改良品种。

《农政条陈》：必以学术改良畜牧之术，而增加岁产。凡有自外国购入牛马嘉种，及增

殖一本地夙无之畜产者，悉免厘税，以奖励之，为宽定年限，及期，然后收税焉。

优惠政策，须广为布告，以免官吏因循守旧，上下里手，未有实利，反受其害。

《垦荒私议》：以上诸端，必颁诸条告，由督抚飭令长，由令长颁示通衢，家喻户晓，人人知垦荒之有利无害。向日之所顾虑者，一旦旷然清之，如是而地有不垦，民有不劝者，吾不信也，吾不信也！

乙兴农之事

雪堂论兴农之事，其要有七。

《郡县兴农策》：一曰开荒芜，二曰兴水利，三曰考物产，四曰兴制造，五曰课农学，六曰厉林业，七曰兴牧利。

以言其详，一曰开荒芜。

《垦荒私议》：谋富之道，莫要于兴农；兴农之端，莫急于垦荒。

《垦荒裕国策》：此策之宗旨，在令民间以私财垦荒田，三十年间，逐次收为公田，归之国家，以充国用。

垦荒之先，须相荒地之种类。

《郡县兴农策》：中国各行省，其上壤开辟者十之九，其下壤不过辟十二三耳。加以兵燹之余，未经垦复；江湖之侧，淤垫初成；及因事故而封禁之山林，因争讼而闲置之腴壤；如是之类，在在多有，均宜设法招垦，以兴大利。至斥卤之地，向无种植；瘠薄之区，岁收苦少者；又可依学理，为之改良，增其收获，此又收效于垦荒之外者也。

然垦荒之事，难易互见。所难在体制，即土地之所有权。

《垦荒私议》：夫大地不耕，一旦而募人夫、施耕锄、步嘉种，期年无不收获者，此至易之说也。而官荒有胥吏之需索，私地有原主之把持，此又至难之说也。

据此，雪堂约举垦荒之务为五，主旨在激励开荒者，保护其利益。

《垦荒私议》：一曰编荒籍。由地方主吏，查勘管内荒地，籍其坐落亩数，分官荒民荒二宗。管地之大者，三五月靡有不悉者。荒籍既立，则管内之荒数可稽矣。

二曰禁把持。荒籍既立，官私既分，乃由长吏布令，凡管内私荒，仍责原主，限一年内开垦。若逾期不垦，即改私为官，听他人领垦，垦熟以后，原主不得争执，以愆愆而弭争。

三曰蠲旧赋。新垦之户，从领田之日起，算定限升科，以前旧赋，悉予蠲除，胥吏不得诈索。

四曰缓升科。六年开科，原有常制，然考之康熙十二年，有十年起科之诏，雍正元年，

有旱田十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著为定例之诏；今上诏旨屡次颁，谆谆以为民兴利、并不重在赋税，晓谕有司；各省地方官，宜体圣上重农兴利之意，缓其升科，以厚民力。垦户不尽富民，有举债从事者，缓其升科，则踊跃恐后，无虞竭蹶矣。

五曰奖垦户。垦荒予奖，著在前典，今宜破格施行，以为民劝。有开地千亩者，予职衔；数千亩至万亩者，益优其奖，且由本省督抚颁手谕以褒美之。如是则人情益奋励矣。

《垦荒裕国策》：领垦之人，国家须加厚奖，以导诱之。宜定例令，有垦田五千亩者，予七品官；垦愈多，赏愈加，以是为差。凡垦主垦地至三十年期，第六次缴田时，再格外加恩，予以赏功田，其数视所垦之多寡，要以十分之一为率。赏功之田，永远不税，以示国家旌劳劝农之意。

《垦荒裕国策》：或谓开地五千亩，赏七品官，毋乃太优乎？曰，依筹餉捐例例之，殆未为过。荒田垦熟，至贱之价，每亩值十元，五千亩值五万矣。乌得为太优？

《垦荒裕国策》：凡民已垦之田，日后若须用为铁路、工厂，无论为官为私，皆给其田值，其价与他民间熟田同，不得意为低昂。又开荒时所购农具、机器、种子、牛马等，应准免各税，以资激励。

垦荒之利，利在国家、垦户与垦主，所谓效速而款巨，富国而益民，不损民间固有之财产，而开万世不竭之宝藏。其详，《垦荒裕国策》有分析计算。为鼓励垦荒，防范利益外流，雪堂主张以国家财力借贷支援垦主，而不得举外债。

《垦荒裕国策》：垦主力不足，应准其以领垦执照至银行贷银，但仅能在中国银行，不得在外国银行，亦不许借外国债，及招外人入股。若犯以上所说，除夺奖不给赏功田外，更加以相当之惩罚。至向银行贷款，亦有程度，每万亩所借，不得逾万元。

二曰兴水利。

《郡县兴农策》：水利为农田首务，水利既兴，则农事整理过半。

《农政条陈》：水利为农田要端，水利不兴，则地利因之而劣。今宜略师古者沟洫之制，为垦荒式，俾民遵守。其详细，可仿日本整地法令，而相宜变通之。

《郡县兴农策》：地方官宜考求四乡之沟渠几何，田亩几何，若者已兴水利，若者未兴水利；其未兴水利者，宜责民鸠资为之；民力不及者，官贷金焉。至官款如无可挹注，可以地方之积谷贷之，而岁收还焉，与粮并征。盖积谷原所以防荒歉，而水利之兴，实可增岁产，二者固相辅而不相背也。

三曰考物产。

《郡县兴农策》：物产多者民必富，少者必贫。

《劝业私议》：土产之多寡，地方之贫富系焉，郡县之贫富、国家之强弱判焉。是土产者，生人之大本，国家之枝干也。

四曰兴制造。制造品种类甚多，

《农政条陈》：农产制造，如制麻、造纸、织绸、纺纱、酿酒、制烟草、制罐藏食物、编草帽纒之类，其事甚多，其利尤渥，宜一一劝民兴业。

欲兴制造，首在官设劝业所，扶助辅导农民从业。

《农政条陈》：每地方宜设劝业所，聘请技师，招集平民，分类学习。且设立劝业所所用之费，即可于所制物品取之，不须别筹。

发展土产加工制造业，可开拓利源，堵塞利益外流，

《农政条陈》：地方多一制造品，则外国少一输入品。

《郡县兴农策》：夫物产虽富，以其原料输出焉，其利五，而以其制品输出，则其利十；是故制造尚焉。

然而制造应先求自用而后谋输出，以利民生为第一要义。

《农政条陈》：（地方多一制造品，）贫民即多一生路

《郡县兴农策》：然制品首宜充境内之用，如织布、缫丝、制糖、造油、酿酒、焙茶，先从事于日用之品，而徐及其他。

五曰课农学。雪堂论教育，即一本我国圣贤遗教，困而后知学，故以兴义务教育、国民教育为第一要义。论兴农，自亦极重教育，以提高农民素养，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务农会略章》：事无巨细，非学不成，必使农田所在，皆有学堂，负耒之民，咸新理新法。

《农政条陈》：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

《农政条陈》：海产之利，不亚陆产，今中国海岸南北数千里，殖产寥寥焉，其故何哉？民智未开，人力未尽也。

《郡县兴农策》：今者农业之衰，由于农不通学，士不习农。今遽欲责不识字之耕夫，而使读书，无宁使读书者以考求农事。然欲如东西洋之立农学堂，经费浩大，不易观成。计莫如府设一学，而每县则设农谈社，取今日已译之东西各国农书，分门讲肄，牧令于寻常书院考试艺文以外，别课农学策，优者奖之今官派之《农学报》，阁置可惜，若颁发于书院中，前列诸生，劝其肄习，其功甚大。有欲开试验场、售种所者，地方官力扶助之，以速其成。如是，则士大夫之知识日启，农智亦可渐进矣。

《农政条陈》：立学之费，宜仿日本札幌农学校之例，垦荒地以为学堂产业。无论官立

私立，皆得承领荒地，多者数千亩至万亩，少亦二三千亩，但筹垦本及建校费，逮荒田垦熟，即以岁产为常经费；不须别筹款项。私立之学，则除拨给官荒外，垦熟后永不神科，以为之劝。至卒業之学生，不分官私，概由政府给文凭，将来为教习及地方查考委员，尤优者资遣留学海外，归来升之农部重任焉。

《垦荒裕国策》：公田收入以后，可令将来肄业农学卒業之士为田畷以掌之，每地千亩，设立田畷一人，任课耕收纳之事，教民以改良之法，以增岁收。其所赢之金，即为田畷之劳金，而租额则仍亩收一元。但无论丰歉，不得短绌，惟大凶之岁，乃得酌免。如是，则田野既辟，农学亦日臻进步矣。至田畷之能举其职与否，应不时访察，以行劝惩。

六曰厉林业。

《农政条陈》：泰西山林之利，优于植谷，然十年树木，见效稍迟，中国人民见小欲速，以致林利不兴。今于中国兴林利，莫过于长江之滨及沿海各处，与夫黄河之侧、童山之巔。若能处处种植，十年以后，岁产必增数千万。但宜仿东西洋各国之制，立林务官以为之防守。其办法，可分官有民有二者。

《郡县兴农策》：林业用少而得利迟，然隙地废壤、荒山斥土，靡不有所宜之木，宜导民种植，以收馀利。

《振兴林业策》：今为之策曰：地方有荒山或斥卤，相其地之大小，百亩立之监，监以下，役夫五，合六家为庐舍，从事看守，司培垦。田主起庐舍，购苗木，并给林监及役夫一岁之食。苗木未长，荫翳不生，其下值农用工用杂物若蚕豆、麻、药草之类，所受之利，足给一岁之食。林木则榆、柳、茶、柏、桐、杉、栗，相宜间杂植之。柳五年可薪；茶、桐五年以后，可榨油；杉、栗逾十五年，中材利无穷矣；若更值榭，则三五年后，可饲山蚕，又兴蚕丝之利。如是佃既足食，更以纳课，田主第一年出资，第二年后便收微利，逐年增加，十年可收成本，十年以后，食利不已。

其《运河堤种树说帖》，分六端，详细述河堤种树几何值价几何、间伐办法、看守之法、官办不如民办与民办收益之法、养寒户以受保护树木之效、种树固堤。

七曰兴牧利，重视一家一户小规模，不求盲目发展大牧场之无裨实际，但图虚名。

《郡县兴农策》：今郡县兴牧利，亦宜为小规模者。盖在大牧养家，须大场地、多人夫，失利甚多，而畜多易致病，损利尤甚；不若每家以馀隙地为之，合四乡所畜，足抵设大牧场百数，而费用则不及什一焉。苟购置牛羊鸡兔种类之佳者，俾民繁殖，数年以后，其利溥矣。

《农政条陈》论农政要领九目，

一曰设农官，二曰考农事，三曰奖垦荒，四曰励农学，五曰兴林利，六曰兴牧利，七曰兴海利，八曰兴制造，九曰立赛会。

与此所言七事略同。考农事即农官之职事；奖垦荒即开荒芜，约其事为三，曰稽荒数，曰缓升科，曰定田制即兴水利，比《垦荒私议》所述为简；励农学即课农学；兴海利、立赛会为新列项者，略曰：

《农政条陈》：尝闻中国海面，鱼物甚夥，自渤海至吴淞口，鲨鱼之多，不可胜计，为欧美水产学家所艳称。今若于此兴捕鲨之业，其利甚厚。又北自渤海，南至广东，若处处殖以贝蛤牡蛎之类，岁入必增数千万。今宜劝民于南北洋立海利公司各一所，而贷金以助之，责以岁偿。

《农政条陈》：天下一切事物，比较优劣，奋励之心乃生，此东西洋各国博览会、竞进会所由来也。中国亦宜仿行。凡物产之优劣、农器之利钝、技艺之优绌，并立竞进会，以收观摩之益。此省与彼省较，此县与彼县较，此田与彼田较，比较愈密，进步愈速。但此事必须官为之倡，并设赏品以劳之，可用东西洋成法。

切实实行此九端，则其利益广溥矣。

《农政条陈》：设农官则责有攸归而政可举矣；考农事则各省之地产可稽而殖产改良之法乃可施行矣；奖垦荒则可黄政兴而地产丰矣；励农学则学堂可遍立而人才出矣；兴林利则林利兴而材木不可胜用矣；兴牧利则牧利兴而民知劝矣；兴海利则海利可兴而殖产必丰矣；兴制造则工艺兴而农利厚裔；立赛会则人智起而进步捷矣。

其余论兴农之细事，尚有僻地粪田。

《僻地粪田说》：中国肥粪，以人粪为大宗，而辅之以烬肥，是均非附近通都大邑，不便取求，若在僻远之区，非筹人粪烬肥之代用品不可矣。试略举四端于后：

一曰种牧草以兴牧业。今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米草，半种谷类，以牧草饲牲，而取其粪，地为牧场，洩溺所至，肥沃日增，必岁易其处，今年之牧场，为明岁之田亩，如是不数年，瘠地沃矣。至所畜之品，以牛羊豕鸡为宜，而豕鸡之用途尤广，粪亦最良。但饲草以外，须兼饲秕糠耳。

二曰种豆而兴制油业。豆科植物，叶多腺管，能吸取空中淡气，培养土膏，故不施肥料。亦能生长。但所种之豆，宜就地制油，而留取豆粕，既可直以肥培，且可饲牲，而以畜粪粪田，利尤厚也。

三曰用绿肥。大凡肥粪原料，不出三者，曰动物，曰植物，曰矿物。绿肥者，取植物枝叶，沤腐以供肥壅，一切植物，皆可用，而以豆科植物为尤。若豌豆，若紫云英，若苜蓿之

类是也。然天然植物，随在可取，若草木落叶根茎，虽腐化较迟，然以人造尿水浴汤池淤等浸而腐之，亦资利用人造尿水法，见日本人著《肥料效用篇》。又草之为物，蕃衍甚速，谚谓一夜草生九子，其证也。若于小沟洫及低洼水地，皆散布草种，待成长，捞取粪田，腐化速于他物，其益尤洪也。

四曰用土肥。此有烧土垒土二法。烧土者，削表土约二三寸，处处堆积，和以残株败梗，徐徐烧之其法详见日本农学士原熙《肥料篇》，于黏土最宜。垒土者，乃抔土为击，岁垒数堵，每逾一二年，墮而培田，功等他肥。盖新土垒壁，则土面吸受大气中养分，兼受日热，又经严冰朔雪，融解而松土性，一时顿化熟土也。

丙兴农之术

雪堂兴农思想之奥衍，端在兴农之术。雪堂论兴农之涂术，广采东西洋当时止先进方法，不独至今尚多有可用，且高瞻远瞩，其精神遗意，遥接当今世界先进潮流。

一曰广开利源以富国裕民。除种植业外，林业、水产业、加工制造业、流通业，一切可以富国裕民者，均在雪堂所论需开发之列。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若中国之果品，质良价贱，宜改良向者贮藏之法，而习罐藏之术，以运输欧美。

讲求殖产。

《论海滨殖产》：海滨殖产一日不讲，则漏卮一日不塞，此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荒地之不适宜兴农者，亦须各相其宜，以充分利用。

《北方农事改良议》：北方又有斥鹵下地，废弃不耕者，此非不可种植也，若于此植稗，亦能成长但稗有水陆二种，海滨湿地，宜植水稗，无水之地，宜植陆稗。每亩所获，并稿计之，岁可得银二三圆，所收之稗，人可以饱，且可饲鸭，稿可薪，三四年后，即可植甘蓝荞麦矣，再数年，可植二麦矣。若兴水利，则得效尤速。至斥土之不毛者，亦可种树，可深耕，土面令松，和以堆肥绿肥，冬期再耕，令土面冻结，春而融解，再和以马粪人粪，而植松柏之苗木，十可活八九，稚苗既生，一二十年成材矣。

对国人弃置明显之大利如种树于不顾者，深表诧异。

《江干种树议》：中国扬子江东西蜿蜒数千里，流域及数省，东南之富源，悉钟于此。濒江都邑，人口悉繁密，宜若无弃地矣；乃试由吴淞航行而西，帆樯所指，两岸平芜，一望无际，森林密荫，殆不可见，沃壤膏腴，弃置不顾，可惜孰甚焉？

又操奇握赢者变天下，而目前冲要之区，每岁数十万舟楫之所来往，而漠然无加意于此者，可异又孰甚焉？

《江干种树议》：今长江两岸，广袤如彼，若以植树，可种榆柳十馀行，每里计之，可得万馀株，若上下游遍植之，十年以后，受利且数千万。

尤重兴利与赈济穷苦无告之人之一举两得，

《垦荒代振策》：国家即富足，安能遍失业之民，而人人授之食，令安坐待哺哉？亦授之业，令自养而已。

垦荒主张以垦代振，即以所得教民学艺以自活，寓赈济饥民于垦荒之中，

《垦荒代振策》：一查荒地，二定垦法，三甄别饥民之老稚，四购牛种，五谋善后兴工院。依次行之，不周年，而效著矣。

《垦荒代振策》：振荒无善法，自古为然，而以工代振，较为得策。但世所谓以工代振者，不过修城隍、浚川河等事耳，究不如以垦代振为尤善。盖以工代振，虽成一时之工，不能兴长久之利；若垦荒代振则否。

考殖产之事，有三要焉：土地也，人力也，资本也。以振代垦，则以无数待食之人，鸠集备振之款，而令从事于南亩，饥民自食其力，而振款又不至虚糜，岂非两得之事哉！至所垦熟之田，即永为备荒之用，但与寻常积谷备荒之法，当为之变通焉。将田亩所入，创为教工院，收养贫民，教织布、纺纱、刻书、制器、刺绣、雕刻等艺，售物所得之利，半以劳工人，半以备蓄积。岁岁推广，人人得业。民即遇荒歉，工作馀资，足以自活，不待振矣。况更有蓄积之金，可为平糶之用乎？

种树亦寓赈济之意。

《振兴林业策》：前之所谓林利苦迟者，令之速；养佃费多者，令之寡；作践盗伐者，得佃防守，而无意外之虞；以荒土活贫民，而更受利毓材；一举而三善备焉。

《江干种树议》：今市井多徒手之民，朝野有屡空之叹，若于此加意，益国利民，一举而数善备。

二曰奖诱劝导以扶持殖产。注重引导示范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去年，寿州孙君首试种美国小麦于扬州，结实壮于华麦殆倍，不仅质良，收量亦增。且欧美之麦，有红皮白皮二种，白皮者适燥地，红皮者适湿润地。是地无论燥湿，均可择种而植，其便利孰甚焉？

《北方农事改良议》：夫一易再易，载在往籍，有莱有田，亦著前典，然彼蚩蚩之邛，固未可语此；势非有志之士，躬行而诱导之，先示之以成效，而后示之以理由；如是则疑议

不作，而率由者众，民智日启，地利日兴矣。

与实际支持。

《垦荒裕国策》：开荒时，所购农具、机器、种子、牛马等，应准免各税，以资激励。

《垦荒裕国策》：垦主力不足，应准其以领垦执照至银行贷款。

奖励则物质与精神并举，

《劝业私议》：凡本管内向无之物产，有能谋兴创者，给凭褒奖之，许免厘税十年；届期业渐盛，半税之；再十年，业大盛，乃全税之。

垦荒之奖励，已见论垦荒条。奖罚应分明。

《垦荒裕国策》：垦户领田至第五年，仍未一律垦熟者，仍照收六分地之一为官田，而不给奖励，俟全田垦熟，然后行赏官之典。若所垦地已五年，而仍未垦至六分之一者，夺其田，予他人。

新垦之田，不得植鸦片等病国殃民之物，著之令典，违令者夺奖，不给赏功田。

三曰注重流通以发展经济。

《废物利用说》：天下之大利，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流通之。三者交相为济，如环之无端。

其论流通，一则重促进国内生产，物尽其用；一则注重输出国外，挽回利权。国内之流通，要须蠲除苛捐杂税，实行优惠，

《劝业私议》：地方素无之土产，不难以人力谋兴盛，而今日二十馀行省之大，从未见辟未有之利源，创新兴之产业者，其故何哉？无劝业之经，而有厘税之苦故也。

《劝业私议》：准人素不事蚕桑，劝以兴此业，不顾也。叩以故，曰亦知此利厚，然地不织绸，得茧必外售，载货出，不百里，厘卡已经二三，本且不保，利于何有？谁为此者？曰免厘何如？曰果尔，则阡陌间皆桑妇也。

优惠流通，实则有利国家。

《劝业私议》：客或难之曰。厘税充国家要需，免之，如国用何？曰。暂免，非久免；为劝业免，非常物概免也。夫税起于业，民不兴业，税于何有？免税而劝业，业盛而税丰焉，譬之植树以求材也。然方其幼稚日必培壅，萌芽必保护，非爱萌芽也，望其将来之成材也。材成，斯为栋梁矣，为榱桷矣。若方其萌蘖而伐之，安有成材之望？夫创业犹植树，免税犹培壅保护，业盛而税之，犹待成材而用为栋梁榱桷，此理固易明者。

至外贸之有助于挽回利权，发展经济，尤为雪堂所注目，而不惮再三言之。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由商埠而转输入内地者，

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以蕲改良。如此，非但可阻外美之输入，且可输出矣。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迩来各处纱厂日增，而细纱仍仰给东西洋各国，若不早图移植美种，则欲塞此漏卮，未由也。

《振兴林业策》：考海关税册，外国材木进口者，岁有所增，此商途一大漏卮，亟当挽回者。

四曰利用科技以改良产业。于农业最重良种。天之生物有不齐，种类有优劣，欲兴农利，必选他国之优良物种，人工移植以改良本国物种。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上）》：天生农产品，有遍产于大地者，有特产于一处者，有产于此方而优、彼方而劣者，此固造物者之憾事，然可以人工弥其缺也。人工为何？移植改良是已。

《郡县设售种所议》：改良农事，以精选种子及购求佳种为第一要义。

《郡县兴农策》：可以人力移植，俾繁衍也。其法先考求所有物产，凡可以济用阜财者，分类为物产表；更就表中所列，为产品陈列所，以资考究。物产表可颁发格式，悬赏金购之，或发题征文于书院诸生，考核精者与赏品焉。表中不但列其品目，并记产某乡，岁产几何，价几何，赢绌之数几何，赢则售直何处，绌则补之何地，一一备载，庶一目了然，而后可从事于人工移植，而补天产之未备焉。

种植业养殖业需多引进外国优良品种，其尤要者有五，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一曰麦，二曰棉，三曰牛，四曰马，五曰鸡。

《农政条陈》：中国牧利，偏于西北，而东南则少，此固风土所限，然亦人事有未尽也。牧利之大者为牛马，而当改良者亦为牛马，宜选各国嘉种购入以繁殖之。牛以取乳，马以耕战，不仅于农事有裨。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欧洲各国，乳酪之利最饶。中国饮食嗜好，殊于西人，似牛乳非所亟；然今者口岸日辟，外人之来者日众，而饲中国之牛以取乳，其利嗇甚，而荷兰乳牛之良者，则日可得乳湏二斗，是宜移植荷兰瑞士等佳种，以兴酪业。但此业宜兴于附近商埠之地耳。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嘉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鸡有名列古咩者，富产卵力，岁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枚，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

海滨则讲须求水产移植。

《论海滨殖产》：水产业为海滨绝大利源。中国江苏以北沿海，产品盖寥寥焉。此固地气有南北之异，然果以人力补天事之憾，其产品必盛，无可疑焉。夫以人力补天事，以移植为第一要义。

《论海滨殖产》：今考江苏海滨，涂田甚多，土人以其通潮汐，不能种植，弃而不顾。今若以种蚬种蛏，可骤增良田数万万亩。此二物种之极易。

良种不独足以兴农，且与国防息息相关。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马之为物，不仅在服役，尤为战阵所必必需。而中国之马，类皆弩下，此亟宜求西域良种，而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以资刍养，而强我守御。此今之急务矣。

本国固有之良种，亦应选育。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绍兴之蚕种，甲于地球，宜改良制种之术，尽屏向来之恶种，而遍育于各行省。此亦改良之最重要者也。

引进培植推广良种，实非易易，应设立售种所以司其事，

《郡县设售种所议》：购欧美日本各国之种子，或此省而购彼省特产之种子，有旷时日、费资财，而终不可得者。计莫如各处设立售种所，以便志士之购求。

售种所之职司有五。

《郡县设售种所议》：一购选种器。若试盐水浓淡之比重计、验种子甲折力之器之类。

二曰讲求欧美佳种，凡购求外国之种，或中国夙无者，或中国有而不如外国产之佳者，若欧美之麦，英伦之葱，美利坚之棉与玉蜀黍，印度之蓝，推之农用动物，如瑞士之羊，意大利之蜂，荷兰之牛，亚拉比亚之马之类，皆罗而致之，以广传殖。

三曰设种田。美国植棉，专设造种之田，择向阳平坦之地，厚其肥培，专于此培植棉种，较种棉采花，其利尤厚见《美国种棉述要》。今宜师此意，立种田，俾得繁殖，免远求之劳，而收倍蓰之利。

四曰教种植法。凡售种处之种，或来自外国，或传自远省，求者或昧其培植之法，宜于包裹种子之纸袋表面，载明其名目及贮藏之法、栽植之时期、性质之宜忌若土质之干湿之类，以便览省。

五曰造新种。近欧美学士，依植物学新理，施人工媒合之法，以人力改良植物之

种类，故近来植物新种类日出不穷。譬如朝颜即牵牛花，一供玩好之微草耳，品种至简，而日本人从中国求种，以人工媒合之，近得种品万馀，辟广园植之，其从事于培植者，称朝颜师，几如治专家之学者矣。今宜从事媒合之术，而为种子改良之计。

种子引进，尚需因地制宜改良。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下)》: 美棉之质软丝长。美棉移植于华，成熟之期，稍后于吾棉，而畏霜特甚，宜早种；且棉实上仰，畏雨浸渍，此其所短。若取通州棉种，与之交配，必可改其上仰之性，短其成熟之期矣。

务农会会员寿州孙荔轩于扬州连年试种美国小麦成功，其友高邮杨昂以标本赠会中，并详为解说，雪堂乃笔记之，成《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附以中美麦穗之实物比照图。叙述既竟，雪堂意犹未尽，又加案语，论必须因地制宜，改良美国良种，以求更适合中国土地。

《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 美种小麦之穗，壮于中国寻常种且倍，富于小粉质，杵粉洁白，而华麦则逊之。然剖视而察以显微镜，与华麦较，则华麦明而美麦暗，盖华麦胶质较富也。且收成之期，亦华麦短于美。由是观之，华麦尚非无可取也。尝考美国种之植物，迻植中土，靡弗宜者，惟较之中土产，收刈皆后期，殆美国温度高于中土，故迻植温度较低之地，不免延其期耳。美棉亦然。今欲为之改良，宜依植物学新理，取华种之佳者，与美种施人工交合，则向之成熟期迟者，必改而较早，向之胶质寡者，必改而增多。合两国之种，取其性质之善而改其不善者，在一反掌间耳。

外此，亦需注意防治害虫

《创设虫学研究所议》: 中国每遇虫灾，归之天数，除蝗孽以外，不闻捕治之策，安望其驱除技术之进步哉？

《创设虫学研究所议》: 吾于此益知研究昆虫学之不可缓矣。今举创设之概要于此：一曰购害虫益虫标本，以资考求；二曰购修昆虫学器，如显微镜之属，以便研究；三曰购杀虫药品，以资试验；四曰植除虫植物，如除虫菊之类，以广利用；五曰备饲育室，以考验害虫性情状态；六曰购益鸟益虫，广其传殖，以收天然捕获之功。

与引用新式机械。

《用风车洩水议》: 世界工作生力之具有五，曰人，曰畜，曰汽，曰风，曰水。五者之中，其利用而费少者，尤莫如风。

用风车有三利焉，微风即转，昼夜不停，一也；无薪炭人工之费，二也；洩水之外，可任他事，三也。惟中国从来所用风车，笨拙不得力，风小则不能运转，风大则杆轴将折，是

宜用美国奇埃叠哀安摩太新式者。

又论北方农事之失策有三，

《北方农事改良议》：天下农民之穷，莫过于北方，农事之媮，亦莫过于北方。北方农事之失策者有三，一曰水利不修，二曰耕地多而力与粪不能瞻，三曰知识太陋。

关于耕地多而力与粪不能瞻，

《北方农事改良议》：北方壤地广莫，而税课仅少，地价廉约，故一夫尝领一二百亩，既领如此之地，不忍弃而不耕也，乃遍树之，然瘁其力，不足善其田，竭其资财以市肥粪，不能腴其壤，年复一年，地方愈疲。

欲救此弊，莫若如略师古者代耕之法。如此数岁，田可日良，民可日富矣。

论南方可用风车车水。

《用风车洩水议》：中国南方水田之低者，多筑圩防盛涨，乃大雨时行之际，往往圩外之田，高于田内，水不外洩，致隳一岁之收者有之。盖时值农忙之际，以人力排除，则所费不貲，而汽机洩水，微特非农家力所购，而薪炭直费甚巨，且非谙习机器者不能用，何如用风车之便宜乎？

五曰保护环境以持续发展。雪堂不以地大物博之俗论自慰，深知中国物产之不足敷用，汲汲倡导废物利用。

《郡县兴农策》：衣裳之蓝缕，森林之条枚，鸟兽之毛骨，稻麦之梗杆，油酒之糟粕，人畜之矢溺，悉供制造，而化无用为有用焉。

介绍欧美日本废物利用之新法，

《废物利用说》：制造之余材弃物，今亦本理化学新理，而发明利用之术。

取马粪中纤维质以制纸，人溺为漂白剂，甘薯及他物造淀粉，品物之残滓造沙糖，爪哇薯造无烟火药，草木嫩枝造颜料，木屑造酒精见日本高桥橘树《废物利用篇》，此类甚多，倭指难数。

同时知此类皆须研究理化学，乃能从事，中国尚未易行，故仿其意，举中国可以立即实行者。

《废物利用说》：人溺为最有效用之肥料，凡动物之溺，含由里阿质内有轻淡炭甚多，其有益于植物，功与淡轻三同，而人与豕之溺，肥分尤多。凡用动物溺为流质肥料，宜施之于春夏，每溺一分，约加水三四分，其益不亚于古安奴即秘鲁鸟粪，今各处多半弃置不用。若以木桶贮蓄，有益田亩不浅，且街道因之清洁，有

功于卫生，尤不细也。今乃委大利于沟渠，岂不可惜哉？

又如滨海之地，贝壳牡蛎，积置甚多，如坻如京，随往皆是。若取以烧为蛎粉，既可肥田，且资涂墍，其利不费。

又如稻藁，仅以备爨，其值甚贱；考此物可以造藁，有称南华藁者，以腐藁为藁母，而积藁为长状之阜，广二三尺，高三四尺，以藁母间杂其间，而施以泥水，不逾旬，而藁生矣，每藁百斤，获藁甚多，其利极厚，风味不减松藁也。近江西之赣州。已传其术，此极易仿行者也。

更有兽骨败叶，并可制肥培；惟骨类须舂碎，加以石灰，俾由质化尽，乃易为土所吸收；败叶则宜和堆肥，积贮腐化，而后用之；果能加意贮蓄，其利不细。

他如败絮蓝缕，可以造纸；蚕蛹桑渣，可以饲鱼；皆为无穷之利藪，亦农家理财学之一端也。

《郡县兴农策》：推而衣裳之蓝缕、森林之条枚、鸟兽之毛骨、稻麦之梗杆、油酒之糟粕、人畜之矢溺，悉供制造，而化无用为有用焉。

此犹地尽其利之旧说，为浅显者；而尤令人叹异，则在雪堂亟论中国应大力发展、开拓利源之同时，已密切关心环境保护，持续发展。于江西樟脑之开发，具徵其远见卓识。雪堂反对竭泽而渔之所谓开发，

《与江西友人论制樟脑办法》：窃谓中国弃利甚多，而农产制造，其一端也。即以贵省之樟言之，其弃置不顾者无论矣，即每岁伐以代薪、以制器者，得价亦甚啬，坐视大利而不兴，诚为可惜。诸君子有鉴于此，乃出而设法集资，欲以弃置之材，而兴靡涯之利，其志诚可敬佩。但鄙意必措施有方，乃可兴办；否则，宁弃置不用耳。何则？天产之物，有一岁之获，有数十岁之获。今贵省以豫章名，千数百年于兹矣，虽天时地土并宜此木，而参天蔽牛之材，亦必成于二三世之久。今观章程，有教民制脑，随地收买之条，导以厚利，而不为之裁制，行见民间任意斩伐，悉数靡遗，不十馀年，豫章之茂林尽矣。公司仅仅得十年之利，而举记载以来一二千年之名产，俄然而成泡幻，宁不可惜！且滥伐山林，能致水旱，即公司亦何乐殫心竭力，以开此暂时立涸之利源，而贻后日无穷之患害哉？

主张开发与保护、开发与培养并重。

《与江西友人论制樟脑办法》：鄙意当为之立限制，约为三端，一曰存老林，二曰造新林，三曰用枝叶。其法籍现有之樟林，以十分之一为供用林，十分之九为保存林；供用林可刈干，保存林仅刈枝，然每树取枝，亦不能逾全树十分之一，案年递伐，十年而尽；一树仅

用老枝，至每年刈后所长之新枝，则留而勿翦，翦亦无用，新枝无脑，徒伤树耳。必如是，乃能长保其林，源源取用，久而不绝也。至供用林既经刈伐，当就其迹地，更造新林，伐老树一，必补种幼树十，植而未活者更植，必足其额。公司宜就本省官山，从地方官稟请，用造新林，从每年公司项下，扣存十分之二，为造林费，所造之林，即为公司产业。如此，则地方不受滥伐山林之害，而公司坐致长久无疆之休，较之顾目前沾沾之小利，而致樟林罹靡有孑遗之惨者，其得失为何如乎？

特异第二

甲现代目光

雪堂所论之农业，绝非局限于种植业一端，更非局促于粮食种植业，如后人所谓以粮为纲者。举凡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养殖业家畜与水产、林业、加工业、流通业内外贸易，囊括无余，实即今日所谓举国共识之大农业。雪堂论农业，重在以科学技术兴农，尤重科学思想长远规划，于借助科技以促进生产、利用废物以保护环境、追求持续发展三致意焉，与当今世界最先进之思潮接轨通气。凡此驻马高岗、立意高原之宏大眼光，实为雪堂遗献，后世最应继承者。

乙系统意识

□ **涉猎广泛，论述全面。**既宏观综论兴农之要道，以大农业观引领农业发展；又中观条析区域农业发展规划；更微观缕述兴农具体之措施，如何改良引进售卖良种、如何改进风车浇灌农田、如何利用僻地粪田；既论述所主张之利益，也论及实行之困难，局限之条件。凡此，皆可徵雪堂之于兴农，实胸有成竹，以系统观统筹全局。约其论述，要为三端，一农政，一农学，一农事，列为下表：

雪堂兴农论述分类表

□ 农政

农官私议 农政条陈 郡县兴农策 劝业私议

务农会公启 务农会略章 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 农学报略例

日本农政维新记 德意志农会记略

□农学

垦荒私议 垦荒裕国策 垦荒代振策 振兴林业策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 北方农事改良议 论海滨殖产

废物利用说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产馆

□农事

用风车泄水议 僻地粪田说 与江西友人论制樟脑办法 江干种树议 运河

种树说帖 郡县考察农业土产说 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说 郡县

设售种所议 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 杭州蚕学馆成绩记 浙江各府县创

设养蚕公会记 创设虫学研究所议 锦州恳务公司设备条说

□极端重视调查，掌握真实情况。于己所知，则知无不言，务求详尽圆通。如论编制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

《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说》：中国地处温带，物产富饶，每年由通商各口输出外国之货物，价在一万五六千万两上下，其品物大抵天生者多，制造者少，其品物价值，于海关税册，得见大略，欲知其详末由也。鄙意物产富饶之地，宜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以资考核。

即详细规划编制之法：

《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说》：其法分输出品为五类，一曰农产，二曰水产，三曰林产，四曰矿产，五曰制品。每一品物为一书表，分八目，一产地，二种类，三用途，四输出之处所外洋或外省，五输出各处之多寡，六输出之总额，七输出之价格，八逐年销数价值之比较。即为旁行之表，表前后系以详说。每岁计之，以验商务之盈绌，地方之兴衰，即进而谋推广改良之术，胥基于此焉。此表之作，与各郡县物产表可互相考证，彼详出产，此详销售，盖有辅车之势焉。

《郡县考察农业土产条说》分其事为十条，逐条详细解说，无一浮词赘语。举其一以概其余。

《郡县考察农业土产条说》：地方物产，应编成物产表。大端分六门，曰谷类，曰植产，曰水产，曰畜牧，曰矿产。

谷产中，米麦若干，杂谷若干；每亩布种若干，得谷若干；每年全境所产若干详记丰凶平三数，谷类每石得价若干记最高最低平均三数，以其总额供地方食用，为赢为绌，盈则售出何处，绌则取盈何处；一一记载。植产分平地、山林二宗。

平地所产为工艺、植物如棉麻桑靛之类、药品、果物，亦详其产数、价值。

水产分淡水、咸水即海与江湖之别，而二者之中，又分动植二类植如海藻、菱藕、动如鱼鳖螺蛤，详记其出产之数、采取之法；制品分销售本境及输出境外二宗，而计其总数、销路、利息。

畜牧则记其产数、品目、价值。

矿物则载其产品、地段及开采与否。

于己之所不知，则不耻下问，处处留心，注重调查。有关于一地农业状况者，甲辰六月，玉由杭州返沪滨，同舟有豫人而学农于闽者，叩以闽中农事，客乃为述其大略。因书之，为《闽中农话》，包括农时、选种及浸种、耕耘、肥壅、分秧及收刈、害虫、农具、利益八项；分析福建之农事优于他省者四，选种、深耕、勤耘、疏植；尚待改良者三，浸种、施肥、收刈。有关于良种之种植繁育者，如前述之《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尚有询于南海县陈敬容而成之《南海县西樵塘鱼问答》。

□论事正反两说，实事求是，体察民隐，重在引导，不揠苗助长，不作高调空论之谈。论中国林业难兴，虽为人事未尽之故，然兴林亦自有其难处。

《振兴林业策》：农利近，故易举；林利远，故难兴。而人情则多骛近利。此一难也。

垦田招佃，田主供给，只期岁耳，期岁以后，便可食田之毛，且输租焉；林利则非旦夕可期，若辟地千亩，役夫数十，岁岁养之糜帑无算。此二难也。

始植，有人畜之作践；成林，又虞偷儿之盗伐。此三难也。

有此三难，遂至废业。

雪堂曾删润不知名人所作《滇黔种鸦片法》，刊入《农学报》第十五册及《农学丛刻》，跋中畅论欲根绝鸦片种植，必先使农民有利益足抵甚或高于鸦片之作物，其寓意至善，即今日各国根绝此物之种植，要亦不能出于此法之外。

《滇黔种鸦片法跋》：今欲令罢植鸦片，民必不从，何也？鸦片之利，数倍于植谷。必择一物，利埒于鸦片，或且过之者，谕令徙业，意者其信我乎？

其所推荐代替鸦片种植者为植桑，于其获利，既有详尽之推算，又举江浙两省内植桑之湖州与种鸦片之象山徐州富贫之差距为实例，并以迩来印度亦推行此法为说明。至于以植桑代替种鸦片，尚有一难，即鸦片当年即获利而植桑必待三年以后，则以为当行三亩改一之法，第一年改植桑一亩，三年获利，再行续改。其利益究竟能抵鸦片否与其办法果可行与否，今日虽不得知，然此不足为先贤病也。

丙实践精神

雪堂生长农村，少为家督，亲理庶务，于吾国农业之现状，体验切肤，现存其禀父家书，足以说明见拙编《永丰乡人家书手简留真》，此亦壮年以务农为志业之主因。故其兴农言论，切合实际，详案细查，凡所规划，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坐言起行，循序渐进。《务农会略章》《务农会试办章程》所规划之会务，首重农事实际详见下节。论如何垦荒，官荒私荒如何开垦，如何引进售卖推广良种，垦荒如何获益，擘画解说，都酌情准理，履理切心，已备见前述。又如论种树，论良种，论粪田，在在如是，不赘论。今再略示一二。

雪堂于《教育世界》曾有《江苏振兴实业条议》，条分缕析江苏工农业振兴之计划步骤，具徵其实践精神，今择其关涉农业者，录其大纲，以窥豹一斑：

《江苏振兴实业条议》：调查土产第一 兴工首在兴农。今宜先就江苏各地所有土产，一一调查。约分五类：一曰谷产，二曰植产，三曰水产，四曰畜产，五曰矿产。当分门列表，以备查考。至特别产品，为一地方所特有者，尤当详记其原委、品目、产额、价值、商况等，毋得遗漏。

设农事试验场第二 设立农事试验场之宗旨有二。一实行改良之法，使农夫目验新法之利；二于学校兼授实业，而令学生得实验所授之学理。

隙地种树第三

设蚕业传习所第四

关于调查土产之五种，雪堂均详加说明；论设蚕业传习所之为必需，

苏省与湖州相隔一水，乃蚕业终不发达，南不及嘉湖，北不及锡金，土性宜桑而养蚕者少，非设法导诱之不可。

而日本设立蚕业学校，一处岁费数千或数万金，非苏省财力所及；雪堂乃为规划事半功倍之法。

莫如立蚕业传习所，于春夏间三月养蚕期内，教民养蚕制种，收传习生数十人，令转相授受；于他时则教以栽桑缫丝等事。所需经费，器具及开办费不过一二千元，可赁民房为传习所，而请蚕学毕业生二三人作为教习，凡一切费用，岁千馀元即可。费省而效捷，莫逾于此。若更拨官地为官桑园，令学生于此实习种桑与修剪之法，并以供饲蚕之用，尤便利矣。

雪堂尚有《锦州垦务公司设备条说》，为垦荒筹划一切，约为十三条：

一设种子田，二设种畜场，三设气象观测所，四设农具制造场，五设农产制造所，六兴沟洫，七定房屋式样，八种树木，九设守望所，十设劝惩所，十一设乡塾，十二设族葬处，十三设肆场。

农业生产、销售、农业科技、水利、城镇规划建设、警政、教育、福利，包罗万有，与今日所谓小城镇建设，别无二致。

既注重实践，则自注意因地制宜。前所述引进良种改良农事，已可见其一斑。又如中国人口过剩，应如何解决人力与机器之矛盾，至今仍为有识之士所瞩目，雪堂之论，值得三复斯言。

《务农会公启》：泰西人工极贵，故事事须用机器；中国工价甚廉，可不藉机器之力，然人力不胜之处，亦非机器不可。

渊源第三

雪堂农学思想之宗旨，与我国重农传统一脉相承。如兴农为立国之根本，重垦荒，重兴修水利，重保护农民，重农耕技术之改进，皆我国农学之宗旨所在。即其三十而立之后，因绝意科举，一担行李，飘然东走沪渎，立农学社，办《农学报》以兴农学，整理湖北农务学堂，从事农业教育，命海上之寓居名学稼楼，自号稼民、江东穉夫，名所居为学稼楼，所取亦古人不仕则农之遗意。而论及**兴农之科学技术与操作层面，则我国古农学于雪堂，则影响甚微**，多取自东西洋。此即可徵雪堂于经国济民之业，讲求实用，不尚空谈，勇于拿来，实亦我国古圣先贤之真精神。此与雪堂教育思想于技术层面多得自日本，而根本宗旨则坚守孔圣遗意，如出一辙，均雪堂稳健改良派思想本来面貌。杨直民先生即以为《农学丛书》为“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交汇”“实验农学在中国发端”《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农业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而后来时过境迁，雪堂慨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驯至清廷灭亡，遂归咎于新学，晚年回忆平生，有云云，则为晚年痛定思痛，所发之极端言论，固非当日之思想，不足以后例前明矣。

《集蓼编》：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欧美人多食肉食乳食，习惯不同，惟日本与我相类。其可补我所不足者，惟选种、除虫及以显微镜验病菌，不过数事而已。

雪堂接受之新农学，首得于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朝野上下，同心同德，不遗余力，讲求农业，此三十年前之陈迹，予雪堂之印象极深且远。《日本农政维新记》根据日本《今世农史》，详细铺陈明治元年至十七年间，日本兴农之史实，尤于明治天皇与大久保利通等元老重臣之提倡，三致意焉。其事今已为陈迹，而雪堂当日之曲终奏雅，则今日尤应深

味。

《日本农政维新记》：总计日本农业革新之由，不外设立农官、定规则、开荒地、毓森林、兴水利、编书报、开赛会、创学堂学会、贷帑金为开业费诸事；而尤能鼓舞国民之精神、促事业之发展者，则在天子临幸会场学校，巡视农田、水利、工场，褒有功、奖优异即实业家之既往者，且追赠其子孙；大久保公又首捐金以倡导之，政化之行，风行草偃，有以也。

此文长达二十二叶双页有半，统万余言，占《农事私议》全书近半全书五十五叶有半，不独为集中第一长篇文字，亦雪堂所有各类单篇文字中长度之冠。《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上篇概述日本之经验，下篇即据此畅论我国之办法。他如《论海滨殖产》《废物利用说》《农政条陈》等篇，均举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兴农史事与措施为证。其《农学报》所载文章，《农学丛书》所收书籍，亦以取自日本者甚多。

次则取诸欧美。如论欧美政府设置农官与农会，

《农官私议》：欧美各国，特立农商务省，以司农商之事。凡山林、道路、水利、畜牧、制造、学术、税课，一切官为之定法令规则；欲兴一利，民力不足者，官为补助之；发明一器，可以利用者，官为奖励之。

《德意志农会记略》一曰农政会，二曰农事会。农政会其宗旨在观察全国农业之利害、法令之得失，以应政府之咨访。农事会以考验学术、改良实业为宗旨。

欧美政府劝民兴业之术，

《劝业私议》：平日既免出口货税，以鼓舞商人；于民间起业时，更贷金瞻助，深恐其力薄而业不举；故能庶业繁兴、税课日盛。

痛言日本欧美开博览会之促进农事，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产馆》：玉案：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智识，盖一举而三善备焉。

仿行荷兰风车之利，

《用风车洩水议》：考荷兰人用风车，成绩大著。其国亚尔零海本为一片汪洋，后国人于浅水岛多之处，横筑一堤，堤成，以风车排水，今涸出之田，日增一日。

欧美各国防治虫害之法，

《创设虫学研究所议》：欧美各国，随处有昆虫学会，所以发明考究防遏驱除之法，新理日出。其始也，用药品、人力驱除之，继则以益鸟益虫代人力矣，继则以寄生菌类补益虫益鸟之力所不及矣。

欧美各国植树得大利。

《江干种树议》：泰西诸国，行道之旁，亦必树木，既以取荫，且以阜财。

其取诸欧美者，亦由日本转贩而来。其记德意志农会事，即据《大日本农会报》所载，其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事，即据日本《国民新闻》报记者所记。

雪堂取法东西洋农学之意义，端在兴起我中国之农业，以富国裕民。

《日本农政维新记》：夫日本以海中岛国，境地如此之狭隘，而自农政革新以来，殖产乃倍于昔；况中国之地大物博，若鉴日本之成绩，而谋振兴之，其殖产之丰富，岂有既哉！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产馆》：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意讲求，先于各地开竞进会，其用金有限而鼓励甚捷。

龟鉴第四

雪堂兴农思想之原则宗旨，乃至部分措施做法，时至今日，仍足为国人鉴。最其大要，约有数端：

重环境保护、持续发展，
重农业科技、农民素养，
重特色农业、因地制宜，
重大农业，
重流通业，
重加工业，以制成品代原料输出，
重官吏之示范引导，
重发挥农民之自主积极性。

践履第五

雪堂兴农之践履，可约为甲兴农实务、乙兴农宣传、丙兴农教育三类；论其先后则甲乙丙，论其收效为乙丙甲。

甲兴农实务

雪堂所予之兴农实务，厥维农学会。戊戌前后，学会蜂起，而论坚持之久，持务之实，当推此农学会为白眉。此亦雪堂坚忍持久、善于治生之性质所决定者。

名称 务农会之名称，据公启与章程，当作务农会，而《农学报》所刊之题名及捐款名单作又农会，端方奏折雪堂日后回忆《集蓼编》又作学农会、农学会，戊戌政变后，刘坤一为改名江南总农会。

兴办 务农会之史料缺乏。其创办时间与开办情形，今仅得据《集蓼编》略知梗概此书为雪堂晚年灯下依枕自述，俾其长孙继祖笔述者，未遑遍检群书，虽时间情形往往不免出入，而为身经其事者之回忆，其事实大旨故无谬也。其言务农会之经始云，

《集蓼编》：予少时不自知其譎劣，抱用世之志，继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业，以资事畜。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恨其言不详。乃与亡友蒋君伯斧协商，于上海创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时家事粗安，乃请于先妣，以丙申春（案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至上海，设《农报》馆，聘译人译农书及杂志，由伯斧总庶务，予任笔削。及戊戌冬，伯斧归，予乃兼任之。

其论戊戌时与海上诸志士之关系，与《农学报》所以自处云，

《集蓼编》：予既至海上，见士夫过沪江者，无不鼓掌谈天下事，而《时务报》专以启民智、伸民权为主旨。予与伯斧私议，此种议论，异日将于国为利害，是未可知。且当时所谓志士者，多浮华少实，顾过沪时，无不署名于农社以去，是宜稍远之，伯斧黜焉。

（戊戌政变）朝旨禁学会封报馆，海上志士，一时雨散，《农报》未经查封，予与伯斧商议所以处之。伯斧主自行闭馆散会，然是时馆中欠印书资，不可闭。予乃具牒呈江督，请将报馆移交农工商局，改由官办，并托亡友仪徵李鹤侪大令智侔面陈刘忠诚公。公曰，《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为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归并农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大令为言，虽制军意在保全，奈财力不继何？忠诚乃亲批牒尾，令上海道拨款维持。沪道发二千元。时予赴淮安省亲，岁暮归沪，伯斧已将此款还印费，不存一钱，感于时危，归淮安奉母。予以忠诚盛意不可负，乃举私债继续之，于是农馆遂为予私人之责矣。

会员及捐款 会员据《农学报》所刊题名转载如下：

蒋黼伯斧	罗振玉叔馥	汪康年毅伯	梁启超任父
徐树兰仲凡	朱祖荣闾樾	邱宪顿庵	马良湘伯
马建忠眉叔	陈虬志三	叶瀚浩吾	张謇季直

张美翊让三	李智侍鹿济	叶意深缙卿	连文冲聪肃
陈庆年善徐	陶在宽七彪	沈学颀兴	沈瑜庆藹苍
凌赓颺佩卿	魏丙尧少堂	王镜莹显屏	邵章伯
邵孝义仲仪	龙泽厚积之	龙唤纶赞侯	汪鸾翔巩庵
况仕任晴皋	王浚中颖出	龙朝辅左臣	刘梦熊味清
谭嗣同复生	柳齐泽农	周学熙緝之	高崧岚坡
沙元炳健庵	吴廷赓坚庭	马燮光芾庭	邓嘉緝熙之
胡光煜焕文	桂嵩庆芑亭	李钧鼎薰甫	李盛铎木斋
龙璋研仙	钟天纬鄂生	范熙庸通甫	王孝绳司直
张汝今励伯	赵景彬蔚卿	汪振声晓村	

捐款者及数目：

蒋伯斧五百圆	罗叔馥五百圆	徐仲凡三百两
邱嵩庵一百圆	鹿柴居士三百两	刘渭卿一百圆
席麓生沅生五百圆	朱闾樨一百圆	沙健庵一百圆
吴坚庭一百圆	马芾庭一百圆	张季直五十圆
狄楚卿五十圆	林迪臣一百圆	松鹤龄一百圆
桂芑亭一百圆	黄叔颂三十两	王司直十圆

此两名单均据原次序。可见其中多为江浙乃至全国闻名之维新人士、地方官吏，多为雪堂之好友。

□**章程与事务** 务农会章程，今所见者凡三订，其一为《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十一月初一日所刊之《务农会公启》，署名为上虞罗振玉、会稽徐树兰、如皋朱祖荣、吴县蒋黼，其二为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农学报》第一期所刊之《务农会略章》，其三为同年第十五期《农学报》所刊之《务农会试办章程》，后二者无署名。此三分章程，宗旨如一，而条目逐次加详。关于务农会之宗旨，

《务农会公启》：蒙等不揣固陋，思招集同志，创设务农会，以开风气，以浚利源。

《务农会试办略章》：同人不揣固陋，立会海上，讲求此事，将以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上以酬朝廷饥渴之意，下以尽草泽芹暴之忧。

《务农会试办章程》：是会专为整顿农务而设。

关于务农会预备兴办之事项，几囊括兴农之所有义。

《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本会应办之事，曰立农报、译农书，曰延农师、开学堂，曰储

售嘉种，曰试种，曰制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曰赛会，曰垦荒。

一垦荒，

《务农会公启》：本会筹集款项，在江浙两省地方，购田试办。惟需款浩繁，尚冀四方同志，解囊慨助，以成此举。所购之田，即作为会中公产。

《务农会略章》：中国旷土，所在弥望。满蒙西藏等处无论矣；各行省内地，若山陕川粤，未辟之利，随在皆是；即腹内各省，江皖湘鄂，人烟稠密之地所，亦多弃地。盖因粤匪乱后，水利就湮，荒莱失治。又沿海沿湖涨地，日出不穷。若皆理而治之，其利不可胜计。本会拟筹款开辟各地，先自就近之地始，将来所辟之田，即为本会公产，以备兴办学堂等一切正用。

一购置仿造外洋机器，

《务农会公启》：拟聘请化学师一人，辨别土宜，并酌购外洋机器农具，为中国所不可少者，以佐人力之不逮。

《务农会略章》：中国农具，仍二千年之旧制，而日益苦窳，泰西所用机器，则皆精巧灵捷，有火力、马力、人力之别。火力所费不貲，且中国人工甚贱，视西国工值，迥不相侔，火机暂可不用；而马力、人力各器具，则不可少。如中国犁耕，仅及数寸，而西国之犁，则深至二尺；凡是之类，不胜枚举。本会购买各种器具，试验果灵捷合宜，即如式仿造，以利民用。

一讲求良种，

《务农会略章》：农田得谷之多寡，蚕桑得丝之美恶，牛羊牧养之赢硕，固关人力，亦须先求美种。泰西凡农田所在之处，皆有售嘉种所，畜蚕之家，必先以显微镜视蚕身，必无病，方许传种；畜产亦先求善种，使之配合。本会一本西人成法，设售谷种所、验蚕种处及购求西国大马与各畜种之嘉者，俾孳生繁息，不匮于用。

一经营大农业，

《务农会公启》：农之为义，兼耕牧言。本会除树艺五谷外，博采中外各种植物，一一试种，兼及饲养牲鱼等事，以广利源。

《务农会略章》：农学门径广博，约举其要，厥有六端：曰农，曰圃，曰林，曰泽水产物及取水藻为肥料之类，曰畜牧豢养六畜及养鱼育蚕养蜂之类，曰酿造造酒、制糖、榨油、焙茶、纺棉、剥麻、制果、割漆、制丝、熬樟脑、作染料之类，凡此诸端，皆所讲肄。将来试办有效，即开设制造糖酒等厂。

《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本会以农艺为主，并及蚕桑、畜牧、农产物制造诸事。

一示范推广，

《务农会略章》：种植畜牧之法，土法之迂缓粗浅，泰西之灵捷精善，有识者皆知之，然无微不信，共喻为难。本会俟得地后，相厥土宜，如沙地宜棉、塉地宜桑、下泽宜稻、高寒之土宜麦与高粱、草莱灌聚之地宜牧之类，悉用新法试办，一二年后，成效可观，旁观益知效法。又古法之区田代田，近代亦有试行者，得谷多寡，言人人殊，如能试办，亦资阅历。如有曾以新法试办者，乞函示情形，受益无量。

《兴农会略章》：泰西一艺一物之微，必有赛会，各操所业，以相比赛，褒勤警惰，厥意甚善。本会亦拟分种植、畜牧、制造各类，分设赛会，以验良窳，以求新理。

一兴办农报与学堂，讲究农学。

《农学报略例》：报馆为农会最要之一端，会中诸事，合先从报馆办起。

《务农会公启》：每年收款，除开支薪水等项外，陆续添置田亩，翻译农书，并创办农学报章，专译各国农务诸报，及本会开办后一切情形。稟请设立农务学堂。

《务农会略章》：今本会翻译欧美日本各种农书农报，创立报章，俾中国士夫，咸知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制肥料，以机器省工力，精制造之法之理。

《务农会略章》：事无巨细，非学不成，况农学事理繁赜，尤必开学肄习，讲求光、热、图、算、水、化、动植物等学，而化学、动植物学尤要。必须聘请化学师一人，化验土质，动植物学师各一人，研究各物体性，先立一堂，日渐推广。必使农田所在，皆有学堂，负耒之民，咸新理新法。

□ **实效**。务农会之实效，史缺有间，今已不可详考，然尚可勾稽《农学报》所载，略见一斑。《农学报》辟《本会办事情形》一栏，第三册（一八九七年六月）至七十七册（一八九九年八月）为题二十一题，事项二十有七。其内容，约得二类。

兴农学十八

飭订《农学报》九

购买农书二

兴办农学四（另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一条）

务农会章程一

设立农会一

聘请农师一

举农事九

种植业四

蚕桑业五

其可记者，如第十一册《美赠农书》：

本会开办以后，购求欧美农书，储以待译。昨使美参赞汪仲虞司马由美回沪，交到农书数十种，系美国农部所赠。

第二十五册《星使贻书》：

去岁由邵小村中丞函致使美大臣伍秩庸星使，托其购求美国农书，兹已由美寄到美国新出农书十余种，行将择要翻译，以期有裨农业。

同期《勘丈涨沙》：

钱塘县属长寿一图，沿江有新涨沙地一千二百十七亩，由会中禀请，拨给本会，为试行新法之地。现奉廖中丞及恽方伯批准，本会已派人勘界，勘界以后，即聘请日本农师前往筹酌兴办矣至地图及文牒，另编附报印行。

第二十九册《试验育蚕》：

中国饲蚕之法，与日本不同，不仅察病选种为然。兹于上海设育蚕试验场，聘日本熟于饲蚕之事者井原君，取绍兴与湖州、日本蚕种，以日本法育之，以较二者优劣。现已赁屋饲育矣。

第三十五册《蚕事情形》诸事。

本会育蚕已毕事。考各种以日本小金丸为最，新昌澄潭镇次之，湖州玉银寿所制种最劣。今年蚕病，多脓蚕、包节、黄软、腐烂等病，湖蚕最剧，上簇死者甚多；日本茧最坚厚，绍兴次之，湖种茧薄不洁。饲蚕时期，天湿多雨，四眠后骤冷，寒暑表缩至五十度，湖州种制造太劣，自母蛾遗传虚弱性，故绩最劣。本年用日本法制精良绍兴种及日本绍兴挂合种，以便次年饲养焉。

雪堂本人之兴农举措，第八十一册有《淮安兴农》，

淮安农地沃衍，为稻麦盛产之区，而桑茶之利未闕。兹由农会会员上虞罗君叔韞、金匱谈君勤生、连平范君子文及本地绅士方君小樵、王君蓉仙、朱君潞生等，议在城中创设桑茶摹范图，从许朗轩太守请得元代大军仓旧址，约得七八亩，现已耕垦开沟，以便种植。许太守并欲捐湖桑一二万株，以为之倡。至耕垦及一切经费，罗君独任之，并须创蚕业传习所及缫丝改良所云。

尚与张謇等合作开发海复荒地，第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六十册《农学报》（一九〇一年十月至十一月）载有张謇之《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另据《海复乡史》载，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雪堂与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筹资设立通海垦牧公司，历时五年，于南通海门两县分界处，围垦八十平方公里，分为牧场堤与一至七堤，三十年在笏箕攀设镇，取

名海复据海复招商网所载。

雪堂尚致书端方，论兴农应自畿辅始，

《集蓼编》：方戊戌新政举行，浚阳端忠敏公任农工商大臣，锐意兴农，移书问下手方法。予谓欲兴全国农业，当自畿辅始。昔怡贤亲王议兴畿辅水利，竟不果行。公若成之，不朽业也。因寄畿辅水利书，附以长函。公阅之欣然，乃先议垦张家湾荒地。而值八月之变，公出任外吏，濒行，遗予书，谓兴农一事，朝旨不以为非，君若愿北来，当言之当道，必加倚重。予意颇动，寻念去庭闱远，且不知任事能否无阻，乃谢之。

停办 据《永丰乡人行年录》，雪堂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北上京师，任职学部，以不能遥领，沪上农学会与《教育世界》均停办。

乙兴农宣传

编辑《农学报》

雪堂兴农之实务，囿于条件，未足自夸，然以言近代农学宣传，则翹然为第一巨擘。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兴办之《农学报》，不特为我国最早之农学刊物《中国近代报刊篇目汇录》，且为我国第一种科技专业期刊朱先立说，《中国科技史料》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由雪堂与蒋黼等创设之务农会所主办，三十一年十二月停刊，前后九载，出刊三百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以前为半月刊，二十四年起为旬刊。坚持之久，出刊之多，不独农学，实亦我国近代报刊之白眉。按诸罗蒋关系性情与《农报》之实际，编辑事务，由罗主政者多参见前引《集蓼编》。每期之内容，略为创作与翻译两端，细目则谕旨恭录、奏折要录政策文件、论文兴农论文，各省农事、本会情形国内农业新闻，农会博议农业组织动态，西报选译、东报选译东西洋最新农政农学农事动态、农业科技专著最新国际农业科技与我国农学遗产等项，内容丰富，包罗万有，切要可行。传统农学与近代西方实验农学相交汇杨直说，《农业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政、学与事并重，实为兴农之百科全书式刊物，不独当日振聋发聩，闻所未闻，不胫而走，即今亦尚可考求当时农政农学农事情形之大略。

《农学报略例》：一本报之设，以明农为主，兼及蚕业畜牧，不及他事。

一本报详载各省农政，附本会办事情形，并译东西农书农报，以资讲求。俟报章日多，捐款渐裕，即添人专译农书，不附报后，以期出书迅速。

所据以翻译之东西洋农学报刊，约计则有：

英国

英伦农会（务）报 伦敦农务报 农学新闻报 太晤士报 磨工

报 博学书

美国

益智报 墨州杂报 农业报 农家报 农务报 墨州农学报

纽约农家(民)(人)报 农人(民)报 园圃新报 林学报

西报

热地农务报 技艺会报 农家(人)月旦报 日日报 多言报

田家风景报 上海日日报 农事温故报

日本

农会报 农事新报 水产会报 兴农报 山林会报 大和讲农杂志 农民报 兴农

杂志 昆虫杂志 昆虫世界 蚕业新报 太阳报 通商汇纂 农桑杂志 农业杂志

新农报 北海道农事周报 北海道农会报 米泽有为会杂志 工业杂志 工业化学杂

志 工艺化学杂志 化学杂志 中外商业新报 东京经济杂志 时事新报 蚕业协

会报 蚕丝会报 特许公报 读卖新闻 报知新闻 东京朝日新闻 大阪朝日新

闻 日本新闻 静冈县农会报 新农杂志 东洋学艺杂志

未注国名

养蚕新报 药学杂志 牧畜杂志 家禽杂志 青年农会报

农事杂报 太平洋杂志 地学杂志 实业世界

此中或虽有报名前后翻译未能规范划一之处，但仍可见其取材之广，眼界之宽；至若包括日本农商省大藏省官报、领事报告、研究院所报告、展览会目录、工厂产品广告，亦一一具载，以资博闻。连载之农书共二百五十七种。

日本一百三十三 朝鲜二 西洋三十三 不知国名十二

中国七十七(当代六十三 古代十四)

当日发行状况，据所刊各封疆大吏及亲民官之推广文牍，知多申饬下属公费订阅并颁书院绅士一体阅看，甚或令于公众聚集场合为农夫读报。通令下属购阅《农学报》者，依据登报之先后，约有：

杭州府林太守启 江宁府刘太守名誉 顺天府胡府尹燿棻

浙抚廖中丞寿丰 两湖督院张之洞 两江督部刘坤一

安徽抚部邓华熙 浙藩恽方伯祖翼 保定沈太守家本

清苑劳大令乃宣

刊行《农学丛刻》《农学丛书》

近代报刊发轫期，仍不脱书籍之窠臼，类似分期发行之丛书，当时按期出版，分载多书多文，各自起讫；积有年所，则分别合订，即为一部丛书（后郑振铎编刊之《世界文库》，犹承此种遗意）。雪堂之《教育世界》与《农学报》亦复如此。

《农学报》发刊之次年一八九八年初，即将第一年已刊完之重要论著重新编刊为《农学丛刻》第一集，共四册二十三种，凡二十万字，署“农学会印行”，为日后《农学丛书》之嚆矢。其内容包罗广泛，

农学丛刻

农学 一

农事 十八

种植业 十

棉花类 五

烟叶 一

鸦片 二

咖啡 一

菊花 一

养殖业 五

蚕 二

牛 一

猪 一

鸡鸭 一

土产调查 二

水利工程 一

农政 四

外国农会章程二

外国农科大学章程一

蚕务条陈一

其来源以翻译及编述为主。

外国 十二

本国 十

时人 九

前人 一

不明 一

光绪庚子起陆续刊行《农学丛书》，主体即《农学报》所载农书（以译著为主）之分类合订本，而仍有新刊，第五集则悉为《农学报》以外者，都七集，印二百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本拟札饬属下各州县认购，以助销行，然实则销行甚畅，毋庸及此，不仅雪堂历年《农学报》如山逋负一扫而清，且有赢馀，以贍其家。《农学丛书》之情况，列表如次并参考日本大川俊隆《上海時代の羅振玉》，大阪产业大学《产研丛书》之一《國際都市上海》，刊行时间除二三集外，均为大川所推测；《农学丛书》据第二集杨直民前揭文：

农学丛书

第一集	二十册	八十八种	上海农学会译	一九零零年中
第二集	二十册	四十七种	光绪庚子江南总农会印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以后
第三集	十册		光绪辛丑江南总农会印	一九零一年九月至年底
第四集	十二册		上海农学会译	一九零二年二月以后
第五集	十册		上海农学会译	不详
第六集	十册		江南总农会印	一九零四年十月以后
第七集	十册		江南总农会印	一九零五年十一月以后
统	八十二册	二三三（或云二三五）种		

江南总农会为戊戌政变后刘坤一为农学会所改名。其具体内容，举第一二两集，以窥一斑。

著作国别，以第一集为例：

日本	四十种
中国	二十九
当代	二十五
古代	四
美国	七
未知	四
法国	四
英国	三
奥地利	一

著作内容，以第二集为例（依原有分类及次序）：

学理及业务	六种
-------	----

山林及种植	十六
农具及制造	三
畜牧水产昆虫	九
蚕业	三
物产	三
章程	一

关于《农学丛书》，晚年自述云云。

《集蓼编》：是年（庚子）秋，予方拟措资，将历年所译农书，编印丛书百部，充农馆经费。款尚未集，鄂督张文襄公电邀予总理湖北农务局。文襄问，丛书百部，得价几许？曰约五千元。问印费几许？曰半之。文襄曰，农馆经费，易事耳。五千元所得，微，可印二百部，书成，当札飭各州县购之。既辞鄂归，所印农书，亦未请文襄札发，而销行甚畅。所得利益，除偿本金及维持农馆东文学社外，尚赢数千圆。

农学论著

雪堂之于《农学报》，编辑之外，尚多有造述。第一为编辑润色，作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中（一八九八年四月）；其次则论著，文篇一目所收，除少数奏折章程外，均为其所撰之农事论文，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下（一九〇〇年一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中（一九〇一年五月），又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下（一九〇一年九月），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上（一九〇二年九月）；第三为调查，光绪二十五（一八九九年）及三十年三月上（一九〇四年四月），其余序跋及杂文，包括《农学报》及务农会章程，虽未署名，揆诸实际及雪堂办事风格，应为其所作。

雪堂《农学报》著述表

一编辑（以著明者为准） 七种

山东试种洋棉简法

英国仲均安著 罗振玉重编删润

第二册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 一八九七年五月

黔蜀种鸦片法

未署撰人 罗振玉润色删节

第十五册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

美国种棉述要

直隶臬署原译本 上虞罗振玉润色及排类

第一八册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 一八九八年一月

第一九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上 一八九八年一月

第二〇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中 一八九八年二月

植美棉简法

直隶臬署原译本 上虞罗振玉润色及排类

第二〇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中 一八九八年二月

整饬皖茶文牍

程庆霖著 罗振玉辑

第二四册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下 一八九八年三月

第二五册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 一八九八年三月

第二六册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中 一八九八年四月

第二七册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下 一八九八年四月

第二八册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上 一八九八年四月

第二九册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中 一八九八年五月

种印度粟法

直隶臬署原译本 上虞罗振玉润色及排类

第二五册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 一八九八年三月

第二六册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中 一八九八年四月

月季花谱

闾名撰 罗振玉辑

第七八册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 一八九九年九月

二论著 二十七篇

论农业移植及改良

第九四册庚子一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上 一九〇〇年二月

第九五册庚子二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中 一九〇〇年二月

废物利用说

第九六册庚子三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下 一九〇〇年二月

垦荒私议

- | | | |
|----------------------------|------------|----------|
| 第九七册庚子四
北方农事改良议 |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上 | 一九〇〇年三月 |
| 第九八册庚子五
农官私议 |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中 | 一九〇〇年三月 |
| 第九九册庚子六
创设虫学研究所议 |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下 | 一九〇〇年三月 |
| 第一百册庚子七
郡县设售种所议 |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上 | 一九〇〇年四月 |
| 第一〇一册庚子八
振兴林业策 |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中 | 一九〇〇年四月 |
| 第一〇二册庚子九
德意志农会记略 |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下 | 一九〇〇年四月 |
| 第一〇五册庚子十二
郡县兴农策 |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下 | 一九〇〇年五月 |
| 第一〇七册庚子十四
郡县考察农业土产条说 |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 | 一九〇〇年六月 |
| 第一〇八册庚子十五
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说 |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 | 一九〇〇年六月 |
| 第一〇九册庚子十六
与友人论制樟脑法办法 |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上 | 一九〇〇年七月 |
| 第一一四册庚子廿一
用风车泄水议 |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下 | 一九〇〇年八月 |
| 第一一八册庚子廿五
杭州蚕学馆成绩记 |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上 | 一九〇〇年九月 |
| 第一二〇册庚子廿七
论海滨殖产 |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下 | 一九〇〇年十月 |
| 第一二一册庚子廿八
僻地粪田说 |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上 | 一九〇〇年十月 |
| 第一二二册庚子廿九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产馆 |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中 |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 |

- 第一二六册庚子卅三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下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
日本农政维新记
- 第一二九册庚子卅六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下 一九〇一年一月
- 第一三〇册庚子卅七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上 一九〇一年一月
- 第一三一册庚子卅八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中 一九〇一年二月
- 第一三二册庚子卅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下 一九〇一年二月
运河堤种树说帖（《农学私议》目录题《漕渠植树说帖》）
- 第一三三册辛丑一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上 一九〇一年二月
浙江各府县创设养蚕公会记
- 第一三四册辛丑二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中 一九〇一年三月
垦荒代振策
- 第一三五册辛丑三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下 一九〇一年三月
劝业私议
- 第一三七册辛丑五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中 一九〇一年四月
垦荒裕国策
- 第一三九册辛丑七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上 一九〇一年四月
江干种树议
- 第一四〇册辛丑八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中 一九〇一年五月
农政条陈
- 第一五四册辛丑廿一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下 一九〇一年九月
锦州垦务公司设备条说
- 第一九〇册壬寅廿二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上 一九〇二年九月

三调查 三篇

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

- 第九三册己亥卅六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下 一九〇〇年一月
南海县西樵塘鱼调查问答

第二五〇册甲辰七 光绪三十年三月上 一九〇四年四月

上虞罗振玉问 南海陈敬彭答

闽中农话

第二六八册甲辰二十五 光绪三十年九月上 一九〇四年十月

四其他 十一篇

《农学报》略例

第一册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上 一八九七年五月

务农会略章

第一册

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

第一五册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

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

第六六册己亥九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下 一八九九年五月

《山东试种洋棉简法》跋

第二册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 一八九七年五月

滇黔种鸦片法

第一五册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

《植美棉简法》跋

第二〇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中 一八九八年二月

《整饬皖茶文牍》序

第二四册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下 一八九八年三月

《杭州蚕馆章程》跋

第七六册己亥十九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上 一八九九年八月

《月季花谱》跋

第七八册己亥二十一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 一八九九年九月

《美国种棉书》跋

第八五册己亥二十八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上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

□编印《农学私议》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雪堂在武昌整顿湖北农务学堂之暇，别择《农学报》所刊诸文，取二十二篇，刊为《农事私议》。分上下两篇，自著重要论文十九篇为卷上，撮述日本、德意志、法国农政三篇为卷下，而以《垦荒裕国策》一篇附焉。其目详下：

卷上：一农官私议 二垦荒私议 三劝业私议 四郡县兴农策 五郡县考察农业土产条说 六垦荒代振策 七论农业移植及改良（上下） 八北方农事改良议 九郡县设售种所议 十用风车泄水议 十一僻地粪田说 十二创设虫学研究所议 十三论海滨殖产 十四废物利用说 十五编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岁计表说 十六与江西友人论制樟脑法办法 十七振兴林业策 十八江干种树议 十九运河堤种树说帖（目录题《漕渠植树说帖》）

卷下：二十日本农政维新记 二十一德意志农会记略 二十二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产馆

附录：垦荒裕国策

□时论之评价 《农学报》当日影响若何，今可从所刊大吏推广之公牍略窥一斑，此自为当日之公论。

《杭州林太守飭各属购阅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札》：新出《农学报》，讨论农田水利、树艺牧畜，兼取古今中外良法，最为切实有用。有司号曰牧民，凡百姓生产，皆民牧之责，吾辈不能尽民而牧，不如教民以自牧。今报中自五谷百产草木虫鱼，靡不备举。中国农人，病不识字，致无农学，古人躬耕之业，今之士大夫未有闻者，更无人为农学提倡。有司能于各书院中，择其留心有用之学者，与之讨论，亦足以开风气。其散处各乡，朔望均有宣讲圣谕及分讲善书，若择报中浅近易行之事，附与讲说一二，使百姓多一恒产自利，即吾辈少一疚心之愆。

《江宁府刘太守飭各属购阅时务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札》：《农学报》其中讲究农田水利，甚属精微，有关于地利者非浅，亦即按月购置书院，俾士子一并阅看，愈广见闻。至该令为亲民之官，更宜讲求地利，并着购阅，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

《顺天府胡尹飭各属购阅农学报并飭考求农事札》：迩来农政失理，物产不丰，揆厥所由，固地利之未修，实人事之未尽也。近见上海所出《农学报》，首列各省农政，次及农事，其于种植之宜，畜牧之道，颇能经纬相宣，洪纤毕贯；次选译东西洋农书农报，亦复广采旧闻，博推新理，可与中国《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书互为发明，补所未备。州县为亲民之官，苟能即是以相度土宜，劝求农利，发北地之菁英，保中华之藩庶，其为利益，实非浅鲜。除分行外，合将该报第一册先行札发，札到，该州县即便查照，悉心考究。

《两湖督宪张咨会鄂抚通飭各属购阅湘学农学报公牍》：上海《农学报》大率皆教人务农养民之法，于土性物质种植畜牧培养宜忌各种新法，以及行销衰旺情形，考核精

详。其一有裨士林，其一有关民生，均为方今切要学术治术，自宜广为传布。

《两江督部刘札飭江苏安西各属购阅农学时务报公牒》：上海新设农学会，采取各国新法章程，以及嘉种器具，绘图立说，印报出售，如果仿行，必能见效，其有裨于民生国计，良非浅鲜。

《安徽抚部邓札飭安徽全省购阅农学报公牒》：进来上海创设农学会，出售《农学报》，凡中外之有关农事者，兼收博采，择精语详，堪以拓故见而启新知，阜民财而益国计。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专门推荐：

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

所引论列，次依《农学报》刊序，详摘《农学报》之评价；至其订阅与阅看之方法，大同小异，不及备载。

丙兴农教育

整顿湖北农学堂 光绪戊戌秋（一八九八年），张之洞敦请雪堂整理湖北农务。其大略，雪堂日后自叙云云。

《集蓼编》：是年（今案戊戌）秋，鄂督张文襄公电邀予总理湖北农务局，文襄曰，现以鄂省农政相烦。此间设农务局已三年，并设学堂授农蚕两科，总办某观察不解事，命提调某丞任学堂监督。近该丞力陈学生窳败，教习不尽心讲课，惟诛求供给，非停校不可。我意国家经费及学子光阴，均当矜惜，故请君任农局总理，兼该堂监督。其即日视事，详察情形，早日复我。予既退，提调某时已改充幕僚出见，且导予至其室，谓予曰，此堂学生皆败类，不可造就，当以快刀斩乱麻手段，亟停此校。予询以君往任监督几年？曰三年。予私念校风之坏，果孰致之？竟侃侃而谈，毫无愧心，甚以为异。某曰，制军且以全省农政奉托。予曰，既有总办，又有总理，不嫌骈枝耶？某曰，然。制军以总办不晓事，专任君。不去之者，以君为诸生，公事文移不便故。除行公文用其名，他不令干涉一事。

明日，予至学校，受事。收支委员李某持簿籍至，则教习，农科蚕科各二人，农科为农学士美代清彦、吉田某今忘其名，蚕科为峰村喜藏，他一人今忘其名；翻译四人某某；学生两科总七十余人；颇讶学生之少、翻译之多。乃先接见教习，教习谓夙敬仰先生，今莅此，某等之幸。以前，总办提调，苦不得见，有事，由收支转达，颇不便。以后许直接迳达乎？予诺之。又见译员，四人中三少年，为使馆学生，能东语，不通中文，拘执浮滑，又一人，年差长，中文略通，性尤阴鸷。又接见收支委员李寿卿，则中州人，出言鄙甚。一人为文襄之同乡侯某，则挂名支俸而已。予乃逐日接见诸教职员，并上堂督课，且分班接见学生，戒以

闻本堂学风素劣，致有请制军停校者。制军矜惜尔曹光阴及国家经费，故命予来此整顿。今与尔曹约，自今更始，当敦行力学，一洗前耻。有偶犯过者，初次宥之，再次记过，三犯革除。众皆唯唯。自是遂密察校中情形，乃知译员半为革命党员，且观其所译讲义，文理均不可通。因询教员以学生既三年，何仍不能直接听讲？答以提调嫌第一年课表东语太多，谓既有译员，不必重东语，故某等碍难违命。但深愿嗣后再招新生，必期直接听讲。其言颇合理。且与久处，并无诛求供给事，知以前必收支委员托名冒领者，提调不知也。学生则以新监督每事躬亲，颇有戒心。逮半月后，有故态复萌者致记过者。既一月，详察记过诸位生中，有五人举止诡异，与译员往还甚密，意其必三犯，已而果然，遂面请斥退。于是校风日整。乃谒文襄，陈二事，一请裁不职译员，暂觅替人，以后废除，令学生直接听讲。二请拨地为试验场，以备实验。并面陈自革退劣生，校中安静，但学风之坏，由于译员，译员不去，根株尚存。文襄大悦，令觅替人，且面允拨抚标马场地为试验场。译员全体辞职，予立许之，乃电忠恣及少泉代焉。于是教员称便，校风清谧。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下半月（一八九九年五月）第六十六期《农学报》，载《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知雪堂曾拟为此学堂新招生。

农务学堂现奉湖广督宪张飭令，添招学生五十名，讲授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务各门。

然雪堂之整顿，不见容于窳败腐朽之衙门，故不能继续。

《集蓼编》：次年暑假返沪，遂再三辞职。时该校管理颇易，营谋者多，文襄遂派员接办，而委予襄办江楚编译局，实无一事，素餐而已，意颇不安，逾岁遂并谢之。

出长京师大学堂农科 据鯉翁《永丰乡人行年录》，宣统元年己酉闰二月（一九〇九年三至四月），雪堂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集蓼编》云为张文襄所奏补。是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之始，雪堂亦为我国农业大学校长之第一人。据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任期为一九〇九年四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为期甚短。其所作为可述者有二，一考察日本农学教育，二建筑校舍及试验场而已。

《集蓼编》：时大学行政，皆由总监督主之，各分科监督，画诺而已，无从致力。

惟是时，七科皆在马神庙，本某驸马旧府，地狭不敷用。予请于管部，奏拨西直门外钓鱼台地，建新校，设试验场。溽暑严寒，往返监视，至辛亥秋乃落成，而武昌之变作矣。

考察日本农学教育 宣统元年五月端午后一日，雪堂由京师出发赴日本考察农学教育，并为农科大学聘请日本建筑技师及教师事，留有《扶桑再游记》一卷。稿未刊，今据手

稿，详摘其有关情形如次所注月日为阴历：

五月廿五日

至札幌，是日，自函馆向北，所见农田多荒芜未开辟者，而自余市以北数十里，则农田极整，所造新林尤苍翠可爱，斯时苹果方实，每实以纸袋盛之，累累满树，以防虫蚀鸟啄。

廿六日

早间八时，同纬君、俊人赴农科大学，拜佐藤校长昌介。坐中遇南教授鹰次郎，乃佐藤君属其导吾等参观者也。问佐藤君以该校设备费，佐藤君言，初二三十万元，今用至六十万元矣。问以经常费，对以岁二十万元，由文部省支出者半，由农场收入者半。至临时费则不能言准，今年约计六万元云云。并出该校及农场与演习林、植物园一览见赠。南君因导观农学教室，计普通教室一、化学实验室二、林学教室一。其建筑颇便宜，每一种教室，其旁即附以器械室、教员室、藏书室，此可法也。楼下设植物标本室，皆出官部博士手集，多至五万种。出该堂后，即至植物学教室及动物教室，此二堂特别筑之，其制略如普通教室，盖农学中，二学颇占重要也。参观时，林学教授小出博士房吉、理学博士官部金吾并出，为说明种种，可感。该校演习林凡三所，地位悬绝，官部博士为说明，其理颇精。

是日发电田伏翁，问原口博士任（今案指农科大学堂建筑事）建筑师技师事。晚间得复，已电都中矣。农科大学实科生贵州万□□勳忠来谈。

廿七日

至农科大学，遍观养蚕馆、昆虫馆、教室、寄宿舍、第一第二农场、制乳室、农具室、水产教室及标本室，大雨，衣履尽湿。薄暮，八田博士三郎来拜，狩野博士友也，为彼邦动物学大家。又山东留学生牛献周来字正甫，在农科大学专攻△△病。

廿八日

原约看北海道牧场，以第三部事务长不在，比有电话至，已不及矣。遂谢不往。

许士泰君来言，日本农租日增。彼于明治四十年纳所有税一千零四十馀元，至去年增至一千七百馀元矣。又言，进来食盐归政府专卖，盐价几于糖等。又言，日本开拓北海道卅年乃纳税。又言，每秋开荒费约三四元。

午间，至农科大学辞行，谢其招待。并回看八田博士，博士劝同往真驹种畜场，

乃回寓午餐，午后，与八田君同乘马车往。行一时许，乃抵种畜场，该场技师仁木信雄出该场要录见示，知经始于明治九年，今规模日扩，所有种畜为牛、马、羊、鸡。牵马数匹出示，乘用者至神骏，荷用者亦极壮健。仁木君言，乘用之马，每日必令围人乘行一点钟，使用者每日必令荷重物，盖不使习练，则本能日失，必成若弱种云云。牛种亦佳，其尤者，母牛产犊已七阅月，日犹出乳一斗二升，此等良种，在欧洲亦少，故已登之杂志，此牛世界皆知名矣。其余则日出一斗或七八升，民间之种，则如出数升耳。并出乳汁相飧，即场中所出也。八田君言，其同乡立花伯爵有私立农场，至精，劝往视，愿为介绍。以时日短促，谢之，其意则可感也。

日暮归寓，牛君以三叶虫化石二来赠。

六月初四日

八时半，与纬君同访驹场大学，晤书记官武部君直松，赠帝国大学一览一册。叩以该校每年经费，言计十五万元。临时费则每年文部省发出六科大学公共费三十万元，各校多寡不等，不能画一。由武部君导观农学、林学二教室，及林产物试验所、养蚕室、农具场等处。方参观养蚕室时，见方为种种试验，并以涂颜色颜料之叶饲蚕，盖新发明之法也。桑叶涂以何色，即吐何色之丝。叩以其颜料用何种，对以即显微镜试验所用者，此以前所未闻也。诸堂参观后，有观温室及作物见本园。前在农化教室见德人某，方充教习，今询之，则已归矣。询以月俸，武部君对以五百五十元。

初五日

晨至驹场，参观农艺化学及兽医两讲堂，并图书阅览室。该校以历年学术研究报告见赠，前日向松井博士面请也。兽医教室庭中有法国名誉教师美松铜像，盖在日本教授二十年，勋三等，今食退位俸，可见日人之待外国教员之有恩礼也。

初六日

至农科大学，晤松井君，托其介绍农艺化学教习。

六月初五日致信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汇报考察心得及为农科大学所办事宜，与考察记颇有详略，亦据《再游记》后附抄底稿摘之。

一札幌大学至今均用美国教育法制，然自改大学后，精进无已。其科目今已改与驹场一律，惟兽医改为畜产，因兽医为畜产一部分，偏而不全也。此札幌胜利；一于驹场处。

一札幌基本金至富，有农场八，约地积十七亿五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七坪，

价格三十四万九千四百三十七元，每年收入农场利益十万元，每年京城费共二十万元，临时费则多寡不等，今年则二万元。其每年所赢余，则积为公债，现其总额达五万一千五百七十谕元，其所收之利，以充推广之用。

一建筑费，初为三十万元，每年增筑，凡计六十万元。

一该校农场，尚有未垦辟者。该校长言，再二十年，农场尽，便不须文部省之岁费，此校遂独立矣。

一该演习林凡三所，规模完善且宏大，其三所相距颇远。盖演习林以寒温热三带均备为最善，此校偏北，但有寒温二带耳，燃较驹场，弘大多矣。

一改校功课至密，半日实习，半日讲演，此亦与驹场不同。驹场重学理，学生实习重点不及四分之一，惟实科则第一年讲授多于实习，第二年讲授实习相等，第三年实习多于讲授。此亦两校不同之处。

一该校有预科三年，预科毕业，乃入本科，盖亦因各处高等，名实不尽相副，学力不能齐等之故。在彼国教育有年，尚不能不于本科之前设预科，我国今日欲废预科，而尽以各省不画一之高等毕业生入学，其不能直接受学，可预卜矣。

一该校附设选科与实科目，一以养成大学教师之助手，一以养成实用之人才。其意因但设本科，经费与教员与增设此两科，其所费增损有限也。然则我国于本科之外，宜设实科，一以图经济之利便，一以宽入学之资格。图受业者之增加，似不可不早计及也。

一此次在西京晤前文相菊池总长，渠问我国学生定额之多寡，玉对以因合格学社国内尚寡，故人数不多。菊池君言，大学初立，不可严持年格。日本初立大学，实无一合格之学生，故初立大学时，学科既不完备，卒業成绩远逊于今日，然当世大人物，多半出于此时。盖大学修业期仅三四年，教师但示以专门学之门径，而真正修业，则在卒業以后。盖学生卒業，令充教授，则凡有新理新说，皆须参考，教授期内，皆修学之时，而又加以社会之阅历，故成就自然远大。今贵国于学生卒業后，其任用之法，多不就其所学，而授以职务，虽卒業时有至高之成绩，亦日亡而已。故严入学之年格，不如定卒業后之任用。此论至精切确。菊池于教育行政，阅历有年，方能作是语。不知我国能采用否耳。

一札幌大学长佐藤氏任用以来，于今二十馀年，其教授，如南鹰次郎、官部金诸博士，在校亦垂二十年。任期既久，故学长与教授咸视校事如家事。此不仅该校为然，他学校皆如是也。

一得部电，知聘技师事，可照前函办理。兹先拟问文部建筑科，与约会晤，尚未有定期。西京某博士须与面商。兹因驹场大学从今日着手调查，俟与文部接洽后，若不能就绪，即亲赴西京，与该士见面，并面商一切。文科经科建筑，似不须技师设计，因两科无特（别）之建筑，惟心理教室，西京之式最佳，可仿照，除此一教室外，均无特别式样也。

一教习一事，语文科须与经文两科或一科共聘文学士一人，教心理、伦理、社会、教育等学。现为省减计，先聘农艺化学士一人已托松井学长、理学士一人，矢部已询之八田博士矢部乃其弟子，据云学问尚优，拟即遵聘，但月薪恐不能减少，俟复再详陈。

雪堂于兴农，阅历既如此丰富，成效既如此明显，故当日朝野一致推崇，以为明达新农学之干才。《农学报》第三册第十九期载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上谕称：

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转引自吕顺长著《清末浙江与日本》一八四页，上海古籍二〇〇一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开经济特科，湖广总督张之洞、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法部侍郎沈家本、漕运总督陈夔龙交章举荐，而以丁忧未应。陈之荐章云：

《庸庵尚书奏议 保送经济特科人员折》：留心时务，为学切实不浮。考究农学及教育各事，皆可坐言起行。现在江鄂办新政，皆赖以厘定。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时间据罗树勋日记，江苏巡抚端方以《农学丛书》五集进呈，奏中盛赞云云。

《端忠敏公奏稿》四《进呈农学书籍折》：窃据候选光禄寺署正罗振玉呈称，于光绪廿三年春间，邀集同志于上海创立学农会，考究农学新理新法，译印保障，兼译农学新书。廿四年，经故督臣刘坤一奏明，改为江南总农会。数年以来，所译农学新书，日以增多。兹特汇齐装订，都为五集，恳请进呈御览前来。臣伏查该员罗振玉，力学深纯，心术正大，曾赴日本游历，于学堂教育之法，夙有探讨。进来在江浙广东等省办理学务，皆相倚重。该员创设农学会，业已有年，家本寒峻，虽经改为江南总农会，公家并未助给经费，而所译农书，哀然成秩，皆该员独立支持，未尝中辍。较之妄出保障，有害人心，希图渔利者，用心相去，不啻霄壤。观其考核之勤，采取之伯，自应将原书进呈御览。

至张之洞邀请整顿湖北农务及农校、奏任为农科大学监督等，亦为明证。

顾颉刚与图书馆

陈艳军

顾颉刚（一八九三至一九八〇），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读书、写书，一辈子与书打交道，成就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创建了历史地理这一新学科。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给学术界带来了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巨大的变革，形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新学派——古史辨派。顾颉刚的成就当然与图书馆分不开，而“顾颉刚与图书馆”这个题目却少有人谈论²⁸。

荐言 一九一六年顾颉刚正式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从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沿袭了京师大学堂的旧有体制。学校有图书馆，却没有几个人去利用，形同虚设。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锐意改革，出版刊物，搭建校长与学生对话的平台，对切中时弊而又可行的建议，立即施行，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热情。顾颉刚对图书馆中的陈规陋习、呆滞停顿的现象一一罗列，写成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一九一八年三月四——十六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蔡校长对其所指出的每条都做了批复。文章登出不久，图书馆就有了较大的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图书馆的工作，顾颉刚从重视民族文化的高度，提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即使是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仍“固执己见”。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致王伯祥的信中说²⁹：“弟意，毛主席一再宣示，文化有三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写入《共同纲领》。现在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俱以发动，而民族的文化则置之高阁，视为不急之务。上周锡兰和平代表某君莅沪，告人曰：‘上海偌大一个都市，而上海图书馆之藏书乃不及我家！’其实馆中有书百万册，只缘干部不重视线装书，不但不买，即没收及捐赠者皆装箱锁置仓库，陈列者皆新华、中图所出小册，故以为不及其家也。故民族文化之

²⁸ 仅见顾廷龙《介绍顾颉刚撰〈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一九八一年《文献》第八辑。

²⁹ 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三页。

不整理，不但有负先民之劳动成绩，并将贻羞国际，视我为无文化之国家。现在私家图书已集中国家图书馆，诚能早些编目，则集合各本而校一定本，集合各家说而编一集解，事不为难；更请精通马列主义者予以批评，亦不致贻读者以毒素。此事只有现在可做，若再迟十年，我辈纵不死亦必不能工作，待后起者则不知何时，此学势将中断。”

顾颉刚先生不但对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他还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从一九五四年起，就开始提议在北京建一座全国性的图书馆。一九六三年的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请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推动科学研究，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提案。二十年后，国家图书馆新馆在紫竹院附近落成，顾颉刚的愿望终得实现。

任职 一九二〇年夏，顾颉刚大学毕业。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讲课，最适宜到图书馆搞图书编目，于是同学罗家伦就把他推荐给胡适，胡适帮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了编目员的职位。当时北大图书馆有藏书十七万册，却从未有一部完整体现馆藏的目录。顾颉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中文书目。他先写出《图表编目意见书》（刊载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北大日刊上），计划从书名目录着手，然后编著者目录。在做编目的同时，馆里还要求他在十七万册书中厘定出善本。他一进书库就是半天，一个人东寻西找，如同“小老鼠堕到米囤里去了”。他藉此机会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他感到自己真到了“譬入众香之国，目眩瞽于花光，宛游群玉之峰，神愕眙于宝气”的境界了³⁰。两年后因照顾母亲归家，离开了他喜欢的图书馆工作。

一九二七年顾颉刚出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整理为中山大学购买的图书，同时编辑《图书馆周刊》。一九三〇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了燕大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一年担任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九年十月，顾颉刚应聘为四川省立图书馆筹设委员会委员。一九四六年顾颉刚从重庆返回苏州，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为图书博物馆系的学生讲授目录学。解放以后，顾颉刚担任了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筹建上海图书馆，并经常和柳翼谋、尹石公等一起编目校片。

购书 一九二七年因为人事关系，顾颉刚离开厦门大学，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此间，他向校方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购书计划，即著名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中，顾颉刚回顾了前人藏书正统正宗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顺应潮流的渐变，这种渐变带来的藏书宗旨的变化和图书馆职能的变化，“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图书是载

³⁰ 见前引顾书第六三页。

圣人之道，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就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标准。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³¹在这份计划书中，顾颉刚拟定了购书的范围，包括十六大类：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帐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象。他详列了这十六大类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指出其作用。根据这份计划书，顾颉刚遍及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等地，遍访书肆、书坊、书商、旧藏家，甚至小书摊也不放过，寻得不少珍品。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碑帖等等，甚至科举考试的夹带，也有收集。前后历时四个月，共买书十二万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顾颉刚结束购书，返校担任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主持整理这十二万册图书。经过一年的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出了一本专号，顾颉刚写了一篇《卷头语》，谈到了资料收集的不易：“到了江浙之后，努力购书……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不少。”³²

应当说，顾颉刚这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地方文献”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半以上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与现代地方文献的理论相一致。对地方文献理论的形成、地方文献搜集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对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和著名教育家顾廷龙两个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份计划书后来被收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杜定友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特作《书后》：“我拜读了顾先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之后，心中十二分的佩服。他这计划书的篇幅，虽是很短；但是含义甚深，计划周密。所要说的，都说过了。我对于他的计划，不敢赘一辞。

³¹ 见前引顾廷龙文。

³² 同上。

他拟的十六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增减。我只是以图书馆学的人注意。顾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但是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而且不尚空论，把实际的计划和各类书籍购求之必要，详述无遗，尤令人钦佩！所以现在把它付印，作为图书馆丛书之一。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的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我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依着顾先生的计划，去搜罗古籍。本着上述数点，去打破传统观念，扩大图书馆范围，实行科学的管理。这非但于中大图书馆前途有无限的发展，即于中国图书馆界也有重大的贡献。”³³在以后的工作中，杜定友先生也遵循了此方针。他极力主张地方图书馆要搜集地方文献。他在《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中说，“各地的图书馆，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尤为专有之责，以广东文献而论，负保存责任的当然是广东省立图书馆了”，“提倡读书运动，供应参考资料，这是每一个图书馆的责任，但是一个省立图书馆，则除此以外，更有重要的责任，就是保存广东文献”³⁴。

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曾说过：“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我服膺先生之说，经常注意到正统以外的图书资料的搜求，亦略有所得。”³⁵

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抵达杭州后即发生了淞沪抗战，由于交通中断，被迫滞留杭州数月。利用这个机会，顾颉刚在杭州为燕大图书馆寻购图书。禹贡学会成立后，他积极为禹贡学会收购有关史地图籍等。

赠书 顾颉刚从小就喜欢逛书肆，求学时期，经常光顾书肆、书坊、书摊，四十岁时集藏了三间屋子的图书资料。到抗战胜利，仅近代史资料就有两万多册。多次搬迁，图书分散在北平、上海等地。一九四八年他把在北平的藏书运到上海，整理后，选取其中有史料价值的图书八百六十种，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后归入上海图书馆）。其中清末民初之章程、报告、概况、传记及河工、海防等工料、薪粮、公费清册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此外，还有抗战时的内地出版物及期刊若干册。

一九五三年一月，顾颉刚将珍藏多年的《论持久战》捐给上海图书馆。他特意手加题跋：“毛主席这本著作，一九三八年出版于延安。那时我在兰州，承他的厚惠，邮寄给我。奉读之下，恍然于抗日所应走的方向。抗战期中，我的生活非常不安定，在甘肃住了一年，即到昆明，又转成都和重庆，直到胜利东归，这册书始终没有离开我。现在我把它重以装订，捐

³³ 见前引顾廷龙文。

³⁴ 引自卢中岳《杜定友对文献工作的业绩与评价》，《广东图书馆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³⁵ 见前引顾廷龙文。

给图书馆，作为永久的纪念。”³⁶

新中国成立不久，出现了私家踊跃捐赠藏书景象，大家、学者纷纷捐献图书。五十年代初，顾颉刚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永乐大典》三册、甲骨两盒、《东方杂志》一百零八册。顾颉刚逝世后，藏书共计四万六千余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现在全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并成立了“顾颉刚文库”³⁷。

荐人 顾颉刚钟情图书馆的工作，碰到贤才，他也要推荐到图书馆。一九三〇年秋，吴晗从上海到北平，曾与顾先生谈起明朝学者胡应麟的卒年问题。顾先生考其卒年是六十岁以上，吴晗考证出胡应麟应卒于五十二岁，打破了顾颉刚的观点。当时的吴晗年仅二十一岁，顾先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就举荐他到燕大图书馆任编目员，两人由此过从甚密。王煦华是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顾颉刚把他介绍到合众图书馆任职。后来王煦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颉刚的助手，帮助整理顾颉刚的资料，成为顾颉刚学术思想研究的专家。

作为学者，顾颉刚善于利用图书馆自不待言，为了读书写作，他甚至把家搬到邻近图书馆的地方。正是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成就了他的学术成就。

³⁶ 见前引顾廷龙文。

³⁷ 王菡《顾颉刚藏书之聚散》，《光明日报》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日。

唐与渤海关系的珍贵文献

孙绍华

渤海国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是在唐睿宗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当时唐王朝特派“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为专使，在完成使命的归途中路经旅顺口时，特意“凿井两口”，并题记其事，刻石“永为记验”，史称“鸿胪井题记刻石”。这是唐与渤海关系史上最早的信物，也是辽东半岛上最有价值的石刻，更是可与史书相互印证并可据此记载以纠正、弥补史书谬误与缺失的重要历史文献。一千多年以来，在原石上下前后左右题记补刻者甚多，除有七则题识因漫漶剥蚀已难辨认外，尚有大致或完全可以辨认者达五则之多。但不幸的是，日俄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旅大，日本镇守使中将富冈定恭公然将此石刻掠夺至东京，至今存放在日本皇宫内的建安府前院，称作“唐碑亭”。自此以后，多少日本人写文章研究、考证，赞美掠夺者的功勋，以主人的身份自居而恬不知耻。最令人气愤的是，去年夏天，大连电视台记者专程去采访时，竟无理地遭到拒绝。非但石刻不得一见，而且任何有关的资料也不肯提供。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居然恶狠狠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这种强盗嘴脸使我们不禁联想到：难道被掠夺去的国宝不应归还么？

我在二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这一石刻的考证文章，现在看来，有许多应该补正的地方，故而另写此文，希望能引起重视，从而考虑所有被掠夺的国宝如何通过法律的程序合理地归还等问题。

一

在唐代国内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中，渤海国是势力最大、辖地较广、年代悠久到几与唐王朝相始终的一个大的藩属。但除了唐代史书上少量有关记载以外，《渤海国志长编》乃后人所作之史料辑录，而传世之文献与文物也为数不多。迄至今日，最有价值的文物当首推原在旅顺口黄金山下的鸿胪井题记刻石。因为它是唐王朝与渤海国政治关系史上的重要信物，它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献价值。

渤海的祖先历史悠久，商代称肃慎，汉称挹娄，北魏时称勿吉，隋唐因“勿吉”音转而曰靺鞨，“羯”又因与“鞨”形近而讹变为“鞨”。至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之后，才有渤海之称。

先是，大祚荣曾于武后圣历年间自立为振国王。唐中宗即位后，曾“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表现了唐王朝对国内部族的尊重；大祚荣也“遣子入侍”，表示渤海已正式接受了与唐王朝的领属关系，但当唐朝将派使者册立封号之际，恰值突厥与契丹在边境上的战争连年不已，以致“使命不达”。及至“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在我国的历史上确立了渤海郡的称号。而后，渤海郡每年都遣使“朝贡”，并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在很多方面都仿效唐制，受唐文化较深的影响，遂使渤海郡的农业、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以上引文皆见《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传》）。

崔訢对于接受这次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使命，自视非同一般。所以，在他完成这次使命之后，归途路过旅顺，特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并刻石记事，“永为记验”。石刻的原文是：

敕持节宣靺鞨使

鸿胪卿崔訢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石高市尺一尺六寸，宽一尺一寸九分。三行，第一行八个字，第二行十个字，第三行十一个字，共二十九个字。书法苍劲遒丽，有北碑的刚健之风，颇具古拙韵味。在唐代楷书中属于独具风貌者。这一石刻在旅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受到历代的重视，留下了许多题识，分散刻在原石的上、下、左、右及背面。其中有七则题记因风化剥蚀已难辨认，尚存五则分别为依稀可辨与完全可以诵读者。比如：（一）明代“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布政司右参议姑苏查应兆记”，刻于原石下方，文中残存“观风访古，临黄口井，登奇石，因得览唐崔鸿胪古迹”字样。（二）明万历题刻，残存“万历”“井”字及“开元”诸字，已难知具体年月及题者姓名，刻于原石背面右部。（三）清代“乾隆四年岁次己未秋七月二十八日记”，题者为额洛图，刻于原石右侧。（四）清“道光二十年秋九月督兵防堵英夷，阅视水阵，见有巨石一方，开元崔公题刻尚存，因随笔以志。嘱水师协领特贺觅匠刻以镌垂其永。”后署“太子少保，盛京将军宗室耆英书”，刻于原石正面右上角。（五）清末刘含芳在原石正面崔訢题刻左端补刻一段长文：

此石在锦州旅顺海口黄金山下，其大如驼。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

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这是最后也是最完整的一则题记。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光绪八年任旅顺北洋海军营务处处长，兼旅顺船坞工程总办。在旅顺期间，曾留心文物古迹的保护，故有此题识。

日俄战后，帝俄战败，日本侵占了旅大。旅顺海军镇守司令长官中将富冈定恭，在他到任的当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即将此刻石掠运至东京，而于旅顺原址立一“鸿胪井遗迹”石刻以掩盖其强盗行径。日本文人学者对此石刻，据说“在许多书中都被大家赞扬，这已成为史家的常识。”（引见渡边谅《鸿胪井考》）他们俨然以石刻的主人自居。而时至今日，真正的石刻主人希望一见原石而不可得，公理何在？

这便是国宝鸿胪井刻石的沧桑史。

二

这一珍贵文物具有着多方面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须从几个角度去考证和认识。

第一，是对渤海建国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证物。

崔忻一行使节此次出使渤海，在唐王朝与渤海的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有力地表明，大祚荣所率部族的兴起和强盛，唐王朝的态度是支持和承认的。专派使者册封，除保留大祚荣原有的忽汗州的领地外，加上忽汗州都督的头衔，既使其合法化，又表示了尊重。而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比起原来的自称振国王就更具有地方特色。这一举动，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联系，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自此以后，渤海国才被世人所知，载入史册。所以我们说，旅顺鸿胪井题记刻石是这一历史关系的不可多得的验证。

第二，石刻的文字内容可以纠正《唐书》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疏漏和缺失。

唐王朝对于这次派遣使者是极为重视的。据前引《旧唐书·北狄传》所记，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往渤海册封大祚荣，可见这个崔忻的原职是“郎将”，但是，这一刻石却清楚地标明使者的官衔是“鸿胪卿”。按唐代的官制，“郎将”是不能担负“诸蕃封命”职务的。那么崔忻“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等职，就是专为担负此次册封大祚荣的使命而加衔。按唐制，鸿胪卿掌管出使封拜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述：“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诸蕃封命，则受册而往。”这正好说明崔忻的出使特加鸿胪卿衔是符合官制的。由此可知，《唐书》所记，是崔忻未出使前的官职；碑文所刻，则是出使时特授的职衔。二者非但不矛盾，也可以印证《旧唐书》所记原属未错，只不过不够

完整罢了。通过这一对比，就更可以看出石刻文物对于印证、补充、纠正史书讹失的作用是必须重视的。至于《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传》所记之郎将为“崔訢”，而此刻石为“崔忻”，这大概是由于“訢”“忻”二字音同形近而史书误记。刻石是崔忻直接所辖的事，不致有误，而且寥寥二十九字，何至把特使的名字刻错，当然应以刻石为准。

值得特作说明的是，石刻中用“靺鞨”而不用“靺鞨”与习惯用法和史书的记载不一致。这在上文已略有论及，但须作进一步的论述。按渤海的先人在北魏时有“勿吉”之称，“勿吉”与“靺鞨”音近，故演变至此。此皆从满族语言之“窝集”（意为森林）转化而来，意思是说，渤海人是森林中的部族。至于“吉”字转化为“鞨”字，盖因传统所说“五胡”族中有羯族，故以“鞨”代“吉”。而“鞨”又讹变为“鞨”，这是受上面“靺”字的“革”旁所株连而产生的文字类化所致，有如“凤凰”的“皇”字受“凤”字的株连而讹变为“凰”字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从声韵和语源上的推断。从另一面考虑，石刻中所用的“靺鞨使”是唐王朝派崔忻为特使时所加的封号，崔忻不会也不敢写错字；何况他完成使命归途中岂能把出使的国家名字都弄错？由此可以断言，“靺鞨”应是“靺鞨”，即使《唐书》和字书、辞书中皆作“靺鞨”也不足为训。

第三，刻石纪年可与《唐书》有关记述相印证。

关于册封大祚荣的年代问题，《旧唐书》所记与刻石所载似有不合。关于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事，据《旧唐书·北狄传》载，大祚荣于武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武后圣历共二年，此事属于元年或二年则不可考。但据日本史学家菅原道真等在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四年所修之《类聚国史》卷一九三所记，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公元六九八年）大祚荣始建国渤海。和铜六年受唐册立。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即唐武后圣历元年，那么大祚荣的称王就是在圣历元年。渤海与日本邻接，而历史家菅原道真又是和渤海使者曾有过多次接触的学者，所得的消息当属可靠。而且《类聚国史》的成书也在《唐书》之前，至于受封册立之和铜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即唐玄宗开元元年，则又似与《旧唐书》所记之“睿宗先天二年”不合。与碑石所记之“开元二年”亦差一年。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误的。据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太上皇帝》所记：“中宗为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弑，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率兵讨乱，诛韦氏及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太子。先天元年，立为皇帝，听小事；自称太上皇，听大事。明年，诏归政于皇帝，是为玄宗。”可知睿宗在位时玄宗已为皇帝。而所谓的“明年”即先天二年。按《唐书》所记，此年十一月改元开元，即所谓“归政于皇帝”。则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因此，《旧唐书》所记年代，可能是崔忻出使时尚在十一月未正式“归政于皇帝”亦即改元开元之前。而刻石是在完成使命归途经过旅顺口的时候，实际只在

改元开元后的六个月，这是因为崔忻此次出使的途径不是从长安沿古长城路线到东北，而是从山东登州乘船渡海到旅大，再自旅大北行至渤海（当时大祚荣据东牟山，即今吉林敦化境内）。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往返不过半年左右，完成使命后回到旅顺口，此时已是开元二年五月，也是合乎情理的。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可以证明，旅顺口鸿胪井题记刻石在唐与渤海政治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是具有多方面历史文献价值的国宝。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考证文章，但那时由于许多有关资料被封锁在掠夺者手中，我们无从掌握。现在根据几方面的文献重写这篇文章，一则希望对渤海国的研究有所推进，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石刻的不幸经历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件珍贵文物的遭遇，往往也与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发人深省的惨痛教训。二则也使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将侵略者掠夺的文物通过外交和法律的手段抓紧索还。古人说得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当事人大多渐趋凋零，而岁月是无情的！

甲午战争前中日留学教育比较

辛 欣

十九世纪中叶中日同处于文化形态的转化之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它们的国门，使它们在蒙受耻辱的同时，也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为了增强国力，抵御侵略，中日共同选择了西学之路。西学之路有两条：一是引进来，吸引洋人才、洋技术；二是走出去，派遣留学生出洋海外，直接向洋人学习。相比之下，后一条道路更为主动有效，是西学的主要方式。因此，发展留学教育成为甲午战前中日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

中国的留学教育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七年容闳、黄宽、黄胜作为教会学生随传教士赴美，分别考入耶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学生。一八七六年李鸿章派陆军军官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军事学院学习水陆和机械技艺。一八七一年曾国藩先后三次上奏清廷，选派幼童赴泰西各国学习，谙悉西方之技，以图回国充实海防。最终获准施行留美计划。同年颁布《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在上海设局负责办理挑选幼童赴洋事务；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挑选聪慧幼童；年龄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读过几年中国书，家庭不反对，并且经考试合格者方能留洋；每年选三十名，连选四年；学期十五年，学成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根据各人所长安排工作；官费留学，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也不准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赴洋学童入学之初所学书籍、专业，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报到上海¹。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幼童三十人赴美留学，容闳和陈兰彬为监督。随后清政府又连续三年选送九十名幼童赴美。留美幼童首先学习语言，住在美国人家中，同其子女一起读小学、中学。幼童三个月去“出洋局”（容闳等人创办）一次，专门学习华文。一八八一年，由于华人监督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学生的思想开放不

¹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八六九至八七〇页。

满，上书告状，加之美国又推行排华政策，不允许华人进美国的海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故清廷解散“出洋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除病故和其他原因未归的二十六人外，其余九十四人分三批回华，分别被送往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等处。

受幼童留美一事启发，一八七三年船政大臣沈葆楨与陕甘总督左宗棠联衔上奏，递呈《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请求朝廷批准送船政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生之聪颖且有根柢者留学法国，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送后学堂习英文学生之聪颖且有根柢者去英国留学，究驾驶之方及练兵制胜之理。由于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此事未成定议。一八七五年春沈葆楨派船政洋员日意格回法国采购挖泥船、铁肋及新式轮机，趁机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和后学堂学生刘步瞻、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游历学习。

一八七六年《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出台，规定：奏派华、洋监督各一员，随同出洋，会同管理留学事务；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制造学生十四名，制造艺徒四名，分别赴英法留学，计满三年为限，以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舰回华，调度布阵丝毫不藉洋人，并有专门洋师考取给予确据者，方为学有成效；上述两项学生内如有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专业者，由两监督会商挑选，分别安插学习；留学生于闲暇时须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并由华监督定期调考华文论说，以期明体达用；两监督及各项生徒自出洋以迄回华，均须详注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再由船政抄咨南洋大臣复核。此外，《章程》对华、洋监督的责任、留学生的待遇以及应遵守的纪律、进入院校生徒和赴厂上舰学习的先后顺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²，较留美计划更为严密细致。

同年十一月，船政学生赴欧留学计划得到朝廷获准。一八七七年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欧，监督为李凤苞和日意格。一八八一年前学堂八名学生，后学堂六名学生获准出洋留学。由于李鸿章临时从后学堂选调四人分赴天津水师学堂和“威远”号练习舰充任教习，故第二批留学人数为十名。一八八六年又有三十三人留学欧洲，此为第三批留学生。

从一八八〇年开始留欧船政学生先后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洋海军和海军学堂。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经营数十年的海军全军覆没，派遣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之事停止。

甲午战争前中国曾有四位留美女学生，她们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四个人都学医，除金雅妹是自费留学外，其余三人皆由教会资助。学业完成后，全部回国行医。

²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九一八至九二一页。

二

近代日本的留学始于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创建海军，“尊王攘夷”，一八五五年永井岩之丞“拟请遴遣学生游学海外”³。七年之后，日本开放海禁，幕府向荷兰派遣十二名留学生，主要学习军事学和自然科学，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由中村正直和川路太郎二人负责监督，学制二年。一八六三年长藩派五名学生留英。一八六八年萨摩藩派七名学生留英。

一八七〇年日本制定了《海外留学规则》，次年颁布的《学制》也列有留学生条款。明确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留学生分官费和私费两种，官费学生中的“华族留学生，由太政官选派，大学生由大学选派，士族庶人由府县厅遴选”。遴选标准是：通晓派往国语言；“禀性诚实，思想敏锐者”；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但有非凡俊才者，不在此限”；官费留学生还分为初等和上等，初等为中学毕业，上等为大学毕业；留学生年限，一般为五年；对留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明，凡有“污辱国体者”、“懒惰或有不轨行为者”，一经查知，立即召还，并给予应有处分；临行前还要对神宣誓，保证报效国恩，不玷污“国体”；留学生的任务是：熟悉各国“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文化制度、科学技术，以达到“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助国家于兴隆，期皇谟于久远”之目的⁴。

一八七一年大臣岩仓具视率四十八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去欧美考察，随行的有五十九名华、士族出身的留学生，其中包括五名女留学生。同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一时间全国上下争相出国，出现留学热，有人称此为“留学万能时代”。这期间留学人数猛增：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共派遣留学生一百七十四名，一八七三年增到三百七十三人，其中官费生二百五十人⁵。

为了节省经费，提高留学生质量，一八七三年政府宣布停止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将已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全部召回，实行“贷费留学生规则”，即由开成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严格遴选，对优秀学生采取贷款形式派往国外，学期五年，归国三年后偿还学费。依此办法，当年开成学校选出十一名优生分赴美、德、法。一八七六年选送十人。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由于爆发西南战争，停止派遣留学生。一八七八年政府对贷费留学生条款又作了改动，

³（日）胜安芳，《大日本创建海军史》，第一册，东京明治三十九年版，第二九页。

⁴（日）野田义夫，《明治教育史》，东京育英舍明治四十年版。

⁵《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第五二七页。

允许贷费留学生自己选择留学年限，每年贷款一千元以下，回国后二十年内还清⁶。接下来的三年共有二十名贷费留学生先后出国。

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一八八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费留学生规则》，规定：东京大学毕业生中之有望成才者，由文部卿为其选择留学国家、学科、年限，费用由政府承担，学成归国后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八八四年文部省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职五年以上且自愿从事学术研究者，允许自费留学一年或一年半。一八八五年日本《公费留学规则》再次修改，规定东京大学和外交部所辖学校的专科毕业生可以出国留学。然而当时每年外派的人员很少，一般不超过十人。一八九二年天皇敕令更改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则，扩大选拔范围，规定文部省可根据学术技艺研究的需要，在其直辖的学校毕业生中选二十二人出国留学，其留学年限和回国服务年限由文部省决定。

军事教育是甲午战前日本留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一八六九年日本政府派山县有朋、西乡从道去欧洲考察兵制。一八七〇年海军兵学寮生徒前田十郎右卫门和伊月一郎随英舰航行，时间为三年，学习航海技术；一八七一年兵学寮生徒八田裕次郎、赤岭五作等留学法国；同年六月，炮术军校的平原秀次郎、造船局的丹羽雄九郎去英国留学；八月，海军生徒坪井航三到美国亚细亚舰队的旗舰上学习驾驶；九月，森田留藏到美国学习海上炮术。当时军校留学生中，除公费外还有十六人是以自费和藩费的形式去美国留学，目的是研究海军军制和战术，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男爵松村淳藏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七七三年“海军兵学海外留学生规则”出台，规定海军留学生全部由海军省管理。

三

下面从背景、思想、过程、作用四方面对中日留学教育作一比较。

背景 中日留学教育产生的背景相似，皆产生于西方列强侵略和国内矛盾激化之下，所谓内外交困。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事件：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败于洋人船坚炮利之下，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开放港口；在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清政府借助洋人提供的洋枪洋炮，镇压了起义。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清政府品尝了落后挨打的苦果，也体会到了近代生产技术和武器装

⁶ (日)野田义夫，《明治教育史》，东京育英舍明治四十年版。

备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希望用洋人的武器和技术来对付洋人的侵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军政要员开始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武器装备和生产机器，改革海陆军的训练及体制，加强海防建设。洋务派最初的作法是“模仿”洋人设局建厂，购进制造舰炮的机器进行仿造。造“制器之器”，需要培养“制器之人”，于是伴随着第一批洋务产业的出现，培养从事洋务人才学校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国内办学受信息来源、师资水平和实习场地的限制，具有局限性，“即使仿循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⁷，不能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鉴于此，清政府于七十年代初作出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决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处于幕府统治之下，推行“锁国”政策：国家之间的交往仅限于幕府与朝鲜交换通信史；严禁渡海出国；严禁基督教传播；限制对外贸易。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日本，俄、英、法、美频频“拜访”日本，紧锁的国门被打开，签定不平等条约、划租界、开洋行、建兵营。日本在遭受侵略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趋激化：各藩欲脱离幕府控制，寻求自治；下层武士对地位低下不满；农民起义连年不断。面对困境，一八六八年新上台的明治天皇进行维新改制，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其中“富国强兵”是目的，以“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为手段。手段的运用离不开向西方学习，因此，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在施政纲领《五条誓文》中提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教育为本”，随后对教育进行改革，制定了发展留学教育的政策，掀起全国出洋学习的高潮。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若想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只有求学海外，增强国力，才能抵御侵略。

思想 中日留学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相似，都经历了对西方文明由排斥到接受的过程。但是，由于民族心态、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日留学教育思想产生的时间早晚和深刻程度不同。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清醒的中国人认识到失败的原因在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西方列强的胜利靠的是坚船利炮，要想制服夷人，不被侵略，必须学会造船造炮。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是最早的西学思想。

西学思想的出现遭到清朝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认为一旦引进西学，势必会影响信仰，动

⁷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八。

摇统治，甚至宣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否定西学的作用。面对守旧派强大的势力，洋务派打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只学西方的实用技术，人文、政治、宗教不予涉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甲午战前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军事及自然科学。

日本与中国相同，西学思想也是在遭受失败之后产生，而且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然而，在日本西学思想形成所用的时间和遭到反对的程度远不及中国。其原因是日本为岛国，自身具有局限性，历史以来一直通过海上交通与别国往来发展，经常碰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习惯于接受，如果把中国文化界定为“发生型”，那么日本便是“摄取型”，善于吸收别国文化并对其进行加工变成本民族的东西。从其有历史记载到明治维新以前的一千多年间，日本一直是靠摄取中国文化而获得发展。“摄取型”的文化决定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不排斥，对中国文明如此，对西方文明也如此。所以在日本国门被打开后，日本对夷人侵略行径的反感很快转变为对其文明的兴趣，像以往对待中国文化一样，日本人积极主张加强同西人的接触，希望通过把西人引入内地和把国人送出海外的形式，尽快把先进的西方文明吸收过来，充实自己，以免被“万国大世界”所排斥，最终不能进入文明世界。

这种思想的提出遭到保守的“攘夷”派反对。“攘夷”派将中国儒教思想作为武器，反对日本西学、西化，尤其反对学习西方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主张人人平等，不符合日本幕府乃至天皇封建统治的需要。后来“攘夷”派在确实感触了西方文明之后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全面否定西学，认为“西土之邦，智巧开，制度章典焕乎可观。则资彼有馀以补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圣知之用心也”⁸。由完全“攘夷”变为部分“攘夷”，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貌似而实异。道德和技术可视为并列关系，而中体西用则有主次之分。因此可以说，日本对于西学的态度较中国更为积极。

过程 实施时间。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开始于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幼童。这是在中国被迫开放海禁的三十年之后，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有十馀年时间。严格意义上说，留美幼童还算不上留学生，他们到美国只能先读小学。清朝第一次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的时间应该是一八七七年，福建船政学堂学生首次赴欧留学。

日本留学教育开始的时间较中国早。一八六二年德川幕府向欧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这是在日本遭美舰进攻被迫打开国门的八年之后，比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早十年。在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未抵欧洲之前，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一八七七年在《伦敦致李伯相》一文中就提到，当时“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在伦敦者九十人”。可见一

⁸ 《外来文化摄取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第一〇三页。

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留学教育已经大规模启动。

派遣人数。近代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派往美国的幼童共一百二十名，福建船政局在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二年、一八八六年派往欧洲留学生共七十三名。除此之外，一八七六年李鸿章派七名陆军军官留德，再加上早期容闳等三名留学生，金雅妹等四名女留学生，共二百零七人，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留学生总数。

同时期日本的留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中国。从开放海禁到明治维新之前，由德川幕府和各藩派遣留学生一百四十余名⁹，明治维新初期留学生人数增多，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有一百七十四名，一八七三年增到三百七十三人，后经调整每年派遣人数有所下降，一八七四至一八九四年共派遣留学生三百八十五人¹⁰。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日本共派遣留学生近九百人，是中国的四倍多。

派遣国家。中国留学生留学的范围较小，只限于美、英、法、德四国，德国只有七人，其余全在美、英、法三国。

日本留学生派遣的地区较广，美、英、德、意、法、荷、奥、西、葡、俄等国都有日本留学生¹¹。

学习内容。中国留学教育实用性较强，为了加强海防，发展洋务，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多主攻军事及其相关的科技专业。在福建船政学堂三期留学生中，学习矿务的八人，学习语言 and 法律的十一人，学理化、气象的十一人，其余五十三人学武器、舰船制造与驾驶。

与中国留学生相比，日本留学生涉及的专业和科目要丰富得多，从饮食服装到铁路电信，从自然科学到政治法律，从农业到商业，从民用技术到军事指挥，无所不包。当然，同中国一样，军事及其相关的科技也是当时日本留学的重点。

教育经费。甲午战前清朝的留学生多为官费。在《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中规定，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赴美的留学幼童每人来回路费及服装银七百九十两，每年驻洋房租、生活费、学费四百两，每月监督、翻译、教习人员工资一千七百二十两，四年共计费用一百二十万两（因留学生提前撤回，实际花费没有这么多），全部由政府从每年的江海关洋税中指拨。福建船政留学生因每次派遣人数不定，地区不一，学制有长有短，其费用没有统一标准，“所需经费，由闽省额拨南、北洋海防经费酌提动用。旋议定闽省厘金项下筹银四分之一，按着章程分年汇解。”¹²

⁹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九六二页。

¹⁰ （日）野田义夫，《明治教育史》，东京育英舍明治四十年版。

¹¹ （日）黑田茂次郎，《明治学制沿革史》，第一一六页。

¹²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二四〇页。

甲午战争前日本的留学生分为四类：官费、藩费、贷费、自费。为了有计划培养人才，一八八一年公费留学再度恢复。日本留学生中官费比重较大，军校、师范院校和开成学校的留学生基本都为官费。一八七三年日本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最多，达二十六万元，占文部省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八。多种渠道的留学推动了日本留学教育的发展。

作用 甲午战前，清朝派往国外的留学生，经过数年努力，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学习军事专业的留学生独立设计、制造舰船；监督从国外订购的舰船的质量；驾驶和指挥军舰；充任船政学堂教习以及参与海军章程制定等，推动了海军的发展。学习自然科学和民用技术的留学生，建铁路、开矿山、开设电报专线等，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留学生中思想活跃者，通过撰写论文、翻译外国著作介绍资产阶级思想，通过翻译民族文学作品向国外介绍中国，促进文化交流和思想发展。

日本由于留学教育实施时间早，留学人数多，学习范围广，其影响更为巨大。留学生除在许多行业中起着骨干作用外，还参与了国家体制的重大改革。从伊藤博文、井上馨、森有礼这样的政治家、思想家，到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大山岩等海陆军元帅、将军，无一不是留学教育的结果。他们留学海外，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回国后对日本旧有的封建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加速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巨变，以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都同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成功密不可分。

同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封建科举制的束缚。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随着洋务的出现产生了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学校，但科举制仍是社会教育的主流，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许多人认为读书考科举才是正经之事，搞洋务读洋书是歪门邪道，加之当时对西洋缺乏了解，出国留学顾虑重重，导致留学生源不足。一八七二年中国第一批赴美幼童的人数仅为三十人，但在大陆还未招足，不得不到香港增补。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推行的是武士世袭制，下层武士由于社会地位低，没有出路，纷纷投身西学，希望通过留洋出人头地。第二，缺乏相应的近代教育体制。由于科举是教育目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学校大多为科举考试而设，学习的内容都是同科举有关的经书籍典，缺乏反映近代文明的科学知识，连同文馆这类为同国外交往而建的新校，也只增加了外国语言的课程。所以中国派出去的很多留学生，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国外学校的要求，基础不好，学习吃力，不能完成留学任务。日本则不同，一八七二年颁布《学制》，后又经过修改颁布《增补学制》、《教育令》，在国内建立起与西方相近的教育体制，推广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为留学教育提供充足的生源，保证了留学生的质量。第三，留学缺乏统一规划。近代中国采取的几次派遣留学生行动，都是由地方大员直辖的地方性教育机

构和洋务派官僚创办的海军学校发起的,具有集团性和地方色彩,缺少明确法规和统一计划,全凭当政者一时喜好和地方财政收支而定,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日本则做了充分准备。一八七四年颁布的《增补学制》就制定了“留学生规则”,对留学工作做了统一规划和管理。后来又多次修改规则,直至完善。第四,对归国留学生不够重视。受封建思想制约,很多人认为出洋留学就是“洋鬼子”,就会“以夷变夏”,因此留学生归国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八八一年从美国撤回的留学生因为不被理解,甚至受到软禁的对待。后来的海军留学生虽然第一批归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唯恐落后”¹³,但后两批却遭到冷遇,没有得到适当安置,人才流失。即使被任用也只是承担具体事务,没有一人担任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要职,这同明治维新时期作为杰出代表活跃在各界舞台上的日本留学生相比,差距实在不小。甲午战后闽浙总督兼理船政大臣边宝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此方面的论述一语中的,“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学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恩,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境”¹⁴。

当然,日本战前的留学教育也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盲目、肤浅、照搬照抄等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段成功的教育历史。开放的留学教育带来一个崭新的日本,这一点不容置疑。世界任何国家或民族都非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总有值得他人学习的骄傲和向他人学习的必要。只有不断地采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获得真正发展,此乃留学教育之所在。

¹³ 池仲祐,《洋务运动·海军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第四八三页。

¹⁴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九八二页。

黄海海战“松岛”舰被击真相

冷绣锦

中日海军主力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在大鹿岛海域进行的黄海海战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战斗之激烈，是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中外学者对此次海战研究成果也很显著，惟有些问题的结论值得商榷。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舰究竟被北洋舰队哪几艘舰击伤，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中外资料对“松岛”舰中炮的不同记载

在中国史料中的记述。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海军篇第七开始说“平远、广丙亦来会，而船弱不任战”，后又说“我‘定远’击其‘松岛’舰几沉之”。¹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十月六日致总理衙门电报中，主要陈述“定远猛发右炮击倭大队，各船已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定远”起火后由刘步蟾边指挥灭火，边炮击日舰，终于“发炮伤其‘松岛’督船，并合击伤其右侧一船，白烟冒起数丈。”提到“平远”、“广丙”二船“续至”并“尾追装兵倭船，为敌所断，未及归队”，后来“亦俱折回”，表明“平远”等弱舰一直在战场上周旋。²

在外国资料中也有记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的《大东沟海战》中，只称“群炮萃于松岛，亦击断其号旗之杆”，并“受伤尤剧”³。英国海军后备役中尉戴乐尔，时任中国海关巡船船长，在其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国事记》中写到：“我方十炮之三巨弹，其一射入日舰‘松岛’之腹内，轰之，惟未沉之，称此弹之功者，‘镇

¹ 《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六七至六八页。

²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九，第七一九页。

³ 《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一六七、一七一页。

远’舰之赫克曼氏也。”⁴这里只提到“镇远”舰击中“松岛”舰。帮办“镇远”舰管带美国人麦吉芬的《鸭绿江之战》，以《中国铁甲舰镇远号舰长（帮带）回忆录》为副标题，刊载于美国《世纪杂志》一八九五年八月号中，记道：“当日本主队环攻我们之时，距离约为两千八百公尺至一千公尺间，有时甚至更近。约三时左右，‘松岛’与‘镇远’相距约一千七百公尺，我们对它攻击，我们十二、三吋的一颗钢弹，长约五倍口径，含有约九十磅的炸药。日旗舰被击中。”⁵这里也只提到“镇远”舰击中“松岛”舰。

在日本史料中的记述。《日清战争实记》所载《松岛舰之勇战》中记录：“二时三十分距离一千二百米，‘平远’舰以二十六厘米炮频繁地向我发炮，炮弹击中我二十二厘米炮座，使左舷发射管四人死亡。……我追击队发射的炮弹命中敌舰前炮台，使其二十六厘米炮不能再使用了。‘平远’舰终于不支而逃去。三时三十分‘镇远’舰发一发三十厘米半的炮弹，命中我‘松岛’舰左舷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船体倾斜，白烟腾起，周围黯淡。”⁶在和田笃太郎编辑的《日清交战录》第十一号《黄海之海战》一文中，提到“平远”舰与“广丙”舰进入黄海大战战区，“平远”舰被日舰“扶桑”舰后炮击中起火，后来就离开了战场，也提到“定远”舰与“松岛”舰互被击中情形。⁷以上日本的两则资料是战时记录，可信度较高。

二、中外论著对“松岛”舰中炮的记载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论著对其有不同记述。一九〇六年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明治二七八年海战史》记载了“平远”舰在海战中的表现有三：一是十七日下午二时三十四分“平远”发射二十六厘米炮弹一发，命中“松岛”左舷军官室，贯穿鱼雷用具室，打死左舷鱼雷发射员四名；二是下午三时十分“松岛”又中一炮，炮弹“打穿左舷中央鱼雷室上部，在大樯下部爆炸，打死左舷鱼雷发射员二名；三是下午三时十五分，“平远”舰再击中日舰本队“岩岛”舰。⁸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日清战史》记载：

三时，“济远”舰离开战场，清军溃败，惟有“定远”、“镇远”二舰还在坚持战斗。

⁴ 罗尔纲著：《晚清兵志》，中华书局版一九九七年，第九七页。

⁵ 《晚清兵志》第九七页。

⁶ 《日清战争实记》第七编，参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八册，第七六至七七页。

⁷ 和田笃太郎：《日清交战录》第十一号，春阳堂版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日，第一二至一六页。

⁸ 日本海军军令部：《明治二七八年海战史》，春阳堂版明治三十八年，第一九七、一九九、二一四页也记载了“平远”舰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退出战场之事。

这时第一游击队追赶逃走的清军舰队，而旗舰“松岛”舰也被“定远”舰炮击，舰前部被炮击碎。⁹

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记载“定远”舰击中“松岛”舰比较详尽：

三时半（“定远”舰）发出之三十公分半巨炮炮弹，击中“松岛”舰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其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爆炸。刹那间，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之巨响。俄而，剧烈震荡，舰体倾斜，浓烟蔽空，状至至危。¹⁰

中国论著对其记述时，往往只提到“定远”和“镇远”二舰。包遵彭著《中国海军史》所载“松岛”舰被击中的内容如下：

丁汝昌既受伤，管驾刘步蟾、副管驾李鼎新代司督战，指挥进退，变换旋转，使敌炮不能射准，枪炮官沈寿堃、徐振鹏督战甚勇敢，发炮击伤“松岛”督船及“松岛”左侧一船。……日旗舰“松岛”被“镇远”十二吋炮击中其全部炮塔。其惟一炮亦被击毁。¹¹

吴杰章等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记载：

三时三十分，当“定远”与日本旗舰“松岛”相距约二千公尺时，“定远”舰发出之三十公分半大炮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且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甲板上的药包爆炸。¹²

胡立人等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记明：

当“定远”与日旗舰“松岛”相距二千米时，“定远”发炮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药包爆炸，发出巨响。¹³

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写道：

战至下午三时半，当“定远”与“松岛”相距大约二千米时，由枪炮大副沈寿堃指挥发出了三十公分半巨炮炮弹，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其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炸药爆炸。死伤达八十四人，队长志摩（清直）大尉，分队长伊东（满嘉记）少尉死之。到下午四时十分，已经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于是，“松岛”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¹⁴

⁹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参谋本部明治三十七年版，第二五六页。

¹⁰ 《日清战史》第七编（上），东京博文馆版一八九六年，第一五七页。

¹¹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版，第九六二—九六四页。

¹²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二二八至二二九页。

¹³ 胡立人等：《中国近代海军史》，大连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二六二页。

¹⁴ 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二七页。

二〇〇〇年九月由“几位多年从事海军工作并致力于世界海军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历时数载”完成的《世界海军史》，在记述黄海海战时也只是说：“‘定远’等右翼舰（指“经远”、“来远”、“扬威”、“超勇”，实际上“定远”列于犄角雁行阵之左翼——引者）发右舷火炮猛攻日舰‘松岛’‘千代田’……”。下午十六时之后，“北洋舰队战斗力大减，处境不利，但‘定远’、‘镇远’等四舰仍奋力坚持战斗。‘定远’、‘镇远’遭日联合舰队本队五艘军舰围攻，但毫无惧色，在战斗中重炮击中日旗舰‘松岛’号，使之死伤一百多人，失去指挥能力。日不得不将‘桥立’号改作旗舰，其本队只得后撤”。¹⁵

三、“松岛”舰木村浩吉回忆“松岛”舰被击之详况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旗舰“松岛”舰为海防舰，排水量四千二百七十八吨，马力为五千四百匹，配炮三十一门，速力十七点五海里，乘员三百五十五人，于一八九〇年下水。“平远”舰为巡洋舰，排水量仅两千一百吨，马力为两千四百匹，配炮八门，速力十四海里，乘员一百四十五人，于一八八八年下水。单从两舰的基本状况看，“平远”舰远远不如“松岛”舰，但是据“松岛”舰水雷长木村浩吉大尉回忆，在黄海海战中“平远”舰与“镇远”舰等舰一同击中“松岛”舰，迫其退出战场。以下为木村浩吉新记“松岛”舰三次被击实况：

（一）（九月十七日下午）“平远”舰第一次击中日舰“松岛”舰——

二时三十分，清舰“平远”舰及其同僚，试图想在我本队前横截，再急转方向突击“松岛”舰，有的舰将鱼形水雷一字行置于我舰首，准备向我两舷发射水雷，在“松岛”舰的猛烈炮击下，他们立即改变方向，右转进击本队，之后以直角方向逃走。此时我们的本队出现在“平远”舰的左舷，其距离有一千五百米，用速射炮炮击其侧面，在无数发炮弹的轰击下，已使其舷侧出现洞穴，从舰内冒出浓烟，舰内也出现火焰。同时“平远”舰在用二点六厘米巨炮向我舰射击，击中“松岛”舰，并从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并击穿隔壁的一寸钢铁，再从水雷发射管下通过，撞击到机关用的油罐，顿时使三点二厘米的炮塔已变成无数的碎片。该敌弹在穿过中央水雷室时，使舰内各室发生猛烈震动，硝烟弥漫，人近咫尺难以辨认，令人窒息。发射管四员因窒息而死，血肉喷溅在衣服上，凄惨可见。

（二）“平远”舰第二次击中日舰“松岛”舰——

¹⁵ 丁一平等：《世界海战史》，海潮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四〇八至四〇九页。

随后，“平远”舰又以四七密弹命中“松岛”舰中央水雷室（偏右两度的位置）和大樯，二名发射官员倒下。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散布遍地皆是，在上面行走犹如洗刷地板一样。当时，在中央发射指挥官井手少尉的侧面被敌弹炮击，使“松岛”舰发射电路断绝，同时，又有二三名官员战死。只见少尉胸部以下一片血迹模糊，背面粘着厚厚的肉浆，少尉抖落下落在身上一斤多的人肉，正当少尉传出发射令时，又一敌弹炸死二名发射官员。

（三）“镇远”舰炮击中日舰“松岛”舰——

三时三十分，“镇远”舰三十厘米半口径的大炮发射二颗炮弹，命中“松岛”舰。一颗击中“松岛”舰左舷甲板第四号炮身上方，又转向击破右舷侧上甲板。另一颗击中四号炮钢盾破裂，盾及车台碎片飞舞，炮身弯曲下落，借势将附近的药壳儿引破爆炸，猛势把一层的舷侧板爆破，有三分之一长，从甲板的巨孔穿出有二尺至三尺有余，并击断上甲板之铁桩、铁梁，厂甲板左右舷顺势出现三四坪¹⁶洞，使舰体失去平衡，舰体倾斜，海水灌入，很快使舰内数处破损。“松岛”舰这时整个处于瘫痪之中，上甲板里面的电灯、电路、传话管、水管、蒸汽管、升降口全部断裂变形，两个梯子也已粉碎，一切犹如草蔓一样垂下。指挥官志摩（清直）大尉、士官、下士士卒二十八名，有的四肢分裂，有的有上体无下部，残缺不全，其他重伤之后而死的有二十二名，幸免一死的仅三十余名，惨状严重。随之又出现了火灾，火药、瓦斯弥漫整个“松岛”舰，烟雾腾起，四面暗淡，令人窒息，防火队亦难以接近。幸而风从破损的舷侧，吹进一些新鲜空气，才使毒气稀薄。防火队得以竭力灭火，只用三十分左右扑灭火灾。下甲板的炮员、弹库员非死即伤。幸存的人收起四散的炮具，重新转交给新的人员，尽力有效地修复许多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的炮台。为减轻重伤者的痛苦，脱掉因火药、瓦斯而燃烧的毛织军服，让伤员裸体。有的头发已烧成灰烬，身体烧得如墨一样黑；有的被烧黑的铁片烫伤；有的腹部破裂；有的手足丢失，被有毒的瓦斯熏的痛苦难忍，悲鸣连天。突然，司令塔外的爆破点，直径达四五间隔大小，发生急剧震荡，造成舰体倾斜。不成想钓床箱及铁栏的金具向左右分离，同时看见它的下方火焰腾起，白烟飞腾，一时间朦朦胧胧咫尺难辨，本舰前部向海底沉下。巡查前部水雷室，下甲板下降，发出异臭烟气，使人窒息，四周狼藉，到处是火。有人大声呼喊防火队，帮助救火，士官以下力夫开始忙于救火。请人到前部水雷室救助重伤患者，升梯到上甲板，然而上甲板及艇端里面也在燃烧着，又忙于帮助救火。士官办公室虽已被火烧黑，仍作为安置重伤患者，桌子上、地板上、椅子

¹⁶ 日本古时的计量单位，一坪等于三点三〇五八平方米。

上横七竖八躺着重伤患者，治疗人员没有立足之地。伤病员时而叫喊口渴，时而呻吟着。有二三个重伤者看见我进来不断地向水雷长叫喊着要水，我就用陶制茶壶装着水，给重伤患者喂水。已失去战斗能力的士兵还询问着“定远”、“镇远”舰的情况。一个看不清容貌者叫我，辨别不出是何人坐在长椅上，喊着自己的职务和名字——“我是大石候补生”。我听到呼叫，抬腿通过重伤员，急促地到了下甲板炮台，让他脱掉衣服，全身已烧黑，胸部以下二寸处受伤了，出血很多。他要着水，在此时难以讲究礼数，用平生不同的语调说“我遗憾”，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然而舰内各处，有索水声或痛苦声。有二人因原来的水兵服肥大，火烧的面积也大，破裂肥大的衣服，他们觉得痛苦万分。水兵们忍着痛苦用小刀割下粘在身上的衣裤，有时粘在衣服上的肉皮也同时被拽下……。重伤者六、七人很快死去，室内稍微安静了一会。这时在桌子上的一个人，因热心于佛教的人，他端坐在桌子上，双手合掌，唱起南无阿弥陀佛。

四时十七分，“松岛”舰从檣头降下旗帜，告诉各舰独立行动，改为“桥立”舰为旗舰。“松岛”舰死者五十七名，伤者五十六名，在这次战役中“松岛”舰战死的官兵占总数的一半，伤者占三分之一。¹⁷

木村浩吉大尉的回忆，记录详细，图文兼有，颇具权威性。“松岛”舰重伤并非仅“定远”舰、“镇远”舰之功，它是在被“平远”舰大炮两次击中的情况下，“定远”舰、“镇远”舰又趁势击中“松岛”舰关键的一炮，使其失去战斗力。遗憾的是，过去一些史料和论著没有提及“平远”舰的功绩。

¹⁷ 木村浩吉：《黄海海戦ニ於ケル松島艦ノ内状況》，东京：发行者内田芳兵卫，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第七、一一至二二页。

《罗雪堂合集》出版

闻 鲤

张本义萧文立两先生编纂的，目前最为全面精善的罗振玉学术论著的总汇《罗雪堂合集》，今年已由华宝斋书社宣纸线装精印出版。一代宗师一生心血庶乎得以保存，后世学者亦可坐拥研究中华固有学术不可或缺之武库。这实在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重大事件，将对今后学术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学术重镇王元化先生欣然泼墨题签，并题词“国故瑰宝，新知膏壤”，国学宗师饶宗颐先生也题词“承先启后，百学湛深”。

罗振玉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稽古拓新、既开风气又最为老师的学术大师，是连接中国传统朴学与近现代社会人文学术的桥梁，学术研究领域极广，创获极多，又是中国文化史搜集、保存、整理、刊布学术资料最具贡献的一人，同时是与予世界学术主潮的开风气者，是泽古多通、五体皆能、首开甲骨文书法、兼擅篆刻且书风纯正的书法大师，是嗜古多藏、别具只眼的收藏大家；颇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他还是现代教育、现代农学研究与实践的先行者。罗振玉在学术史的这种极其重要的地位，得到同时及后来中外学术界一致承认和推崇，包括在政治上和他势不两立的傅斯年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内。法兰西学士院曾推选他为通信员，日本汉学京都学派更是深受他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学门要请他担任考古学导师；交游如伯希和、沙畹、内藤虎、神田喜、沈曾植、蔡元培、柯劭忞，都是学术大师，王国维、容庚、商承祚、唐兰、柯昌泗昌济都是从他问学而卓然立立的大学者，子弟中也有振常、福成、福棻、福颐、庄、继祖等学者诗人；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傅斯年、张舜徽、胡厚宣、谢国桢等对他的学术贡献和地位都有具体的肯定评价。

罗振玉一生论著编述三百四十多种，开拓了殷虚甲骨、石室遗书、流沙坠简、大库史料、熹平石经等新兴领域，对寰宇碑刻、冢墓遗文、三代古器，以及传统四部诸学，也涉猎广泛。但他一生是以传古自任，栖栖皇皇，席不暇暖，传刻古图书刊布新材料在六百四十种以上计一千五百八十九卷，而自己的著述，除随时结集刊布者外，未能亲手整理彙纂。身后除部分

图录翻刻不绝外，著作几无重版，遑论整理。当时所印，数既寥寥，且多有未能流布者。晚年退居旅顺将军山，大连光复时，藏书大部分六千麻袋被中国共产党旅大地方组织及人民政府接收，捐献大连图书馆，统藏书九万馀册、家刊四万馀本，其中许多著述尚未来及发行，后来才由馆方陆续拨付转让国内各图书馆。二十世纪中后叶，台湾曾出版《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一百四十短册，虽开创之功不可没，而搜罗不备，择别不精，刊印粗略，著述编刊混杂，误收失收兼有，且大陆极罕流传；编纂出版完整全面精善之罗振玉全集，此正其时。

《罗雪堂合集》广泛搜集其已刊著述未刊稿本及佚文，整齐划一编订为三十八函一百九十册，影印排印，宣纸线装。这不仅是罗振玉学术论著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出版，而且规模之大制作之精，也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异数。论其特色，约有四项，一蒐罗最全，二别择最精，三版本最佳，四印制最优。

蒐罗最全 第一是总数最多。《合集》收录编者所见罗振玉学术论著统一百七十二种，凡文集十六种专著一百五十六种。与学术无关的诗集未编入，所编纂的图录，考释编入本集，图录将另行编次为《罗雪堂香古图集林》。

第二是整理最力，新编凡十九种，包括整理手稿、增订重编、改编、汇集佚文各种形式。据手稿或抄稿第一次整理发表的七种，为《扶桑再游记》《雪堂纪年附自书履历》《读积古斋钟鼎彝器文字札记》《陆庵杂记》《归梦寮日札》《贞松堂藏书画目》《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周书》。增订重编的三种，《新编唐折冲府考补》《海东金石苑校语》《虞山人诗校记》；其中《唐折冲府考补》荟萃雪堂一生三十年精力，先后补订十二稿，刊行八次，最后统一增补编入劳氏原书内，刊入《百爵斋丛书》，而世人不察，包括其冢孙罗继祖先生在内，都以为刊入《辽居杂著乙编》者为最后定稿，今则由编者从《百爵斋丛书》本中录出，方为真正定本。改编一种，《偃庐日札补遗》。佚文新编三种，为《贞松老人贖墨》《雪堂教育论集》

《农事私议外篇》，共蒐罗编者所见佚文二百多篇，后二者将引发对中国近代教育史及农学史的重新认识。新编法书及印谱二种，所收法书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质量之精美，雪堂治印之全面，将给书法篆刻界耳目一新的冲击。书信三种，为《永丰乡人家书》《永丰乡人手简》

《永丰乡人书札致观堂》，更囊括编者已见之家书、手简及致王国维书信，都一千一百二十三通，蔚为大观，对中国近代学术及政治史之研究，将提供一大批具体新鲜的宝贵史料，尤其是罗王二人关系公案之研究，将因此全面改写定论。且此三种，编者前都曾编订出版过，此次重新增订，《家书》《手简》多有增收，分为二种，《书札》前编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时，不但未附手迹，当时根据的只是手迹的单色缩小复印件，多字辨识不清，此编则据原色电子扫描件重新释读，纠正前编错误不下一千多处，足为定本，此编出，前本可废；

均附收手迹，不啻罗氏书法大全，可与法书集并观；更考订人物，方便研索，又言简意赅，决不枝蔓，一扫此类图书滥抄词典的痼疾。

第三是正本清源，收录雪堂以他人名义出版的著作三种。为《希古楼金石萃编》《海东金石苑补遗》并《附录》和《傅青主先生年谱》。也可为罗振玉学术上光明磊落，决不屑于攘夺他人心血的左证。

第四是补充台湾本《全集》之阙失。《合集》所收，台湾本未收者凡三十四种。除上款所列外，尚有《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南宗衣钵跋尾》《读碑小笺》两板《存拙斋札疏》《鸣沙山石室秘录》《芒洛冢墓遗文五编》《关中冢墓遗文》《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庚子京师褒恤录校记》及《补遗》《清文雅正》《杜诗授读》《农事私议》。

第五是收录时人及亲属所著传记资料，及罗振玉著述藏书刊书各种目录等附录共十五种。其中台湾本未收者凡十一种，为《永丰乡人行年录》《陆广所著书目》《松翁著书目》《罗雪堂著述总目》《貽安堂书目》《贞松堂校刊书籍目录》《贞松堂校刊群书解题》《大云书库藏书目》《唐风楼藏书目》《大云精舍藏书目》《雪堂藏旧刻旧钞善本书目》。其中亦多未刊稿本和罕见家刊本。《大云书库藏书目》为罗王东渡日本时，王国维所编，原稿已失，今据仅存钞本排印，《唐风楼藏书目》《大云精舍藏书目》据稿本影印。诸书目不仅是中国图书文献史之珍贵资料，还可以供物价史之研究，更足以破历来哄传罗振玉图书定价昂贵垄断学术之无知妄谈。

别择最精 《合集》分类编次。凡十二类又附录。分类或依体裁，或依题材，兼顾罗振玉学术研究之实际与读者使用方便，类目容有交叉，亦未强求一律。为方便读者，编者还在卷首冠以十馀万言之《罗雪堂自称集释稿》《罗雪堂著述述略稿》及《编纂说明》，总结罗氏所用字号，详尽介绍其著述之版本与内容。前两文，均为首创之作，信息丰富，体例精善，裁断审慎，要言不烦。

版本最佳 罗振玉著作多为家刻本，随著随刊，且精益求精，叠经增订，版本繁曠。本编均比而勘之，尽量依据最后校订本。若先后版本，异同甚夥，则兼收并蓄。选用版本情况，详列于书首之《编纂说明》。

第一种，据最后刊本者。《鸣沙山石室秘录》凡七刊，累次增订；《淮阴金石仅存录》后增订改编为《楚州金石录》；《海外贞珉录》《瓜沙曹氏年表》各两刊，《高昌鞠氏年表》《万年少先生年谱》《徐侯斋先生年谱》《隰西草堂集拾遗》各三刊，均选增订本，《隰西草堂集拾遗》罗继祖先生也以为《明季三孝廉集》本为最终定本，编者发现，民国二十二年铜山董氏刊之《隰西草堂集》卷十方为最后定本；《国朝文范》《清文雅正》二刊而实为一书，则选

略有增补之后者。

第二种，以一本为主，兼顾他本者。《存拙斋札疏》第一版三则为定本所删，今选用定本，而以此三则并有改动之一则附存。

第三种，各本自具特色，兼收并蓄者。《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南宗衣钵跋尾》所收后收入《永丰乡人稿》，然有刊落者，收录者文字异同也很多；《读碑小笺》凡三刊，第三版所收较第一版多六十四则，故选此两版；《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较初版增改一千馀处，且衍生出近代学术史众说纷纭实游谈无根而谬说至今流传不绝的最大公案；《集殷虚文字楹帖》初版及汇编本虽都为罗振玉手写，而初版文字甚大，足为甲骨书法范本，汇编本搜罗更全；熹平石经成书凡十六种，刊行八板，今选用其先后综录的两种。

罗振玉著作或列入所编丛书，或列丛书之名而无其实，亦有单行者，《编纂说明》一一标明。刊行者及年代，都依据原书牌记，无牌记则阙如。

印制最优 《合集》所收，罗振玉自编成集者原貌影印，既避免如今无错不成书的麻烦，更有赏心悦目的美观；未刊稿本准稿本排印，新编佚文亦排印，则经过编者三番五次的精心校勘，虽不敢说没有错误，却总可以自信胜过眼下书籍；书信三种，有手迹者，均影印与释文同收。总而言之，力求信今传后。

罗氏刊书，绵延一生，装帧用纸，自多差异，不便收藏利用；《合集》统一版式，三十八函如一，印制精湛，媲美原版，不仅视台湾本之简陋，胜之倍蓰，也堪称国内古籍整理出版中印造质量的白眉。手此一编，可实地体味感悟前贤精心呵护之中华传统文化之芳菲馥郁，所谓书香袭人，端在此中，故乐为之鼓吹介绍。

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戴立强

—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艺术史上占重要地位。但历经厄运，“元代及以前之真迹，留世者为万千仅得其一，明、清真品，百十存其一二”¹。值得庆幸的是，自汉至近代，著录或传世的成卷或单独成篇的中国绘画的论著达数千余种。

这些著录类书籍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一些失传的书画作品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使后人可领略其大致风韵。另一方面，借助其中的真实记录，可以考察一些古代书画的递藏情况。例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及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²对《唐欧阳询行书梦奠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详尽记述，是书画鉴定学和收藏史学难得的资料。

因此这些书画著录类书籍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时作为文献传承的载体，可以弥补它类文献之不足，有助于文化史的研究。

二

辽宁省博物馆度藏丰富，其中尤以书画类见长。例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出的七十二件珍品中，就有三十余件收藏或曾经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前身为东北博物馆）³，由此可见本馆书画藏品质量之高。

¹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弁言。

² 此三种书分别见于《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〇年）第二、三、四册。

³ 其中著名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即由书画鉴定学家杨仁恺先生从库房中发现与鉴别出来，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些藏品包括，一九四五年溥仪从长春伪宫携逃被缴获的一批历代法书名画；一九五二年又征集了一些长春伪宫散佚的书画作品。此后，为了充实馆藏，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并得到了周怀民等鉴藏家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辽宁省文物店等单位的支持，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更加改观。每念及此，人们对本馆杨仁恺先生等文物工作前辈的创业精神，莫不肃然起敬。

《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以下称《书画著录》）由辽宁省博物馆编写，辽宁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初版。全书分“书法卷”与“绘画卷”两册，前者收录自晋《曹娥谏辞》迄清《魏燮均行书屏》，凡一二三件；后者收录自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卷》迄清《黎明仿丁观鹏法界源流图卷》，凡一四七件。每件作品著录有：（作品各部位）“尺寸”、“画心”（内容描述）或“书心全文”、“书法特点”、“题跋”、“鉴藏印记”、“历代著录”、“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等栏目。

与以前的著录典籍相比，《书画著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所收录书画作品，均经过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鉴定，其真实性多为学术界所首肯。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真假相杂，珠目难辨的情况。

（二）图文并重，使读者可通过图版观赏书画藏品，具有较强的直观性（虽然为黑白图版，且一些图版不够清晰）。

（三）“附记”中提供了与题跋及收藏者等有关的背景资料，其中的考证，虽为一家之见，亦足资参考。

《书画著录》集十馀位学者之力，费时数年而编辑成书。称其开内地文物收藏机构书画著录之先，有利于艺术鉴赏与艺术史研究，应不为过誉。

三

除了图版不够清晰、存在相当数量的错别字及一些病句而外，《书画著录》还存在一些稍微突出的缺陷。以下试分类举例。

体例不够统一。

（一）《书画著录》“序例”云：“本书编排，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每件作品中列有画心、跋文、鉴藏印记、历代著录、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

先说“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书画著录》书法卷收录《明李应祜等书观大石联句诗册》、

《明程南云行草书千字文册》。据书中“作者小传”，李应祯生于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关于程南云的生年，《书画著录》中《明程南云行书千字文册》“附记”云：“……然从款识中得知书于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自谦‘馀四十年未得点划（“划”，原迹为“画”——引者注⁴）之妙一二，深慨书法之难’。从中可推知大体书写年岁和出生年代……也就是说程南云写此千文在六十岁左右。”如此推算，程南云生年在明洪武前期，早于李应祯五十多年。“附记”又云：“程南云写此千文在六十岁左右”，其时李应祯尚十一岁。不知为何将程南云排在李应祯之后？

再说“作者小传”。按书前“序例”，“作者小传”本应排在各篇末“附记”栏之前。然而，《书画著录》绘画卷中的“作者小传”多数见于篇首。且于小传中，有的先记作者生卒，再记作者字号、里籍；有的则先记作者字号、里籍，再记作者生卒。前后体例，很不一致。

（二）“序例”还云：“一位作者如有多件作品被著录，作者小传仅在首篇文稿中出现。”然而，《书画著录》书法卷中分别著录王铎书作三件，傅山书作二件，伊秉绶书作二件，然而，此三人的“作者小传”却出现在每人作品著录的第二篇中，可谓“序例”与著录的内容，各行其是。

（三）绘画卷中《明蓝瑛 刘度 陈洪绶山水人物图册》，不仅破例将题跋者高士奇列入“作者小传”之中，而且，又破例在同一篇中分出四栏“历代著录”，每栏所记均为“《辽宁文物》（总二期），一九八一年。”其实，《辽宁文物》（总二期）所载者，正是本篇“有关文章”栏中所记“《清初高士奇旧藏陈洪绶、蓝瑛、刘度的三幅小画》，《辽宁文物》（总二期），一九八一年。”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有何必要在同一篇著录中再三再四地提及？

（四）绘画卷《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有关文章”条云：“《征集工作小议》，《辽海文物学刊》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从题目即可以看出，《征集工作小议》与《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并无多少关联。再者，《征集工作小议》中所提及的书画作品，除《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之外，尚有《明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卷》、《明唐寅悟阳子养性图卷》也在绘画卷内著录，然而这两件作品的“相关文章”栏中，并未提及《征集工作小议》一文。

所记一些史实不够准确。

（一）《书画著录》多数篇章的“附记”云：“……入清内府后，溥仪在（‘在’为衍字——引者注）逊位前，以赏溥杰为名，连同其他一些书画经天津运往长春伪宫。第二次世界

⁴ 程南云自题“馀四十年……”，即四十余年。例如，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玉田杨先生哀辞并序》：“……隐居教授馀二十年”。又：本篇“书心全文”栏，记程南云自题一处断句不妥：“……公（赵孟頫）实先文宪公（程钜夫）所荐先著作公，盖尝从学者也……”，当改为“公实先文宪公所荐，先著作公盖尝从学者也”。

大战胜利后，溥仪携逃至吉林省临江市为我军（个别‘附记’中‘我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引者注）截获……”。

这类记载关系到一批书画名迹递藏的史实，在记述上不得有半点的虚假与夸张。上引这段记述有三点不妥，其一，这批书画在天津滞留多年，直到伪满洲国成立时，才随溥仪辗转至长春，并非“经天津运往长春”。其二，何谓“我军”？遍查辞书，不得诠释，更何況后来之读者。据《中国东北通史》可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未到达吉林省通化地区⁵。其三，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中国，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词，始于同年九月。而此前，据溥仪本人回忆，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被苏联红军俘获于沈阳飞机场⁶。可见这批书画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溥仪携逃至吉林省临江市为我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获”。

（二）《书画著录》中一些“历代著录”栏云：“《中国明清绘画展览图录》，德国出版，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时，德国尚未统一，有两个德国，分别简称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批绘画作品于一九八五年一月至同年八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巴登-巴登、科隆和汉堡等三地美术馆、博物馆展出，该图录由这三家机构在展览期间联合出版。说该图录一九八五年“德国出版”，令读者难以查寻。

一些作品名称不够确切。

（一）一件书法或绘画的作者，是作品名称的重要部分，如果某作品的作者不详，应当在名称中标识“佚名”字样。例如，《书画著录》书法卷中“《晋曹娥诔辞卷》”，当改作“《晋佚名书曹娥诔辞卷》”；绘画卷中“《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当改作“《北宋佚名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二）“设色”或“水墨”，是古代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一件作品名称的组成部分。《书画著录》绘画卷中，仅有几件作品的名称标明“设色”（如“《清王铎设色山水图册》”），其它作品名称中均无“设色”（或“水墨”）字样，因而显得不够准确。

（三）书法卷《宋米芾行书天马赋卷》“书法特点”栏记曰：“此卷为米芾行书的古临本……”。既然是一件临本，应当将作品名称改成“《宋米芾行书天马赋卷（临本）》”，以便使读者从名称中就知道这是一件临本，而非米芾的原作。

⁵ 佟冬主编、刘信君等分卷主编《中国东北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第六卷，页六九九。

⁶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页三八六、三八七。

(四) 绘画卷《明沈周催菊图卷》(目录中标出“原名《沈周盆菊图》”——引者注)。卷中沈周自题诗云:“盆菊几时开,须凭造化催……”,可见,此卷《石渠宝笈》续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续集》著录为《沈周盆菊图》,《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七·明代绘画(中)》名之《沈周盆菊幽赏图》,并无不妥。随意将“盆菊图”改为“催菊图”,容易引起混乱。另外,将此卷中的清乾隆题诗与印记列入“画心”栏内,也欠妥当,应将其列入“跋文”栏内。

(五) 书法卷《明陈元素和行书王维辋川诗卷》。此名称不妥。王维原诗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陈元素所书内容为王维、裴迪各十六首诗,其卷后题识也说“每题二章,前王后裴”。因《辋川诗》已为后人皆知的唐人名篇,故此卷当名之为《明陈元素行书辋川诗卷》。

(六) 书法卷《清魏燮均行书屏》。此名称不够确切,据所书内容,当改作《清魏燮均行书论唐人书屏》。

一些提法有欠妥当。

(一) 《书画著录》设有“画心”一栏,以文字描述绘画作品的内容。《清高其佩怒容钟馗图轴》“画心”栏云:“画钟馗立像……给人以周身气冲牛斗之感……恰与双目所视目标一致,把观者视线引向画外,使人联想……”。此段描述的主观意味太浓。作为绘画内容的文字表述,一定要尽量客观才是。

(二) 绘画卷《清龚贤一道飞泉图轴》“附记”云:“此图……一九八八年中央书画鉴定组……”,其中“中央书画鉴定组”,当改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

(三) 绘画卷《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作者小传”栏云:“陈鉴如,元……”,然“附记”又云:“清《秘殿珠林》定《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为陈鉴如所作,实误。”既然此卷作者非陈鉴如,为何又列其生平列于“作者小传”栏内?可谓知误再误。

(四) 《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跋文”栏,原迹题跋释文:明余鼎题“竹林大士出山图记……茶毗则有紫(衍文)神光照夜……非由(衍文)赖天望日”。“衍文”,指因缮写、刻版、排版等错误而多出来的字或句子。可见,在书法墨迹释文中运用“衍文”一词,很不恰当。根据原墨迹,当改为:“茶毗则有紫(点去)神光照夜……非由(点去)赖天望日”。

(五) 绘画卷《明何浩万壑秋涛图卷》“附记”云:“何浩款下有‘五羊东溟图书’印。‘五羊’系广东,“五羊”为今广州市的别称,并非泛指“广东”。该卷“附记”又云:“《石渠宝笈》把此卷定为宋何浩所作,不妥。我认为……”。一部集体创作、以辽宁省博物馆名义出版的著述,行文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出现第一人称代词“我”。

(六) 《书画著录》中多数“历代著录”栏云:《辽宁文物》某年某期,《辽海文物学刊》

某年某期。这两种杂志所刊载者为多种类、多学科的论文或报告等，并不属于著录类文献。将其中刊载的文章列入“历代著录”栏，而未列入“有关文章”栏中，不太合适。

图版存在的问题。

(一) 绘画卷《北宋宋徽宗瑞鹤图卷》中释来复的诗题，原为白纸黑字，图版显示的却是白字黑地，或是将负片当作反转片排版而造成此结果。

(二) 绘画卷中《北宋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卷》与《南宋明皇击毬图卷》两件作品的引首图版使用了同一幅照片，上题“龙眠真迹”，署“中书舍人金湜”。而前者的文字说明为“引首……黎明表八分书‘龙虎真迹’”，可谓张冠李戴。由此可见编校时的粗心程度。

《书画著录》“序例”云：“本书成书匆遽，疏漏舛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海涵斧正。”对于书中“疏漏舛误之处”，请求读者“海涵”，不是作者应取的态度。所云“成书匆遽”，似为推辞。《书画著录》序言署一九九二年三月，出版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其间六年有馀，完全有机会对书中内容再三斟酌、推敲和校核，使之缺陷减少到最低限度，力求尽善尽美。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总而言之，通览《书画著录》全书，收益甚多，虽存在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玉；而个中教训，当为新版《辽宁省博物馆书画著录》之借鉴。